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权利之争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前 言

权利，力量无穷，魅力极大。追权逐利，无人不为，唯所为不同，这在古今皆然。权利，可使人乐，可使人死；可使人乐，可使人悲；可使人富贵，可使人贫困；可使人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造福人类，富国利民，流芳百世；也可使人干尽坏事，贻害人群，害国虐民，遗臭万年。之所以出现如此两极，在于权如何使用，利如何分配，以及追权逐利的动机和目的。而能否正确使用和对待权利，在于为公或为私，其关键是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

干任何事情，手中无权难于办好。想要为国家为人民做好事，无权也不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赋“归去来兮”，纵情山水之间，好像他讨厌“权”而只乐于追求自然之美，其实不然。如果陶渊明不想有权，何以出任县令？他原是个极有抱负的人，有志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众人皆醉我独醒”，又能起多大的作用，何况他只不过是七品芝麻官，权力极其有限，不可能改造那个乱糟糟的世界，他自己又不愿意同流合污，卑躬屈膝于高官贵戚之间，自损人格，只能归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如果陶渊明不是当“五斗米”的小官，而是当大官，权可御天下，能做于国于民有利之事，他是不会在南山之麓隐居的。

无利之事，任何人也不愿干，有利可图，人才有劲；当然，各人情况、素质不同，追利的手段、目的也不同：有的谋公利而忘私利，这是人最崇高的品格；有的先谋公利而后图个人之利，也应充分肯定；有的谋个人之利而不损公违法，属正当之事，无可非议；有的损公利以谋私利，则应完全否定。其实，公利和私利虽不一样，但是相关的，即谋好了公利，个人之利也在其中了。儒家则不管青红皂白，凡言利的都反对，他们鄙视利，把“利”和“仁义”绝对对立，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凡是言利的都列入小人之列。因此，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的回答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到外国去游说，不能有利于其国，谁想用你，要你干什么？何况在那战国时代，各国之间互相兼并，各国都在想方设法富国强兵，以免被别国吞灭，或征服别国，而不言利怎能富国强兵？而孟子却反对梁惠王言“利”，梁惠王必然对他所说的“仁义”不感兴趣，孟子到其他国家也同样碰壁是不足为奇的了。儒家学说的致命伤之一是把“仁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不是在“利”的基础上讲“仁义”，“仁义”也就空洞无物，于国于民无利。其实“仁义”和“利”是对立统一的，如果执政的能对人民施行仁政，做有利于国于民的事，就可使人民富裕安乐，国家繁荣富强。

权和利是密切相关的。掌好权，用权为公，对国对民的利就大，政局就稳定；如果以权谋私，就害国害民，政权就不会巩固，以至丧权。

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权的制约，也跳不出利的羁绊，权利是无所不关，无所不在，无所不与。权利对于每一个人，既可为福，也可为祸，人们对权利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应避祸造福，这时已对国对民都有利。

有鉴于此，作者从我国古代史中，探讨了权利的起源和发展、治乱与权利、权利之间的关系；总结了正确使用权利与否的经验教训，以及各个封建朝代因内部争权夺利给国家、人民、民族造成的祸害（见第一、二章），并将正反面人物进行鲜明的对比，说明人生价值最珍贵的是什么，最卑鄙无耻的是什么？（见第三、四章）

这本册子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二十五史”，也摘引自其他历史书籍。因权利牵涉的面如此之广，写作力求通俗，深入浅出，使广大青年能够阅读，故对所引用“二十五史”的资料，一般都翻译为白话，文字明白易懂的则照旧，对于关键内容和名句或极有文采的文字照原文摘引，但加以适当说明其意。其他三本小册子也如此。

权利学是一门极其博深的学问，以个人之认识极难穷尽其奥妙，错误在所难免，祈读者、专家指正。

霍雨佳

月 15 日写于海口胤园

自序

作为中国人，我们为伟大祖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感到自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祖辈辈遗留下了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丰富历史遗产，其中积淀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在这“优胜劣汰”的时代，中国人要想登上世界舞台占得一席重要的位置，不是依靠别的，而是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在竞争中智者胜，这个古老的真理，又为今天世界上的无数事实所证实。因此，开发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实践加以发扬光大，无疑是我们重要的历史使命。

古老的智慧不将之创新，就不能发展，“四大发明”诞生于中国，因没有很好利用，在中国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是，“四大发明”流传到了欧洲，促进了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出现。不前进就落后，落后就挨打，中国人正因此曾经尝尽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苦头。

智慧要积累和继承才能发展。这是因为人们认识每一事物，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思考；要证明一个真理，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考验；要有所发明，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试验。这就是说，经过我们的先人一代接一代对客观事物的努力探索，积累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民族智慧的素质是有所遗传的，故中国人的智商是较高的，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时将会发挥出来。事实正是如此，今天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在激烈竞争中出人头地，涌现了不少科学巨子和经济巨人；他们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结合民族智慧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为中华民族增了光。

可见，要发展必须继承。当今中国人要想在国际的各种竞争中取胜，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智慧。过去，每当发现自己落后时，便出现“学西方热”，对自己则“妄自菲薄”，只强调传统文化糟粕的一面，连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也否认了，有人甚至主张不读中国书。学习别国的优秀文化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但否认自己的优秀文化显然是极端错误的。笔者对此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的。在长达四十三年之久的记者、编辑生涯中，工作之余，我一直喜读古代书籍，尤其喜读“廿五史”。这是一套最完整的、最系统的、最宝贵的中国古代系列丛书，是二十五部纪传体史籍的总称，全部有三千八百一十一卷，共五千四百六十一万八千字。记述了上自黄帝起，下迄清代止的全部历史。这套古史籍的鸿篇巨著，既是祖国文化的宝库，也是我国古代智慧的总汇。将其中能启人智慧、广人知识、长人才干、供人借鉴的典例分类评述，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为此，笔者以“廿五史”为主，参考其他史书，撰写了《权利之争》，《攻心有术》、《人际是非》、《鹿死谁手》四本小册子，合称“智慧四书”。希能对读者有举一反三的启迪作用。

霍雨佳

1993年5月31日写于海口胤园

权利之争

绪论：论权利

“二十五史”，概言之，“权利”二字而已。

国家的治与乱，集团的合作与分裂，家庭的和睦与内讧，朋友的相好与反目，无不与权或利有关。人际间一切事情，几乎都受到权利的操纵、干预或制约。

权利是“出尔反尔”，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建设世上乐园，也可以建造人间地狱；可以使人流芳百世，也可以使人遗臭万年。之所以如此，决定于人们如何使用和对待权利。

权利对人们的关系如此之大，探讨权利学和正确认识和使用权利，显然极其重要。

权利的起源和发展

权和利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先后出现，逐渐结合，逐渐增大，权越大利越大。在母权制，子女知母而不知父。这时是以妇女为主的，她负责管理全村生活，这种管理可以说是“权”的萌芽，那时是有“权”而没有利。因全村人劳动所得只能很勉强维持一村人的生活，谁要多占就会使别人挨饿，利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在母权制时，只有管理“权”而没有利，所以说，“权”的萌芽早于利。在父权制，出现了家庭，男人处于支配的地位。推举的部落酋长不只有处置成员之权，甚至有决定战争的较大之权，这时有实际意义的“权”才产生，且部落的成员比母权制时的成员的人数多得多，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且有交换，酋长利用其手中之权，占有一定的剩余产品，这样“利”就产生，这时“权”与“利”才开始结合，但是权不大，利也不大。到国家出现后，国王的权利比酋长的权利更大了，但在最初的国家里，国王的权利是有一定限制的，因其部分权利分散在诸侯的手里，国家虽受到诸侯的尊重，但还不能随心所欲，我国的周王朝就是这种情况。自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的权力空前膨胀，一切权力都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天下所有一切都是皇帝的，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其权极大，其利也极大，因之当皇帝的，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人们是多么羡慕皇帝的高贵的享受，有志气有野心的都想当皇帝，只是有的怕灭族不敢想，不怕杀头的就心向往之，如项羽看见了秦始皇出游那样威严雄壮，不禁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也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此也。”后来项羽果然领江东八千子弟反击暴秦，刘邦也斩白蛇起义。秦始皇因其权利无限，权独掌利独吞，迄二肚更甚，人民活不下去，便跟项羽、刘邦等人造反，不承认其权，不为其利，秦传二世而亡。但从此皇权至尊、得利最大的制度一直传下来，即使如此，有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却不敢乱用，有权不敢自专，能纳臣下的谏净，有利不敢享尽，照顾到人民的利益，这说明他对权利有正确的认识，因过分使用权利将会亡国。迨宋时，强化中央集权，但宋太祖对臣民还宽容，是一个比较关心人民的好皇帝。明时中央集权的制度更完整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是绝对专制主义者，他把一切大权都独揽在自己的手里，他谁也不相信，只相信自己，加上他是个猜忌狂，害怕别人夺取明朝天下，竟将跟他打天下的功臣几乎杀个精光，仅胡惟庸、兰玉两案就杀了四万五千多人。其杀功臣手段之狠毒，可说是空前绝后。但明太祖与秦始皇有所不同，虽然他两个都是独裁者，而秦始皇是独吞天下之利，竭天下财力、物力以奉己仍嫌不足；明太祖却不扰民，轻徭薄赋，让人民休养生息，人民安居乐业了就不会造反，故他虽滥用权力大杀功臣而天下晏然。当然明太祖立下的极端专制制度对后代影响是极坏的。

由于皇帝的权利无限，其魅力极大，“取而代之”是一些有雄心壮志或有野心的人的最大愿望。而在同一个皇室内部夺位之事也经常出现，为了争当皇帝，即争大权夺大利，一切封建伦理道德都被丢到九霄云外，如胡亥为夺帝位，与赵高发动沙丘政变，矫诏杀兄扶苏，又为巩固帝位，将其兄弟姐妹几乎杀光；西汉“七王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也是为争帝位而骨肉相残；杨广为夺帝位，弑父杀兄，毫无人性；宋代，赵匡胤留下“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在中国古代史上，为谋私而争权夺利，大都祸国殃民，而其中

的首恶大多逃不了脑袋搬家的报应，有的生时虽侥幸不受惩罚，但终受历史的判决，臭名永扬。

权与利的关系，利是基础，追权正是为逐利；如果有权而无利，人们就不会那么热衷于权。吕不韦破产帮助秦国公子异人立为太子嫡嗣便能说明这个问题。吕不韦到邯郸经商，碰巧遇见秦公子异人质于赵国，知他境况不佳，把他视为“奇货可居”，想利用他来赚比经营珠宝更大的利润，便回去跟他父亲商量。据《战国策》记载：他问其父：“耕田获利多少？”他父亲说：“十倍。”他又问：“经营珠宝能赢几倍的利润？”他父亲说：“百倍。”他再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赢几倍的利润？”他父亲说：“无数。”他说：“竭力耕田，不得吃饱穿暖，今定国立君，其利无数，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正因“定国立君”取得政权可获“无数”的利润，吕不韦才破财帮助异人，如果利润不大，这位大商人是不会于这种事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要有无限的利就必须有无限的权，吕不韦正是为取得“无数”的利，帮助异人先取得无限的权。权和利是密切结合的。权是手段利是目的，人们争权正是为夺利，这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而皇帝的权利不受限制，权无限利无限，正是封建社会反复出现争权夺利事件的主要原因。

治乱的交替与权利

周秦以来，近三千年间，由乱而治，由治而乱，一乱一治反复交替，究其原因，都与对权利正确使用与否有关。乱之起，或因统治者滥用权力，独吞天下之利，人民受压迫受剥削到了极度，就要铤而走险，草泽英雄振臂一呼，四方响应，天下大乱，这时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分裂出来，混水摸鱼，逐鹿中原，秦、隋之末就是这种情况。或为争权夺利，统治阶级内部内讧，彼此反复拼搏，以至自取灭亡，如西汉帝党与后党之争，东汉外戚与宦官的搏斗。有的如群兽狂斗，致削弱自己，造成大乱，如西晋“八王之乱”使中国支离破碎，人民遭受战乱之苦，时间长达近三百年；唐后期藩镇割据，一直继续到五代十国，彼此互相征战，“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中国满目疮痍，残破不堪。以上两种乱因，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彼此兼有，却有主次分，即或主要是因滥用权力造成大乱，或主要是因内讧而自取灭亡。但其造成乱的根本原因，都是因统治者奢侈腐化，暴虐人民。每次大乱之后，终归于治，因逐鹿中原者，其中得人心又能顺应历史潮流的杰出人物，削除群雄、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必然落在他的肩上，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就是这种历史人物。除了秦始皇能统一中国而不能治好中国外，都能接受历代造成祸乱的历史教训，较能关心人民，采取一些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的措施，因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由于封建制度是传子，而皇子皇孙都是在女人和太监群中长大，只知享乐而下知人间疾苦，即使有良师教诲，懂得一些治乱之理，只是感性的知识，毫无实际经验；且这些皇子皇孙大多是酒色财气俱全，他们一继位，往往把朝政弄得乱七八糟，如辅佐非人，则更紊乱不堪了。于是前代的祸乱现象又重复，又由治而乱。在封建社会里，由乱而治，由治而乱，就是这样反复地交替。

对于人民来说，大乱是灾害和死亡，治世能使人安居乐业。探讨致乱的原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总结求治之道，因能治则不乱。大乱终会结束，是因人心厌乱厌战，较得人心的逐鹿者将会芟除群雄，统一中国。前代“载舟覆舟”的教训是如此明显，开国皇帝在主观上是记忆犹新的，认识也是深刻的，如不收拾人心，让人民安居乐业，将重蹈前代的覆辙。在客观上，因长期战乱，死伤狼籍，人民十不遗一，田地荒芜，满目疮痍，国民经济已陷于崩溃，如不改变这种残破局面，任何统治者都不能统治下去。由于这些主客观原因，开国皇帝大都求治心切，能以前代亡国为鉴诫，探讨治国之道，且取得较显著的成绩。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点治国成功经验：

一、搞好经济。食衣住行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解决了这些问题，人民生活才能初步得到保证。当然，要使经济高度发达，出现盛世，就需要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以发展生产力。经济搞好了，人民就安居乐业，社会就安定繁荣，动乱就不会出现，政权就日益巩固。因此，搞好经济是求治的第一要着，舍此而想求治只不过是缘木求鱼。两汉、隋、唐、宋、明在其开国之初，其求治无不从发展生产着手。其具体措施大都是轻徭薄赋缓刑，让人民休养生息。刘邦登基之初，人口比秦时减少一半，且大部流亡在外，生产已陷于停滞状态，人民苦得很，政府极其困难，连皇帝也不能配同一颜色的四匹马来拉车，将相只能乘牛车。面对社会如此荒凉、凋敝，不恢复发展生产，人民活不了，政府也统治不下去。因此，刘邦采纳了陆贾“无为而治”作为治国

的指导思想。所谓“无为”并非无所为，而是无所不为，即不要劳民不干扰人民，让人民有能力有时间去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这样人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就无办不好的事情。尔后文帝、景帝继续贯彻执行这一治国指导思想，才能出现“文景之治”。隋文帝登上帝位后，把发展生产和储积谷物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同时“躬履节俭”，使上下节俭成风。此外还采取了平均徭役，以法治国等一系列措施，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间，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人口也有增长，社会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财物达到库藏容纳不下的程度。据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古今称国家最富饶者，应为隋。”

二、能用人客众。乱世有乱世人才，治世有治世的人才，有的在乱世能称英雄，在治世则无；有的在乱世是英雄，在治世是名相，如汉的肖何、唐的房玄龄、宋的赵普、明的李善长，等等，他们对由乱入治部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在统治巩固后，开国皇帝大多屠杀功臣，功臣能充分发挥作用和善终的不多；不杀功臣的只有唐太宗、宋太祖二人而已。他俩都能用人客众，故唐宋两代号取得“两个文明”建设成就最大的朝代。而影响深远的，尤以宋太祖采取“重文”的治国方针为最。宋太祖是靠马上得天下的，对“之乎者也”的读书人是轻视的，后来在其处理政事的实践中，许多问题都要请教饱学之士才明白过来，得到了解决，才认为“做宰相要用读书人”，从此，朝廷军政职务都重用有才能的士大夫，并立誓不杀士大夫。所以，宋朝士大夫不用耽心杀头，敢言敢于，效忠朝廷。因而在历代王朝中，宋朝出现的名相忠臣最多，治世的成就也突出。

三、澄清吏治。官吏贪污腐化，是封建社会的痼疾，当其趋向极度时，标志着当时的封建王朝将寿终正寝。故每当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时，开国皇帝一般较注意澄清吏治，尽管其程度有所不同，贪污腐化现象也就有所减少。其中整顿吏治最有力的、打击最严厉的，要算明太祖朱元璋。元末农民大起义，与吏治腐败大有关系，起自民间的朱元璋对此是有深刻的认识的；而在明王朝刚建立时，不少功臣宿将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这种现象不改变，新政权将步元亡的覆辙。因此，朱元璋认为“这种弊端如不革除，要想施行善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召见文武百官宣布：“如今要严肃法纪，发现官吏贪污、虐待百姓的，坚决治罪，决不宽恕。”他用最严厉的手段对待贪官污吏，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梟首、剥皮实草之刑以示众，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史称：由于朱元璋严惩贪污，“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一新。”在明初吏治是较清明的，这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促进了“明初盛世”局面的形成。但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手段之严厉，缺乏完整的法律手续，不是核实事实后才定案，而是往往听特务的报告，由个人独裁。因此，他打击贪官污吏虽空前绝后，但其造成的冤案也是空前绝后的。这是不足为法的。

四、要善于纳谏。封建皇帝至尊至上，权力无限大，可以决定一切，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人民利害，以至国家盛衰兴亡。如果皇帝金口一开，便是圣旨，即使是错误，不容臣下进谏，不容更改，那么其危害之大可以想见。唐太宗恰与那些极端专制的皇帝相反，虽然他手中握皇帝至高至尊的做大权力，他并不独裁，即使他下了圣旨，也容许臣下提出异议，甚至他还规定，皇帝下的圣旨必须得到有关大臣的签字同意才能执行。这说明唐太宗有决定一切之权而不独裁，确有点“分权”思想和“民主”作风，这在封建皇帝中是罕见的，也是唐太宗最可贵之处。正因唐太宗能采纳臣下的谏净，纠正了

自己的许多错误，自己也就能慎终如始，保持了“贞观之风”——诚信纳谏。他之所以能如此，是由于他懂得一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他原以为懂得弓箭，经弓工向他说明弓理才知道自己对弓的鉴别不够精确，说：“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哪能都懂得。”因此，他经常鼓励群臣向自己多提意见，并虚心采纳。唐太宗经常与臣下讨论隋亡的教训，得出一条结论是：隋之亡最主要的一条是扰民，因此，他说话和做事，都非常谨慎和细心，凡属于扰民的，不说不做：他认识不到是扰民而说的和做的，别人提出了不同的正确意见，他就改正过来。他采纳了魏征的“偃武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意见，并作为治国的总方针，因而出现“贞观之治”，边境民族纷来朝贡，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使盛唐成为我国最强大、最繁荣的朝代之一。

两种相反的权利观

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同样，有什么样的权利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权利观有种种，但各趋两极的权利观有两种，一是权利为公，一是权利为私，两者虽只是“公”、“私”一字之异，但其所为、效果和后果及其影响截然相反。

历史上的不少杰出人物之所以永垂不朽，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他们具有权利为公的权利观，当他们手握大权的时候，能为国、为民、为民族争利，或英勇地捍卫国家、人民、民族的权利，为此而奉献其一生，以至自己的宝贵生命。正因具有这种大公无私的可贵品质，他们的思想才能升华到最高尚的境界，才能干出永垂史册的光辉业绩，他们的人生价值是最珍贵的，受到后人景仰不已，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们是不朽的。

能力国为民为民族争权利的，他自己对于权利一般是淡薄的，如果他热衷于为己争权夺利，就很难为国为民为民族争权利。“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的至理名言，是他身体力行的总结。正因其“淡泊”和“宁静”，才有高尚的志气和远大的理想。诸葛亮除了政府所赐的八百桑树和十五顷田，以及所给俸禄，不另增添一点财产，也不多拿公家一点财物，正如他所说“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而为统一中国，复兴汉室，救民于水火，贡献了其一生，确是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所谓大公无私，并非不讲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融化于国家、人民、民族利益之中。因为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包括在其中了。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少年时他便具有这种“先忧后乐”的高尚人生观。他从出仕途以至当上副相，他不为升官而喜，也不为贬官而悲，而是忧国忧民，在地方当官廉洁奉公为民解忧，在朝廷上敢于直言，改革弊政，虽因此三次贬官而不改其初志，他以“天下为己任”的高风亮节，被人称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即使是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大多摆脱不了忠君思想，但其可贵之处是把忧国爱民跟忠君思想结合起来，对君王的言行有害国虐民的，敢言敢谏，甚至敢骂，虽然其出发点是为君王好，不致重蹈亡国的覆辙。魏征不管是事何主，都能为国家、人民着想，他不因曾是唐太宗的敌人的臣属而畏缩不言，一发现唐太宗所做不符合国家、人民利益。会步亡隋的后尘的，都进行谏诤，纠正了唐太宗的许多错误，“贞观之治”的出现，魏征是有大功的。唐太宗感其忠，誉为“人镜”。包拯之所以扬名后世，被人称为“包青天”，是因其刚正不阿、为民伸冤。他为官廉洁，最恨贪官污吏，他说：“清廉的官吏，是人民的榜样；贪污的官吏，是人民的强盗。”他执法大公无私，从不徇情谋私，不许人走后门，对亲友也如此。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即使是权臣国戚犯法，也敢于弹劾，在无官不贪、有冤无处诉的封建社会里，有包公为民伸冤，必然使百姓感恩戴德，把他看成救世主。尔后当人们受到冤屈时，总希望有个“包公”出现。他虽已逝世九百多年，其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高大形象仍活在人们的心中。海瑞是个忠君忧国爱民的典型。但在忠君、忧国、爱民三者中，《明史·海瑞传》作者指出，海瑞从政一生，“意主于利民”，这是正确的。由于嘉靖皇帝修道不理朝政，造成法纪松弛，吏贪官横，民不聊生，于是愤而上书为民请命，历数嘉靖的种种错误，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海瑞骂皇帝”。他任巡抚应天十府

时，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尤其是强迫乡官退还掠夺百姓的田地，使百姓有口皆誉。他眼见贪官盘剥、乡官掠夺，百姓日益穷困，主张，“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所谓“井田”实际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在封建社会虽是幻想，但海瑞的愿望是良好的，对农民是深表关怀和同情的。海瑞为人刚直，凡于国于民有利的都敢于，于国于民不利的敢顶，不只敢惩治贪官、抨击豪强、弹劾权贵，还敢骂昏君，这就是后人所赞颂的海瑞精神。

古代杰出之士，多具有“民本”思想，认识到爱民始能国治。历史上理财者多搜刮于民，国库富裕，人民则贫困，刘晏理财指导思想则以“爱民为先”，做到利国利民。他增加赋税，是先队扶助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生产着眼，增产增收了，百姓不用多出赋税而国家税收自增。并使各种产品货畅其流，不使“谷贱伤农”，或土产销不出去。救灾不是在成灾之后，而在灾情初出现之时，及时帮助农民生产自救，国家不用多费救济财物，灾害可及时制止。他及时掌握信息，采取措施调节市场使物价得以长期稳定。刘晏的理财措施，使国家和人民两得其利。他负责全国财政二十年，善理公财，不积私财，两袖清风，其廉如此！苏轼，人都赞其诗文绝妙，却少讲其廉洁爱民，其实，他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人文两美。他历知数州，为官清正，关心民瘼，为民伸冤，做了不少好事。他知徐州，洪水泛滥将淹没城，他奋不顾身，与军民一起卫城保民。他屡被贬谪，躬耕自食，与人民打成一片，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所任州府，人民都盛称其德。如杭州人民，家家有其画像，饮食必祝，还建生祠以纪念他。苏轼一生，不论升官或贬滴，都始终爱民，故处处得到人民的爱戴。

千古最难唯一死，能过这关的，则无所畏惧，无所不敢为。但不怕死并非都是好汉，“死有重如泰山，有轻如鸿毛”，以权谋私利或做坏事而死则轻如鸿毛，毫无价值，且遗臭人间；为国家、人民、民族而死，则重如泰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写的《过零丁洋》诗的最后两句，表示了他以死报国的决心。当国家危急之秋，文天祥挺身而出，起兵救国，挑起了抗金重任，不幸被俘，逃归又继续抗战，战败又被俘，尽管元统治者采取一切威胁利诱使其投降，文天祥岿然不动。这位状元丞相虽被元统治者杀了，但他“浩然之气”长存人间，力后人景仰不已。

在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我国涌现出不少民族英雄，林则徐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之一。当英国等国在我国大肆贩毒走私时，他深知将会导致中国亡国灭种的危险，愤然挑起了禁烟的重任，他在虎门销烟壮举，威名震中外。他预知英国将以武装入侵，早就做好战备，使敌人不敢正窥广东。清朝统治者被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的侵略吓坏，竟然假罪于林则徐将之撤职，向敌人屈膝求和。于是由林则徐掀起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以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而告终。但林则徐是不朽的，他揭开了近代史的中国反对西方侵略的第一页，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民族英雄。

当我们评述上述的权利为公而对国家、人民、民族做出不朽贡献的杰出人物后，再回顾那些权利为私而害国虐民，或为保位保官而卑躬屈膝、寡廉无耻的人物时，更觉得他们可鄙、可憎、可恶！这些人给予国家、人民、民族的是灾祸、罪恶，他们的人生价值一文不值，其生时被千夫所指，死后为人所鄙视、唾骂，遗臭万年。如东汉外戚大将军梁冀，他做官实是做强盗，他党羽满天下，贪污勒索也满天下，还嫌财聚不够快，竟公然抢夺别人财产；他专横跋扈，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连少年皇帝刘缵说他“此跋扈将军也”，

便被他毒死。后来恶贯满盈了，身死族灭，遗下掠夺的财产多达三十亿钱，是他贪污的铁证。蔡京因善于投饥取巧，得到徽宗的信任。他是个以权谋私的刮财能手，在他任相期间，想方设法用尽各种办法聚集财物，公开标价卖官鬻爵，到处搜刮奇花异鸟珍兽，弄得民不聊生。皇家和蔡京等的钱库盈溢了，君臣上下便纵情享乐，奢侈腐化日甚。人民不堪其苦，纷纷起来造反，金兵也趁机南下，北宋丧钟敲响了，蔡京末日也同时来到，在被贬途中，在人民唾骂声中死于潭州。秦桧是一个臭名永扬的大汉奸，由于他投降金人，是金人的忠实走狗，一心一意要颠覆南宋，他与宋高宗殊途同归、蛇鼠一窝，阻止岳飞即将直捣金人老巢，使功败垂成，并秉承金人意志，冤杀了民族英雄岳飞，向金人屈膝求和。秦桧虽生时侥幸不受惩罚，但这个民族败类，永远为后世唾骂。贾似道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他原是个二流子，因姐姐贾氏被宋理宗选入宫得不断升官，后竟独擅朝政，残酷压榨人民，生活荒淫奢侈，使朝政日非，国势日弱；元军南侵，他奉命率军抗战，怕死向敌称臣，不战而溃，成了出卖国家和民族的罪人。贾似道丧帅辱国，终被贬滴到高州，押送官郑虎臣恨其人，到漳州将之打死。严嵩则因其善于谄媚上，得到明世宗的宠信，在内阁二十年，专擅国事，弄得国家朝政腐败不堪；他贪污纳贿，鱼肉百姓，敛集大量财产，是个大贪污犯，他被撤职抄家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它珍珠宝玩值数百万两。魏忠贤只不过是个宦官，因与熹宗的奶母客氏勾搭而得到宠信，无耻的官僚都拜倒其麾下，组成一个臭名昭著的阉党，专权擅政，横行非法，排除异己，打击杀害正派东林党人。而阉党的官僚竟为其吹捧，立生祠遍布全国，甚至要以魏忠贤配孔子。一个目不识丁的卑鄙小人，竟被抬得这么高，这是明代的特殊现象，也表明了宦官专权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事败后，畏罪自杀。和珅是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他因与乾隆是儿女亲家而得到信任，国家大书都由他专任，利用其独特的权力，到处勒索，贪脏私饱。乾隆死，嘉庆继位，和珅的罪恶被揭露，抄家时其财产竟共值白银八亿——十亿两之巨！这数目超过清政府二十年收入总额的一半以上！还有张存义和冯道，这是五代时期一对待有的无耻之徒。张存义原参加农民起义。后投降唐朝，那时朝代更换频繁，他为保官，谁势力大就投靠谁，为讨好其主子，甚至让自己的妻子、女儿、媳妇陪其睡觉而不以为耻。冯道则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当大官时间长达二十多年，是五代官场上的不倒翁。主子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汉奸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著文记录其当官履历，自号“长乐老”，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第一章 权利为公利国利民

这一章评价了我国古代九位有所作为的皇帝。当他们利用其无限的权力做有益于国于民的事情，并对自己的私欲有所控制的时候，对社会或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些皇帝如唐宗、十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迄今仍令人景仰不已。世界上没有十全的事，也没有十全的人，包括古代最有成就的皇帝也不例外，有的明于此暗于彼，有的最优之点却是其缺点之源，有的功勋盖世而暴虐空前，有的主观动机为国为民但给人民带来灾祸，这些历史人物复杂如此，对他们要作辩证的分析 and 评价。我们在总结他们治国成功经验以供人们借鉴的同时，也指出其错误及失败的教训，以免后人重蹈其覆辙。因为历史的现象往往是重复出现的，虽然并非一样，但我们从其中的经验教训，可以“温古而知新”，这对于后人的治国不是毫无意义的。

一、为国夺权 秦皇一统

秦始皇继位前，秦已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具有兼并六国的有利条件。但在他亲政时突然发生一场叛乱，能否经得起这次考验，将决定秦国的命运和前途。有雄才大略的年轻国君嬴政以果断的手段，镇压了在大后荫庇下的嫪毐腐朽集团，并夺回军政大权，开始执行了他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

继位前的秦国

秦王朝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恨巨的过程，特别是经过秦穆公、秦惠王、秦昭王、秦孝公的奋发图强，招贤辅佐，使秦国逐渐强大，为后来秦王政统一天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秦原是古代的一个部落，舜时赐姓嬴。秦襄公是秦国的开拓者。《史记·秦本纪》记载：诸侯叛周，秦襄公将兵救周；周平王被迫东迁时，他又派兵护驾，因其有功被封为诸侯，赐给岐山以西之地。周平王对他说：“戎人占领我岐山和镐京一带地方（今陕西省岐山东北）。秦能驱逐戎人，其地尽归你所有。”秦襄公及其子文公进行多年的艰苦战斗，收回戎人占据的土地。但秦人完成其建国任务是在秦穆公执政之后。秦穆公广泛招贤，用百里奚、蹇叔的富国强兵之策，国势日强；用由于计进军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称霸西戎。他企图打通东进之路，争霸中原，曾与晋多次争战，各有胜负，但东进企图没有实现。打通东进之路和确立秦国在战国时的霸主地位是秦孝公。孝公继位时，与秦国并立的有山东（今太行山以东）的齐、楚、魏、燕、韩、赵六国。比之中原各国，那时秦国仍是一个地处西陲的落后国家，被视为“夷狄”，诸侯会盟时都不让它参加。孝公不甘受这种耻辱，决心进行改革以改变落后状态。他在对人民“布惠，振孤寡”，“招战士，叫功赏”，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公开发出招贤令：“宾客群臣中有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强大的，我将让他当大官，分土封之。”卫国人卫鞅听到这个消息后便西向入秦，求见孝公，说拿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勤战死之赏罚，孝公很为赞赏，大力支持卫鞅变法。变法之初，奉民苦之，过了三年，才感到变法的好处。变法后，秦国力量增强、屡次出兵挫败魏师。收复河西失地，打通东进之路。孝公又令卫鞅颁布第二次变法令：“‘为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在全国实行县制，把全国的小都、小乡、邑并为四十一县，由国王派县令管理。”这些变法措施对促进秦国经济及巩固其统治地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秦孝公统治时，秦已无敌于天打通东进之路后，摆在秦国议事日程的重要课题之一是：采取什么对外策略以一统天下？迄秦惠王、秦昭王时已基本确定了。由于秦国强大，中原各国听从苏秦的合纵之说，曾联合抗秦，以阻其兼并，秦惠王乃采纳张仪连横之策，根据形势和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先后分别与中原各国和解，各个击破，瓦解了中原各国的联盟，取得了重大战果。秦昭王时，魏人范雎入秦游说为昭王赏识，他主张论功行赏，因能授官，尤其是他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对秦吞并各国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事实，《史记》的《张仪传》、《范雎传》都有详细的记载。

从上所述，幸的强大是经过其好几代人奋发图强的结果。而后来秦始皇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其兼并策略，在孝公、惠王、昭王时已基本施行了，实践结果是卓有成效的。而秦之先人之所以能如此，关键是他们能广招

天下贤才为之策划，如百里奚、卫鞅、张仪、范雎等都是别国人，正因能集众智，秦国才富强，为秦始皇奠定了统一天下的丰厚物质基础，到他即位时，秦国已占有今陕西、山西、甘肃南部、四川以及河南和湖北西北部广大地区，掌握了丰富的物质资源。秦人对发展生产是十分重视的，如有计划开发巴蜀的钢铁，繁殖武威的牛马，这对加强军事力量和发展生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广泛进行水利建设，如著名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是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兴建的。由于广泛兴建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商业也很发达。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关中地区人民积极种植五谷”，“陇蜀商人多交易兴旺。”当时“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却只占十分之三，而其物质资源则占十分之六。”这说明秦国占地比中原任何一国都广大，其拥有的财富较之六国的总和还多。从当时秦国的国力、人力、智力来看，统一天下的任务已落在秦人肩上。问题是由谁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加冠后的夺权斗争

嬴政继位为秦王时，年仅十三岁，由太后临朝听政，实权则掌握在吕不韦和嫪毐手里。

吕不韦何许人也？《史记·吕不韦传》记载：

吕不韦是卫国国都濮阳人（今河南濮阳西南），他奔走于各国间，买贱卖贵，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商人。公元前265年，吕不韦经商来到赵国都城邯郸。这时，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在赵国当人质，因秦屡攻赵，异人受到冷遇，车辆日用简陋，处境较困难。吕不韦有一天碰巧遇见他，了解到他的情况，便把他视为“奇货可居”，想利用他来赚比经营珠宝更大的利润。于是这个唯利是图又很有政治远见的大商人便到异人的住所拜访，他一开口便对异人说：“我能使你发达。”异人听了一时摸不着头脑，便笑着说：“你自己还没有发达，那能使我发达！”吕不韦便开导他说：“你不知道，我的发达要等待你发达才能发达。”异人领会到他的话所指，便邀他对坐密谋深谈。吕不韦说，“秦昭王老了，你父亲安国君现为太子。听说你父亲最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而能立嫡嗣的只有华阳夫人。你有兄弟二十多人，你排行中间，你父亲安国君又不怎么爱你，让你长期在赵国做人质。一旦昭王去世，安国君继位为王，你那有可能争做太子呢？”异人说。“是啊！那又有什么办法？”吕不韦说：“你手头拮据，又客居于此，没有什么来孝敬长辈和结交宾客。我尽管不富裕，愿以‘千金’到秦国去活动，使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你为嫡嗣。”异人叩头拜谢说：“你如能策成此事，我将分秦国与你共享之。”

于是，吕不韦给异人五百金广交宾客，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带到秦国，通过走华阳夫人姐姐的后门，将之献给华阳夫人，说异人如何贤智，又怎样日夜思念太子及夫人，夫人听了很高兴。吕不韦又教其姐说夫人说：“凡女人靠美色得到宠爱的，年老色衰就会失宠。夫人没有儿子，何不在诸子中选孝敬自己的作为儿子，使他为安国君的嫡嗣，这样，丈夫在受到尊荣，丈夫百岁后儿子为王，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自愿来依附夫人，夫人立他为嫡嗣，夫人在秦则会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趁受到宠爱的时候，夫人只开口说一句话便行了，这正是说一句话便获万世之利啊！如果到年老色衰再说就迟了！”华阳夫人听了深以为然，便向太子说异人很贤明，来往的人都赞誉他，

并哭着向太子哀求说：“妾幸充后宫，不幸没有儿子，愿得异人立为嫡嗣，使妾终身有托！”安国君许之，便与夫人刻玉符起誓，确定异人为嫡嗣，并改名为子楚。从利出发又以利来说动华阳夫人的吕不韦，终于达到了其立异人为安国君的继承人的目的。

但是，这位唯利是图的商人，并不至此为止，他不仅是为立一国之主以获无数的利，而是还有很大的政治野心，他利用一种特殊的“美人计”巧妙地安插其子孙“夺取”秦王宝座。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个善于歌舞的绝色美人，待她怀孕后，邀异人饮酒，让美人陪酒，以引异人“上钩”。果然异人被其美色迷住了，请求吕不韦割爱，吕不韦佯怒一阵后才表示同意。美人也不告诉异人说自己怀孕，到期生了一个男孩，名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后来异人及其妻子回到秦国。秦昭王死，太子安国君继位称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皇后，子楚为太子。秦孝文王立一年便死了，太子子楚继位，是为秦庄襄王，美人为皇后，吕不韦任相国，秦庄襄王即位三年病死，太子嬴政立为秦王，由吕不韦辅国，号称“次父”，权倾朝廷封地河南食十万户，有家僮万人，富甲天下。

秦王政逐渐长大，而太后淫乱不止，经常与太后私通的吕不韦怕被发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为门客，将他假充宦者送入宫与太后私通，很得太后宠爱，被封为长信侯，得到山阳和河西、太原两地作封地。宫中事无大小皆决定于嫪毐，国事则决定于吕不韦，吕不韦和嫪毐是当时秦国的实际统治者。

对于吕不韦来说，他想要得到的权利都到手了，且是利无数，权无限，但是吕不韦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有其政治抱负。从秦庄襄王时任相一直到秦王政亲政前，在这十二年间，他采取了很多有益于秦统一的措施：他团结和起用老臣宿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不论亲疏，赏罚严明；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因而增强了国力，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他还集中宾客三千人编著《吕氏春秋》，这部巨著集儒、法、道、墨、兵、农、阴阳五行各派学说之大成，将之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创立了新的大一统学说，为秦统一天下寻找理论根据和制造舆论；同时也总结古代治国的经验教训，探讨了取得天下后治国的施政方针，以求得长治久安。总之，吕不韦虽为取得无数的利而进行政治投机，但在他取得权力后能正确使用，故能成为杰出的大政治家。他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思想理论方面对秦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促进秦的一统事业是立下大功的。

但是，随着秦王政的长大，他跟这位“次父”也是他的老师的思想观点日益分歧，矛盾也越来越大了。在思想观点方面：吕不韦不信神，秦王政信神；吕不韦重儒道，秦王政“以法为教”；吕不韦主张君任贤，秦王政主张君主集权。既然思想观点分歧如此之大，必然表现在政治上的对立。秦王政个性专断骄横又有雄才大略，他不会听从吕不韦的摆布，也不会让大权旁落，他和吕不韦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引起冲突的导火线是“嫪毐事件”。

所谓“嫪毐事件”，《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传》都有记载：公元前238年，有人向秦王政报告：嫪毐是假宦官，常与太后私通，生两个儿子，私自藏匿起来；嫪毐还与太后合谋要杀害秦王政立他们的私生子为王。秦王政听了，不动声色，伺机动手。秦王政二十二岁到亲政年龄了，便从国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到祖庙所在地旧都雍（今陕西凤翔南），举行加冠礼，之后住在蕝年宫。这时嫪毐盗用秦王政的御玺和太后的玺征发

军队，拟攻打蕲年宫，想杀死秦王政以夺取政权。他还来不及进攻的时候，秦王政已发觉，立即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前往镇压，两军在咸阳交战，嫪毐败走。秦王政向全国下令：有生捉嫪毐的，赐钱百万，将他杀死的，赐钱五十万。结果嫪毐及其死党被一网打尽：“车裂”嫪毐，灭其宗族，杀他和太后生的两个私生子，迁太后到雍地贯阳宫。其死党卫尉竭等二十人皆“梟首”（斩首后把头挂在树上示众），门客则没收其家产将之迁到蜀地。

在审讯中，知嫪毐是吕不韦所进，秦王政欲杀之，但念及他对先王功大，许多宾客又为他说情，才不置之于法，便令他到其封地河南（今河南洛阳）。吕不韦在那里一年多，各国国君的使者和宾客不断前来探望，秦王政恐其生变，写信斥责他说：“你有何功于秦？给你河南封地，食十万户。你有何亲于秦，号称‘次父’。”命令他，“你跟你的家属立即迁徙到蜀地去！”吕不韦知道难免一死，害怕杀头，就喝毒酒自杀了。吕不韦的死是悲剧性的，他虽与太后荫庇的嫪毐腐朽集团有一定关系，即推荐嫪毐于太后以代己，对于“嫪毐事件”应负一定的责任，但他并非其一伙，更不能将他和嫪毐相提并论。吕不韦是明知秦王政是他和太后生的儿子，他不支持秦王政而去参加嫪毐的叛乱，谋杀秦王政而让嫪毐与太后生的儿子为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掌权期间为秦国竭尽心力都是为了秦王政，这便是最有力的说明。

彻底粉碎了太后荫庇下的嫪毐腐朽集团，去掉了吕不韦这个不同政见者，秦王政把大权紧紧握在手中后，就着手进行由他领导的消灭六国的战争。

权力为公立盖世功

从东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即从公元前 770 年到公元前 221 年，时间长达 549 年，各国之间战争频繁，内乱不停，人民遭受的苦难是极其深重的。处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墨子指责说：“大国攻伐无罪之国，侵入其国境，割其禾麦，砍其树木，残其城郭。埋其沟洫，焚其祖庙，杀其牲畜。反抗的杀之，不抵抗的也俘虏而归，男女做各种奴隶，妇女做舂米酿酒的工奴。”（《墨子·天志下》）孟子揭露战国时战争的惨状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因此人心厌战趋向统一。孔子早就提出“大一统”的思想，孟子也主张全国统一，他奔走各国劝各国国王行仁义来达到这个目的，而这只是幻想而已。在当时息兵还靠用兵，谁能统一全国主要看谁的武力强大。

那时具有统一条件的只有秦国，荀子曾到过秦国，在他所著的《强国篇》里夸奖秦国民俗朴素，官吏忠实，大官守法，朝廷清静，是最好的政治；秦国军制，荀子也认为比别国好，《议兵篇》说：秦国以军功升进，不管是什么人，打胜仗的有赏，打败仗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争求军功。正是在这基础上，秦王政亲政后，能顺应人心和历史的潮流，采取正确的统一策略和建立巩固统一的制度，故能建立盖世的功勋。这体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一、统一天下。秦王政能采取统一的正确策略，是因他能用人和纳谏。因素强六国弱，六国合纵以抗秦，这对秦国是一个威胁，如不破六国之间的联盟，则难于兼并六国。因此。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破合纵之策和消灭六国，是秦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恰在这时，秦国人因“郑国渠事件”反对用旅秦客卿，秦王政也一时糊涂便下“逐客令”，曾向秦王政献“灭六国，成统一”之策的楚人李斯上书谏乃止，天下贤才始能继续为秦所用，为之设谋献策。

魏人尉繚、姚贾以及韩非等都先后来到秦国，向秦王政提出各种建议，其内容大同小异。概言之，以远交近攻破合纵，先灭韩、赵、魏，然后消灭其他三国。事先离间各诸侯国的君臣关系，用重金贿赂各国权臣，使其为秦所用；不接受贿赂则派刺客刺杀之，以削弱其实力，随即派良将率大军压境。秦王政很赞赏这些计谋，除韩非被李斯等陷害自杀外，其他人都得到重用，尉繚被任为秦国尉，主管军事；李斯任长史，上《谏逐客令》后升至廷尉。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十年间（公元前 230——前 221 年）先后消灭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并平定“百越”，结束了自西周、春秋战国以来七八百年间的封建割据局面，使中国政局出现了第一次大统一。

二、巩固统一。秦王政兼并六国后采取了许多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措施，其中不少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后二千多年基本上为各个封建王朝所沿用。

确立新的政治制度。他自称皇帝，其权力至高无上，从中央至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按照皇帝意志办事。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之一丞相领导“九卿”，协助天子理“万机”大事总汇于丞相，最后由皇帝裁定。另两公，一是太尉，主管军事；一是御史大夫，主管监察。三公各有其权，多不相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这种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尔后历史证明对巩固统一和促进社会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权力掌握在昏君手里，则会害国害民。

秦还彻底废除了西周的“封诸侯，建藩卫”制度，实行郡县制。这种制度的建立，是有鉴于西周分封而导致国家分裂、诸侯兼并、王室衰微的历史教训，但要建立这种制度没有破私立公的伟大气魄不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摆酒欢宴群臣，博士（官名，掌通古今）七十人上前祝寿。仆射（主管部队之官）周青臣大赞郡县制度说：陛下统一天下后，“改分封诸侯制为郡县制，人人安乐，没有战争的祸患，陛下开创的基业传之万世。”博士淳于越对周青臣所言很不以为然，他说：“殷周两个王朝能够传延达千余年之久，是因建诸侯国以分封子弟和功臣，作为枝叶，以辅佐王室，现在陛下有了天下，子弟仍为平民，虽然设有执管军政的官员，如果发生变故，没有人辅助，靠谁来相救呢？”丞相李斯以时势不同、制度不能相袭用为理由，指出分封制的错误说：“古时天下纷乱，不能一统，是因诸侯并立。”秦始皇坚决支持李斯的意见，尽管子弟为平民，也实行郡县制。尔后历史也证明：凡恢复分封制的，都导致国家的分裂，如西汉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而实行郡县制如能控制得宜，对巩固国家统一是起重要作用的。

秦始皇还对全国经济、文化制度进行革新，下令实行土地私有制，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文字，这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更其重要的是以上“四个统一”，把全中国凝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及采取上述巩固统一的措施，使“大一统”深入人心，把中华民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尽管以后中国发生多次分裂，谁也不能永远分裂中国，到头来中国终归统一。秦始皇建立的历史功勋，不论怎样估价也是不为过高的。

滥用权力的恶果

秦始皇建立了盖世功，也犯了盖世罪。他在统一天下后，不是让长期受尽战争之苦的人民休养生息，而是继续以严刑峻法，横征暴敛，又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中国人口只有二千万左右，而修阿房宫、骊山墓的有七十万人，北筑长城、南戍五岭和修筑驰道约有二百万人，戍边军队也不少于一百万人，这样徭役和兵役的总人数约三百七十万，占人口总数近百分之二十，使“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戍边者十之五六不能生还，服役者多数死于途或工程之中，到处白骨累累，人民苦难是空前的。稍反抗或违其法的，就进行残酷镇压，“轻罪重罚”，使“赭衣（犯人穿的红褐色罪衣）塞路，圜圜（监狱）成市”，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人民怨声载道，怒火填膺，秦王朝已坐在火药库上。

曾经是英明之主的秦始皇为何在统一天下后变成了昏庸暴君？这要从秦始皇思想去找根源。秦始皇是信神、重法和主张极权的，由于信神，必然迷信，他“得为皇帝欲登仙”，寻神仙，求长生之药；做不了神仙，死后也要在阴间尽情享受，于是他一亲政，就为自己修建高达五十丈、周围五里多长的骊山墓，宫殿建设之豪华不亚人间，墓中百川、江河、大海，天文星宿，应有尽有。仅从现已掘出的兵马俑，便可想见其规模多大。费时长达三十多年建筑的这一空前绝后的超级帝王墓，不知投入多少珍奇异宝，花了多少钱财和物资，死了多少劳役民工，活埋了多少宫女和工匠！由于重法，为定法于一尊，才“焚书抗儒”，烧掉任何私人藏有除法家书籍以外的各家书籍，埋掉议论朝政的儒生达四百六十余人。提出焚书最早的是卫鞅，他认为只要“燔《诗》、《书》”便可宫国强兵；韩非也主张禁书，“以法为教”，强调放任文化事业的发展必将导致国家政治的衰败，保证独裁统治的最根本之法是推行愚民政策。可见，秦始皇“焚书坑儒”，只不过是对其最崇拜的韩非思想的发挥，是卫鞅“燔《诗》、《书》”的继续，但其规模更大，手段更残酷，它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是中国文明史上永远洗不掉的耻辱！由于主张君主极权，秦始皇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特别是他以其无限的权力满足其无限的私欲的时候，必然深深地陷入罪恶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因而把自己置于与人民严重对立的地位，“秦始皇死而地分”已不只是人民的诅咒，而是科学的预测，智明之士已料到秦王朝快将灭亡。

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是在秦王政《始皇》亲政前一年出版的，显然这书是给秦王政看的，其中一些主要论点与秦王政存在的错误思想是针锋相对的。它反对单纯用刑罚进行统治，主张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其实这种主张在秦孝公时已施行，他对人民“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与这种主张是一致的，且行之有效，曾称霸中国。它虽也强调君主集权，但主张对君权要有必要的限制，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的论点；劝君主不要事事躬亲，要着重选官用人，使“千官尽能”，如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能按照上述施政方针行事，也许秦朝的历史要重写。但是，思想指导行动，每个人都用他的思想谱写自己的历史，塑造自己的形象，秦始皇也不能例外，他不可能用吕不韦的脑袋来代替自己的脑袋，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思想认识，朝着他所想要走的路走去。

伟大和渺小，明智和昏庸，英主和暴君，都体现在秦始皇身上，它是这样不协调，又是这么辩证地统一，这便是历史上被人歌颂又被人唾骂的秦始皇！

二、解民倒悬刘邦称帝

刘邦三十岁时任沛县（今江苏沛县西）泗水亭长。秦法十里设一亭，亭设亭长，是最基层的小吏，主要办征徭役赋税等事，所以刘邦经常押送服役的民工去秦的首都咸阳。有一次碰巧遇见秦始皇出巡，路的两旁站立着数不清的人群在观看，秦始皇队伍威武雄壮的气派，使刘邦大为赞叹，说：“大丈夫应当像这样啊！”他这么说，只能说是对秦始皇的无限羡慕，还不能说他那时已想当皇帝了。后来与他争天下的项羽的野心倒是比他大，秦始皇出游经浙江（今钱塘）时，他观看了不禁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之。”祖父项燕被秦将所杀，祖国楚被秦所灭，与秦始皇具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项羽，他想取而代之是必然的。后来，以他为核心的反秦队伍果然推翻了秦王朝，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他，而是曾经当过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的刘邦，这是什么原因呢？

活不下去只有造反

秦之危，始于始皇，终于二世。

秦始皇是这样的一个封建统治者：雄才大略却迷信透顶，干大事业却要毕其功于一役，想传之万世却横征暴敛，想长治久安却用酷刑治国，正因其迷信、政急、暴虐，使他的一切美好的愿望化成泡影。在他统治期间，用尽天下的人力、财力、物力也侍奉不了他无穷的急政，填不满他无底的欲壑。及二世继位，更加暴虐。他为篡位，矫诏杀兄扶苏、大将蒙恬；怕别人争位，把自己亲兄弟及宗室、姻亲、大臣勋旧几乎杀光。他当皇帝后，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只是想怎样过得快乐。他跟赵高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他谈其享乐之道说：“人生在世间，一眨眼便过去。现在我当了皇帝，有无限的权力，应是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使我一生稳坐宝位，享尽人间艳福，你认为这样好吗？”赵高好像是奉承又好像是讽刺地说：“这是贤明君主干的事，昏乱之主是想不到的。”于是，二世便恣意而为，赋税愈重，徭役无已（《史记·李斯列传》）。为住得更阔气更适意，他大修阿房宫，调全国民工近数十万人会集成阳，又征五万兵士来维持治安，因库存粮食难供应这么多人，便向各郡县征调，规定运粮草的人都要自带干粮，不准购买咸阳三百里内的粮。人民负担更重更苦了，仅赋税征收量则占农民全年收的三分之二以上，农民是“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人民如不听令或违法则施用各种酷刑，据文献记载：肉刑有腓（砍去膝盖）、劓、黥、宫、榜掠等；死刑有腰斩、枭首、弃市、戮尸、坑死、凿颠（凿囟门）、抽肋、镬、烹、车裂等。还有五刑（黥、劓、斩左右趾再笞杀、枭首、菹骨肉于市）、夷三族（一人犯罪，诛杀父族、母族、邻居）。秦二世这个为篡位保位而残杀骨肉、大臣，只知尽情享乐而不顾人民死活的昏君，已把自己置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天下人已厌秦恨秦达到极点，二世已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最后，二世被赵高杀了，这时，人民已活不下去、统治者已统治不下去了。人民活不下去，只有造反一途；统治者统治不下去，预示着秦王朝崩溃在即，全国已处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严峻形势。

是谁点起星星之火？是两个很普通而不怕死的农民—陈胜、吴广。《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河南阳城人，字涉。公元209年七月，陈胜任

屯氏，吴广任副屯长，他俩率领九百人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当行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时，被连下大雨所阻不能按限期到达，而失期，秦法当斩。陈胜跟吴广商量说：“现在逃亡亦死，造反亦可能死，虽然一样死，但为反暴秦而死，这是为国牺牲啊！”当他俩把造反意图宣布时，九百戍卒都赞成，于是，他便“斩木为兵（器），揭竿起义”。起义后，参加的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攻占大泽乡后，很快便打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县）。陈胜被拥为王，吴广为假王，国号“张楚”。后来，陈胜在与秦军战斗中虽然失败了，但对全国震动和影响很大。

秦法：造反者夷三族。当时人民虽恨秦已极，都想推翻秦政，但恐造反不成遭受灭族之祸，不敢首当其冲，迄陈胜一举义旗，进展又如此迅速，秦王朝这个“纸老虎”已现形，坚定了人们造反的信心，响应的风起云涌，迅即在全国掀起了反秦的热潮。原六国豪杰和旧贵族都纷纷举事，在本国称王或拥立原国王后裔为王。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逃避潜伏各地的儒生也趁机而动，如孔子八世孙孔鲋、魏国的张耳、陈余和韩国相国之后张良以及陈平等都参加了反秦队伍，各为其主出谋献策，对推翻暴秦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说明秦始皇屠杀儒生是加速其灭亡原因之一。

在当时反秦队伍中，出现了两个杰出的人物，一个是刘邦，另一个是项羽。刘邦为县押送夫役时与之逃亡。陈胜起义，刘邦与沛县掾、主吏肖何、曹参杀沛县令响应，后投项梁领导的反秦队伍。这时，项羽已是项梁的主要将领。项梁是楚将项燕的儿子，项燕为秦将所杀，秦灭楚后，项梁跟他的侄子项羽隐姓埋名，躲藏于吴地伺机雪国耻报家仇。陈胜起义后，项梁与项羽杀会稽郡守，得精兵八千人，攻城略地，队伍不断壮大。为争取楚人支持，乃立楚怀王孙心为王，称楚怀王。后来，项梁因胜利冲昏头脑，被秦将章邯打败，被杀。是时刘邦和项羽正在进攻陈留（今河南开封市），闻项梁战死，便作战略撤退，章邯打败项梁后错误地认为楚已无足忧，乃北上攻赵国围困巨鹿，刘邦和项羽才能保存实力。楚怀王趁章邯北撤之机重新作战略部署；以宋义为主将，项羽为副将，率军救赵；因秦主力在外，关中空虚，乃派刘邦率军西征。刘邦采取招降和避实击虚的战略战术，顺利攻入关中，秦王子婴降。刘邦派军守函谷关，以防诸侯军。北上救赵的军队，因主将来义停留不前，项羽把他杀掉，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率军攻击围困巨鹿的秦军，九战九胜，大败秦军，终于解围；又打败和招降来援的章邯二十万大军。项羽在新安全埋奉降卒后，即领军进入关中，刘邦自知力不如，便归顺项羽。当时天下权归项羽，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个王，刘邦被封为汉王，封地在巴、蜀一带，还分割关中地区分别封三个秦降将为王，以牵制刘邦。项羽分封后即率军返彭城。之后正当项羽忙于镇压东方诸侯王叛乱的时候，刘邦率军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出其不意地一举占领关中地区。楚汉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五年的楚汉相争中，刘邦是屡败屡战，因刘邦得道多助，项羽残暴失人心，最后在垓下决战中，项羽溃败，在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从此，天下归汉，刘邦登上了帝位，称汉高祖。

得人心才得天下

从楚汉相争的过程及其结局看，又一次证明了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刘邦为人较宽大，项羽个性则较残暴，刘邦比项羽较得人心。

《汉书·高帝记》记载：初，楚怀王与诸将誓约，先入关的封王。当时，秦兵还强。诸侯兵多被打败，诸侯畏秦，不敢入关。项羽因素杀其叔父项梁，极为愤恨，愿与刘邦一起进攻关中。楚怀王的诸老将认为：项羽为人虽勇敢但残暴，攻破襄城时，军民全都活埋了，凡他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残灭。过去陈胜、项梁统率的都是楚兵，都被秦打败了，不如派有长者风度的人率师入关，以仁义争取秦人。关中人民受秦统治者之苦已很久了，如果得长者前往，不侵暴人民，则可进入关中。因此，不能派遣项羽，只能派素有长者之风的刘邦。后来的事实说明，楚怀王的诸老将对刘邦和项羽的分析是正确的。刘邦果能入关。由于他以仁义抚民，得到了秦人的拥护。秦王于婴投降，有人主张杀之，刘邦不同意说，“怀王派我入关，是因我能宽容，秦王已投降，杀之是不好的。”取咸阳后，刘邦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原秦官吏让他们照旧工作，严禁军队扰民，让人民安居乐业。还派与原秦官吏一起到各地将“约法三章”告谕人民，秦人大喜过望，都争先恐后带着牛羊酒菜来慰劳刘邦的将士，刘邦以“仓库粮食多，不愿增加人民负担”加以辞谢，这使秦人更加喜爱刘邦，他们唯恐刘邦不做秦王、项羽对待秦人态度就恰恰与刘邦相反。《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军主帅章邯率军投降项羽后，项羽因秦军众多，恐入关时不服为乱，于是在新安城南屠杀或活埋秦降卒二十余万人，其残虐如此！入咸阳后，又进行大屠杀，杀秦降王子婴，火烧雄伟壮丽的秦宫殿，烧了三个月火还不熄灭，妇女、货宝尽掠夺而归。刘邦与项羽对比，仁义与残暴分明，秦人恐项羽得天下又遭殃，故在楚汉相争中全力支持刘邦，加上肖何治理关中得法，汉军缺粮给粮，缺人给人，刘邦始能屡败屡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刘、项之胜败还与能否用人有关。《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得天下后总结了汉胜楚败的原因：为了庆祝汉王朝的建立，刘邦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刘邦说“我为什么得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天下？请诸位坦直地说，不要隐瞒。”高起、王陵毫不客气地指出：“陛下对人傲慢，项羽对人尊重，但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攻下的能给之，这是与天下同利。项羽妒贤嫉能，有功的害之，贤者疑之，打胜仗不记人功，得地也不给予，这是他失天下的原因。”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保证后勤供应，我不如肖何；率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人都人中之杰，我能用之，这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范增也不能用，所以他失败了。”《史记·陈丞相世家》也谈及刘、项用人之优劣，陈平离楚归汉时对刘邦说：“项王不信任人，他所重用的，不是他项氏家族的人就是妻子的兄弟，即使有奇士也不能用，因此我才背离楚，听说汉王能用人，故投奔大王。”楚汉纷争持久不决，刘邦问陈平：“天下纷乱，那时可定呢？”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尊重人，廉节之士多投奔他；但他对赏功封地就很吝惜，不轻易给人，所以图利的士人不愿归附他。大王对人傲慢无礼，廉节之士不愿来；不过大王能给人官位和封地，好利无耻之徒因之多归汉。如能去其两短，用其两长，天下就可定了。”从陈平对刘、项的评比，可见两人各有所长所短，项羽重用的人主要是项氏家族的人和妻子的兄弟，以及一些廉节之士，前者多是因人成事之人，后者虽廉节却缺乏奇谋，这些对项羽争天下帮不了什么大忙，有的甚至帮倒忙。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建功业是用命来博得的，如果没有封赏谁愿为你卖命呢？由于刘邦给官给地，趋利之徒才多归之。战争，是合力的较

量，必须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有力尽力，有谋尽谋，才能保证战争机器顺利运转，使指挥随心顺意，才能不断去争取胜利。刘邦用人是“五湖四海”，在他那里确是人才济济，什么样的人都有：张良是贵族，肖何是县吏，陈平是游士，樊哙是屠狗，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韩信是流氓，彭越是强盗，这些人除张良外，出身都下贱，但都各有其所长，刘邦都能量才录用。如韩信有大将之才，经肖何推荐，一下子从小将提升为帅；陈平有奇谋，不计较他的行为不正，也重用之；肖何有治民才干，给他以管理关中的重任。“得人心的得天下”，而要得人心，首先要得人才为之辅助，献符合事物规律的战略策略，这也就符合人民的要求，因之必然得人心。所以，也可以说“得人才的得天下”。可见，“得人才”和“得人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人才把事情办好就得人心，而得人心人才更多归之。刘邦因其得人心，五湖四海之士纷纷投奔他，尤其是有奇谋之士为其献正确的战略策略，人心也就更向往，其初虽较弱小，屡战屡败，因其能集众智成大智，得到军民的拥护和支持，垓下之战终于打败了曾经是“无敌将军”但却是一夫之勇的西楚霸王项羽。

当然，所谓刘邦能用人，既有其相对性，也有其策略性。为争取人才为其打天下时，尽量封官封地；及其得天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于是一些有权威有势力的异姓王都遭殃，韩信坐上囚车时才醒悟地悲叹：“果然像人们常说的：狡猾的兔子捕完了，好的猎狗要上锅煮了；高飞的鸟儿射尽了，好的弓箭要藏起来了；敌国已经消灭了，有功的谋臣要完蛋了。现在天下已经统一了，我这个功狗必然被宰了！”刘邦消灭异姓王虽出于其一统的需要，但对为其立下大功却没有充足证据的韩信，却狠心地将其杀了，足见封建统治者之残酷！历代帝王为巩固其家天下，什么坏事都干得出，冤杀功臣更是司空见惯之事。

解民困始能长治久安

刘邦登基后，接来的是这样的破烂摊子：由于长期战争，死伤狼藉，仅项羽“新安之屠”就达20余万，彭城之役死尸堆积使睢水不流，其他战役死的无法计数；加上天灾人祸，死的数目不下于战争，使人口锐减。曲逆（河北完县东南），是当时的大城市之一，秦时有5万户，汉高祖南过曲逆时，仅存5千余户（《汉书·陈平传》）。广大农民或力逃兵役，或为避战祸，四散流亡，政府能掌握的户口只有十分之二、三，生产已陷于停止状态，又适逢荒年，商人趁机抬高粮价，于是“米一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这就是说，秦时人口有二千万，汉朝只存下一千万人左右了。当时，不只人民苦得很，政府也极其困难，连“皇帝的马车不能配齐四匹一色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史记·平淮书》）。面对社会如此荒凉、凋敝，新登上皇帝位的汉高祖是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呢？

汉高祖开始对此是茫然的。他的左右有个儒生陆贾在他跟前谈《诗》、《书》的道理，他瞪着眼睛大骂说：“我是马上得天下，那用什么《诗》、《书》！”陆贾说：“你马上得天下，能马上治天下吗？‘汤武以逆取天下而用顺治天下，文武并用。这是他能取得长治久安之策。吴王夫差，智因因好用兵而亡，秦亡也由于只用严刑峻法，如秦得天下后，行仁义于民，吸取先王治国的成功经验，陛下那能得天下呢？”汉高祖听了有所悟，脸有愧色，

对陆贾说：“请为总结秦为何失天下，我为何得天下以及历代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陆贾乃写论文十二篇，每上奏一篇都得到汉高祖的赞赏，左右也高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其中《无为》篇提出：秦代“事越烦天下越乱，刑法越增加邪恶之势越盛，光靠用武力镇压，敌人就越多。秦王朝不是不想长治久安，他的失误在于用暴力对待人民，即刑法太峻急之故。”因此，陆贾主张治国方针应是“无为而治”。具体而言，是反秦的重徭赋严刑蜀之道而行之，即轻徭薄赋缓刑，让民休养生息。陆贾“无为而治”的思想，被刘邦全部接受，成为其建国思想。

在汉建国之际，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导致长治久安的关键，不然，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又要被迫挺而走险。为此，汉高祖采取了促使各阶层人民尤其是流散的农民回乡去，以及鼓励发展生产让人民安居乐业的种种措施，主要的有六：一、兵皆罢归家。随军入秦的关东人愿在关中的，免徭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役六年。二、号召逃亡人口回乡，“复故爵田宅”。三、因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平民。（以上见《汉书·高帝纪下》）四、轻田税。秦时征收农民所得达三分之二，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使之积极生产，初定十税一，后更减为十五税一（《汉书·食货志》）。五、制定较秦法缓和的九章律，按照律令办事，使人人感到自安。六、与匈奴和亲，使边境暂安宁。以上措施使社会安定，农业生产逐步得到发展。

“无为而治”，即轻徭薄赋缓刑，让人民休养生息，这一治国指导思想，尔后都被吕后和文帝、景帝所沿用，只是在具体政策上加以适当调整，因而取得史称的“文景之治”。

从“无赖”到一世雄杰

“未央宫建成，汉高祖在前殿摆酒大宴群臣。高祖举起玉杯为他的父亲祝寿说：‘从前父亲常说我是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哥哥仲力。现在我的产业跟哥哥比孰多呢？’群臣听了，皆呼‘万岁’，大家乐得笑哈哈。”（《史记·高祖本纪》）当了皇帝，还用小人得志的口气向父亲自夸，“无赖”相还未全变。本性难移，这本无足怪，值得令人思考的是：刘邦这个“无赖”是怎样变成一代雄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司马迁写的《史记·高祖本纪》及有关人的传记中去找线索。在《高祖本纪》里，司马迁在不少地方谈及刘邦与众不同的种种怪异事，如说他是其母与神遇怀孕而生：他醉卧时，常见其上有龙；还说相者说其相贵不可言，又有斩当道蛇的传说，说他斩的是白帝子，而他是赤帝子，等等。这无非说他是天生的皇帝。这些怪异事，很可能是刘邦起事时编的鬼话以骗人，后在民间传开，司马迁不加分析地将之写下来了。这当然是不足为信，对我们探索的问题毫无牵涉。倒是司马迁所写的有关刘邦的个性、为人及其言行，给我们提供极其珍贵的资料。现概括为两点，然后加以分析：

一、粗暴与慷慨

刘邦，鼻高，额突，胡须美。他为人宽容，喜施舍和交游，但对人态度傲慢，动不动开口骂人，概括的说，就是粗暴和慷慨，这便是刘邦性格的突出特点。在他争天下和登上皇帝宝座后，这种性格有了充分的表现。尽管他爱骂人，因他慷慨对人，给官给钱，挨了他骂的人，虽一时不舒服，因得到

了官和钱，心里就高兴，愿意为他卖命。《史记·黥布列传》记载，淮南王黥布是项羽的猛将，因与项羽有矛盾，刘邦派人说他归汉。刘邦接见黥布时，却坐在床上洗脚，如此慢怠黥布，黥布很恼怒，后悔归汉，欲自杀。及到为其布置的住处、房屋、饮食和从官跟刘邦一样，又大喜过望，因而愿为刘邦效力。他对韩信也如此。《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刘邦入蜀任汉王，将士想东归多逃亡，韩信也在其中。肖何追回韩信后极力向刘邦推荐，说信有奇才，可帮刘邦争天下，刘邦同意，欲立即召韩信来拜他为将，肖何说：“王一贯对人傲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唤小儿，这便是韩信要逃走的原因。如果你要他为大将，应择良时吉日，斋戒沐浴，建设坛场，以礼拜将，韩信才肯留下。”刘邦照办，并用韩信计，出陈仓，定三秦。韩信平齐，派人向刘邦要求立为假王，以镇定局势，这时刘邦被楚军围困于荥阳，他听了破口大骂说：“我现在被围困，日夜盼望他前来解围，他却欲自立为王。”张良轻踩其脚，附耳语说：“我们现在处境困难，那能禁止让韩信称王，不如善待之，立他为王，使其守任齐地。不然，会发生变故。”刘邦这人很精灵，一说便醒悟，便改口大骂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何必当假王！”乃派张良前往立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韩信满足其称王的愿望，便竭尽全力效忠于刘邦，项羽派人说韩信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不为所动说：“我事项王，官不过郎中，言不听，策不用，所以背楚归汉。汉王拜我为大将，让我指挥数万大军，他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我今天才能这样。他这样亲信我，我背之不好，虽死此心也不改。”正由于刘邦能“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有才能的提拔，立大功的封王封地，其部下才死心塌地为其所用。试想没有韩信、黥布等大将为之卖命，刘邦能打下天下吗？显然是否定的。

二、无知与听从

刘邦不喜欢也不懂《诗》、《书》，对于古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及治国安邦之道，他是茫然不知的。如处于治世，这种人是可能有大作为的，恰好处于乱世，他才能有机会崛起于草莽之中。不过，按照他的认识水平来指挥战争是难于取胜的；用来治理国家，也是难于治好的。他虽所知不多或无知，但其素质很好，当别人提出他所不知，即向他指出好的计策，他能虚心倾听，并能当机立断，言听计从，故往往能扭逆为顺、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如他奉楚怀王之命西入关，攻宛城，攻不下。有人为之献策说：“宛城是大部，人民众，积蓄多，守城军民自度投降必死，故皆坚守。你硬打，死伤必多：如绕道西去，宛城将兵随你后追击，这样前后夹攻，你就会失‘先入关者王’之约。为你计划，不如向宛城守将约降，封其官，引其兵西向，未攻下之城，会闻风开城投降，这样你就通行无阻了。”刘邦从其计，果如其所说，顺利地进入关中。刘邦是个酒色之徒，入关后，被豪华的秦宫和艳色的美女迷住了，便留在宫里享乐。樊哙向他进谏：问他：“你想有天下，还是想当富家翁？”刘邦说：“我想有天下。”哙说：“我入秦宫，看见装饰宫殿的珍宝奇物不可胜数，漂亮的女人也以千计，如此穷奢极侈、享乐腐化，这就是秦之所以亡的原因。愿你不要步他们的后尘，急返霸上驻军住地，不要留在宫中。”刘邦不听。张良对刘邦说：“秦无道，你才能得到这里。要为天下除民贼，应该俭素。今初入关，便要享乐，此是所谓，助桀为虐。‘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你听樊哙的规劝。”刘邦终于醒悟，乃回到驻军住地。刘邦这个酒色之徒能听从樊哙、张良之谏是不易的，这是因他懂得奢则亡俭则兴的道理后，断然回到霸上，确是难能可贵。随后，

他与秦民“约法三章”，不接受秦民送来的劳军酒肉，因而得到秦民的衷心爱戴，在楚汉相争中给他全力支持。又如前面所述，他原对《诗》、《书》一无所知，当陆贾谈及其中所论治国之道时便破口大骂，听懂陆贾的“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毅然接受其“无为而治”之策，终于导致西汉长治久安。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粗暴和无知，这是大多数草莽英雄所共有的，也是他们的短处。但刘邦能超过其同时代的枭雄，是因他慷慨待人和善于用人计策，他这些长处是其主流，粗暴和无知是次要的，故其短处不能掩盖他的长处，不能对其事业起破坏作用。善于用人的，不只是能使五湖四海之士归他，关键在于能用其所长和能纳其正确的计策，不然，人虽多何益？以刘邦原有的认识水平，要取得天下和治好天下是不可能的。由于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政策，故不仅能取得天下，也能治好天下。

刘邦之能得天下、治天下，归结到一点还是因其能用权为人民谋利；掌握军权时，不害民，救民于水火；掌握政权时，让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这便是刘邦之所以能从“无赖”到成为一代雄杰的主要原因。

三、王莽代汉因得人心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白居易《放言》五首诗之一的最后两句。意思是说如果王莽在未“篡位”前死了，他的奸诈虚伪面目是不会暴露的。这虽对王莽是否定的，但还肯定其曾有“真”的一面，即他在辅政时是享有贤名的。班固《汉书·王莽传》、司马光《资治通鉴》则认为王莽是乱臣贼子，连他做的好事，也说是出于奸诈用心。尽管王莽的新王朝与秦王朝统治的时间一样长——都是十五年，班固写的《汉书》将《王莽传》附在其末。不过班固还能将其事迹如实记录：不管是好的坏的，为王莽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使后人对他有个较全面的认识。古代历史学家对王莽的评价，对当代历史学者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只从“奸诈虚伪”的角度来评价王莽，将之列入“昏君”之册，几乎是众口一词。一笔抹煞王莽是否公允？对他的评价能否只从“篡位”和“奸诈虚伪”以及其改革失败着眼？应该怎样评价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做系统的、辩证的探讨。

新代汉是历史的必然

要正确评价王莽，先要弄清楚他“篡位”前的历史背景。这可从两方面来说明：

（一）西汉末朝已不可救药。

西汉出现的社会危机，其病源在于土地和奴婢问题上。西汉初，因楚汉相争，人民死的过半，大量土地荒芜，由于汉高祖采取“重农”政策，生产逐渐获得发展，土地还不成为问题。文帝时，土地兼并开始严重，很多农民因破产沦为奴婢。文帝为缓和社会矛盾，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社会危机一度减轻。武帝时，官僚、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兼并土地，剥削农民，农民沦为奴婢的更多。之后，汉代历代皇帝，不仅不愿或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人为地加速土地兼并的进程。成帝时，不仅诸侯、官吏、地主强占民田，成帝本人也在民间占有大量田地。哀帝时，大臣师丹、何武等提出“限田限奴婢之议”，政策制订了，却遭到外戚丁氏、傅氏和弄臣董贤的反对，哀帝也带头破坏“限田”政策，他一次就赐给董贤田地二千顷，“限田”政策只好束之高阁。因之，地主剥削越来越重，农民穷困越来越甚。谏议大夫鲍宣向哀帝上疏揭露：如今百姓有七亡、七死。七亡是：1. 阴阳不和，水旱为灾；2. 政府官员，横征暴敛；3. 贪官污吏，勒索不止；4. 豪强地主，兼并不停；5. 徭役频繁，失农桑时；6. 乡村不靖，民不安宁；7. 强盗匪徒，劫民财物。七死是：1. 酷吏严刑，殴杀犯人；2. 狱吏苛刻，虐死囚犯；3. 审案不公，冤陷无辜；4. 强盗横行，勒财杀人；5. 怨仇相报，互相残杀；6. 荒年饥饿，活活饿死；7. 瘟疫传染，无药病死。鲍宣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得，竟然想靠刑罚以促使天下太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千万人民的七亡，七死，不正是由于当官的贪残暴虐造成的吗？”接着他尖锐地批评哀帝：“如今，百姓缺食少穿，父子、夫妇难以团圆，真使人鼻酸。陛下为何不救百姓，反倒倾国家无数的财产赏赐外戚和董贤之流！还乱封官赐爵，但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皇天心欢，百姓心服，能办得到吗？治天下的，当用天下之心为心，决

不能为快己意而胡作非为！”谏官自谏，哀帝还是我行我素（《汉书·鲍宣传》）。

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土地越来越多集中于少数豪强地王的手里，农民越来越破产沦为奴婢，使之成为西汉末期的两大社会问题。因这两个严重的问题解决不了，人民日益穷困，只能铤而走险。早在成帝时，流民、士兵、刑徒的起义到处发生；到哀帝时，人民反抗的形式多种多样，波及的范围更其广阔，局势更其严重，刘氏王朝已岌岌可危了。

造成如此局势，是由于西汉后期昏君辈出。汉元帝是个糊涂皇帝，只知追求享乐，不问政事。他任太子时，因其好儒非法，其父宣帝预言：“乱我家者太子也。”果如宣帝所料，在他统治期间，中央集权削弱，社会危机日深，豪强地主兼并之风更盛，官奴达十余万，西汉王朝趋于衰落。其继位者汉成帝更荒淫昏庸。他最信任外戚，任太后同母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总揽朝廷大权，同日封太后异母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侯，世人称“五侯”。外戚王氏集团权倾天下，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五侯大都骄奢淫逸，横行霸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连汉成帝也受制，要任一个官不得王凤点头也不行。他虽知王凤太骄横，因有太后庇护也无可奈何。当然，主要还是因他对政事毫无兴趣，故乐得把它交给王氏集团，自己可以尽情游玩享乐。他经常微服出游，斗鸡走马。有一次微行过阳阿公主家，悦歌舞者赵飞燕，便召她及其妹入宫（后封赵飞燕为皇后，其妹为昭仪）。从此，只在两美人帷帐中厮混，乐在其中。他说：“汉武帝好神仙，求白云乡；我终老这‘温柔乡’足矣。”果然，有一天晚上他宿在赵昭仪处，早晨起来刚穿好袜子便一命呜呼了，继位的汉哀帝也像成帝一样信任外戚，他在位时，王氏集团被排挤，其舅家丁氏、祖母家傅氏受到重用，丁、傅家族同样飞扬跋扈，渔肉人民。哀帝这人比成帝更荒唐，成帝好女色，他却喜欢男色，对宦童董贤宠幸无比，赏赐无数。谏议大夫鲍宣、丞相王嘉先后对他苦谏，因刺中他的痛处，鲍宣被充军，王嘉被下狱，绝食而死。哀帝对董贤更加宠爱，竟下诏任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把国家行政大权交给一个才二十二岁毫无从政经验的弄臣，昏庸得惊人！更其荒谬的是：有一天，他在宫中欢宴董贤及其亲属，酒酣，他视着董贤笑说：“我欲效尧禅舜，让位给你怎样？”（《汉书·董贤传》）痴呆知晋惠帝司马衷还知恋帝位，汉哀帝竟想让位给弄臣，堪称超级昏君！

西汉后期一朝比一朝腐败，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人民“七亡”、“七死”已活不下去了，统治者统治不了也不想统治了，西汉王朝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其不亡何待！在人民中早就传有“汉运将终”之说，连最忠于汉朝的刘向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完结了，篡汉或代汉之事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二）王莽“篡位”势在必行。

公元前10年6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哀帝死了，哀帝无子，哀帝祖母傅太皇太后和哀帝母亲丁太后也在早些时候一年死了，这时立嗣大权就只掌握在太皇太后王政君手里，她到未央宫去取皇帝玺绶后，下诏免去董贤大司马职务，由王莽做大司马，接管国家一切大权，立一个五岁的娃娃为皇，是为平帝，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听政。于是，国家军政大权又全归王氏集团。初，王莽因伯父王凤、叔父王商的推荐，姑母王太后的提携，逐步高升，官至大司马，后因得罪傅太后被迫辞去大司马职务，受这次排挤的教训，他深知要

巩固王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必须清除其他外戚势力。其打击矛头先是指向外戚傅、丁集团，凡其家属为官和依附的官僚一概免职。为防止平帝的外家渗入朝廷，规定平帝母中山孝王后卫姬及其舅关内侯卫宝、卫玄仍留在中山，严禁来京师。王莽将平帝和其母隔绝开来，其长子王宇担心平帝长大后怨恨王氏，便私写信给卫后兄弟卫宝，教卫后以母子之情要求来京照顾平帝。王莽置之不理，王宇就找老师吴章和大弟子吕宽商量，吴章认为要劝王莽是难的，但王莽相信鬼神，可用变异的怪事来恐味他，再劝说他归政于卫氏。王宇就使吕宽在夜里端盆动物的血洒在王莽的门上，这被门吏发现了，立即向王莽报告，王莽把吕宽抓来审问，才知道是王宇主谋，王莽便把王宇抓送监狱，令其服毒自杀，其妻子怀孕，待产子后，也将之杀了。王莽便趁机把卫氏家族都杀了，只留下平帝的母亲卫后。据说王莽后来毒死年仅十四岁的平帝，《汉书·平帝纪》只称驾崩，但以理推测，他毒死平帝是可能的。王莽既然把平帝外戚几乎杀绝，如果留下平帝，他长大亲政后是绝不会放过王莽的，王莽从其王氏集团利益出发，毒死平帝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平帝死，王莽立年仅二岁的孺子婴为帝，其篡位意图已很明显。这时，汉室已名声扫地，人们对它不存在任何希望，而王莽的声誉这时却达到了高峰，获得汉室贵族、官僚和各阶层人民的大多数拥护，王莽和平“篡位”，建立新王朝以代汉是势在必行了。

他确是曾经很得人心

据《汉书·王莽传》和有关人的传记载，王莽在未“篡位”前，确是做了不少值得称赞的事：

1. 关心穷人，为民做事

每次发生灾害，他都不吃荤腥，只进素菜，以表示对灾民的关怀，同时想方设法帮助和赈济灾民。公元2年，郡国发生旱灾蝗灾，王莽主动提出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灾民。由于王莽带头捐献，公卿豪富纷纷响应，献出田宅救灾的有二百三十人。他派使者到各地发动人民捕捉蝗虫，按捕得蝗虫数量多少给酬，并根据灾情轻重，免去或减少农民赋税。

在发生瘟疫的地区，王莽下令腾出房子、组织医生给病人治病，一家死六口以上的给葬钱五千，四人以上给三千，二人以上给二千。

为使流亡的贫民有住宿地，他废汉皇室的呼池苑，改为安民县（在甘肃华亭县境）。募贫民迁来定居，沿途饮食及到新县后所需田宅、器具、犁、谷种、食粮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又在长安城中建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座，让贫民居住。

他对下级官吏和贫穷的读书人也给予帮助。他常常把自己封邑里的租税收入全部分送给收入微薄的官吏和贫穷的读书人，对无依无靠的老年穷人，也给予一些适当的照顾。

他是如此慷慨助人，自己一家的生活却过得很俭朴。有一次，王莽的母亲患病，朝中的公卿、列侯们派自己的夫人前往探病，这些贵夫人穿着曳地的华丽衣服，满身珠光宝气，乘着漂亮的马车到大司马府第时，王莽的妻子便到大门外迎接，因见她穿的衣不曳地，仅可及膝，都以为她是婢女，及与交谈才知道是王莽的夫人。一个权倾天下的大司马夫人竟穿得如此朴素，贵夫人们不禁大为惊叹！

西汉后期的皇帝穷奢极侈。公卿、列侯享乐腐化，有那几个管人民的死活，而恰在这时出现这个王莽，对人民是如此关怀，对自己是如此俭朴，对比之下，人们能不心向往之。不管王莽出于什么动机，对他做的这些好事，应予充分的肯定。

2. 执法如山，不分亲疏

评价王莽时，论者都认为他是个纯粹儒家，其实他也是个法家，是儒法兼用的人。儒法兼用已为汉统治者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在实行法治中，一些法家在理论上喜谈“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话虽如此，包括那些法家有几个能实行？连执法最坚决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王子犯法却黥其师，不敢动王子一根毫毛。而王莽呢？是在历史上真正做到“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的人，他的第二子王获杀死一个奴隶，王莽痛责王获，令他自杀偿命。以王家的权势，即使杀死一个大官也算不了什么，何况在那个奴隶贱如牲畜的时代，杀死一个奴隶只不过是宰一条狗，这又算是什么，而王莽竟以“杀人者偿命”来处理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此执法如山，古今有几人？王莽的侄儿王光与执金吾窦况勾结，教窦况代他杀人，窦况把那人逮捕，判处死刑斩首。有人向王莽报告这事，王莽勃然大怒，按法处决窦况，严厉责备王光。王光母亲自知王光不免，伤心地对儿子说：“你自以为比王宇、王获那个亲近？”便跟儿子一起自杀。王莽过去对他的这位寡嫂和侄儿很关怀和爱护，现在侄儿犯了罪也就毫不留情，王光死后，王莽让王光的儿子袭职。王莽是如此爱情分明！

3. 重视知识，网罗人才

王莽本人就是个大知识分子，他懂得知识的重要，更知道人才之可贵，故在为平帝辅政时，搜集各种书籍，广招各种人才。公元4年，他在京师大兴土木，建造了明堂（古时天子宣讲明教的地方）、辟雍（国立学校）、灵台（国家天文台），还为学者兴建宿舍一万栋；设立《乐经》博士，增加各经博士数额，每一种经典都增加到五人。又广泛征求，凡能解通儒家学派六经中一经的，并教授学生十一人以上的，以及藏有《礼记》、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纬、钟律、脍、兵、《史篇》等，或能够通晓其意的，都可乘坐政府的驿马车前来首都长安。当时天下各种有才干有奇异能力的人士，纷纷响应王莽的征召，先后来到长安的有一千多人。王莽要他们把所知道的都记下来，以便重新审编，使谬误得到纠正，不同得到一致。王莽还征求治理黄河的水利专家，应征前来的水利专家有一百多人。由于王莽广泛网罗人才，公车府里人才济济，热闹非常，京师里一派文教昌盛的景象，试问：在封建统治者中，能像王莽这样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有几人？

4. 上封皇族，下惠僚属

王莽对于刘家皇族格外施恩，对于他的僚属也经常照顾。他接受安汉公封号时拒绝接受给他的二万八千户的封赏，建议用来先行封赏刘姓皇族诸侯王的后代及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再封赏现在在位的。有一次，他就封宣帝曾孙三十六人为列侯，其余汉室皇族皆增加户数或封爵，并各赏赐财物。对二千石以上年老退休的官吏，终身给年俸禄的三分之一。他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和皇帝的赏赐分给僚属。

由于王莽关心穷人、为民做事，执法如山、不分亲疏，重视知识、网罗人才，上封皇族、下惠僚属，在全国引起了好的影响，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拥

护。如他被排挤遣回封国时，令次子偿奴命，人们反映很好。在封国三年，就有官吏二百多人向朝廷上书，为他呼冤：“贤良”周护、宋崇等还在考卷上歌颂王莽的功德。王莽女儿被选为皇后，朝廷赏他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王莽上书坚辞，这又一次得到广大官民的赞扬，上书歌颂他的前后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正因王莽如此得人心，加上辅政期间，日夜操劳，勤于政务，采取种种有效措施，稳定了哀帝以来的动荡政局，社会出现了安定的景象。因之，他的官位步步高升，由大司马到安汉公，由安汉公到宰衡，由宰衡到加九锡，由加九锡到摄皇帝，由摄皇帝到假皇帝，最后由假皇帝到真皇帝，王莽不用动一刀一枪，用和平手段夺得了汉家天下，做了新王朝的皇帝。

空想改革家的悲剧

王莽当上皇帝后，他遇到的问题，还是西汉王朝遗留下来的两个问题，即土地无限制的集中和农民大量转化为奴婢。对这两个问题，西汉中后期皇帝不愿解决也无力解决，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改良建议，遭到官僚豪富的反对而不能实行。王莽在他辅政时，对由于土地兼并造成农民的困苦有较深的了解和同情，而要使农民摆脱困境，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和奴婢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因此，王莽称帝第一年，即公元9年，就下令变法：

先是颁布“王田”、“私属”的诏令。《汉书·王莽传》记载：他揭露土地兼并的弊病说：“自秦以来，由于废井田，人们开始兼并，贪鄙念头日益滋长，强梁地主占有的土地多到成千上万亩，贫苦的农民连立锥之地也没有。又设置奴隶市场，把奴隶跟牛马一起关在牲畜栏里出卖，奴隶主可以决定奴隶的命运，甚至可以随意宰杀，这是违背‘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大义的。西汉名义上虽只征收租税三十分之一，但因经常临时追加，加上土豪劣绅的掠夺，实际上征收的达十分之五，故富者的牛马有吃不了的余粮，贫者连糟糠都吃不到，便铤而走险，因而触犯刑法，陷于监狱。”

接着，王莽说他在大麓时曾实行井田计口授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宣布：“天下土地都收归国有，改称‘王田’，奴隶婢女，改称‘私属’，土地和奴婢都不得自由买卖。一家男子不够八口，而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应把其多出的分给族人邻居或亲友。汉有田的，现在分给之数，也应照此办。”

井田制，相传是中国殷周时代的土地制度。其初见于《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古时是否有井田制，抑或是孟子托古改制的设想，迄今还无定论。这在古人也许是设想，而在王莽却是实践，从纯理论讲，这是解决兼并的好办法，如果能实行井田制，即耕者有其田，农民的困苦面貌将可改观。但在封建社会里，其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而当时汉室皇族、官僚、功臣后代及大地主、大商人都占有绝大多数的土地，王莽要把私田改为“王田”，即归国家所有，必然遭到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而王莽不愿也不可能发动农民摧毁地主占有制度，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而在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前，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

王莽另一重要改革是实行五均六管法。西汉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

人受到一定打击，后来，大商人贿赂王、侯，并互相勾结，不仅控制物价，占有大量土地，且经营铁盐大发横财，不少大商人富拟王侯。大商人的投机倒把，贱买贵卖，放高利贷，是造成农民贫困、国家收入减少的原因之一。正如晁错所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大贫贱矣。”（《汉书·食货志》）王莽在宣布实行五均六管法时说，是为“齐众庶（均贫富），抑兼并”做到市无二价，贫富相安，强者不得压迫弱者，富人不得要挟贫人。五均是在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每季第二月，司市官订定本市物价，称为平市。市上买卖五谷、布，帛、丝、棉等生活必需品，如卖方多，买方少，司市官按物实价，全部收买；如物价超过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其自由买卖，民间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欲经营而缺乏本钱的，也可低利借贷，不取利息，六管，即只由国家掌握盐、酒、铁，收山泽生产税，官铸铜钱，五均赊贷。显然，王莽实行五均六法，是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新王朝获得经济利益。但王莽所用非人，从事五均六管工作的大多是不法商人，他们和官僚勾结，利用手中权力，投机倒把，转手赊贷，攫取暴利；还制造假账，虚报库存，官府无所得，尽入私囊，本是可以益国利民的事，变成祸国殃民。

再次是改革币制。王莽辅政时，加铸错刀、契刀、大钱三种，与原有五铢钱并行。新朝建立第一年，为清除汉朝的影响，废错刀、契刀和五铢钱，另铸小钱与大钱并行。第二年又另造二十八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多，造成交易混乱，且易于私铸。使私钱充斥，得益的是豪富，受害的是小民。

王莽实行“王田”、五均六管、币制改革，是以重法随之的。他严令：“敢非议井田制，违背法令或造谣惑众的，流放到边疆。”、“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由于这些改革触犯豪强的利益，他们拼死反抗，王莽便依法惩办。《汉书·王莽传》记载：因买卖田宅奴隶和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这些犯罪的是什么人呢？说有“自诸侯卿大夫至庶民”，这里所说的“庶民”不可能包括贫苦农民，因为在那时兼并极其集中的情况下，这些贫苦农民是无田可卖、无钱买田的，更是无力铸钱的，能买卖田和铸钱而犯罪的只能是皇族、官僚、地主和商人。而犯罪的“不可胜数”，仅犯铸钱罪就有十多万人之多，可见，新王朝为变法跟这些人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刑罚是极其严厉的。而新王朝的社会基础又恰恰是由这些人形成的，既然王莽跟他们决裂了，其社会基础也就毁了，又没有农民的支持，王莽靠谁来推行他的改革呢？其必然是行不通的，最后只好取消井田制和禁止买卖土地、奴婢以及六管的法令。只有五均继续实行到新朝灭亡。

由于王莽改革失败，造成国危民困，全国各阶层纷纷参加起义。这时的局势正如王莽所说，江湖海泽（起义的聚集地）像乱麻沸汤。王莽最严重的错误是，无端挑起边衅。本来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王国与中国关系还好，王莽为自己的威信，竟贬诸国王为侯，并侵侮诸国，激起诸国反抗，王莽便四出用兵，发动对西域和东方以及西南方诸国的侵略战争，不仅消耗国力，劳民伤财更甚。在内忧外患严重交迫下，新王朝终于崩溃。公元23年，长安被起义军攻破，王莽被一商人所杀，最后由汉皇族的刘秀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东汉王朝。

王莽想为贫苦人民做好事，干一番改天换地的大事业，以扬名千古，结

果是国破身亡，被后人唾骂，这便是这个空想改革家的悲剧！

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过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其实成者称王未必是好王，败者称“寇”亦未必是真“寇”。三国时刘备、诸葛亮屡打败仗，其割据的蜀国也灭亡了，但刘备被人称为仁君，诸葛被称贤相大名垂宇宙，而使三国归晋的司马炎得到好评却不多。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王莽因“篡位”，多被封建历史学家所贬责，而“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出版比王莽“篡位”时还早二百多年的《吕氏春秋》已提出这个观点，当皇帝的不一定是姓刘的。篡位之事，在历史上多得很，备受推崇的唐宗、宋祖，他们的皇位还不是夺来的，唐宗夺位的手段比之王莽则残酷得多。因王莽“奸诈虚伪”而把他所做的好事都抹煞也不对，曹操何曾不奸诈虚伪，但仍不失为有为的君主，被誉为“一代之雄”。

评价王莽主要要根据他的所作所为和对人民的态度，以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如何，再进行客观的具体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一个知识分子创立一个庞大的王朝，王莽是头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封建社会里，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并付诸实践，王莽是头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才实现耕者有其田，而在一世纪新王莽已提出来了，并作为国策大力推行。在封建社会里，王莽所从事的事业是空前绝后的，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大革命。这个大革命涉及的范围之广、斗争之激烈，我们从王侯、官僚、地主和商人反抗改革被判罪的人数之多可以想见。但是，王莽的理想是超时代的，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从事的事业以失败告终，在今天看来是心然之事了。可是，王莽的崇高理想，敢想敢干的大无畏精神，却永留人间，令人无限敬佩！

至于像王莽那样关心穷苦人民，尽力为之做好事，在历史上的统治者有几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流传千古，而早在范仲淹说这句话近一千年前，王莽受安汉公封号而辞封邑时就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待全国人民丰衣足食，才再领封赏。”王莽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王莽一生，他重视的是事业，而不是钱财，也不是为了个人享乐。他一家的生活过得很节俭，却乐于助人。他担任一般侯爵时就是如此，那时他收入还不丰裕，而为了帮助别人，弄得家无余财，有时为了赈施宾客，甚至卖掉了自己的车马和裘衣。他辅政后，所得的俸禄和封赏大多散给俸禄微薄的下层僚属和贫穷的人。而不少历史学者在论及王莽这些德行时，却笔锋一转，用“沽名钓誉”四字将之否定了。试问：世上有没有纯粹为做好事而做好事的人？有没有完全不为名或利而做好事的人？为名利而做坏事应该受到谴责，为名利而做好事，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又如像王莽那样执法如山，在历史上有几儿？王莽不仅对别人，对自己子侄犯罪也毫不留情，如果王莽不是大公无私，是不可能按法杀自己的亲属的。王莽这样做了，应该值得赞扬，可是班固在《汉书·王莽传》论及王莽侄儿杀人被按法处理时，却说：“初，莽以事母、养嫂、抚兄子为名，及后悖虐，复以示公义焉。”意思是说，王莽孝事母事，奉养寡嫂，抚育侄儿，是为博得名誉，而为了以后篡位，遂用骨肉之亲，以显示自己的公正。班固

论及王莽的其他“公义”时，也往往采取这种笔法，于是王莽的“公义”便变成“不公义”了。次子王宇杀奴隶，王莽使之偿命，侄儿王光使人杀人，王莽要按法处理，这不是天下最公义之事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引用《王莽传》有关的资料时，也只讲其害民之事，不讲其利民之事，对处理王光案件也持与班固同样的看法。是非要分明，不能糊混，更不能颠倒，王莽执法如山。不论亲疏，应该充分赞扬和肯定。

王莽是个有宏图大略，又是个敢想敢干的社会改革家，也是个犯错误最多、失败得最惨的社会改革家，他的改革不能给人幸福而是带来苦难。不仅王莽是这样，历史上不少有为的改革家也有同样的不幸遭遇。

由王莽发动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它给后人有什么启迪和教训？为了探讨这些问题去查《汉书》时，给我们提供资料的只有一篇《王莽传》，关于他的事迹却略焉不详。像王莽在全国实行这样大规模的改革，不管是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对后人都具有重要的鉴戒意义。因此。新王朝在历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位置，历史学家应把其改革事迹详细地记录下来。按照惯例，后代王朝多为前代王朝立史：而代新王朝的恰恰是东汉王朝，因把他视为乱臣贼子，不可能为新王朝立史，这使我们探讨其失败原因和教训时，感到资料缺乏而深以为憾。从《王莽传》留下的简略资料，我们只能粗略地概括其失败给后人的启迪和教训是：1.改革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从社会的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照搬是没有前途的；2.改革不能只靠刑罚来推行，主要靠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否则会适得其反；3.改革要用得其人，才能把事情办好，用不得其人，好事会办成坏事；4，改革要便民利民，相反，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王莽的变法，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成功的经验，但他留下的却是他进行社会大革命的崇高理想，为解决人民的困苦而敢于改革的大无畏精神！

四、隋文为政兴利除弊

唐太宗曾问他的大臣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是怎么样的君主？”他俩认为，“隋文帝对自己要求严格，遵守礼制，他勤劳政事，每次坐朝廷，有时至太阳偏西才罢朝；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召集与之讨论政事。虽然为人还不够仁明，亦是励精图治的君主？”唐太宗说：“你们只得其一，未得其二。这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凡心暗看问题就不透切，至察则猜忌多疑。因自己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帝位，便认为群臣不可信任，每事都由自己来决定，虽劳神苦形，做的事就不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的官员，都是承受他的意志办事而已。”（《旧唐书·太宗纪》）两方面的意见合起来，对隋文帝的评价就全面了。尽管隋文帝存在不少缺点，他确是个“励精图治的君主”，在古代封建帝王中，是一个较好的皇帝，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隋文帝最大功绩是使近三百年来支离破碎的中国又统一起来，社会空前繁荣，人民获得安居乐业。隋朝跟秦朝虽然都很短促，却是封建王朝中两个重要的朝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王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王朝所遵循，隋制是有承先启后的作用的，隋文帝的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周、陈腐败故能反掌取而代之

《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杨坚是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父亲杨忠随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被封为隋国公。杨坚二十岁时继承父亲隋国公爵位。后随周武帝破齐有功，升任柱国。武帝聘其长女为皇太子妃，及宣帝即位，其女被立为皇后，他被拜为上柱国。579年，七岁的静帝继位。因年幼政事都由杨坚操纵。宣帝统治时，刑政苛酷，臣下离心离德，恐怖不安。杨坚辅政，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行节俭，人心归之。周室归臣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等进行反抗，杨坚派兵将之镇压。接着，杨坚大杀北周宗室诸王。581年，杨坚自立为帝，创建隋王朝，年号开皇，建都长安。隋文帝即位后，改革旧制，兴利除弊，政局稳定，国力加强。这时，陈后主叔宝荒淫昏愤，上下离心，国政混乱，杨坚命其次子杨广统率水陆军五十一万八千人伐陈，不到四个月时间，攻下金陵俘虏了陈叔宝，统一了中国。

由上可见，隋文帝之得天下是很顺利的，代周不费吹灰之力，取陈只是反掌之间，为何能如此轻易取而代之？这是因北周和南陈之主腐朽昏溃，荒淫厌政，人心早已厌弃之了。北周武帝是个有为之主，灭北齐后准备灭陈，事未行，竟病死。其子周宣帝继位，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昏群之一。当太子时因行为不检，常受其父武帝杖责，父死继位，他对父亲死毫无悲戚，却手抚受杖伤痕，破口骂道：“老东西，死得太晚了！”现在这“老东西死了”，他大可恣意而为了，于是纵情声色，广招美女，日夜游乐，沉迷醉乡，不理朝政；大兴宫殿，极其奢侈华丽。不附己的，或敢进谏的，不死即贬；颁布《刑经圣制》，以苛酷刑法进行恐怖统治，使朝臣人人自危。为满足私欲，猛增赋税，人民苦不堪言。为专事享乐，传位于七岁的静帝。次年宣帝死，政归杨坚，杨坚“道德声望，天下归心”，故能顺利取之。至于那位陈后主叔宝，跟周宣帝一样是荒唐的昏君。陈叔宝这人倒有点才，写得一手好诗赋，

但他好色而贪杯，经常与一大批“押客”与“妇学士”混杂一起，作长夜狂饮，共赋新诗，颂扬他最宠爱的张贵妃、孔贵妃等八位美女的艳丽姿色，由宫女美姿者千余人习而歌之。他还“盛修宫室，无时休止。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刑罚酷滥，牢狱常满。”而他的“押客”与宠妃，互相勾结，“唯以刻剥百姓为能事”，他们卖官鬻爵，接受贿赂，制造冤狱，朝纲极度率乱，人民苦不堪言。当隋军发起总攻，南朝仍忙于筹办一年一度的元会盛典（春节），不发兵抗敌，陈叔宝竟说：“王气在此，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奏伎赋侍，纵酒如故。元会盛典这一天，他喝得酩酊大醉，昏睡了一天，直到晚上才醒来。虽有十万火急文书，连封也没有拆开。建康守军虽有十万，却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因而隋将贺若弼以八千士卒纵横无阻，直抵建康；韩擒虎以五百精骑攻入宫城，陈叔宝想逃也逃不及了，便与爱妃张丽华、孔贵嫔躲入一口井里，终被擒获，成为阶下囚。陈国只立国三十三年。

腐朽的政权必然被取而代之，这是历史的一条规律。北周、南陈之必亡，这不出时人意料之外。但“困兽犹斗”，有的在亡前还进行激烈抵抗，甚至壮烈牺牲，而隋灭南陈之易又速，这与陈叔宝这位超级昏君有关。隋文帝取天下易如反掌，正因他有着幸遇着这类超级昏君。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乱一治的现象反复地交替着，古人每遭逢乱世，总希望有“真命天子出世”，使乱进入治。其实这“真命天子”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诸多逐鹿中原者中产生的，在这种生死搏斗中，同样是“优胜劣汰”。隋文帝的取胜，是因他优于其同代的封建割据者。其优何在？这是因他能兴利除弊，进行的战争又是近三百年来人民所盼望的统一，故人心向往，“天命”归之。而他能兴利除弊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是因他针对当时统治者扰民的苛政和奢侈，反其道而行之。他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害民的去之，益民的行之；提倡节俭，以身作则，上行下效，形成一种节俭风气。由于他为政抓到了根本，即改革和节俭，因之政治昌明，经济繁荣。隋文帝为政之道，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改革旧制国家面貌一新

隋文帝在即位之后，他面临的是各割据政权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不堪，是因循守旧，还是革新除弊？他知道如果选择前者必然重蹈覆辙，只有后者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巩固新建的政权，因此，隋文帝综合前代多种制度，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改革政治制度。

首先是改革官制。在中央，废除了北周“六官制”，创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是尚书省、门下省和内史省。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是执行机构，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驳正违失；内史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三省分权独立，又互相牵制，改变了过去宰相专权的状况。六部是吏、礼、兵、都官、度支，工，分管全国政务。三省六部制强化了中央集权。这一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朝。

简化地方行政机构。隋以前，地方官制极为紊乱，南北朝都设州、郡、县三级，且滥立官名，形成民少官多，耗费甚巨。583年，隋文帝改地方政权三级为二级，即废一级地方机构，只存州县两级，这不仅提高办事效率，而且官员的减少也就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隋文帝十分重视吏治，奖励良吏，严惩违法官吏。隋文帝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官吏，发现罪状便加以处治，甚至使人给官吏送贿赂，接受贿赂，立即处死刑。他的第三子秦王杨俊生活奢侈，苛剥人民，他曾派人处治，杨俊还不改悔，大建宫室，穷极侈丽。他便免其并州总管官职，勒令归第，将他禁闭。大臣杨素劝谏，说治罪过重。文帝说：“我是五个子之父，按照你说的，为什么不别造皇子律？管叔、蔡叔作乱，周公将之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我做的远远比不上周公，那能再违法不将之处治呢？”（《隋书·秦王杨俊》）在严惩违法的官吏同时，隋文帝还大力表扬和奖励良吏。临颖令刘旷考绩天下第一，擢升莒州刺史；公孙景茂做官有清名，屡受升迁，由太守而刺史，隋文帝下诏将其事迹颁告天下，在隋文帝统治时，良吏甚多，一般官吏不敢恣意违法，这对人民是有益的。

针对北周刑政苛酷，隋文帝进行改革，制定了较简要的《开皇律》，其基本精神是，“以轻代重，比死为主”。隋文帝对官吏虽严厉、常于庭上杀官吏，但对人民还是较宽容的，民有冤屈，允许上告，可一直上告到朝廷。为防止冤杀罪囚，还下诏规定：诸州死囚，不得在当地处决，须送中央最后决定，经三次专请才行刑。齐州一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七十余人去京城，行到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合该的，但害得护送你们的民夫这么辛苦，你们于心安么！现在释放你们，某日都要到京城，如果你们失约，我只好代你们受死。结果，被释放的民夫，都如期到京城。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后宣布免罪，并下诏说，只要官有慈爱之心，民并非难教，要求官吏学王伽，以至诚待民。

改革以门第高低任吏制度，以考试选拔官吏。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主要按照门第高低选拔官吏，一般人士很难有仕进的机会，因用人限于门第，使许多杰出的人才埋没草泽。隋文帝即位后，废除九品中正制，选官不问门第。587年，令每州送三人，参加考试，选士以文章华美为标准，合格者录用为官。599年，为改变文章取士的惯例，又规定以“志行修谨”和“清平济干”二科举人，即取士按德才。隋文帝用考试办法选拔人才担任官吏，为后来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这样就打破了门阀大族长期把持各级政权的局面，扩大了官吏的来源，改善了官吏的素质，有利于改善政治，对专制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二、改革经济制度。

首先是改革了北周、南陈徭赋繁重的恶弊，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隋文帝曾几次下令减免赋役，人民的负担都比以前各代轻。徭役方面，缩短服役年龄和服役天数，原规定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到二十一岁，受田年龄（十八岁）不变，这样，丁男前三年不纳租调和可不服徭役；服役天数则由三十天改为二十天，并规定五十岁以上者，可免役输庸，即以纳布帛代替力役。赋税方面，规定布绢每年输一匹（四丈）减为输二丈，减少了一半。对发生灾害的地区，曾多次免收赋税。赋役相对减轻，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轻徭薄赋的同时，推行均田制和大索貌阅、输籍之法。由于推行均田制，农民分到了较多的土地，扩大了耕地面积，由589年的一千九百四十余万顷至618年增至五千五百余万顷。还修水利工程。582年，开渠引杜阳水灌三畦原，灌溉土地达数千顷。584年，又引渭水达潼关，漕运四百里，民间名曰：“富民渠”。耕田面积的增加和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促进了农

业生产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财富。北周、北齐末年，因赋役沉重，刑罚残酷，农民隐漏户口或投靠豪强地主的很多。585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清查户口，称“大索貌阅”，即根据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与本人的体貌进行核对。清查结果，全国户籍增加了四十四万余丁，一百六十四万余口。并减轻农民赋役使低于豪强地主对于依附农民的剥削量，称“输籍之法”。此法实行后，许多原来依附于豪强地主的农民纷纷脱离地主，向官府申报户口，纳税服役，成为国家编户。由于生产的发展，户口也迅速增加，581年至609年，全国户口从三百九十九万余户增至八百九十余万户，即增加了一倍以上。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生产发展，经济繁荣。《隋书·食货志》记载：“中外仓库，无不盈积”。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所储存的米帛，米多的过千万石，帛少的也有几千万匹。这些，再加上全国的储蓄，据《资治通鉴》记载，可供隋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元人马端临说，古今称国家最富饶者，应为隋。如洛口仓库（今河南南阳）的储积，隋末李密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用过；东京（今河南洛阳）所积布帛，王世充曾占据过；西京（今陕西长安）府库至唐还未用尽。可以想见，隋文帝时财政经济之宽裕，国库储藏之充足。

提倡节俭，上行下效形成新风

《隋书·房陵王勇传》记载：隋文帝因见太子穿的蜀铠饰上珠宝，心里很不高兴，担心他会染上奢侈的邪风，便教训说：“上天让谁当皇帝，不是因与他有亲，而是看谁有德行，历观前代帝王，未见奢侈而得位长久的。你是太子，如果不上称天心，下不合人意，那能继承帝位，居万民之上？吾未当皇帝前所穿的衣服，各留一件，经常看之，以警戒自己。今以我过去所用的刀赐给你，你应该体会我对你的希望。”隋文帝要求当皇帝的要崇尚节俭，这是他总结历代帝王穷奢极侈的终必灭亡而得出的结论。因此，他经常以此为警戒，身体力行，带头节俭，也严格要求太子。上行之，下效之，故能改隋前统治者穷奢极侈的风气，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新风。这种作风的根本转变，对继承前朝遗下的经济凋敝、满目疮痍的国家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它也是隋文帝实行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南北朝之末，北周、北齐和南陈的皇帝，个人私欲无穷无尽，向人民掠夺也就无穷无尽。“上梁不正下梁歪”，臣下也竞相奢侈，贪污腐化成风。为了填满统治者的无底欲壑，只能是用苛刻的刑政去强夺豪取，使人民困苦不堪，人心也就厌极恨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以善政和节俭使天下归心，取而代之。有鉴于前代君主以奢侈而亡，他十分重视节俭，不仅口头强调，且身体力行。他施行节俭政治，对促进政治昌明、经济繁荣起了重大作用。《隋书·高祖纪》“史臣”评论他时说：“躬节俭，平徭赋，仓廩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隋文帝取得如此善政，使国泰民安。这与他“躬节俭”有很大关系，也可以说是他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他教训太子时谈到节俭才合乎“人意”，是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所以他容不得奢侈，对太子如此，时臣下也如此，容不得奢侈，也就是容不得扰民，因此他奖励良吏，严惩不法官吏，使政治趋向昌明。也由于他认识到“人

意”向背的重要、故对待民众比较宽容，不只废除前朝酷刑，制定刑罚较轻的隋律，还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兴利除弊，使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一个国家要形成一种新风，要具备诸多条件，不仅要上头大力推行，还要符合“民意”，且要持之以恒。隋文帝躬行节俭，且始终坚持。从辅政开始至即位后，隋文帝都提倡节俭，坚决推行，积久才成为风气。

像隋文帝这样节俭的皇帝，在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他个人生活过得很节俭，不管是住的、穿的或游乐，都务求节俭，乘车服用的东西破了，随时修补，不做新的；有的官民用布袋装生姜送给他，他以为太破费，大加谴责。宫中存物也不多，有一次他配止痛药，要用胡粉一两，在宫中却找不到。由于他的影响，当时官吏不穿绫绮的衣服，也没有用金玉来装饰，便服多用布帛，衣带的装饰只不过用铜铁骨角而隋文帝对人民疾苦也比较关怀。《隋书·高祖纪》记载：他乘车外出，路上遇见向他上表的人，就停车亲自询问。他对人间疾苦，经常留意，常暗中派人采听各地风俗和吏治的得失。594年，陕西关中饥荒，他派人去看老百姓食什么东西，他们回来向他说是食豆粉拌糠，他拿这些食品以示群臣，流着泪自责，令撤销常膳，不吃酒肉，时间长这一年。有一次他去拜泰山，见向洛阳就食的关中饥民沿途皆是，他令撤销侦察，令卫士不得驱逐参杂于卫队之间的百姓。见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好言勉慰。在道路难走的地方，见挑担的，令卫士扶之。

由于隋文帝提倡节俭，又关心百姓疾苦，做了不少好事，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和具有发展生产的条件，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也就迅速增加。隋文帝还以储积谷物作为首要任务，不仅国家储蓄，也规劝农民储蓄，因而国富民裕，隋文帝也就成为封建社会的好皇帝之一。

是开国君主又是亡国始作俑者

我们在研究开国帝王时，发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政策和言行，不仅对当时有巨大的影响，也往往与其后代的兴亡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开国君主的政策与言行，大多受到其后世的遵循。隋文帝所犯的错误，即诛杀功臣及选择杨广为太子，不仅削弱隋朝，且导致其传二世而亡。《隋书·高祖纪》的“史臣曰”也谈到这个问题，并指出，“探讨其衰落之源，考核其乱亡之兆，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由来已久，是起于文帝，成于炀帝。”

隋文帝为人至察而猜忌，这是他性格的特点。至察，是说其人观察问题很仔细，即“明察秋毫之末”，也因其眼光焦点只在“秋毫之末”，往往看不到事物的整体，或忽略了其主要之点，这对事物整体的认识就糊涂不清，所以唐太宗说他“人至察而心不明”。“至察”又加上“猜忌”，这就使他做了不少错事，而且他不相信别人，只信自己，他做错了别人也不敢说，他所犯的错误就无法纠正，也只能是一错再错。

隋文帝之所以猜忌多疑，除了个人性格外，是因为他夺位于寡妇幼儿之手，怕别人也效法他行事，故妒忌贤能，特别是对功大权大的功臣，他对开国元勋及有功诸将，不是杀即贬退，安于位的没有几个人。其中被冤杀的不少，如王世积平叛及征陈立有战功，进位上柱国，因见隋炀帝性猜忌，便纵酒不谈政事，即使如此也不能幸免，他被人诬告谋反，隋文帝不查明便趁机杀之。灭陈后，隋文帝欢宴功臣，说，“高颍平定江南，虞庆则降服突厥，

可以说是功勋显赫！”又举杯祝酒说：“饮此酒，愿我与诸公等子孙，常如今日，世守富贵。”不仅彼此子孙不能世守富贵，这两位元勋就已落得不好下场，虞庆则被人诬告谋反被冤杀，高颀这个具有文武全才、隋朝开国第一元勋，也因不同意废太子勇而废为平民。当高颀任丞相时，他的母亲见隋文帝虐杀功臣，很担心儿子遭不幸，便告诫高颀说：“你富贵已极，但差砍脑袋了，你千万慎重！”因此，高颀常患灾祸临到头上，及罢官，他深自庆幸自己得免于祸。高颀谏废太子杨勇被免官，从此无人再敢进言，隋文帝乃废太子杨勇，终于选择杨广为太子。

隋文帝废太子杨勇是有缘由的。杨勇颇好学习，擅长词赋，性宽仁，但有点率直任性。隋文帝即帝位，立长子杨勇为太子，军国政事，都令勇参谋和决定。他对时政不对的，都能提出纠正意见和建议，隋文帝每纳之。杨勇还结纳天下才能之士。但杨勇穿的衣服较华丽，又多几个内宠，这就引起隋文帝和母后不高兴。隋文帝是崇尚节俭的，有一次看见杨勇穿上著名的四川铠甲，辽饰上金玉珠宝，认为这太奢侈，心里很不高兴，严厉地批评杨勇。其母亲独孤皇后是个极其妒忌的女人，她不准隋文帝近别的女人，也很痛恨男子纳妾，见杨勇多几个内宠，尤其宠爱美人云氏，她很不满意，恰巧她为杨勇找的元妃因心病突然死了，疑是云氏投药，便狠狠地谴责杨勇，从此独孤皇后常派人伺察杨勇，求其罪过。杨广知父母不怜爱太子杨勇，便进行夺嫡阴谋活动，他伪装得很节俭。不喜女色，每次从扬州官署入朝探父母，临别流涕依依不舍，并谎言太子要谋害他，因而得到独孤皇后的喜欢。隋文帝及其皇后对于杨勇只从生活小节上挑剔，而看不到他的品德和才干。但隋文帝最后废太子杨勇，主要还是因他的猜忌所致，他不只猜忌功臣，也猜忌太子。由于太子杨勇声誉日高，受到百官的爱戴，冬至那天，百官前往东宫朝贺，太子杨勇以鼓乐相迎。隋文帝知道，说是“违礼”，并下诏指出太子非君王，不能接受百官贺，以后应予禁止。从此，疑太子夺位，加上独孤后与杨素等搜罗虚构罪证，终于废太子勇，立杨广为太子。而立杨广为太子的后果呢？四子杨秀因不满杨广夺嫡，被杨广陷害而废；五子杨广起兵反对杨广夺位，被镇压幽囚而死。隋文帝则在病时因杨广污辱其爱妾，才觉悟到“独孤误我”，要召杨勇时，杨广派人把他杀死，并矫诏杀杨勇。杨广登上帝位后，荒淫暴虐，穷兵黩武，引起天下大乱，被其部下缢杀，他只当了十四年皇帝，隋王朝总共也只存在三十七年便灭亡了。

隋文帝从一个开国君主成为亡隋的始作俑者，他的猜忌多疑性格起了关键的作用。

五、贞观之风诚信纳谏

古代封建帝王，庸碌的多，英明的少。在这少数英明帝王之中。有的有大勇而无大智，或有大智而缺大勇，唐太宗则大智大勇。他既是一个勇于冲锋陷阵的猛将，又是一个善于决胜千里的战略家；他能马上争天下，又能下马治好天下，是一个最杰出的帝王。唐太宗某些言行，特别是他的为人和风格—史称“贞观之风”，即诚信待人，兼听纳谏，不仅成为后世有作为的帝王的楷模，至今还不失为用人治国良方，仍为人们所赞赏和景仰，他是个不朽的伟大历史人物。

谥文武圣君当之无愧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唐太宗，即李世民，他是李渊的次子，“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及长，雄杰好武。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崛起，他“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其父李渊为太原留守，趁机起兵反隋，取而代之，建立唐朝，称唐高祖。唐朝的创建，李世民南征北战，战功显赫。626年，“玄武门之变”后，被立为太子，同年受父禅即帝位，称为太宗。在位期间，以“亡隋为戒”，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贞观之风”、“贞观之治”，为后代历史学家所称颂。649年，太宗病死，谥文帝；674年，追谥为文武圣皇帝。这并非溢美之辞。唐太宗是当之无愧的。

唐朝开国皇帝虽是唐高祖，实际上创建的是唐太宗。有的历史学者否认这个事实，但在《旧唐书·隐太子传》中，唐高祖自己承认这一事实，他对李世民说：“发迹晋阳，本是汝计：克平宇内，是汝大功。”这寥寥几句话，充分证实了李世民在创建唐王朝的功勋。

“发迹晋阳，本是汝计”，事实确实如此。616年，李渊任太原留守时，年才十八岁的李世民就向他父亲分析当时天下形势，并劝其父及早举事，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都成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将至，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这是上天给予良好的时机啊！”李渊听了，认为“亦大有理”（《资治通鉴》卷一八二）。李渊虽认为“有理”，但下不了决心。因为造反成功，大富大贵，他是心向往之的，可是造反失败就要灭九族，他不能不慎重考虑，因此犹豫不决。而“明机果断”的李世民，看准了就决定干，在这之前，他已广结豪杰准备义举。晋阳令刘文静与李密连婚被李渊关进郡狱，世民知其人可与谋，便入狱探望，与之图谋大计。刘文静与晋阳宫监裴寂是朋友，因李渊与裴寂相好，欲通过裴寂劝李渊举事，便引寂与太宗交游，太宗有意与之结纳，使其规劝李渊。文静知裴寂以宫女陪李渊夜宿，便威胁裴寂说：“你为宫监，而以宫人侍客，你死算了，为什么要害唐公呢。”要他促李渊举事以免祸。裴寂惊，劝李渊说：“二郎密集兵马，欲举义旗，正是为了裴以宫人奉公，因恐怕事发被诛，所以急切要起兵。今天下大乱，城门以外，都是贼，如守小节，旦夕死亡；如举义兵，必得帝位，大家都有这种想法，公意下怎样？”李渊终于同意，说：“我儿确有此计，既已决定了，可从之。”（《旧唐书·裴寂传》和《刘文静传》）于是，617年起兵西向，进军长安。

“克平宇内，是汝大功”，这也并非虚语。不仅主要的战略决策于李世

民，在芟除群雄中，他取得了决定性的最辉煌的战果。当李渊率军到贾胡堡，隋将宋老生已率精兵守在霍邑以拒之。时当七月，雨水连绵，道路泥泞，只好札下营寨。因粮食将尽，李渊与裴寂商议，准备暂回太原，以图后举。李世民反对说：“本兴大义以救百姓，当先入咸阳，以号令天下；今遇小敌就要班师，参加起义的人将从此解散。回守太原势孤力单难以保存。”李渊不听，促令班师，李世民知道了，在帐外放声大哭，声闻帐中，李渊召入世民问其故，世民说：“我军举义起兵，前进才能取得胜利，退后必然散伙。那时，敌人从后追来，必然束手就擒。孩儿想到这里，怎不悲痛！”李渊听了为之感动，终于醒悟过来。不久天晴了，军粮也运到了，乃挥师攻城，世民诱宋老生出战斩之，攻入霍邑。接着，李世民提出，请进师入关，“取永丰仓以赈穷乏，收群盗以围京师”的作战方针，李渊同意，乃命李世民沿渭河北岸西进，迂回包围长安。因李世民军令严肃，秋毫无犯，一路上进展迅速，平定了渭北及三辅地区，扫清了长安的外围，使长安成为一座孤城。义军所至，吏民和地方豪强纷来投效，屯军于阿城时，世民已有兵三十万人。不久，与李渊大军会合进入长安。如果李渊纳裴寂班师之议，必将如李世民所说“退后必然散伙”，将被敌人所擒。因纳李世民的战略决策，唐军才能实现其“占据长安，号令天下”的打江山的第一步计划。当时，是进是退，是决定唐军成败的关键。唐军起兵，李世民立了最关键的首功。之后，李世民四出征战，几乎每战必克。617年，击破割据陇西（治今甘肃陇西东南）的薛仁果；619年，击败刘武周，收回失地太原；620年，俘获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击降王世充，进入洛阳，平定河南北；622年，大破刘黑闥。芟除这些主要劲敌，为大唐统一天下扫除了主要障碍。

李世民不仅是一个胸怀韬略的统帅，也是一个勇冠三军的猛将。他用兵善于“奇正配合”，奇兵以轻骑为主，或用轻骑冲入敌阵，或从后包抄突击；在战争中，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退兵殿后；他武艺高强，箭法如神，往往于万军中斩敌大将。李世民率诸军攻王世充于洛邑，王世充率三万精兵相拒，他以轻骑挑战，时众寡不敌，陷于重围，左右皆惊。他令左右回去，独留殿后。世充骁将单雄信率数百骑夹道来逼，他左右射之，无不应弦而倒，获其大将燕颉。世充乃退回东都。窦建德以兵十万来援世充。世民采取围城打援战法，留部分军围世充于东都，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迎战窦建德十万大军。建德驻军板桥，世民屯军于武牢，相持二十余日。世民为示刍尽放牧马于河北以诱之，建德果挥众而至，世民先不出战。建德士卒自辰至午，兵士饥倦，皆坐于地上，又争饮水，逡巡欲退。世民下令曰：“可出击了！”建德军未及整列，李世民亲率轻骑，冲锋陷阵，所向皆靡。俄而众军合战，器尘四起。世民率轻骑挥幡而入，直突其阵后，张起旗帜，敌人见了，惊惶大溃。世民率军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生擒建德。

李世民青年时适逢隋末大乱，他为“潜图义举”，故“尚威武，不精学习”。及天下渐平，乃积极学习经籍，开文学馆以接待四方之士。当时有杜如晦等十八学士，经常与之讨论经义，探讨历代兴亡之道。这说明李世民能根据不同的时势，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

李世民即位初年，经常与大臣总结隋亡的教训，探讨治国良方。他接受魏征的建议，定出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处理国内外问题的总方针。隋之亡使他深刻地体会到“载舟覆舟”之理，认识到人民的无比威力。他不仅以“载舟覆舟”之理警励自己，也用以教育其继承人太子李治

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因此，他的言行一般都能考虑到对民众是有利或有害。他说：“我每日坐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要考虑到此话对百姓是否有利益，因怕说错了话害民，所以不敢多言。”他选任官员，也考虑到能否为百姓办好事。魏征推荐杜正伦，认为是难得之才，他提升杜正伦为兵部员外郎，对他说：“我今提升有德行能干的人，不是对其私行恩惠，而是因其能为百姓做好事。我对于皇室宗亲及勋旧没有德行和能力的，都不任以官职，因你忠直，我才升任，希望你为百姓办好事”。他做的事，当谏官说不利于百姓时也停止不办，他说：“当人君的，不为百姓而做奢淫之事，危亡之机只不过是反掌之间。”他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苛剥民众来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腹饱了身也死了，君富了国也就灭亡了。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问题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人君也就丧亡了，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言行以是否有利于百姓为依归，人君和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论述如此精辟，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一人而已。

由于唐太宗办事能以有利于百姓为准则，他即位后即着手改变因隋末大乱造成国家残破，人民困苦的状况。628年，他向侍臣们指出：“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失时为本。”唐太宗指出要抓的“本”确是当时根本之“本”。唐因隋末长期战争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地方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全国户数只有二百余万，约占隋末的609年的户口近九百万的百分之二十几左右。针对这种情况，他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劳动力为“本”，提出了“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他认识到隋末农民反抗是“赋繁税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引起的，为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定实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政策。地方官吏如果超出规定向农民征税，就以“枉法”论处。为了“去奢省费”，他减少土木营建工程，节约开支，并身体力行；还精简机构和裁减百官，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二千五百多人精简到六百余人。他认为任用官员，主要是看他是不是贤才，“如果选得善的，虽少也能把事办好，如果是不善的，多了有什么用？”因此，他宣称要“选用廉吏”治民，各州刺史都由他亲自负责选派，他还发展了由隋兴起的科举制度，使过去从政之门只限于贵族和门第世家子弟到向民间开放。当他从宫殿高处望到进士们鱼贯而入的肃穆行列时，兴奋地说：“天下英雄都进入我的口袋了。”为了澄清吏治，唐太宗从朝廷要员中委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以决定对他们的赏罚和升降。这些措施鼓励官吏守法和防止其刻剥百姓是有作用的。

由于采取上述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官不扰民，农民守业，仅数年间，生产迅速发展连年获得大丰收。630年时，一斗米只值三四千钱。由于人民丰衣足食，犯罪的也少了。这一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不过二十九人。632年，唐太宗亲自审理囚犯，判处的罪犯有二百九十人，年终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于明年秋天回来就刑。633年4月，全部回狱，无一人逃亡。于是下诏免他们死罪。当时，社会稳定繁荣，出现了“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清平局面（《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唐太宗在做到“中国既安”的情况下，也达到了其“四夷自服”的目的。

唐初，突厥、吐谷浑经常前来勒索或入侵，为保护国家尊严和人民安全，唐太宗曾多次派兵反击，并将之征服。但他对边境各民族主要还是实行布德怀柔的政策，如对俘获的突厥首领颉利可汗，给予优厚的待遇，赐予良田美宅；对依附的各族人民由其首领统辖，一般不改变其社会制度、部落体制，尊重其风俗。对于归附的各族人民则妥善安置，协助其发展生产，以至让他们在长安居住，待遇与汉族同。边疆少数民族的依附和归附，唐王朝的疆域扩大了，超过了秦王朝和西汉王朝的版图。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如在641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王松赞干布，促进了汉藏的友好关系。又开通通往西域的大碛道和通往北方边疆地区的参天可汗道，以加强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唐太宗采取的正确民族政策，为唐王朝树立了极高威信，不仅少数民族主动前来朝贡，630年，唐太宗还被少数民族首领尊为“天可汗”，唐太宗在总结其民族政策取得的成就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

贞观期间，由于唐太宗贯彻执行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总方针，国内外工作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史称“贞观之治”。

上述唐太宗的武功和文治是空前的，而这与“贞观之风”，即唐太宗诚信待人、兼听纳谏是分不开的。

得人心是因诚信待人

争天下之本在于得人心，古代明智的逐鹿中原者莫不为此竭尽全力，但由于各人的素质不同，有的外示宽厚，而内藏奸诈；有的在用人之际，厚相结纳，及其取得天下后，就大杀功臣；唐太宗则始终以诚信待人，且表里如一，故将相也始终死心塌地追随，为之奋战沙场，竭智尽力助其治国，这便是唐太宗能取得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今图画于凌烟的二十四位功臣，其中参加晋阳起兵或属于宗室、姻亲的有十一人，而来自敌营的则有十三人。除了二人因参与或涉及谋反罪被杀外，大都委以重任，参与朝政，他们不仅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了显赫的功勋，在贞观之治中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人大都始终得到恩遇和善终。

贞观初，有人上书请除去佞臣，唐太宗召见他，问：“佞臣是谁？”对曰：“臣在民间，不知佞臣是谁。愿陛下与群臣讨论问题时，佯怒以试之。他坚持不屈的，就是直臣，畏威顺旨的，就是佞臣。”唐太宗说：“君是源，臣是流，源浊了要求流清，这是不可能的。君自为诈，臣下那能直呢？朕现在是以至诚治天下，对于前代帝王以权谲对待臣下，常觉得这是可耻的。你的策虽好，我是不采用的。”唐太宗以至诚待人，不只是在即帝位后，在为其父策划起兵反隋前后，已经显示出来了。未起兵前，他已暗中准备，他训练精骑二千人，其中就有不少“群盗大侠”，因他“折节下士，推财养客”，“莫不愿效死力”。起兵后，他又接纳和交结了不少武艺高强的战将，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使其马队更其强悍。骑兵是当时劲旅。因其冲锋猛，速度快，可出其不意冲敌前或绕敌后，因敌忽遭袭击措手不及，往往造成全军崩溃。且唐太宗率领的都是骁骑，都“愿效死力”，故所向披靡，即使处于危境，因将士拼命搏斗，而转危为安。

由于唐太宗以诚信待人，敌营不少猛将敬佩其人，认为是托身之主，前来投其麾下。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战将，随宋金刚南侵，金刚战败逃奔突厥，

敬德收其余众守介休城，太宗派人说之，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不久，寻相等降将皆叛，唐军将领疑敬德必叛，将他囚于军中。有人向太宗说：“此人勇健非常，在狱中久了必然生怨，留之恐有后患，请即杀之。”太宗说：“我的看法不同。敬德如果背叛，那能在寻相之后呢？”便下令释放，请他进入卧室内，赐以金宝，安慰他说，“大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我不会听谗言以害忠良，请你体谅。如果你要去，今以这些金宝相赠，以表我们共事之情。”这一天，太宗与敬德打猎于榆窠，恰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奔太宗，敬德跃马大呼，镞刺单雄信坠马。敌军稍退，敬德护卫太宗冲出敌围，随即率骑兵与世充交战，敌众大溃，擒敌将陈智略，俘虏敌排架兵六千人。太宗感谢地对敬德说：“众人都说你必反，我独保你不反，做好事有好报，想不到相报这样快啊！”从此，太宗更其信任。敬德任马军总管，随太宗四处出征，屡立战功，被封为鄂国公（《旧唐书·尉迟敬德传》）。秦叔宝、程知节原是王世充马军骑将，因鄙薄世充为人多诈，敬慕太宗诚信待人，当与唐军在九曲对阵时，他俩与数十骑于马上揖世充说：“蒙你厚待，本想报恩，但你性猜疑，非托身之所，请从此告辞”，便奔投唐军，叔宝被拜为马军总管。叔宝每从太宗征伐，敌中有骁将锐卒如炫耀军威，纵马往来奔驰，太宗便令叔宝往取之。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敌军无不惊惶退避，其骁勇如此！在与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等的战斗中都立功勋，封翼国公，后改封胡国公（《旧唐书·秦叔宝传》）。程知节被授秦王府左三统军，领左一马军总管，讨伐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时，他每阵先登，以功封宿国公（《旧唐书·程知节传》）。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都从太宗讨建成、元吉，是太宗死党，都是唐朝开国功臣，与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

唐太宗知人善任，忠勇者倍加爱护，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李靖和李勣都是在唐太宗的爱护信任下建立了显赫战功，成为有唐一代名将，李靖少有文武才略和远大抱负，他的舅父、隋朝名将韩擒虎，每次和他谈论兵法都赞不绝口，说：“可以与谈孙、吴兵法的，只有此人而已。”李靖任马邑郡丞时，觉察到太原留守李渊有图天下之志，便前往江都（今江苏扬州）向隋炀帝告发，走到长安，道路阻塞不能，只好滞留。因此，李渊攻占长安时逮捕他，决定把他处死。李世民早慕其人，坚决请求为他赦免，才免一死。后李靖在破肖铣平抚岭南、俘辅公祐统一江淮中，战功卓著。太宗即位后对他更加信任，出将入相，宠幸无比。雄踞漠北的突厥，李渊为起兵曾向他称臣借兵，后颉利可汗乘“玄武门之变”派大军直逼渭水便桥，威胁长安，因无力与之决战，初即位的唐太宗只好前往渭水便桥，送大批金、帛求和才作罢。唐太宗认为这是唐朝的耻辱，做好战备后，于629年派李靖率大军十余万讨伐突厥，次年俘颉利可汗，李靖功第一。但御史大夫温彦博却弹劾他“军无纲纪，致令虏中奇宝，散于乱兵之手。”李靖入宫晋见，太宗对他大加斥责，李靖只顿首谢，不置辩。太宗说：“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有功不赏，反以罪杀了。我不会是这样，当赦你的罪，记你的功勋。”后来，太宗知是上了谗言的当，向李靖道歉说：“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在我已明白过来了，请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里。”便正式任命李靖为尚书右仆射（宰相）。后进封卫国公（《旧唐书·李靖传》）。李勣原参加翟让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后劝翟让奉李密为主。李密为王世充所破，他与李密投唐。先后参加了东平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闥和南定辅公祐的统一战争，以及在北伐突厥和征辽战

争中，都建立了汗马功劳，封英国公。唐太宗对李勣最信任和尊敬，在生活上对他也关怀备至。641年，李勣在对薛延陀的反击战中患暴疾，医生说用胡须灰可以治疗，太宗便剪自己的胡须，亲自为之和药。李勣感动得“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太宗说：“我不过为国家着想罢了，不烦深谢。”太宗晚年，还为儿子李治选他为辅佐大臣，另两个是文臣，即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只有李勣一人是武将（《旧唐书·李勣传》）。《旧唐书》列传第十七“史臣”曰：“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凌烟之最。”这是说画相于凌烟阁的二十四位功臣中，卫国公李勣和英国公李靖是其佼佼者，唐太宗与英卫二公，君爱臣，臣忠君，君臣无间，统一了天下。

兼听纳谏故治国有方

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是最能兼听纳谏的。因此，他避免了做不少错事，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这才取得“贞观唐太宗之所以能兼听纳谏，是因他认识到自己所知有限。他曾对大臣肖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弓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腹理都邪，弓固然硬，发射却不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这使他懂得必须多听别人的意见，所以常鼓励群臣对他做不对的事多提出意见。632年，中书侍郎杜正伦、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上书进言，他认为很好，便设宴款待，对他们说：“我历观自古人臣效忠，如遇明主，便得以竭诚规劝。我又听说龙可训之，但他喉下有逆鳞，触犯它就要吃人。人主亦有逆鳞，你们却不怕触犯，各上奏进言。如常能如此，我就不会虑有危亡了。你们的忠心，我是不会忘记的，所以设宴款待。”虞世南每与他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时，对他进行规劝，他对侍臣说：“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由于唐太宗鼓励群臣进言，群臣也敢于规谏。魏征的谏诤，太宗大都欣然纳受。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知无不言。太宗赞扬他说：“你所谏的前后有二百余事，你不是竭诚为国，那能这样？”有一次太宗欢宴大臣，酒酣，对长孙无忌说：“魏征、王珪，从前尽心帮助东宫，诚是可恶。我不念旧恶拔擢用之，这无愧于古人。可是魏征进谏，我不同意，仍坚持己见，为何这样呢？”魏征说：“昔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表示同意，背后又另一样说’，如果臣当面同意，后又进谏，这是‘背后又另一样说’，这哪是稷、契事尧、舜之意呢？”太宗大笑说：“人说魏征举功傲慢，我觉得很柔媚。”魏征拜谢说：“陛下鼓励进言，臣下才敢谏，如果陛下不喜欢臣进谏，哪敢屡次触犯龙鳞？”

还因唐太宗能兼听纳谏，臣下也敢进谏，出现了不少骨鲠之臣，形成一种谏诤的良好风气。魏征、王珪、戴胄、岑文本、杜正伦等原来都是敌对势力的人，照理自顾不暇，那敢触犯龙鳞，但是他们在这种良好风气的影响下，都能操心国事，直陈己见，即使太宗不高兴也敢于坚持，因而得到太宗的赏识，成为唐朝大臣。这种进谏之风不仅出现在朝廷上，也出现在宫内。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穿上朝服向他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消了。太宗晚年，军旅调动，宫殿兴建频繁，百姓厌倦劳役，太宗贤妃徐惠娘上疏

进谏，劝其罢兵，“慎终如始”，太宗善其言，赏赐甚厚。

太宗的许多错误就是在纳谏中纠正的：

维护了法的严肃性。唐朝原规定征兵范围是十八至二十一岁之间，为多征兵，唐太宗决定征十八岁以上的，因命令需要大臣签字，但魏征却几次拒绝签字，唐太宗火了，召魏征来问这是为什么？魏征认为改变征兵年龄这是失信于天下。太宗反问：“我有什么失信于天下？”魏征举了一系列的例子，太宗醒悟了，同意取消这个命令。他对魏征说：“我原以为你太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有一次，吏部尚书长孙无忌被召，竟带佩刀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校尉校尉不发觉无忌带刀入，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罚铜二十斤，太宗同意了。戴胄反对说：“校尉因无忌而致罪，于法当斩。如果论误都是一样，判一生一死，如此差别是不公的。”太宗认为戴胄所议是对的，校尉才得以免死。有些官员假造资历，太宗令这些人自首，不自首的处死。后发现了假造资历的人，戴胄依法断以流放。太宗说：“我下令不自首的处死，今断为流放，是示我天下不信。”戴胄说：“如果陛下杀了，臣管不了。既然交下审问，臣不敢违法。”太宗说：“你自守法，使我失信吗？”戴胄说：“法者，国家颁布以取信于天下，言者，只不过是一时喜怒所说的。陛下发一时之忿而令杀之，既然知道不可而置之于法，这是忍小忿而存大信。如为忿而违信，臣为陛下惜之。”太宗说：“法有所失，你能纠正，我不用担心了。”

停止了扰民的工程。630年，太宗下诏征发劳力修复隋代乾元殿旧址，以备巡幸。大臣玄素上书进谏，劝太宗以古代帝王由奢致亡为鉴戒，指出：“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及乾阳毕功，隋人解体”，应“弘俭约，薄赋税，慎终如始”，江山才可永固。最后指出：“现在陛下的国家还不如隋时，却役使疲困不堪的人民，这么说来，陛下还甚于炀帝”。太宗看了表召来玄素问道：“你说我不如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玄素说：“如果劳役疲苦的人民修殿，那就是同归于乱，随他们一样下场。”因玄素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又讲得很有道理，唐太宗自我检讨地说：“我没有认真考虑，以致做出这种错误的决定。”于是，指示立即停止修复乾元殿，赐玄素綵二百匹，以奖励他的直谏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谏谏。”

废除了宗室封王的制度。太宗常对肖瑀说：“我欲使子孙长久，唐室永安，你有什么高见？”肖瑀认为宗室封王以镇天下是长治久安之法。太宗同意，便下诏“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早在高祖时便封诸王，在唐初宗室封王的达数十人。马周上书进谏，以历史封宗室造成的祸害指出，这非爱之而是适足以伤之。他认为夏、殷及汉的国运长久，主要是因“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太宗称善。封德彝也上奏道：“既封郡王，就要烦扰更多百姓供其劳役，这非示天下之至公。”臣下的进谏使太宗认识了封建的不对，他说：“我为皇帝是要使百姓生活好，哪能烦扰百姓以养自己的宗族呢？”便将宗室郡王皆降职为县公，只有有功的数人不降。太宗废除封建，这就基本上消灭分封割据的危机。

避免了重蹈隋帝的覆辙。隋之亡，太宗是亲自目睹的。隋之亡，并非它不强大富裕，也不是隋炀帝是个昏庸之主，而是因炀帝劳民和独裁。因其劳民，引起全国人民反对；因其独裁，不听忠言，所犯的 error 不能纠正而且越

来越多，一直到灭亡。这两个教训对他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当皇帝后，经常与群臣总结隋亡的教训，并以之为鉴戒。因此，他赞赏魏征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观点，并力行之。他做的事，谏者认为是劳民时，大都能认错不干，故能避免了重蹈隋帝的覆辙。如征高丽时，他原以为大国之师去征服一个小国是易如反掌的，但出师无名，他失败了。他恼怒得很，决意继续出征，谁也不敢犯颜进谏，时房玄龄正在患重病，他认为东征高丽是国患，便上表进谏，在总结太宗的文治武功及其众美具备的高尚品行时，要他懂得“进退存亡”之理，遵老子“止足”之诫，指出高丽没有“违背臣节”、“侵扰百姓”、“为中国患”三条罪行，伐之既师出无名，对双方都是一场灾难。太宗看了表，深深地感动说“此人病重如此，还这样忧我国家。”于是再不出征，才不步炀帝要征高丽促使全国大乱的后尘。唐太宗接纳臣下的谏诤是真心诚意的，他深知谏诤和纳谏能使它避免亡国之祸，故对谏臣是欣赏的。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我当保存这三镜，以防止自己出现错误。魏征死，我丧失了一面镜子！”魏征死后，他看到魏征写的一张表的草稿，其中有一段话说：“天下的事，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则安，任用恶人国家则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的只见其人的恶，爱的只见其人的善。对人的爱憎，都要认真详察、如果爱的而看到其恶，憎的而看到其善，去邪恶勿疑，任贤要专，国家就可繁荣富强”。太宗看后，恐怕自己因爱憎不明而犯错误，要求公卿侍臣，将这段话写在笏上，发现他的错误必须谏诤。

两代悲剧和晚年瑕疵

皇帝宝座，无人不羡，一旦登上这宝座，掌握了无限权力，就贵极荣极，无所不有，无乐不享，故争夺帝位，无代无之。利令智昏，权迷心窍，为争夺这大权大利，脉脉含情的人伦关系，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死仇，于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以至祸连百姓，家国离碎。

对于唐太宗来说，这种悲剧不幸连续发生在其兄弟及儿子两代之间。在为父亲李渊打天下时，他兄弟三人，即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同心协力，患难与共，都立了战功，堪称英雄好汉。李渊代隋创建唐朝登上皇帝位后，封建成为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各设王府，可自任官员有兵有将，对外太子可发“令”文，王府可发“教”文，跟皇帝的“诏”并行，这形成了三府三权并立的局面。本来建成的太子地位已经定了，将可继承皇位，但他猜忌的是其二弟李世民，因其战功最大，声誉最高，兵力最强，恰好其三弟元吉也妒忌世民，建成使与之勾结，“潜谋作乱”，提前夺取帝位。元吉也在暗中觊觎帝位，他对护卫官薛宝说：“除掉了秦王，取东宫易如反掌。”初，他俩曾用毒酒和行刺杀害世民不遂。624年，趁唐高祖到宜君县（今属陕西）仁智宫避暑，便决定起兵夺权，并约庆州的杨文干同时起兵作为外援。其阴谋被高祖所知，立即以他事召见建成，他知事情败露，赶忙叩头谢罪，奋身自投于地，几乎丧了性命。高祖又命令李世民率兵平定杨文干的叛乱。高祖对建成所为虽愤怒至极，因有其党羽及高祖的宠妃等为之说情，又不了了之。不除掉世民，建成是睡不安席的，当突厥兵犯汉南兵围乌城（今陕西定边县）时，极力推荐元吉出征，建议调秦王府骁将锐兵由元吉统帅。并拟在出征前，以宴别为名拿下世民，对外就说“暴卒”，并将其骁将全部“坑

之”。建成部下王晔将这一密谋告诉世民，世民与其智囊房玄龄、杜如晦商量后决定先发制人，626年6月，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九人埋伏玄武门，建成、元吉经过，世民发箭射之，建成应弦而死。元吉中箭而逃，尉迟敬德追上杀之。这就是历史所称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并非偶然事件，这是封建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的必然结果。根据当时形势，双方都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是你除掉我，便是我杀死你，别无他择。以势力论，世民最强，但建成与元吉合力，则不相上下。建成、元吉屡次要谋害世民，欲置世民于死地而后快，世民如不反击，则只有死路一条，彼此已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出现这种局面，李渊也有直接的责任，他因见世民英明过人，武功显赫，曾三次“暗里私许立为太子”，但因立长不立幼的封建传统思想的制约，尽管建成品行不佳，始终不忍废之。还因李渊的犹疑不决，而建成也探知其父皇有废己立世民的意图，认为不除掉世民则难于继位；世民对其父皇私许立己虽表示“不愿”，但并非其真心话，这就加速双方摊牌的步伐。为扩充势力，双方都各自树立死党，养蓄骁将锐卒，争取大臣支持，拉拢父皇的宠妃，结纳地方势力，收买对方部下，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集团势力，其所属成员都各自竭智尽力，准备进行最后拼搏。因胜利则成为重臣，失败则诛将被杀，故除掉对方计划都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玄武门之变”也就势在必行了。而建成、元吉之败也并非意料外之事，他俩生活上“驰猎无度”、“饮酒无节”、声色犬马，荒淫腐朽；在社会上“兼并田地、侵鱼百姓”，无恶不作，不得人心。世民则不然，为人英明有大志，能以诚信待人，甚得人心，故建成、元吉曾出重金收买其部下尉迟敬德、段志玄，他俩不为所动，而建成的“心腹”王晔却是太宗的爪牙，使太宗对建成、元吉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故能先发制人而消灭之。

悲剧没有到此闭幕，而是在太宗儿子之间继续演出。主角有三，即太子李承乾，四子魏王李泰，五子齐王李祐。承乾表里不一，在朝廷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与佞臣声色犬马，嬉游褻狎，太宗被其表面现象所惑，甚为宠爱，每出外令其居守监国。

李泰有文才，工心计，因太子有脚疾行动艰难，便有夺嫡之意。他撰《括地志》，文辞美丽，太宗很为赞赏，曾私许立为太子，每月赏赐超过太子，因之，李泰交结朝臣，自成朋党，加紧进行夺位活动。承乾知太宗宠爱李泰，也知其图谋，怕被废立，便与其党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等谋反，将率兵入西宫，提前夺取皇位。其谋未发，齐王李祐首先发难。李祐舅父阴弘智劝李祐招武士，结死党以备将来夺位。李祐喜与群小嬉游，尤好弋猎，其长史权万纪规劝不听，上书太宗，太宗几次下书责备，李祐恨万纪，派人将之刺杀，在齐州发动所属部队公开反叛，但无人响应，太宗派李勣率的讨伐军来到，李祐已被其部属捕捉，送至京师，赐死。元昌赐令自尽。李祐反，承乾对纥干承基说：“我住地离西宫只有二十步近，造反比李祐方便得多。”承基因与李祐有联络，下狱当死，遂供出承乾准备谋反事，太宗便将承乾幽禁。承乾说：“我贵为太子，还有什么要求？因被李泰所图，特与相臣谋自安之道。一些有野心的人便教我干这反叛之事。”于是，李泰的图谋亦暴露。太宗向群臣宣布：“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废承乾为平民，幽禁李泰于北苑。唐太宗因李治“仁懦”曾想立庶出俱有文武之才的李恪，因长孙无忌等反对，坚持要立嫡出的李治，太宗也只好同意了，太宗在与长孙无

忌、房玄龄、李勣商议立嗣事时无限悲痛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啊！”说了，自投于床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忙上前扶持，夺取了佩刀。

人总有瑕疵，都有七情六欲，太宗也不例外。他明于知人，善于用人，但在立嗣上则糊涂，表现得很软弱，几乎为儿子事而自杀。世上没有万能的人，也没有完美的人。唐太宗晚年较骄奢，“渐恶直言，”私欲有所膨胀，但经魏征的谏诤，他承认了错误。639年，唐太宗读了魏征的《十渐疏后》，表示要闻过能改，“克终善事”，并把此疏写在屏风上面，“朝夕瞻仰”。同时抄付史馆，让史官载入史册，使其后人作为鉴戒。他对自己的错误也做了反省，他对太子李治说：“你应当从历史上寻找古代贤哲的帝王作为榜样。象我这样是不足以效法的。……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劳民伤财。这都是我的大错，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正确的也跟着去做。”兼听纳谏，正确的照办，错误的改正，而且“慎终如始”，这便是唐太宗的伟大之处。在封建帝王中，在这方面，是找不到哪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

六、武周代唐 史称革命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唐太宗有一匹牡马非常暴烈，没有人能制服它。唐太宗身边的一位才人说，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用铁鞭打它，不服，用铁挝打它的头，再不服，用匕首割断它的喉。这位才人制烈马的手段得到唐太宗的赞赏。

这位才人就是武则天。《旧唐书·则天皇后传》记载：则天十四岁时，唐太宗听说她长得漂亮，便召她入宫，立为才人，料理太宗食宿生活琐事。太宗病死，她跟太宗的没有生育的姬妾一起，被送到感业寺削发为尼。曾经对她的美貌垂涎三尺的唐高宗李治，有一次在感业寺里见到她，便复召她入宫，封为昭仪，不久又封为宸妃，这时李治才二十七岁，武则天已三十岁了。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武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高宗因患风疾，群臣上表奏事，便都委托武后代理。她辅政二十八年，威势跟高宗一样，当时称为“二圣”。683年，高宗病死，武后独掌朝政，她用制烈马的手段，牢牢地统治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唐帝国，时间长达二十一年，其中十四年名正言顺地当了自己开创的武周王朝的女皇帝。

在历史上，人们对武则天毁誉褒贬不一。对这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应该怎样正确评价？

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武则天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她的贡献不仅是在贞观治世和开元盛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更其重要的是她改变了世界，即将由男人统治的世界变成由女人统治的世界，这确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

自母权制过渡到男权制氏族公社以后，女人就一直附属于男人，不仅地位低下，甚至不好的事也推到她们身上。商纣王听从妲己而亡，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终于被杀，吴王夫差中西施智计导致自刎，这些“女人是祸水”之论，一直在古代史学界中占上风。迨春秋时，孔老夫子把“女人”与“小人”并列，都说是“难养也”。

在封建社会里，出现了三位名列“本纪”的皇后，即吕雉、武则天、慈禧，她们都因当过皇后，在皇帝死后，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这是封建制度的特殊产物。吕雉和慈禧虽都掌握了皇帝的权力，未见她俩有当“皇帝”的非分之想，只以太后身份掌握朝纲，不敢越雷池一步。吕雉这人心狠手毒，但她保卫西汉王朝还算有功；她最大的要求，只不过多封几个吕姓王，为外家威威风而已，而那几个吕姓王都是扶不起来的笨蛋，最后还不是自取灭亡，对刘家天下毫无所损。慈禧是个很有阴谋的家伙，她的所作所为给中华民族带来很大的灾祸，是个最坏的清朝的统治者。由于她掌握清王朝实权，她要立谁为傀儡皇帝便立谁，不合她意的便搁在一边，但所立的皇帝还都是爱新觉罗氏。在吕雉、慈禧临朝听政的始终，西汉王朝和清王朝的天下并没有翻过来，她俩只不过是以辅政的角色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而已。

武则天则不然，她不仅临朝听政，而且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女皇帝。武则天能当上女皇帝，主要还是靠她的才干，凭她个人奋斗出来的。她的祖辈务农，到父亲武士护才经营木材生意，后追随李渊打天下，唐王朝建立后得任

都督官职。武则天十三岁那年，父亲死了，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幸武则天长得美，才被选入宫中当才人。才人是低级的内官，她在唐太宗身边十二年的这段时间里，努力读书，才识大有增长。高宗被她美色所迷，才得再次入宫被封为昭仪。她的刚强机智恰恰弥补高宗遇事犹豫不决的缺陷，成为高宗最得力的助手，她也因此得以参预朝政。

这个具有很强权势欲的女人当然不会满足于昭仪的地位，跟着展开了夺取后位的斗争。王皇后去看过她刚生下的女儿，她趁机狠心地将之掐死，皇帝来了掀起被子看，大惊失色，讯问宫女知是皇后刚来过，恨恨地说：“后杀吾女！”“虎毒不食子”，高宗是不会怀疑武则天下毒手掐死自己亲生女儿，嫁祸于王皇后的。这个杀女案，不光是王皇后，连肖惠妃也牵及了，武则天随而将之发展成谋反案，把王皇后和肖惠妃各打一百棍，砍断手足，再投酒缸，哀号惨死。武则天要当皇后，必须得到顾命大臣特别是长孙无忌的支持（他是唐太宗的第一功臣，是唐高宗的舅父，高宗正是靠他的帮助才得继位），武则天便跟高宗亲去拜访长孙无忌，给他三个孙子封官，还给予丰厚的赏赐；之后，武则天又叫母亲杨氏去说情，无忌也不领情。655年，唐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右仆射褚遂良等议废皇后和立武则天为皇后事，褚遂良等以武则天“出身寒微”为理由坚决反对。后来高宗问李勣，李勣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高宗乃决心封武则天为皇后，黜逐褚遂良。659年，长孙无忌被武则天党羽许敬宗诬谋反，迫其自杀，并将反对武则天的官员全部黜斥，朝政开始受武则天控制。660年，高宗因患风疾委托武则天处理朝政。

武则天是个权欲无止境的人，她在夺皇后的斗争中，团结一批官僚如许敬宗、李义府、王俭德等人之为之摇旗呐喊，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代理朝政后，她的权势更炽，这使高宗感到大权旁落，便与人密谋废之。但武后这时羽毛已丰，高宗已处于她监视之中，她发觉后立即制止，将参与密谋的上官仪等杀死。高宗为巩固唐王室的统治地位，立他与武后生的第二子李贤为太子、李贤儿子为皇太孙，他以为两代继承人已定了，唐家天下可巩固了；何况皇太子、皇太孙都是武后的亲生子女，武后是不会废黜他们的。可是高宗想错了。如果这位李贤太子是个唯母命是从的人的话，也许暂可相安无事，但太子颇有才干，深得高宗的赞赏，数令他监国，因他“处理明审，为时论所称”，他的政见往往跟母后相左，这就引起母子之间的矛盾。武则天物色一批文人为其智囊称为北门学士，太子也招集一批学者注“后汉书”，实际是组成自己的派系与母后集团唱对台戏。后汉是后党争权导致衰亡，太子注《后汉书》暗示不重蹈后汉的覆辙，这引起武则天不满，便令北门学士撰《孝子传》等给李贤读，并数次作书责备之，李贤并不顺从。正谏大夫崇俨私奏“太子不堪承大位”，后崇俨为盗所杀，则天疑太子所为，便派人审问，并搜查东宫，从马坊里查获白甲数百领，乃断为造反证据。高宗想宽宥太子，则天反对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那能赦免！”太子终于被废和幽禁，后派人逼其自杀。683年，唐高宗去世。立第三子李显继位为唐中宗，不久被废为庐陵王，立小儿子李旦为皇帝，但不许参与政事。690年，武则天自立为皇帝。

女人当皇帝，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引起了朝野震动，但反对的只是李唐皇族和旧官僚。首先是，以徐敬业为首的被贬谪的官僚以匡复庐陵王为辞，集结十万兵马向武则天宣战，经不起武则天派三十万大军一击便一败涂地。

接着以韩王李元嘉为首的皇族起兵发难，当官兵知是“与国家交战”，纷纷逃亡，不战而溃。为了慑服潜在的反对派和不听命的群臣，以提高其权威和巩固其统治，武则天组成一支酷吏队伍，用严刑酷法进行恐怖统治，李唐宗室近支被诛杀殆尽。为使大臣听命，凡违命或不称职的便撤职或杀掉。她当皇帝的十四年间，任职宰相的有五十八人，被杀被贬的各有二十一个，占72.4%。

武则天就是这样，为了夺取最大的权力，她以超人的智计、最毒的手段、恐怖的政治，进行了惨绝人寰、惊天动地的斗争，最后她取得胜利了，翻倒了唐王朝的天下，创立了武周王朝，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真正由女人统治天下的女皇帝。

武则天不只是中国有名的女皇帝，在世界历史上的女皇帝中也是佼佼者。世界上最早出现封建女皇的是朝鲜、中国、日本，但日本女皇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国家大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朝鲜女皇虽有权，政绩不大显著。东罗马帝国的伊仓女皇虽然在中世纪史上被称“第一女皇”，但比武则天迟了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中世纪女皇中，武则天政绩可以和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俄国的喀德林二世并列，但武则天统治的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国上最大、国力最强的封建大帝国，其政治制度对世界影响之大及深远，是世界中世纪历史上所仅有的。

唐室倾覆而“海内虽然”

武则天进行的夺权斗争，其激烈性、残酷性，不下于任何一个朝代的改朝换代，但它对社会震撼不大，也没有带来大灾害，唐室被倾覆了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这是什么原因呢？最主要的是：武则天在其执政期间，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当时经济的核心是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是经济获得发展的关键。早在武则天还是皇后的时候，就向高宗建言十二事，其中第一条，即其“建言”的中心思想：劝农桑、薄赋徭，让民休养生息，以发展生产。在她辅政和当皇帝期间，积极地推行她所制定的这一经济政策。她屡次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由她亲自作序的《臣轨》一书所谈的也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为了指导生产，她又叫编辑了一本农书《兆人本业记》颁发给各地官吏，要求刺史县令“敦劝农桑，平均赋役”，不要违误农时，发展农业生产。又下令“以田垦辟，家有余粮”作为官员考核擢升的基本条件；为政苛滥、户口流散的州县长官，要受惩罚。在武则天的重视和推动下，各地方官都积极兴建水利，唐前期水利工程多修建于则天执政时期。据统计，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共有二十二项，连边陲的沙州、西州等地也有发达的灌溉系统。贞观前期，河西州县萧条，户口鲜少，百业凋弊，需藏空虚。则天统治时，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粮价下降，由一斛数千钱降为一缗可换数十斛，凉（今甘肃武威）、甘（今甘肃武成）一带“牛羊被野，路不拾遗”。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全国户口也迅速增长，唐太宗时，户口为三百八十万户，至武则天统治的末年，已增长到六百八十五万户。武则天在经济上的建树，为开元盛世奠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的发展，户口的增加，反映了人民得到安居乐业。人民，只要生活稳定，活得好些，不管是谁当皇帝都是拥护的，正因此，当唐室皇族与旧的官僚掀起反对武则天的浪潮时，人民不为所动，没有跟着他们走；不得到人

民的支持，是不可能成什么大事的，这便是两次宗室起兵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

武则天之所以能实行有效统治，除了经济基础建设得扎实外，其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也建设得较牢固。在政权建设方面，武则天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一、发展科举制度，广招各种人才。

人才几乎是决定一切的。“得人才的得天下”，也可以说“得人才的天天下治”。武则天是很重视和选拔人才的，因之武周王朝人才济济，为之出谋献策，治好天下。她选拔的人才，大多数是忠于她的，她的政权也就得到巩固。则天招罗人才，首先是通过科举考试。则天执政后，唐宗室当官的及旧臣被剪除殆尽，为了培养自己的党羽，她大力发展科举制度来搜罗人才。她扩大进士科，还在洛成殿主持考试，亲自录取，被录取的当然感激她的大恩，为她效力。在贞观的二十年中，录取进士二百零五人，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五年中，据不完全记录统计，录取进士就有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在唐高祖、唐太宗时，进士出身的为相甚少，武周朝时，科举出身的宰相则占了30%，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才。

二、坚执刑赏大权，驾御天下官员。

《资治通鉴》说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贤俊亦竞为之用。”武则天认为有才能之士则大胆提拔，故武周朝的杰出人才不比贞观时少，如她的名相狄仁杰、张柬之，后来开元时期的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和文坛巨擘陈子昂、刘知己，都是她通过科举选拔的；武将则有唐休璟、郭元振、王孝杰、魏元忠、刘仁轨、薛仁贵等，都是一时名将。但在放手选拔官员的同时，她课责也很严厉，凡不称职或违法乱纪的，或革免，或诛杀，甚至灭族。因此，官员一般守法，不敢为非。

在武则天统治期间，一般能正确使用权力，镇压叛变而扰民不大，大力发展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她以刑赏御使群臣，英贤者晋升，使为之用；不肖者罢黜，不使其胡作非为，这使其统治基础建设得较牢固，故唐室倾覆而天下晏然。

武周王朝时社会比较安定繁荣，除了以上所述的建树外，也跟武则天能正确处理边疆关系，对内对外能实行较开放政策有关。

所说边疆关系，即与周围边疆的民族关系。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说明，处理得好，民族和睦，对彼此都有好处；处理不好，关系紧张，对彼此都有害处。而引起关系紧张的，这是因中国有的封建王朝，国力强大时，向边疆民族扬威以武力压服，边疆民族怀恨在心，一有机会便起兵侵扰屠掠；有的封建王朝，国力弱小时，无力对付边疆民族的侵扰只有割地送财屈膝求和，这就更增长边疆民族的侵扰的气焰。以上两种做法，都不能改善民族的关系。武则天处理民族关系采取了如下的政策：和则怀抚，降即礼之，寇边坚决迎战。武则天临朝之初，边疆不很安宁，如契丹常来侵扰，东突厥叛变复立，武则天能分别对待，对于东突厥，在派军防御的同时，力争和解，终于在与对契丹作战时得到东突厥默啜可汗的配合，打败了契丹，使骚扰汉北的战火很快平息下来。吐蕃屡犯西境，占领安西四镇。692年，武则天派名将王孝杰收复了安西四镇。为了防御吐蕃骚扰，武则天派三万军镇守在甘州、凉州等地，兴置了大量屯田，由于连岁丰收，所积军粮可支数十年。这

样，用兵不劳民，拱卫了西北边防的安全。特别是701年，她任郭元振为凉州都督，拓地一千五百里，继续保持着通往西域的通道，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制止吐蕃东侵后，武则天连年派出和亲使，重申松赞干布——文成公主时代的唐蕃的亲密关系。吐蕃人民对好战的论钦陵更加不满，这个三十年来破坏唐（周）蕃关系的罪魁终于在内江中自杀。

在国内经济发展和边境安宁的基础上，武则天实行较开放的对外政策，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使长安成为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和向往的圣地，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不只是在陆地，也拓展到海上，海运扩大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那时，外国人可居留中国，享受同中国人一样待遇，既可以经商，又可以上学读书，考进士、当大官，也可以当兵、当大将军。这不仅扩大了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加强了与各国的友好关系。

对内也是比较开放的，容许佛、儒、道三家思想同时存在，使之在斗争中趋向融合。在当时思想界较活跃，创作也较自由，出现了不少传世名作，如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文馆词林》，等等。社会生活也丰富多彩，元宵节三天，京都不戒严，皇帝、大臣、宫女与民同乐，挤得人山人海，人们喜欢歌舞，胡人的乐舞、杂技经常在长安、洛阳演出。服装不时变化，穿著五彩缤纷。男女之间的交往较自由，可自择婚配，离婚也易，贞节观念淡漠，这是唐人的风气。及则天称帝，实行一些尊重女人的措施，妇女在社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男女之间交往更自由了。

总之，武则天在不少方面有所建树，李贽赞她胜过高宗十倍，中宗万倍。她是可以和唐代的唐太宗、唐玄宗媲美的。也巩固了唐太宗时所取得的成就，为开元盛世准备了条件，武则天对社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她不仅是中原地区的女皇，也是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天可汗”，在世界中世纪史上，也不愧称为世界杰出的女政治家。

明智又昏庸的女皇帝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明智的皇帝，都有其昏庸的一面，其所差异的只有昏庸程度不同罢了。作为一个女皇帝的武则天也不能例外。

武则天之所以明智，除了她本人具有机智的素质外，是因她一般还能兼听纳谏，故能明察善断，采取了不少正确措施以巩固其政权，治理好天下。她之所以昏庸：一、出于防人造反的政治需要，乃用峻法进行统治，于是任用一批酷吏专办谋反案，致被酷吏所蒙蔽，造成了很多假案冤案；二、专制帝王权力无限而个人智力有限，她金口一开便是圣旨，就要照办，而任何圣人都可能说的都是对的，开口错了，就必然要办蠢事错事，因而她存在昏庸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解情况，武则天在朝堂设四个铜轨，公开鼓励官民上书言事、反映下情及告密，除了告密外，对她了解世事是大有裨益的，使她对“人间善恶多所知悉”，掌握了天下善恶，是她能明察善断的一个重要条件。

武则天因长期在唐太宗身边，耳濡目染，颇有唐太宗纳谏的遗风。正因她较能纳谏，使她纠正了不少错误，这是她明智之处，使她基本成为一个明智的女皇。

武则天镇压宗室两次起兵叛变后，为防止唐室旧臣继续反抗，公开鼓励

官民告密，擢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来处理告密，专办谋反案件。来俊臣撰写《罗织经》一卷，教其党徒按其经文罗织罪名，陷害无辜，凡下狱的无法自辩，几乎无一幸免。他们还造多种可怕刑具，如“定百脉”、“求即死”、“死猪愁”，并施以“驴驹拔搯”、“凤凰晒翅”、“猕猴钻火”、“方梁压髀”等骇人听闻的酷刑，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宁愿承认谋反罪求早死。先后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的官不计其数，其中大多是冤案。但武则天认为来俊臣等酷吏办案有功，偏听偏信，使朝臣人人自危。不过，她对一些认为不会谋反的亲信大臣，并没有只听酷吏一面之辞，她了解真相后也力加保护。如狄仁杰曾被诬谋反，在来俊臣等人的“罗织”下，狄仁杰承认了谋反，后来她查明真相，安慰了狄仁杰，并免其死罪。武则天内宠张易之纵其家奴凌暴百姓，时镇守并州的副元帅魏元忠答手之。元忠辅太子李显时，尝上奏反对张易之、张昌宗等小人在君侧，则天不悦，两张更其怀恨，乃诬无忠曾对人说：“主上老了，我们应扶太子，治理天下。”则天被其所惑，便捕元忠入狱，不过她召有关人员殿前对证，听取不同的意见，结果知元忠是被诬告，便免其罪。对这两件事，《旧唐书·则天皇后传》的“史臣”赞扬其“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酷吏诬陷无辜的真相日益暴露，武则天为减轻己罪，连续向一些酷吏开刀，称帝次年，杀索元礼，流放周兴。再过一年，杀来俊臣，仇家争割其肉。武则天见群情激愤，便下诏历数来俊臣的罪恶，加以灭族罪，说是“以雪苍生之愤”。其实，酷吏都是秉承其意志行事的。不过这时她已悟到用酷吏治狱之非。697年，武则天对待臣们说：“以往周兴、来俊臣等办理案件，朝臣交相牵引，却承认是谋反，国家有法律。我岂能违背。有的我也疑是滥用刑罚造成的，便派近臣到监狱去审问，得到他们手写承认有罪的状书，我就不怀疑了，就批准他们的处理。自从周兴、来俊臣死后，就再听不到谋反的事了。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冤枉被滥杀的呢？”时任夏官（兵部）侍郎的姚崇说：“这三年来，被告身死破家的都是冤枉，被逼自诬。告密的人就以诬害别人立功，天下称为罗织人罪，这甚于汉朝的党锢之祸。陛下派近臣到监狱去审问，近臣害怕招祸，怎敢翻案？被告要翻案，又惊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就是这样被害的。全靠苍天降灵，皇上你醒过来了，诛杀了凶手，朝廷又安定下来了。自今以后，我以微躯及一门百口担保内外官吏再无谋反者，恳求陛下今后收得告状，把它搁在一边，无须去追问，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则天听了高兴地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陷我为滥行刑罚之主。听了你的话，很符合我的心意。”当日，即派人赐给姚崇干两银。次年，任姚崇为宰相。武则天纳姚崇的批评和建议，终于结束了酷吏政治。武则天能纳谏，使她从昏庸的深渊里拔出来，虽彼称为“千古未有之忍人”，还不致成为暴虐之主。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也是唯一的公开纳男宠的女人。中国男皇帝后宫粉黛三千，而武则天的只不过几个男宠，但内宠、外戚给男皇帝招来不少麻烦或灾祸，对于武则天也不例外，女儿姊妹得入宫廷当皇后或受宠爱，其家属便一步登天，这些人大多是无知之辈碌碌庸人，一旦有权势，便胡作非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东西汉的衰亡，都是与外戚有关。不过武则天还能适当控制其男宠和外戚，还听大臣的进谏，并不完全偏袒他们。因此，她的男宠、外戚虽经常给她带来不少麻烦，不致造成大的祸害。武则天称帝，她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多人被封为王，武承嗣还任宰相，权力最大，另一宰相李

昭德向武则天密言：“武承嗣权太重，恐有篡夺帝位的危险。”这提醒了武则天，她说，“我没有想到这里”，即免去武承嗣宰相之职。武承嗣指使人诬狄仁杰谋反，武则天查明后免其死刑，武承嗣屡次奏请杀掉狄仁杰，武则天不同意说：“我好生恶杀，旨意已下达不能更改。”她的男宠僧怀义持势骄横，连武承嗣、武三思等亲贵都敬畏他，唯独宰相苏良嗣不买他的帐，有一天在朝堂遇见僧怀义，便叫人拉下打嘴门数十，僧怀义向武则天诉苦，她说：“你应该出入北门，南牙是宰相往来的地方，你不要触犯他们。”后来僧怀义作恶多端，她把他杀了。她另纳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张权势显赫无比，贪赃枉法，横行霸道，不顺意的大臣以至王公贵族，都遭其打击，如宰相魏元忠和张说、杨元禧、杨享等因他们的诬害而遭到贬逐，这激起了朝臣们猛烈反对。武则天虽然保护二张，但也下令说，张易之、张昌宗作威作福，着到肃政台受审。张昌宗被罚铜二十斤。她这样做是表示重视朝臣们的公愤。有一次武则天在内殿赐宴，张易之引蜀商数人在筵前博戏，宰相韦安石跪奏说：“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殿。”因令左右逐出，全座为之失色，武则天以安石辞直，深加慰勉。二张违法乱纪，宋璟奏请处以国法，于是二张常借事中伤之，武则天察其情置之不理。

女人局限及武周结局

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敢于革唐之命，建立一个由女人专政的武周王朝，使自己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显示她超人的胆识。但正因她终究是一个女人，以及时代的局限，她摆脱不了夫权的支配，更改变不了以男子为中心的继承制度。

武则天是唐高祖的孙媳，唐太宗的幼妾，唐高宗的妻子，这样，她才能成了唐室皇族的成员，当上了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凭着她的智计和能力，与高宗并列被称“二圣”。高宗曾有“逊位”于她之意，他去逝时遗诏：“军国大事不怏者兼取天后进止。”由于她是唐的“天后”，获得高宗委托处理军国大事的大权，武则天才能顺利改唐为武周，虽然有唐宗室两次起兵，一次还未起事便被消灭，一次很快便被镇压，武周代唐基本上是和平过渡的，实际上是继唐事业。所以，她既想肃清唐王朝的影响，又不能与唐王朝一刀两断，仍然是藕断丝连；她既要抬高自己至高无上的女皇地位，又不能贬低或否定自己的丈夫。这说明她摆脱不了夫权思想的支配。在建都洛阳和立庙问题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她为显示武周与唐不同，把政治中心从长安移到洛阳，将东都改为神都，690年九月改唐为周，正式称帝后，在神都建立武氏七庙的同时，又建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同时享祀仪式如在西庙（长安唐宗庙）一样。可见，她虽是武氏之女，因又是李氏之妇，故不能只抬高武氏而贬低李氏，只好两者兼而顾之。如果贬低或否认李氏也是贬低或否认自己。这个女皇对待武氏、李氏问题是如此矛盾，而依据她当时认识，及其处境也只能如此解决。

在武周王朝的继承问题上，武则天也一直处在矛盾之中。武则天称帝后，以其幼子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显然是想以改姓使他继承武周天下。以男姓为中心的社会里，要使李姓人作为武氏之后是不可能的。所以，也有人建议立武三思为太子，武承嗣、武三思都想染指太子的地位，武则天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遭到不少大臣的反对。宰相李昭德说：“天皇（高宗）是陛

下的丈夫，皇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那能传给侄子呢！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侄儿为天子而为姑立庙的啊！”宰相狄仁杰也经常以母子之情，劝说立被废的庐陵王李显立为皇储，在狄仁杰的劝说下，武则天逐渐醒悟，终于召还李显为储君。武则天不立武姓而立李姓儿子为皇储，大臣们的支持是个重要原因，她所亲信的宰相狄仁杰、李昭德、姚崇、张柬之等都反对立其侄儿为皇储。705年，武则天病重时，张柬之等联络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张易之、张昌宗，拥戴李显复位。当日，武则天下诏传位于皇太子。这一年十一月，武则天死于洛阳宫城南的上阳宫仙居殿。死前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从唐到武周，又从武周到唐，基本上是和平过渡的，这是历代封建皇朝的交替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也是武则天作为一个女人的局限，她改变不了以男子为中心的继承制度，其建立的武周王朝只能落得这样结局。

七、宋祖重文文明冠世

在封建帝王中，宋太祖堪与唐太祖媲美，他俩都是封建帝王的佼佼者，道德作风：唐太宗以诚实待人，兼听纳谏；宋太祖为人宽厚、容众，文治武功：武功两人不相上下，文治则因天不假年，宋太祖稍逊于唐太宗，但他扭转了五代时期重武轻文之风，制定了“重文”方针，促使宋代“两个文明”达到最高峰，中国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即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出现于宋代，对我国和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对后世的文明贡献来说，宋太祖则超过唐太宗。

从“黄袍加身”到“杯酒释兵权”

封建社会易代和篡位的历史说明，为取而代之往往是大开杀戒，即使你是他的亲老子或亲兄弟，都要叫你身首异处，对于仇敌或异己势力，都要扫个清光，甚至夷九族：为巩固帝位，“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今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的悲叹及其不幸遭遇在不断重演。只有宋太祖与此相反，他在夺取帝位和巩固其赵家天下时，不是以“杀”字当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这两则胎炙人口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他用巧妙的和平手段夺取帝位和巩固帝权的经过。

“黄袍加身”的故事是这样的，《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宋太祖，姓赵，名匡胤，涿州（治今河北涿县）人，927年诞生于洛阳。及长，“容貌雄伟，器度豁如”，善骑射。先投北周太祖郭威，后随其养子周世宗柴荣，在南征北战中因他勇武又有谋略，屡立战功，深为世宗所倚重，成为心腹爱将，从一名小校迅速升迁到殿前都点检，掌握了禁军最高指挥权。不久，世宗病死，七岁的柴宗即位。960年正，北汉会合契丹入侵，派赵匡胤出师抵御，大军行到陈桥驿，因天色晚就在那里驻扎下来。五更，军士齐集驿门，吵吵闹闹，说要拥赵匡胤点检当皇帝，有人制止，军士不听。快天亮的时候，他们逼近赵匡胤的寝所，赵匡胤的弟弟匡义入告这事，匡胤才出来，诸校官全副武装排立于庭院前，说：“诸军无主，愿拥立太尉当皇帝。”赵匡胤还来不及答话，他们就以皇帝穿的黄袍加赵匡胤身上，一齐跪拜在地，高呼万岁，扶赵匡胤上马。赵匡胤揽着马辔头对诸将说：“你们要我当皇帝，我有号令，你们能遵行吗？”诸将皆下马说，“唯太傅之命是从。”赵匡胤说：“太后和幼主，我曾北面事之，你们不得侵犯；大臣们曾是我的同事，不得欺凌：朝廷府库，百姓之家。不得侵掠。服从命令的有赏，违者诛杀。”诸将再跪拜，表示遵命。于是，便整军返回京师，除了副都指挥使韩通想组织反抗被杀外，其余秋毫不犯，赵匡胤顺利地登上了帝位，创建了宋王朝，称宋太祖。对于周太后和幼主就加以保护，迁居于西宫，幼主改其帝号曰“郑王”，尊太后为周太后。对北周旧臣一律留用。

所说“黄袍加身”，只不过是一场夺取帝位戏的重演，赵匡胤并非第一个演这样的角色。在唐灭后进入五代时期，即分裂时代，到处割据称王，在五十多年间，更换八姓十四帝，平均每四年更换一个皇帝。那个时代，谁兵强马壮，谁就可“取而代之”，只有取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有的是明夺，有的是暗取。暗取的也各有巧妙，赵匡胤所曾经奉事的后周太祖郭威，当后

汉派他率兵北抗契丹时，当军至澶州，将士哗变，撕裂黄旗裹在郭威身上，拥立为帝。这一幕戏的演出，赵匡胤是拥立郭威为帝最积极的角色之一，他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当机会一到，便如此照办。不过撕裂黄旗裹身，还可说是仓卒间凑数。而以皇帝穿的黄袍加身，显然是事先已准备好了。

赵匡胤即位后，于963年起，便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先后攻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诸国。赵匡胤在征伐诸国中，都告诫，统帅勿滥杀，并要对其国主给予保护。有潘美率兵十万出荆南以伐江南时，告诫说，“攻陷金，慎勿杀戮，对唐后主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他在明德门见李煜于楼下，不少献俘礼。迁李煜于汴京（今河南开封），贬为违命侯，后改封陇西郡公。王全斌统军征伐后蜀，因他贪恣杀降，虽立了大功，便加贬绌，对于诚心投降的国君，赵匡胤诚待之。宋立国后，吴国国君钱俶向宋称臣，谨慎事奉，每岁朝贡，倾境内珠宝以献。宋征南唐，也以亲率大军策应。因此，赵匡胤对他优礼有加。有一次钱俶来朝，宰相等大臣都建议将钱俶留下以取其地，太祖不听，让钱俶归国。钱俶来拜辞时，宋太祖将数十轴奏疏封好交给他，告诉他在途中密看，钱俶看后，既感激又畏惧，南唐灭，钱俶上表宋太祖献所据两浙十三州地归宋，受宋封为淮海国王，后徙封为邓王。钱俶始终受到恩遇，988年病死。在宋兵进迫时，南汉皇帝投降，宋太祖赐宴，刘铨在国内时好置赐酒毒臣下，当太祖赐酒时，铨疑有毒，他凑杯哭着哀求：“臣罪在不赦，陛下既不杀臣，愿让臣当个平民百姓，求求陛下不要使饮此酒。”太祖笑着说：“朕以赤心待人，那会给你毒酒呢！”即取给铨的酒自饮，另酌酒赐铨。

赵匡胤浪迹江湖时曾受人侮辱，有人劝他报复，他不同意说：“那时谁能预知谁将来当天子呢？”他投奔南汉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薰宗本时，受到其子薰遵海的凌侮，赵匡胤即位后召见他，他惊惶伏地请死，赵匡胤却安慰他说：“我赦过赏功，那能念旧恶，你放心，我将重用你。”遵海说：“母亲陷于幽州。”赵匡胤便派人用重金赎回。遵海感其恩，拼死效力，在平李筠叛乱和抗击西夏侵扰中都立战功，被任为罗州刺史。

由于赵匡胤取天下主要不是依靠杀戮，而是善于化干戈为玉帛，融仇敌为臣民，敌人心归服，进展顺利，阻力较少，虽有少数叛乱，只不过是“蚍蜉撼树”而已。

五代时，谁手握重兵，谁就可夺取帝位，尤其是皇帝的心腹武将禁军统帅，宋太祖自己就是以此代周，所以，他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天下基本统一后，宋太祖就考虑采取什么办法防止这种兵变的再次出现。赵匡胤统领禁军时，与重要的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结成义社十兄弟，他们在拥立赵匡胤和四出征战中，都有汗马功劳，是宋朝的开国功臣，在这些手握重兵的将领中都有可能再来一次“黄袍加身”，怎样对待这些出生入死的义社兄弟呢？于是，他请谋主赵普来商量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几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火不熄，生民涂炭，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要熄灭天下战火，为国家长久计，应当怎么做呢？”赵普回答：“以前的战乱，是由于方镇权太重，君弱臣强，如果改变这种局面，只有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样天下自然安定了。”赵匡胤听了，恍然大悟，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和措施：

首先是“稍夺其权”。《宋史·石守信传》记载：有一天，宋太祖因晚朝与石守信等饮酒，酒过三巡，宋太祖说：“没有你们拥戴，我不会有今天

的地位，可是我为天子，没有一天晚上能安枕而卧，还不如当节度时快乐呢，”守信等叩头说：“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陛下为何这么说？”太祖说：“那个不想富贵，一旦有人以黄袍加到你身上，虽不想当皇帝，那行吗？”守信等拜谢说：“臣等愚昧想不到此，望陛下哀怜之。”太祖说：“人生就象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不如多积金钱，买田宅以遗子女，多置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嫌，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听了明白宋太祖的心意。第二天，石守信等便都称病，请解兵权。宋太祖当然很高兴，都同意他们的请求，封他们徒有虚名的官爵，让他们仍在家闲居，赏赐他们许多钱财、田地。这就是史称的“杯酒释兵权”。

其次是“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宋太祖将天下精兵编组成禁军，直接由皇帝指挥；弱兵留地方，将领只领兵不管政、财事务。对禁军将领经常调整，部队也不时换防，目的是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防止武人发动兵变。并将改革军队的经验应用于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在中央政府就限制相权，实行政务、财务、军务分立制度。所有上述措施，其目的在于内外相制、上下相维，最终集权于中央，集权于君主一人。

宋太祖防止政变所采取的办法和措施，显示了他高度的政治艺术天才，一席酒宴铲除了五代以来不断兵变的祸根。加上采取了限制相权、帅权的措施，在北宋时期既没有权臣，也未出现跋扈将军，政权是稳定和巩固的。宋朝三百余年，没有以前的改朝换代出于内部之患，这与宋太祖所制定治国方针和巩固帝权的政策是大有关系的。

重用文士和提倡读书

宋太祖制定“重文轻武”的方针，显然是出于防止武将兵变的需要，如他把文官置于武将之上，中央的军事枢纽枢密院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枢密院有发兵权，没有直接统兵权，枢密院直接向皇帝负责，其发兵权也就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禁军不再由一人统领，设“三衙”，各不统属，“三衙”只有带兵权，没有统兵权。遇到战争，皇帝则临时委派文官担任统帅。战争结束，统帅交出兵权，将领则他调，士兵返回营区。可见，文官统军在一千多年前，宋已行之，今有的西方国家实行此法并非首创。文官统军，古今得都认为是宋代“积弱”的原因之一，揆之实际，不能作为定论。历史事实说明，“凡为名将，不能靠武勇还要有谋略，即要具有文武全才。因为战争不只是刀枪拼搏，它牵涉到政治，经济、科技诸多方面，一个统帅必须在宏观方面能把握整体，才能更好运筹帷幄，正确指挥战争以取得胜利。如果没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即使武艺再高强，也只能配当一名武将。在我国古代，有大志的文士不只学文、学治世之道，也学古代兵法，所以不少名将是文人出身的。不少文人出身的名相不仅有道，在军事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说明宋朝“积弱”并非由于文人统军，我们且看北宋历朝的对外关系：在太祖、太宗时，军事上都取得重要成就，太祖时只有北汉未平，太宗继位后灭北汉，他虽征辽失败，那时还不算“积弱”。太宗死，真宗继位，寇准为相，他进士出身，是个典型文人，但对制止辽的入侵是有功的。《宋史·寇准传》：1004年，辽大举攻宋，围澶州（今河南濮阳），宋朝野震惊，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寇准坚请真宗亲征，分析敌我形势，说。“出奇以挠其后，坚守以老其师，彼劳我逸，胜算在我”。便请真宗亲临澶州，真宗

将军事尽委寇准专决。寇准号令严明，士卒战斗情绪很高，辽兵数于骑兵临城挑战，寇准派兵出击。斩敌大半，相持十日，敌统军挾览亲自出阵督战，被射死，辽人派使请盟，寇准不从，但真宗畏敌，将同意立盟又有人进谗言说寇准想拥兵自重，寇准不得已只好同意。真宗派曹利用与辽议每岁输送岁币事，并说：“百万以下都输送。”寇准警告曹利用说：“皇帝虽有敕，但不准超过三十万，如超过此数我就要你的脑袋。”曹利用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打了胜仗却还要每年向敌人输岁币，开创了用岁币求苟安的恶例，其责全在真宗，而寇准是立了功的。如果让真宗南逃，后果不堪设想，如果不是寇准运筹帷幄，重创敌人，辽是不会请盟的，后来有人讥真宗贵为天子立城下之盟，真宗为掩其罪责竟归罪寇准，将其罢相，这真是冤哉枉也。仁宗时，范仲淹为相，他也是进士出身，不只是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也是个深谙谋略的统帅，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的时期。过去西夏经常入侵，侵占了不少地方，仁宗乃派夏竦为主帅，以韩琦和范仲淹为副帅。韩琦轻敌。草率反攻结果中伏大败。范仲淹则不然，率军前往陕西前线抗敌，他亲临前线视察，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等弊端颇多，便进行改革军阵体制，筑坚固的防御阵地，并出敌不意，用七天时间，在宋夏交战地带筑起一座新城——大顺城。西夏发动进攻时，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构成了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防御体系，使西夏兵望而却步，不敢冒险入侵。英宗时，暂停向西夏“岁赐”。及神宗继位，虽想灭西夏，因任用统帅是宦官李宪，指挥不当，失败而归。哲宗继位后，加强武备，并命西北各路多筑城堡，进迫西夏，屡次打败西夏；于1098年，又大败西夏军于平夏城，从此西夏势渐衰。金兵南下，北宋沦亡，其罪责不在文人统军，而是在于宋徽宗等昏君。当金兵逼近开封时，徽宗传位于其子钦宗后即仓惶南逃，钦宗与大臣们也想南逃，在李纲劝悦和坚决反对下才留下，当时大臣无人敢领导抗战，进士出身的任行营参谋官的李纲挺身而出，自愿担当开封保卫战的主帅，在军民的支持下，打退了来犯的金兵。这时徽宗才敢回开封，可是见李纲得到军民的拥戴，怕他权大难控制，便将之撤职。不久金兵再次南下，攻入开封，将徽、钦俘虏北去。我们不厌其烦地叙述北宋九代王朝御敌胜败的情况，在于说明宋朝“积弱”在皇帝本身，而不是由于文人统军。对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进一步阐明。

宋太祖从重武至重文是有一个过程的。他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且在那个以武力割据时代，要想有个锦绣前程，就要靠用刀枪拼搏，在这样的家庭和环境里，他只读了几年书，便专心致志地学了一身武艺，后来靠此为北周屡立战功，掌握了军权，才能“黄袍加身”坐上帝位。他刚当上皇帝时，还瞧不起儒生，有一次，他与赵普路过朱雀门，指着门上的牌匾问赵普：“为什么不直接称‘朱雀门’，中间加个‘之’字有什么用？”赵普回答“之”是语助词，他轻蔑地笑着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但是他“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天下基本统一了，武事他虽懂得多，用处不多了，而治天下要靠文事，这方面他懂得很少。蜀灭后，蜀宫人被纳入宋宫内，他看见她们用的镜背有“乾德四年铸”四字，便召窦仪等问是什么意思。仪说：“这镜必是蜀物，蜀主尝有此号。”他高兴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当时，他用的年号也是“乾德”，便决定改年号，指示宰相说：“年号必须用前代没有用过的。”从此，他很重视儒士。

宋太祖对儒士的重视，在封建社会是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有人说：“宋

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这也许有点溢美，但可以说，士人的处境比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好得多。这表现在：一、在社会各阶层中，士人地位最高。宋太祖为广招人才，大开科举。源于隋发展于唐的科举，迄唐时并非入仕的唯一途径，那时门第世家还存在，其子弟可靠其高贵的门第做官；至宋时，门第世家经过五代战乱已经消灭了，士人要想做官，就只有通过考试一途。唐代取士往往有场外交易，宋代则极其严格，为了不让人作弊，宋太祖还亲自殿试举人。考试及第所受到的重视，宋朝超过唐朝，当及第的进士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热闹非凡，万人空巷。当时有人感慨他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二、对士人很宽容。宋太祖曾下普约，藏于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者。当时大臣及言事者都是士大夫。在宋王朝以前，官员弹劾或检举别人，如果被认为失当或诬告，可能被免职或处死。宋朝士大夫则没有被处死的危险，即使受到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如苏轼、苏辙、欧阳修等人都曾被说成是犯有攻击皇帝、反对朝廷的弥天大罪，而处分只是贬职或流放。有宋太祖誓约的保护，加上受到重视，宋士大夫也就竭力献智，为宋王进卖命。因此，宋代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民族英雄和忠臣义士，如岳飞、宗泽、文天祥、陆秀夫等，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宋太祖不杀士大夫，既可得贤君之名，又可得士大夫的效忠，这确是高明得很！

宋太祖转入文治后，更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便积极学习，以借鉴前代王朝治国的经验教训。如他读到有关尧、舜慎重判处罪犯的经典书籍后，感叹地说：“近代刑罚为什么如此苛酷！”便对宰相说：“五代时诸侯跋扈，枉法杀人，朝廷却置之不问。人命至关重要，那能如此姑息，让他们仍随便杀人呢？今后诸州判决死刑，要上表奏闻，交刑部复核后决定。”他懂得读书的好处，也鼓励其左右读书。宰相赵普“精于吏道，寡于学术，”太祖劝他学文学，赵普乃手不释卷。对于宗室诸王，督促更严，他说：“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在他的督促和影响下，宋代皇帝大都好学，太字曾多次对臣下说：“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宋真字说，“听政之暇，唯务观书。”仁宗也好学，“博古通今”。连那个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书画很有成就，诗词有一定造诣，其他宋代皇帝也多数爱好读书，擅长于诗词书画。对于武将，宋太祖也要求他们读书。他曾对待臣说，主张武臣都要读书以通治道。在宋太祖的倡导下，学武的以读书为荣。宋代有两个最卓越的名将——狄青和岳飞，都是当兵出身的，他俩武艺都很高强，但都好读书，精通古代兵法，都是文武全才的统帅。从岳飞写的气撼山河的千古绝唱——《满江红》，可知其文学造诣之深。由于宋太祖的重视和提倡，从中央到地方官吏都重视劝学。甚至贬官也如此，如苏轼被贬儋县时，便很关心当地学生学习情况。正因上下重视，好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宋代是置读书高于一切的，这从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中足以证明，这诗开头便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于后两句，过去曾予批判，认为是知识分子轻视劳动的错误说法。说“万般皆下品”，显然是错误的，各行各业都是社会分工的需要，那能说谁高谁下，但它说“唯有读书高”，并不是说“士”居首位，这首启蒙诗是对儿童说的，教育儿童要把读书视为高于一切，这是没有错的。对于成年人来说，不论是士、农、工、商、兵，把读书视为高于一切也是正确的。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其学问，都凝集在各种书籍之中，不好好的读书，哪能继承前

人或学习同时代的成果以提高自己，哪能把事业推向前发展呢？再从国家来说，一个国家没有高度的文化，也就不可能有高度的文明，古今如此。所以笔者认为为“唯有读书高”的正名是有必要的。

由于提倡读书，把读书当成最高的任务来抓，宋王朝的教育文化事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发达。中央设最高学府国子监，州政府所在地设州学，县政府所在地设县学。各乡镇有人民自费设立的小型学校——私塾。国家的最高学府虽只有一所，但社会上私立的书院则很多，其规模之宏大，有时还超过国子监。其中最享有盛名的有五所书院，即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当时所有的书院全由政府官员创设，且几乎由政府支持。宋朝士大夫都以兴学为己任，王安石知鄞县时，以兴学为重，文风为之一振；杨简知富阳县时，针对“民多服贾而不知学”的情况，“兴学奉士，文风益振。”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两宋三百年间，读书之风大盛，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记载：“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

宋代教育文化如此发达，宋太祖制定的“重文”方针，重用文士，提倡读书，显然起了关键的作用。

宋代文明高峰形成的奠基者

宋太祖明智之处在于：在统一大局已走后，治国焦点放在文治，集中精力进行文化建设。他整顿了五代以来混乱的赋税制度，实行了轻徭薄赋、奖励农桑、兴修水利，以及繁荣工商业等一系列政策。他对农业和农民是比较重视和关心的，他曾多次下诏令地方官吏劝农，也曾亲自检查农耕，每遇灾害便免赋税或开仓赈济，使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他的“重文”政策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不仅超过唐代，且为尔后封建王朝所不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文化的空前发达也反过来促进经济长足进步，使宋代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官私手工业有了高度发展，如冶炼业、造船业、纺织业、陶瓷业、印刷业等也突飞猛进。

因此，可以说，宋太祖赵匡胤是宋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高峰的形成的奠基者。

三大发明是宋代文明达到高峰的标志。而三大发明的出现与宋太祖提倡读书和重视造船业以及火器的制造不无一定的关系。

由于宋太祖提倡读书，上行下效，全国读书成风，这就需要大量图书，因而促进了印刷业的迅速发展。北宋时，国子监和各地官府、书院、私塾和民营书坊、书肆、书铺都广泛刻印书籍，东京，杭州、四川的眉山、福建的建阳、江西的南昌，都是北宋印刷业的中心，其中以杭州印书业最为有名，印刷业的发展，促使文化的普及，宋初经版不及四千，到仁宗时已有十余万之多，而且版本具备，普通士人及小康百姓多皆有之。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于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北宋时已能印刷巨大的类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华英华》、《册府元龟》，这些书被称为“类书”，它把千百种图书所包括的相类似的事件，编纂在一起，这不仅能够提供同类事件丰富资料，还为中国保存了大量古籍。象《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原书多达一千六百八十九

种，其中百分之八十八，即一千五百种以上，都已失传，完全靠这部类书，才知道那些古籍和它的内容，这是对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图书需量的日益增加，促使印刷业蒸蒸日上，唐、五代时开始使用的雕版印刷技术到仁宗时突飞猛进，最伟大的雕版家之一毕升，发明了活字版。他在胶泥上刻字，用火烧铸，使它变硬，形状跟近代的铅字一样，排版的方式也相同，这是中国最早的活版印刷。这种活字印刷术，在公元 1390 年左右东向传到朝鲜，西向传到西域，转传到西欧。欧洲 14 世纪才有雕版印刷，1450 年，德人谷登堡始用活字版印圣经。显然，在印刷术方面，欧洲比我国迟了四、五个世纪。

宋太祖很重视海军的建设，根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的统计，他参观造船厂和观水战演习的就有十六次之多。皇帝如此重视，必然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北宋官府设有很多造船场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北宋时已能造相当大的船，航行内河的“万石船”载重量达六百六十吨。航海的“神舟”可容六七百人，载重量达一千一百吨，远航到日本、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等地，这种船在当时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国船只，这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当时，北宋不仅输出文化，也吸取外来的文化，促进了北宋文化的繁荣。由于远航的需要，指南针发明了，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这种用磁石磨成的指南针的详细记载，而欧洲关于磁针的记录则较晚。

作为近代军事技术物质基础之一的火药，也是北宋时发明的。为内削群雄，外御契丹的需要，宋初是重视火药的研制的，宋太祖开宝二年即 969 年，冯义和岳义方两人发明了火箭，吴越国王就曾向宋太祖进发射火箭的军士，用火药制造的火箭开始应用在军事上。真宗时，发明并制造了火球和火蒺藜。《武经总要》有关于这些燃烧性的火药武器的简介，如毒药烟球火药法、蒺藜火球火药法、火炮火药法。在毒药烟球火药法和蒺藜火球火药法中，采用小油，沥青来控制燃烧速度的科学发明，在英美各国，还是 20 世纪的事情。

也播下了“积弱积贫”的种子

事物总是有两面的，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宋太祖以其雄才大略，创建了宋王朝，重文兴学，励精图治，促进了宋代文明高度发展，因出于他的自私的目的，也播下了“积弱积贫”的种子：

强调虚外防内导致积弱。宋太祖削弱将权、相权，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宋王朝的统治，但其动机主要是为保家天下使传之万世，害怕别人也来个“黄袍加身”。为此，他强调“虚外防内”，以后宋朝历代皇帝都贯彻执行。宋太宗对此阐述得很明白：“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用心，常须谨此。”（《长岛》卷三二）正因宋代历朝皇帝深惧“奸邪无状”，对将、相猜忌多疑，信任少限制多，故不能充分发挥将相的才能。有些皇帝如宋徽宗、宋高宗等人，即使是处于金兵入侵，国难极其深重的时刻，也宁可虚外而防内，对金人屈膝求和，却对立下大功的统帅诸多掣肘，以至撤职、杀戮。击退金兵、保卫开封的主帅李纲，有大功不赏，因他有数十万军的拥戴，认为是心腹之患，宋徽宗等竟将之撤职，将其集中的部队解

散，金兵再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宋徽宗父子也逃不掉，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率领岳家军即将直捣黄龙府的民族英雄岳飞，宋高宗害怕金人放回钦宗自己帝位不保，便急于求和，意听金人的指示冤杀了岳飞父子，严重削弱了抗金力量，从此人心民心散了，南宋一蹶不振。

鼓励“积财富享乐”导致了“积贫”。宋太祖本人是较节俭的，穿的衣服很朴素，宫中帘帷都用青布。他见三女儿穿用翠鸟羽毛装饰的短袄，不准她再穿，并教育她说，“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对自己及女儿如此，但为了达到其“杯酒释兵权”的目的，却鼓励开国功臣石守信等“多积金钱、买田宅以遗留子女，多置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他为了大将交兵权而采用这种赎买政策，这就为宋朝上下开倡了积财享乐之风。如石守信辞去禁军要职后，在任地方官时，专事聚钱财，遗留子孙“累财钜万”，子孙很奢侈，邸舍、别墅都装饰得很华丽，经常放高利贷苛剥百姓。佐宋太祖统一天下的开国元勋赵普，表面上竭力奉公，暗地里受贿积财。有一次，宋太祖到其家就发现廊下堆有海货十瓶，打开一看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黄金，一问才知是吴越王送的。赵普还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建府第。宋朝后代不少皇帝荒淫奢侈，如酒色财气齐全的皇帝宋徽宗为了享乐，纵容蔡京等人四出搜括，弄得民不聊生；尽管宋代经济较前代有了发展，还填满不了宋徽宗、蔡京等人无底的欲壑。宋代昏君佞臣的搜括挥霍是造成宋代“积贫”的主要原因之一。

八、明祖治国 功过参半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要对他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确是不易，迄今海内外学者还是各有褒贬，甚至截然相反。有的认为他是比较关心人民的好皇帝，有的认为他是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之一，有的则认为他有功也有过，但功大于过。这三种论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都有所据，这是因为他当皇帝后，时而施仁政，忽而行暴政，变化之幻异令人莫测。在这里，笔者主要探讨的是朱元璋的这种幻异的变化，以及对其人的看法。

从小行童到开国皇帝

《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原籍是沛人，到其父迁濠州（今安徽凤阳东）钟离。他长得“姿貌雄杰，奇骨贯顶”，为人“志意廓然，人莫能测”。1344年，家乡发生旱灾、蝗灾和瘟疫，父母亲和哥哥相继去世，家贫又孤苦无依，这一年十七岁的他只好到皇觉寺去当和尚。因灾害寺里无吃的，他便流浪各地化缘，过了三年又回到皇觉寺。这时，元朝腐败已极，人民受不了其压迫和剥削纷纷挺而走险，农民起义军遍大江南北。力量最大的有起义于颖州的刘福通（原奉韩山童假宋后为号召，韩山童被杀，立其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国号宋）和起义于湖北的徐寿辉。郭子兴也在濠州起兵响应。元将彻里不花不敢与起义军作战，便捉百姓作为俘虏向上邀赏。朱元璋为避元兵便去投郭子兴，这时朱元璋已二十五岁，郭子兴见他雄壮相貌又奇特，留为亲兵，以养女马氏为其妻。因他作战勇敢又有谋略，战功卓显，不断升迁，郭子兴死后，其军队由他掌握。1356年，他攻下集庆，改称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以集庆为根据地。由于刘福通在北方与元主力作战，元军无力南顾，朱元璋乃能向兵力较弱的南地区拓展。随着军力强盛，便与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汉帝）决战于鄱阳湖，陈友谅败死；接着，调军破平江，俘张士诚，遂分兵南取浙东，北上灭元。1367年底，在应天称帝，建国号明，建元洪武。1398年死，在位达三十一年。

对开国皇帝，往往传着有“真命天子”的预兆，有的是他自己或其军师们编的，一经传开，人们再加渲染，便更神奇。这些“预兆”都是在逐鹿中原时用以证明他是上天所派，以争取人民的拥戴，当代宫廷史馆照此记录宣扬，后代修前代史书的依样画葫芦。元人修的明史也记录朱元璋的这种“预兆”，如说他的母亲陈氏怀孕，梦见神给他一药丸，放在手中有光，服后醒时，口还有余香。“生下朱元璋时，红光满室。之后，在夜间数有光起。邻人看见，以为是火灾，急往救火，到时却看不见火。”又说他为避兵祸，向神救卜，说要去要留卜之皆不吉，乃曰：“是否要举大事呢？”卜之吉，大喜，遂往投郭子兴率领的红军。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而这“卜”之传出显然是出自朱元璋之口，无非是告诉人们他的“举大事”（推翻元朝当皇帝）是上天所命。其实朱元璋从小行童到开国皇帝，既有“时势”的幸遇，也靠他的智谋和勇敢。

朱元璋出生于1327年，那时正处于元的末世，朝政腐败，横征暴敛，赋役沉重，贵族、官僚、大地主及寺院疯狂兼并土地，剥削极其严重，弄得民不聊生，加上多年的民族压迫（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高，色目人次之，汉三等，南人最下），人民的怒火像火山爆发，猛不可挡，起义的烈火

迅速燃遍大江南北。“时势造英雄”，在这大乱世时代，草泽英雄怀着“取而代之”的雄心壮志纷纷崛起，朱元璋正是在这种机遇下成为逐鹿中原的英雄之一，原比他势力强大的集团军为何先后失败了，或被他消灭了，而皇帝的宝座却偏偏轮到这位出身低下的小行童呢？

历代逐鹿英雄的成功者，一般都具备三个条件，即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朱元璋都是具备的。所说得天时，是说朱元璋处于元末大乱，如非乱世，像朱元璋这样的布衣皇帝是不可能出现的。所谓得地利，是说朱元璋以集庆为根据地，在群雄中他的势力虽较弱，但北有刘福通领导的起义军抗击元军主力，西有徐寿辉、陈友谅起义军牵制着长江中游的元军，东有张士诚的割据势力，而朱元璋是附属于刘福通势力的。那时，徐寿辉、陈友谅则忙于对付元军，张士诚只满足于割据，因之这北、东、西三方无异为朱元璋筑起三面屏障，使他得以向东南拓展，养精蓄锐，待机而动。所说得人和，是说他搜罗到不少杰出的谋臣武将为之出谋献策、拼命沙场，且在战争中军纪严明，不扰民，禁杀俘，故人心归之。

但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朱元璋之所以得天下，主要还是靠人和。1354年，朱元璋南下进军滁州（安徽滁县），经过定远县时，士人李善长来投，知他是当地的绅士，很尊重他，留掌书记，即幕僚长。朱元璋问李善长：“四方在战斗，哪时才能平定？”李善长答道，“秦末大乱时，汉高祖起自平民，由于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懂得收拾人心，五年便平定了天下，当了皇帝。如今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土崩瓦解。你出生在濠州，距汉高祖家乡沛不远，你如能效法汉高祖这位同乡所为，就可以平定天下了。”朱元璋认为这意见很好，从此，他便以刘邦为榜样，很注意搜罗、选拔人才和收拾人心。

当时杰出的士人李善长、朱升、刘基、宋濂等人，或自动投效，或接受其延聘，为之出谋划策；不少猛将如徐达、常遇春、冯胜、兰玉、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等为他拼搏沙场，谋臣猛将同心协力以图天下。由于他懂得“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严肃军纪，不准乱杀，不准扰民，并能优待敌俘，来投者给予适当安置，人心也就归之。正因他能听从正确的战略策略，又得到广大军民的拥戴，故能所向披靡，削平群雄，终成帝业。反观其同时代崛起的群雄如刘福通和陈友谅、张士诚等，他们之所以失败，都因各有其致命的弱点。刘福通掀起的反元浪潮虽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极其浩大，但缺乏正确的战略策略，且将心不齐，各自为战，终被元军逐个打败。陈友谅杀主自立，不得将心；刻剥人民，不得民心。他睡的床却用金装饰，雕刻甚工，宫中的器物也是饰以金宝。其豪奢如此，不得将心不得民心，其败必然。汉亡送上陈友谅的金床，朱元璋感叹他说，此与孟和七宝溺器何异，那能不亡！命毁。张士诚割据富裕的吴地，只知纵情享乐，无远图之志，将领也以聚敛为务，日夜歌舞自娱；将帅每遇攻战则称病，封官爵赐田宅才出兵；军纪松弛，战败概置不问，不久复用为将。上下嬉娱，皆不以军务为意，其不亡何待。

重农惩贪取得显著政绩

朱元璋称帝后，他继承的是元末天下大乱后满目疮痍、遍地荒凉的残破局面，不将之改变，则不能稳定既得的天下，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他就帝位

第一年，天下府州县官来朝，就告诫他们，“天下刚平定，百姓财力俱困，要让人民休养生息，只有廉洁官吏才能约束自己以利于人，你们要尽力做好工作”。他指令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不容许“损民”、“伤农”，对于农民要遵循这样的一原则：“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致于饥寒”，违反的要予以处分。为了使农民“休养生息”，他实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政策和措施：

首先是奖励垦荒与实行屯田。明初荒田很多，农民流亡未归。1368年，朱元璋下令，避乱回乡的，允许开垦荒地，永为己业，免除徭役二年。许多流亡农民纷纷回乡垦荒，变成了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之后又规定，农民回乡开垦土地，如果现在丁少原来田多，不得依前占田；如果现在丁多原来田少的，地方官验丁拨给荒田。凡各地荒田均任农民开垦作为己业，若原业主归来。地方官于附近荒田内拨补给地。北方和中原一带因战乱频繁荒地很多，但少数地方却是田少人多。1371年，朱元璋便迁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没有田地的农民四千多户，前往临壕（安徽风阳）屯垦，由政府给牛、种、车、粮，三年不收租。采取上述措施，使农民有田可耕，既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可使土地荒闲。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和政府的开支，令军队屯田自养，规定边地的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屯田总数达到六十余万顷，每年上缴给国家的屯粮总数为五百余万石。当时全国一百万军队基本上可以实现屯田自给，朱元璋曾自夸说：“我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在此同时，朱元璋还重视水利建设，他即位当年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设，各地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并派官员分赴各地，乘农民农隙督修水利。仅据1390年统计，全国各处所开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浚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

为“取之有节”，对农民赋役适当减轻。明初规定民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按当时亩产量低一石计，为三十税一。徭役一般定有田一顷出丁夫一人，每岁在农闲时节赴京服役三十一天，比元末也减轻许多。1381年，朱元璋还下令在全国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地主隐瞒丁口田产、逃避赋役，使地主负担了部分赋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对于各地发生灾害，及时赈济，对赈济迟缓的地方官甚至处以极刑。对于百姓的困苦，也比较关心，1372年，朱元璋下诏说：“因遭乱卖身为奴隶的，放还为民。挨冻饥饿的乡里中的富户要借贷帮助，孤寡残疾的由政府抚养，不要使他们流离失所。”

由于朱元璋实行上述政策和措施，农民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全面垦亩面积大量增加，1391年就达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比他即帝位时即1367年扩大了一倍多。人口数字也迅速上升。据1393年统计，全国共有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比元朝极盛时期，即元世祖时增加了一百九十五万户，七百万人。

朱元璋的重农政策取得如此成就，是跟他严惩贪官污吏有关的。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打击之严厉，在封建社会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也正因此，明初官吏一般不敢违纪乱法、胡作非为，吏治是较清明的。这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促进了“明初盛世”局面的形成。

朱元璋起自民间，目睹元朝官吏贪残害民，导致政治腐败，使他认识到“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这种弊端如不革除，要想施行善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对贪污犯罪的处理，极其严厉：凡官吏贪赃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处以绞刑。赃至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处梟首、剥皮之刑。其时府、州、县衙门左右皆特立一庙（用来祭祀土地神，即是剥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塞满草的人皮袋，使坐堂官吏触目惊心。朱元璋对不够死刑的害民官吏则撤职劳动，1376年，将有罪的官吏万余发往安徽凤阳屯田；1385年，又下诏逮捕犯罪的官吏到京人筑城。他还发动群众揭发和上诉违法官吏，规定凡是发现有贪赃害民的官吏，百姓可直接向皇帝告状，甚至允许将其擒拿送到京师。由于朱元璋严惩贪污，“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吏治焕然一新。”（《明史·循吏传》）

极端专制及其严重后果

朱元璋即位后就进行国家机构改革，把国家军政大权全部集中于自己手里。以前的王朝都设有丞相一职帮助皇帝处理政事，明初也设丞相，胡惟庸案后将之取消，只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分别处理全国事务，六部互不统属，直接向皇帝负责；原先设有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军队，朱元璋也将之取消，只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所辖的卫所军队。五军各有所管，也互相不统属，都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全国军政大权都直接操纵在皇帝一人的手里。这么一来，这位皇帝就够忙了，他自己表白说，“朕自即位以来，勤励自勉，天未亮便临朝，午后，才回宫，许多事情待办，晚间也睡不安席，往往披衣起来思考，或仰看天象，见一星失附，恐将有祸事，心里很担忧；或想到有事要急办，即将之记下来，待天亮了再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只畏天命，不得不这样做。”朱元璋就这样紧紧地抓着权力不放，辛辛苦苦地做了三十一年皇帝。“日理万机”，这对富有军政经验的朱元璋来说还可拼命应付过去，轮到他的后代那花花太子或娃娃当皇帝，那就可能胡乱批示，或任人摆布了。而明朝皇帝揽的事这么多，权力这么大，又不相信大臣，那只好起用身边的宦官帮倒忙，导致明朝的衰亡。朱元璋在时曾定下祖训严禁宦官干政，又那料到他自己定下的制度为宦官政治复活开了方便之门。朱元璋是历史上性格最猜忌的专制皇帝之一，他不相信自己的臣民，中央督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监察百官，又设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官吏，并与督察院互相检举。这还不够，又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监视全国臣民。锦衣卫设有法庭、监狱，严密监视和处置文武官员，这是由朱元璋直接指挥的特务机关。自从设了这个特务机关，大臣一举一动以至他饮酒、发闷，朱元璋都了如指掌。锦衣卫特务施罪于人的手段连武周时来俊臣的罗织经也望尘莫及。自从有了锦衣卫，“谋反”的人多起来了，冤狱也就不断出现。特务政治是极度专制的副产品，是皇帝博击异己的鹰犬，是镇压臣民的工具。这种特务机构的设立对后世影响很坏，贻害无穷。高度中央集权始于秦始皇嬴政，完善于宋太祖赵匡胤，至明太祖朱元璋已趋于极度。朱元璋实行专制统治手段与秦始皇颇相似，但残忍过之；与宋太祖则有所不同，宋太祖不以“杀”字当头，朱元璋则以屠杀开路。赵翼《廿二史劄记》说：“明祖藉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天下所未有。”

他连兴大狱，其中政治案最大的两次是：1380年，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丞相胡惟庸，十年之后，即1390年，据说朱元璋又发现胡惟庸有谋反罪及其同党，于是先后株连蔓延被杀者共三万余人。此案连及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但找不到其应处死之罪，便以天象告变需杀大臣为借口，令他自缢，这时善长已七十七岁，家属七十余人也被杀。朱元璋还编撰一书名《奸党录》，其中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三年后，即1393年，又兴起蓝玉（大将）谋反的大狱，斩蓝玉，灭其三族，连坐被诛一万五千人，其中有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前已死亡的，用死者子孙来抵罪。朱元璋又编《逆党录》，昭告全国。这两次大狱所杀的主要是他依靠起家的淮西系骨干，军政权基本操在他们手里，朱元璋之所以把他们斩杀精光，用意就很明显了。宋太祖是“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是屠杀解兵权。

除这两次大屠杀外，朱元璋几乎每天部在找藉口屠杀功臣，找不到藉口就暗害，连战功最大的徐达，以及急流勇退归隐的刘基就是这样被害死的。除早死的汤和一人外，开国文武功臣都杀光了。汤和病死时，家人暗自庆幸。在这种恐怖统治之下，官员人人自危，每天早上入朝，就跟妻子诀别，到朝罢回来，合家才有笑容。

朱元璋严惩贪污是应该肯定的，但他是极端专制的皇帝，经断定为贪污案，即使是错了也上诉无门，无法纠正，因之冤案很多。如有所谓空印案，地方向户部上报钱粮报册，规定须与户部所定数字完全吻合，否则驳回，而回去自造来去经年，于是便预带盖印空白文册，如果遇到部驳，即随时填改。1376年，朱元璋发觉此事，以为官吏必用空文书作奸舞弊，即下令将各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并将佐武官仗一百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带空印文书盖的是骑缝印，不能作别的用途。此案发生后，有人曾冒死上书说明事情真相，朱元璋全然不顾，仍大逞其专制淫威杀人，所谓空印案完全是一大冤枉，有不少被杀的还是廉吏，如济宁知府方克勤，廉洁奉公，上任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丰衣足食，百姓视如“父母”，做歌颂其德政，朱元璋曾赐宴以表彰其政绩，但却因空印案被杀。

极端专制主义者有两个特点：一是绝对不准对他有任何轻微的触犯，朱元璋在这方面比任何专制帝王都敏感，敏感到变态的地步，变态得令人不可思议，其大兴的文字狱就是如此。中国文字同音的甚多。但字义各不同，朱元璋却不管字义，如与他忌讳的字同音，便认为是影射侮辱他，下令处斩，大批文人因此被屠杀。朱元璋最讳“僧”、“贼”、“寇”字，奏章如有与此同音的都被处死。如杭州府学的一位教授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作者颂扬朱元璋的好话，不料朱元璋看后，大怒说：“这个腐儒竟敢这样侮辱我！‘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于‘贼’，骂我做过贼。”下令把他斩首。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写的奏章上有“作则垂范”，北平府学教授赵伯彦写的奏章上有“仪则天下”，都因有“则”字而被斩首。有的文字就作随意解释，凡认为影射他的，作者也惨遭钉戮。如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写的谢表有“遥瞻帝扉”，朱元璋却把“帝扉”读作“帝非”；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府写贺表有“取法象魏”，朱元璋却把“取法”读作“去发”，于是，作者都成为刀下冤鬼。极端专制主义者另一个特点是，严格限定人们必须在他画的框框内行动，不准有毫厘的超越。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制定了不少法规、祖训之类框框，除了他可以出尔反尔不受这类框框的约束外，谁

违背就不会有好下场。而且他的框框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把全国人民都囚在其框框之内，不仅是行动，还有思想，他所制定的科举制度就是如此。朱元璋规定科举考试的内容都是四书，五经，考秀才、举人、进士都如此，只准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作题，应考者要按照其义理作文，而且要按道学家朱熹的注疏发挥，不能有自己的见解。朱元璋还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者必须按照其格式填写，到明成祖时发展成八股文。在朱元璋制定的科举制度之下，全国读书人为了求出路，只好死背四书、五经，尤其是道学家朱熹的疏注，背熟了按八股文格式一填便行了，于是人们找到了一种考试妙诀，有的撰家干脆编了各种四书、五经题目的文章，让应考的背熟了，到对题抄文。科举到了明朝已把读书人引入了死胡同，他们不用独立思考，也不用有个人的见解，这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智慧，严重地妨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集仁暴于一身的统治者

在朱元璋一生中，他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不少坏事。如果只从他做的好事论，可以说他是个比较关心老百姓的好皇帝；如果只从他做的坏事论，也可以说他是残暴的君王。对这个集仁暴于一身的统治者应该如何评价呢？

有的论者认为，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受尽官吏、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故对贫苦农民具有深厚阶级感情，对官吏、地主则无比仇恨，故他当皇帝后，对农民施仁政，对贪官污吏则大屠杀。当然，过去的经历对于朱元璋不无影响，但对他这样集仁暴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不能做这样简单的分析。

当朱元璋登上皇帝位时，他已不再具备原有的农民素质。他已是一个具有皇帝素质的统治者，这时他跟历代开国皇帝一样，所考虑的是如何稳定和巩固既得政权，使其皇位传之万世。也就是说他所做的都是从其保家天下着想的。如果还把他所做的只从农民的感情去联系分析，那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可理解的。朱元璋曾受元朝官吏压迫、剥削最深重，连父母死时也无地可葬，如果按照农民的感情，理应与之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应屠杀之而后快，但朱元璋从大局着想，北伐时即宣称：蒙古、色目来降者与汉族待遇同，对于蒙古贵族、官僚、百姓主要还是采取招抚、优礼的政策，来降的蒙古贵族、官僚给予适当位置，归附的百姓，为之善择处所，让他们重过安定的生活。他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蒙古族的反抗，加速统一的步伐，而不是对蒙古族怜爱，或出于仁慈之心。他对巨姓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也是为了稳定和巩固其政权之故。如果说在民间时的遭遇对他有所影响的话，是他目睹农民因不堪压迫、剥削铤而走险导致元王朝崩溃的事实使他深深体会到：不这样做就会重蹈元王朝的覆辙。他说：“老百姓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当权者办事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天怒人怨，没有不灭亡的。”他之所以将与他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几乎杀尽，显然也是为了保其家天下，使传之万世着想。清代史家赵翼早就指出：“明祖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屠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迹也。”

评价朱元璋只能从事实出发，他既施仁政，也行暴政，事实俱在，不容抹煞。对朱元璋其人应作辩证的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曾发生无数次农民起义，而起义都是在封建王朝压迫得使农民活不下去时出现的，于是历史在循环着：旧政权腐败——农民起义——新政权成立，“一将功成万骨枯”，无数农民的枯骨为新的帝王铺平其登基之路，但随着新政权趋向腐败，农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在封建社会的遭遇是极其悲惨的。如果说农民还有安居乐业的话，那是在开国皇帝登基后的一段短暂时间。农民之所以能安居乐业，一是新皇帝鉴于前朝暴政造成的恶果，二是因大乱后造成生产凋弊，如果不“轻徭薄赋”，让农民“休养主息”，不仅农民活不下去要继续造反，新政权也无法巩固。新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施仁政。事实说明，朱元璋重农、惩贪取得的政绩是显著的，在他统治那段时间里，农民的处境比之元末是好得多了，这表现在生产发展了，户口增加了。对于朱元璋的政绩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但是，朱元璋确是个极其专制和残忍的人。他确立的绝对专制制度，将权力全集中在皇帝的手里，把皇帝的意志强施于一切官僚机构以至全国，不准全国臣民用脑思考，说话按照他说的说，行动要在他画的框框内行动，还用特务监视全国军民的言行，使全国处在恐怖之中。这种极端专制统治就是后来的法西斯的先驱。又用文字狱杀害儒士，用四书、五经来禁锢思想，中国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发展，曾居世界之先，到朱元璋统治时代已陷于停滞，从此逐渐落在西方之后。

元人修的《明史·太祖本纪》对朱元璋极口赞说：“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文治武功，他跟其老乡刘邦不相上下，但比之残忍得多，比之李世民和赵匡胤则远不及。朱元璋在某方面又把历史拉向后退，他的功显著，过也突出，是个既有功又有过，仁又暴的统治者，很难说他功大于过，或说他过大于功，也不能简单地用仁主或暴君为他界定。对朱元璋这样集仁暴于一身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必要为他的功过评主次，只能说他功过参半。

九、康熙掌权 大振雄才

一位常见到康熙的传教士写道：“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勾状，虽然脸有天花留下的痘痕，但并不影响他的英俊的外表。”（白晋：《康熙皇帝传》）康熙能当上皇帝，患过天花却是主要原因之一。顺治帝和太后议立太子时，拟定的人选是皇次子福全和三子玄烨，太后认为福全未出天花，玄烨已出过了，不会再受到这种可怕的病症的伤害，便决定立玄烨。1661年，顺治帝病死，玄烨继位，年号康熙，这时他才八岁，遵照太后意见，顺治遗诏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辅政，后来大权落入鳌拜一人手里。鳌拜居功自傲，专横跋扈。贪污受贿，结党营私，随着康熙年长，对其很不满，但康熙不露声色，待机而动。1667年，康熙十四岁时开始亲政，鳌拜仍“欺凌幼主”，他不仅经常在康熙面前呵斥大臣，其所奏请得不到康熙同意就争吵不休，以至撸胳膊挽袖子摆出打架的架式，非康熙同意不行。不除掉权臣鳌拜，君权则不能行使，在内大臣索额图、明珠等人的支持下，康熙命早已训练好的少年摔跤能手，待鳌拜入宫时将其擒住，革职拘禁，并下诏布告朝廷内外，列举了鳌拜等结党专权，不尊君上、营私纳贿等三十一条罪状，除掉了权臣鳌拜，康熙才大权在握，施展其雄才大略，开始了他的辉煌业绩。

统治疆土为汉唐所不及

康熙亲政时，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已消灭，清政府基本上占领了全中国，但内外形势仍很严峻，建立不久的清王朝的权力还不能行使全国。这时，在南方，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暗里实行割据，俨然是三个独立王国，时称“三藩”。吴三桂积极扩大势力，广收党羽，选官、练兵、用才，清政府不能过问。尚之信、耿精忠也如此。三藩的割据，对清政府造成很大的威胁。在台湾及东南沿海仍有郑氏集团势力存在。在漠北，以噶尔丹为首领的准噶尔部，四出进行掠夺，在进攻喀尔喀蒙古时，与沙俄侵略者互相勾结，逼得喀尔喀蒙古人民向南逃迁。噶尔丹不断向东南侵略。与沙俄接壤的黑龙江流域，则经常遭到沙俄的侵略，他们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甚至毫无人性地烤食中国儿童。沙俄侵略者还狂妄地叫嚣要清政府向沙皇称臣进贡，其侵略野心可以想见。面对以上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康熙清醒地认识到，如不将之改变，清政府不仅不能巩固且将危及其统治。但敌对势力来自四面八方，不可能两个拳头一齐出击，只能逐个对付。从何着手？清政府对于“三藩”像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但“三藩”势力已日益强大，要将之除掉谈何容易，如处理不好将会引起天下大乱。不少大臣因此主张采取姑息政策。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要求退休，计其子尚之信继承王位。康熙同意其退休，但不准其子袭爵，命其撤藩。吴三桂、耿精忠闻讯以退为进，上疏假意要求撤藩以试探，康熙交廷臣会议讨论，经过几次会议的激烈争论，意见不一，有反对撤的，有主张撤的，康熙最后作出决断说：“吴三桂等人的造反之心由来已久，不早日除掉，将会养痍成患，后悔莫及。今天的问题是，撤也反不撤也反。既然如此，不如先发制人为上策。”果然如康熙所料，吴三桂一接到撤藩旨意，立即以复明为名起兵反清，迅速占据贵州、湖南，四川等省。耿精忠、尚可喜

先后起兵响应，广西、陕西、湖北、河南都有响应，一时声势十分浩大。但吴三桂在战略上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攻入湖南后不趋势渡江前进，而是在湖南采取守势，结果被动挨打。面对三藩之乱，康熙当机立断，制定孤立和打击吴三桂，争取其他叛乱者中立、归降的战略。在进军湖南时严明军纪，不准侵扰百姓，对贻误军机、畏惧不前之将予以处罚。他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兵到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邱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这时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地，其失败之势已成。吴三桂穷蹙绝望，忧愤成疾，称帝不久便病死。吴三桂一死，其势即土崩瓦解，清军攻下岳州，随即占据四川，进军云南，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康熙在重点打击吴三桂的同时，利用于盾逐个击破，他趁耿精忠与台湾郑经集团之间的矛盾，招降了耿精忠。1677年，尚可喜忧愤而死，尚之信因与吴三桂矛盾重重，在清军的进逼下向清朝投降。在康熙正确的战略策略的指挥下，历时八年，波及十二省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削平了。

平三藩之乱后，康熙就着手解决台湾问题。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1624年被荷兰侵占。1661年郑成功进军台湾，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郑成功死，其子郑经接替执政。经过郑氏父子二十多年的经营，台湾由原来人烟稀少的荒域，变成“地方千余里，户口数十万”的富庶之区。因此，郑氏对建设台湾是有功的。1691年，康熙趁郑经已死诸子争位内乱之机，任命施琅为水师提督，率领三百艘战舰、水师二万攻打澎湖，一战而克。台湾震惊，郑经长子延平郡王郑克塽投降。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岛又统一于中国。郑克塽到北京后，受到康熙的接见，授予正黄旗汉军公封爵，其亲属、部下也分别授与官爵，康熙还下诏说，郑成功、郑经不是“乱臣贼子”，可以归葬南安。台湾统一后，宰相李光地向康熙建议，郑氏政权既已消灭，台湾是蛮荒烟瘴之地，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该放弃。康熙否决了这种荒谬主张，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在台湾驻军八千，澎湖驻兵两千。

平三藩统一台湾后，康熙就集中力量镇压北方的叛乱。明末清初之际，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明时称鞑靼）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明时称作瓦剌）。早在皇太极时，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在清世宗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皆入贡。漠西厄鲁特蒙古中，准噶尔部最强大，噶尔丹做了准噶尔汗后，统一了尔特各部，征服天山南部回部，占据新疆、青海，势力伸入西藏，随即向东侵入喀尔喀蒙古。康熙命噶尔丹退兵归还喀土喀部土地，噶尔丹以有沙俄支持，有恃无恐，置之不理，康熙乃决定用兵镇压噶尔丹。康熙对噶尔丹的战争共进行了三次，皆御驾亲征。第一次在1690年，清军分左右翼出击。右翼军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地方和噶尔丹接触，作战失利。噶尔丹乘胜急进，深入乌兰布通（今赤峰市境），距北京仅七百里，京师震动。后左翼军以优势火器击破噶尔丹用万驼围成的“驼城”，噶尔丹军队溃败。第二次在1696年，清军于昭莫多（今乌兰已托东南）地方大败噶尔丹，噶尔丹仅以数十骑遁。第三次在1697年，康熙亲往宁夏对噶尔丹实行包围，噶尔丹走投无路，服毒自杀。战争结束后，外蒙古正式归附清朝。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为准噶尔汗，他在沙俄煽动下发兵攻占西藏。1720年，康熙派兵入藏击败了准噶尔的军队。西藏归属清朝。

抗击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是康熙一生最辉煌的业绩之一。

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唐、宋、元、

明一千余年的历史中，我国历朝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均在黑龙江两岸设有管理机构。清取代明在中国统治后，因忙于统一无力北顾，向东方扩张的沙俄在吞并西伯利亚后，即将其魔掌伸入我国的黑龙江流域，先后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地方，在此筑城据守。1671年，康熙东巡时，了解到沙俄的侵略动向，就嘱当地守将加紧练兵，保卫边疆，回来后，又派人去观察地势、侦察敌情，并做好战备工作，以反击沙俄的侵略。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就进行驱逐沙俄侵略者的战略部署。1685年，康熙派彭春、林兴珠等率兵二千五百出征，水陆并进，大败沙俄军队，其头头托尔布津被迫投降，便将他及被俘俄军遣送出境；清军毁雅克萨城而还。不久，托尔布津又率俄军返回雅克萨筑城固守。1686年，康熙派萨布素等率军二千余人再次进攻雅克萨，在清军猛烈炮火下俄军死伤惨重。托尔布津重伤致死，八百余俄军只剩下几十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但就在这时，双方和议开始。1689年经过反复折冲，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国界。再由格尔必齐河源顺兴安岭往东至海，岭南属中国。这就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辽阔地区是中国领土。这是中俄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是中国第一次以平等地位跟外国签订的条约，为中俄两国带来了一百七十年的和平。因此，这一条约遏阻了沙俄的侵略，保卫了中国的边疆。

康熙统一中国、打败沙俄侵略，其功绩是巨大的。从此外敌不敢入侵，国内局势长期稳定，全国各民族又凝聚一起，中国的版图更扩大了。秦统一中国，使中国成为一大帝国，两汉统治时疆土又有所增加，唐则超过两汉，明时疆土反而缩小。康熙统治时疆土超过前代，到乾隆时又有增加。这时清政府统治的领土，超过了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与元朝差不多。清统治领土如此广大，标志着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立。

为康乾盛世奠下经济基础

康熙进行的统一战争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使局势趋向稳定，清政权大为巩固，康熙才能集中国力量转向文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中国人民过着一百一十二年的和平生活。再经雍正、乾隆的努力，出现了康乾盛世。康乾盛世的出现，康熙无疑是奠基者。

明末之际，内战频繁，清兵入关后又大屠杀立威，百姓逃亡，田地无人耕种，到处“极目荒凉”。据史载，直隶“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上种一二亩”（《清世祖实录》）。在南方，扬州、嘉定、江阴、松江、漳州、广州、南昌等城市都受到兵火的洗劫，湖广地区也是“城无完堞，市遍篷篙”（《明清史稿》丙编）。号称膏腴的四川，万历时明朝政府掌有耕地十三万余顷，到顺治时只剩一万多顷了（见《明全典》及清文献《通考》卷一《田赋》）。如果不恢复发展农业生产，清政府是巩固不了的。为此康熙亲政后采取了种种措施：

首先是鼓励垦荒。1671年开始，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将三年宽到四年，又宽六年，再宽至十年。平定三藩后，释去浩大军费负担，康熙更放松了起科令。对于农民开垦成熟应该按限起科的田地，常常“未令起科”，“不事起科”。同时规定垦荒有成绩，据其开垦多少，给予不同官职。这促

进了垦荒的积极性，民间掀起自动垦荒的热潮，地少的地方的人涌到地多的地方垦荒，如陕西人到四川开垦，汉南、山东、河北人往长城以外开垦。到了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辟，据史称天下田土“开垦无遗”、“尽皆耕种。”1661年（顺治十八）为五百四十余万顷，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为六百余万顷。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康熙尽力节省政府开支，如光禄寺一年原用银一百万两，减至只用十万两；工部一年原用银二百万两，减至只用银二三十万两；理藩院一年原用银八十万两，减至只用银八万两；明末宫人上千上万，而康熙时宫人不过四五百人。由于节省政府开支，库中充裕，康熙得以数次减免赋税。1711年，户部库银存贮五千余万，康熙便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蠲免钱粮一年，而分三年轮免一周。计康熙六十余年中，前后蠲除之数，殆逾万万（《清史稿·食货志》）。钱粮蠲免，使农民能有余钱投入生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1669年，康熙还下诏停止圈地，宣称满汉军民，应一律对待，凡该年所圈旗地，立即退还汉民。1685年又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圈地是满清入关后对农民的公开掠夺。前后圈地占耕地面积达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四顷。康熙停止圈地，稳定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康熙时治河取得了很大成绩。由于黄河多年失修，下游堵塞，黄、淮合流，不能入海，“北岸民田皆成巨浸”，南面的淮阳七州县也是“一片汪洋”，致使运河阻塞，漕运不能北达。1677年，康熙任靳辅为河道总督治河，采取疏导和筑堤，终于把“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原来淹没之地尽变为民田。1713年康熙又下令修治永定河。永定河原名浑河，向有“小黄河”之称，发源于山西北部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而下，流至京西石景山过芦沟桥，纵横荡漾，改道泛滥无常，为害甚大。经从良乡起到东安开掘了一条二百余里的新河道，使旧河两岸“斥鹵变为膏腴”（《清圣祖实录》）。从此水定河安宁多年，康熙将之改名为“永定河”。康熙时治河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是与康熙的重视分不开的。他亲政后就把“河务”与“三藩”、“漕运”作为三件大事写在宫廷的柱子上，以志不忘。在治河中，他六次巡阅治河工程，亲乘小舟，冒着风险进行勘察，亲自测量水位，并提出了有实际意义的指导方案。在他当政的六十年中，他对治河尽了很大的力量。他治河取得的成就，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发展农业生产，都起了积极作用。

康熙采取以上措举，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是康熙在文治方面取得的重要政绩之一。

康熙的另一重要政绩，是他整顿吏治。明末官僚腐败，贪污成风，清朝依然如故，清廷在给吏部的诏谕中承认官员“贪污成习”，“任意妄为”，“不思爱养百姓，令致失所。”（《清世祖实录》）1653年，顺治亲临内院了解考核情况时，对纠查出来的赃官数量之大吃一驚，不胜感慨他说：“贪官何其多也”。由于当时政局不定，顺治又因爱情变故心灰意懒，他无力也不想改变吏治腐败的局面。康熙亲政后，以明亡为鉴，认为明亡是因“上无道揆，下无守法，以致沦亡”。1697年，他巡视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亲睹各级官员“不能子爱小民，更恣横素”，认为“官吏之贤否，民生之休戚所关”，决定“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清圣祖实录》）。他整顿吏治，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惩治贪官与表扬廉吏相结合。为“惩一儆百”，他下令将贪官耿文明、山西巡抚穆尔赛等大吏正法，并降革了一大批，使官吏贪

污行为有所收敛，对澄清吏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整顿吏治中康熙着力表彰清官，作为官吏的表率。1684年，他下令推举清官，经推举表扬的清官有：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仑，扬州府知府崔华，兖州府知府张鹏和灵寿县知县陆陇其等七人。1690年，经推举又表扬清苑县知县邹嗣尧、三河县知县彭鹏、灵寿县知县陆陇其和麻城县知县赵苍壁。此外，他还多次亲口表扬廉吏。二是慎选官员与实地考察并举。他认为在所有官员中，知州、知县是“亲民之官”，需要慎重选择，但一方之长督抚大员更加重要，因为“督抚清廉，则属员交相效法皆为良吏”（《清圣祖实录》）因此，他陈通过“京察”“大计”之法考察官吏外，还经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官吏的情况，以选择廉洁奉公又有才干的官吏，任用之后还继续考核监督。他还多次出巡“观览民情，周知吏治。”康熙整顿吏治是收到明显效果的。《清史稿·循吏传》前言中说：“圣祖平定三藩之后，与民休息，拔擢廉吏，如于成龙、彭鹏、陈瑛、郭琇、赵申乔、陈鹏等，皆由具令洊历部院封疆，治理蒸蒸，于斯为盛”。

他文武全才学贯中西

康熙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上述成就，是跟他勤奋好学分不开的。他学习兴趣广泛，不论文的文武的，中国的西方的，他都积极钻研，且能亲自实践，虚心向高手请教，故他的学识很渊博，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康熙自幼失去父母，在祖母太皇太后的抚育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自幼就勤于学习，各种经书、古代兵法无不精读。《郎潜纪闻》载：“圣祖自云，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咯血不肯休。几余游艺，临摹大家手卷，多至万余。手写寺庙匾额，多至千余，”读书至咯血还不罢休，可见其用功之勤。及长仍物不释卷，1677年，即他亲政后十六年，还设立南书房，他在这里看书写字，研究学问，并选博学善书的各一人常侍左右，提供咨询，讲究文义，研究观摩。由于康熙经史百家、诗词书赋，乃至西洋科学无不爱好，经常请有关专家到南书房，虚心向他们请教。他召到南书房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汉人，可见他设南书房是为学习和研究汉文化。因其勤奋学习，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个学有成就的汉文化高级知识分子。他还刻苦学习百般武艺，弓马娴熟，能开强弓，“无论徒步或骑马，立定射击或快跑射击，他都能左右开弓。箭射飞禽走兽很少虚发。各种武器，他部件件精通”（白晋：《康熙皇帝传》）。正因康熙勤学苦练，自幼就奠下了文武全才的基础，再经过实践，才识大长，故武能安邦，文能治国。

因康熙精通中国古代经典，遇到复杂的问题，能以史为鉴诫，结合实际，作出正确的决定。如他将削藩问题交由朝中大臣讨论，许多大臣反对削藩，认为削藩将造成大乱，康熙接受汉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支持明珠等大臣的削藩意见，认为“撤也反，不撤也反”，“不如先发制人为上策”，乃决定削藩，撤藩后“三藩”果反，以大学士索额图为首的原反对撤藩的人惊惶失措，认为明珠等人主张撤藩闯大祸，应诛之以谢天下。康熙知道这是“诛晁错以谢七国”的翻版，坚定地驳斥说：“撤藩是朕的主意，他们有什么罪。”于是果断地出兵镇压，终于平定了“三藩”之乱。

康熙虽精读古代兵法及懂得古代治国之道，但他不是停止在理论上或只是纸上谈兵，或高高在上乱指挥，而是理论能结合实际。遇到重大事情，便

亲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决定，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如对沙俄的侵略他早就想进行反击，因国内情况不稳，暂时搁置，但他早就亲到前线去预先了解敌情，并加紧备战工作，待时机一成熟就毫不犹豫地发动反击战，给予沙俄侵略者以重创，终于制止沙俄的侵略。“河务”是他念念不忘要做好的三大工作之一，但他不只是发布命令，而是经常亲临治河前线去了解情况，实地勘察，故能提出有实际意义的指导方案，对治河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

康熙热爱科学，极其重视科学，他干不少事情都能以科学为根据，这在封建帝王中是罕见的。他对天文学、数学、医学、地理学、农学都有研究，不只继承了中国的既有成就，对西方的科学也潜心学习和研究。他处理关于天文历法之争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顺治时，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因修改历法有成绩，被任命为钦天监的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顺治死后，康熙继位，杨光先上书说《时宪历》上即有“依西洋历”五字，是向全世界宣示清朝屈服于西方，应将汤若望等人处死。当时鳌拜辅政，在他支持下废除新法，由杨光先任钦天监的监正。汤若望幸得康熙祖母庇护才免于死。但杨光先对天文历法并无新的研究，推算屡出错误。康熙亲政后便指示用实验分法检验新旧历法的是非。结果旧法总是不准，新法则比较准确。康熙决定恢复用新历法。康熙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新旧历法两派互相控告，死了不少人。在双方辩论时，王公大臣中竟没有一个人对历法有了解。朕目睹其事，心中痛恨。所以日理万机之余，专心学习天文历法二十余年，终于略知大概不至混乱。”为弄清天文学，他先后向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白晋等学数学，曾学习过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的满文译本。康熙晚年在北京设立了“算学馆”，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梅毅成等人用了十年功夫，编成了集当时乐律、天文学和数学之大成的巨著——《律历渊源》。康熙学了数学和天文，引起他学地理的兴趣。他学了使用测量仪器，每行到一处，就要测量那里的地势，调查当地的地貌、地质、水文、土壤等等。他还费了几十年心血，在辽阔的中国疆土上开展实测、制地图。这次测绘结果，编成一部《皇舆全览图》。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用实测、比较精确的地图集，也是世界地理测量史上的伟大成果之一。康熙学习天文、数学、地理，其主要目的：一是为发展农业生产。康熙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看种庄稼，自己也把各种籽种到地，以观察收获多少。有一次他发现一颗早熟的稻子，便将之试种，果然早熟，便以此为种子，培养了一个新连作双季稻——“御稻种”。这种稻子粒长、色红、叶香，他将之推广到苏州、江宁、江西、浙江、安徽等省。由于一年可连种两次，每亩约增产五成左右。康熙对医学也感兴趣，不只学了中医，还学习西医。康熙父亲顺治死于天花，他也是天花的受害者，本来我国早就创造预防天花的种痘法，但没有得到推广，康熙发现后，立即推广，结果收到很好的效果，使无数小孩免生天花，免于死亡。

守成有余但开拓不足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即从 1662 年至 1722 年，从他亲政时算起，直接统治长达 55 年。这个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萌芽”于 14~15 世纪，开始于 16 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已得到迅猛的发展；在 14 到 16 世纪，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主要思潮是人文主义，对封建思想进行严厉的

抨击，其普遍表现是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高涨，但在各国则各有其特征。在顺治时，西方某些科学和人文主义思想已经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康熙身边就有一些博学的西方传教士，康熙向他们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且一生热衷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于人文主义思想康熙是抗拒的。但热爱科学的康熙综其一生都在封建的圈子里打转，没有使中国赶上世界的潮流，这是什么原因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从康熙本人的情况找原因。满族原是个落后的民族，由于尚武善战，乘明末内乱，在汉奸吴三桂等支持下得以入主中原，而它要巩固其统治必须实行满汉结盟，但在结盟中，汉族高度的文化将其征服了。而学习汉文化最积极最有成就的满族贵族中，要算是康熙了。他对宋明理学尤其推崇，他深知宋明理学可以束缚人们的思想，可使人们服服贴贴地听从其统治，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对于巩固皇权是具有重大的作用的。所以，他不只精心学习，且大力提倡宋明理学。他最推崇的是“三代明圣之主”，这就是说，它要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康熙受这种思想影响是很深的。《清实录》记载：康熙在晚年回忆往事时说：“念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康熙讲的是真话，他确是一位体察民情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不过他的最高理想是“家给人足”，最高目标是上拟“三代明圣之主”，他集中精力要实现的是这种理想，要追求的是这种目标，却没有张开眼睛看世界，更没有想到要赶上世界潮流。因此，他热爱科学，积极学习天文、数学、地理、农学，是为了发展建设农业经济，以做到“家给人足。”他遵循着从汉以来的“重农抑末”的封建经济政策，两眼只盯着农业经济，对工商业则诸多限制，这就必然阻碍了国民经济迅速向前发展，使出现于明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迅速破土而出。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已失去了它原有的勃勃生机，一种死气沉沉的封建思想体系已完全形成，它容纳不得任何新的思想，更谈不到吸收其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康熙对西方深为恐惧，他谕告大学士们：“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他逆料对了，但虽恐受其累，却采取消极的防御措施，基本上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清初郑氏势力在东南沿海伸张，乃实行禁海政策；台湾统一后，康熙为了沿海人民的生计，独排众议实行开海，允许对外贸易，设立海关，并对来贸易的外商适当减税，使这时中国对外贸易出现大顺差。后由于康熙对西方传教士的言论有触犯中国传统的礼仪伦理深表不满，因之与罗马教廷及教皇关系日趋紧张，于是宣布禁止传教，对西洋来船严加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当时在传教活动和礼仪上的冲突，实际上反映着东西方文化哲学伦理思想的歧异和碰撞，反映着外来宗教机威与中国专制皇权的冲突和难以调和。反映康熙对西方防御的消极思想还表现在中英贸易上，如 1712 年，英国对华直接出口贸易，在商品方面不足五千英镑，但购买中国商品竟达五万英镑，中国顺差四万五千英镑，但是中国不是引进英国的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以加强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购买英国的商品主要是为满足宫廷贵族的需要，如呢绒、自鸣钟、仪器、玻璃、香料、药材、棉花等。

康熙一生着重点是在于如何巩固清王朝统治，因此他集中精力考虑的是如何防止叛乱和镇压叛乱的问题。凡是认为是反清的就严加镇压，他制造的两起文字狱——“明吏狱”、“南山集狱”就是这样兴起的。而认为有可能

出现反清活动的也预先制止，他限制和禁止人民开采铜铅，主要原因之一是害怕人民在深山密森时从事反清活动。这使中国丰富矿藏不能开采以迅速发展中国工商业。由于他兴文字狱，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阻凝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另外，崛起于边疆一隅的满族，一旦入主中原，民族矛盾是如此尖锐，应解决的问题是如此多，而其父顺治过早死去，一切重担都压在他身上，他只有“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遑，未尝稍懈”，考虑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可以说他面临的是守业，而不是创业。何况他那时统治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碰中国，即使来势汹汹的沙俄，也被清军打得狼狈不堪，只好签约和解；康熙虽预感西方“恐为中国累”，这仅是“千百年后”之事，目前还感不到威胁，日理万机的他就没有时间来多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没有迫切感，将这个问题摆上日程表来加以解决。

正是上述的主客观原因，使康熙只能在封建圈子里打转，不能越雷池一步。纵观康熙一生，守成有余，但开拓不足。尽管他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他还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封建帝王中是最有贡献的皇帝之一。

第二章权利为私祸国殃民

翻开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争权夺利无朝无之，特别是争权夺利是为满足统治者不断膨胀的私欲的时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害是极其严重的。从下面评述九个朝代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搏斗中，真令人触目惊心！子弑父，臣弑君，兄弟相残，派系拼搏，其杀人手段之狠毒，除仇务尽之彻底，惨绝人寰，什么纲纪、封建伦理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由于他们争权夺利为私，其结果是对自己对国家对人民都是灾难。即使是得胜的一方，因内江削弱了统治的力量，而夺得的权利是用来压榨人民的血汗以填其无底的欲壑，人民活不下去时就要造反，秦、两汉、西晋、唐、宋、明、清都因此而亡。而由此造成国家分裂，其后果更不堪设想。如两晋“八王之乱”，有如群兽狂斗，杀人盈野，血流成河，使中国陷入近三百年的战乱、人民的灾难空前的深重。

一、沙丘变起腥风血雨

在中国古代史上，秦王朝的建立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从这时起，中国才真正形成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国。周王朝虽延长八百多年，因实行分封，权力分散，中央权力有限，及其后期，虚有其名而已。迄战国，诸侯割据称雄，战乱不已，人民苦甚，厌战已极。故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符合人民的愿望。秦始皇建立的封建新体制，不仅有利于长治久安，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尽管他做了不少错事，如滥用民力，“焚书坑儒”，等等，人民还是拥护他，社会还是基本安定。而在始皇死后，如继位得人，不是胡亥而是扶苏，历史将重写。二世即位三年而亡，原因有种种，其中之一是内江。

胡亥听赵高守位杀兄

内江起因于胡亥与赵高、李斯结党篡位。这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所谓偶然的因素，是指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时死了，这时恰巧有胡亥、赵高和李斯跟随，才使他们有机会结成朋党，促成胡亥篡位。所谓必然因素，是指胡亥、赵高和李斯在政治思想、统治策略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与扶苏、蒙恬等是对立的，他们蛇鼠一窝是必然之事。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七日，始皇出游，左丞相李斯跟随。始皇最爱十八子胡亥，故也让他陪同。游程大致是：到云梦，过丹阳，经钱塘，渡富春江，登会稽山。返咸阳途中，过吴，从江乘渡长江，北至琅玕，再至芝罘，走到平原津时染病不起。始皇最害怕说到死，所以群臣没有一个敢提及他身后之事。但他自知不行了，便写诏书给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即到咸阳，跟丧车会合，然后安葬。”显然，始皇是要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可是，诏书在赵高手里，他没有派使发出。出游第二年的七月二十日，始皇死。李斯怕有变，秘密运尸回咸阳。在返咸阳途中，赵高策划政变：他先后说服胡亥和李斯后，便写假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并写假诏书斥扶苏、蒙恬有罪，赐死。至咸阳，即发丧，胡亥继位，称二世皇帝。赵高的政变阴谋为什么如此轻易得逞，对建立秦皇朝有盖世功勋的丞相李斯为什么乖乖地听从赵高的指挥呢？

原来赵高长在深宫，幼便被阉，他为人精明能干，强壮有力，熟习狱法，秦始皇便任命他当中书府令，并命胡亥向他学习。赵高百般讨好胡亥，深得胡亥信任。始皇途中死，他认为如能使胡亥篡位，自己就是大功臣，便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先说通胡亥，开始胡亥认为是杀头事，不敢答应，经他反复启发，胡亥利欲熏心，终于同意。他知道如果得不到李斯的支持，这事是难办得成的，于是往说李斯。李斯是个富贵迷，他未发迹前，认为“最耻辱的是贫贱，最可悲的是贫穷。”正因此，他告别老师荀况入秦，希图建功业，以求富贵。赵高深知其人官欲大、富贵心重，于是便从这里入手，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让扶苏继位，必用蒙恬为相，那么你李斯不罢相这才怪呢？现在天下的权掌握在胡亥手里，你如果胆敢违抗是没有好下场的。你听我的计谋，将可封侯，长命百岁，如舍此不从，将会祸及子孙。我真为你寒心。”在赵高的利诱威逼之下，李斯只好恭敬从命（见《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和胡亥、赵高除了都一样权欲熏心外，他们在思想上也有其共同之处，李斯是荀子派法家，赵高、胡亥是韩非派法家，彼此统治术基本上是一

致的。而扶苏则倾向于儒学。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持不同意见，曾规劝始皇说：“那些儒生都崇拜孔丘，陛下用重法处理他们，深恐天下不安。”由于扶苏为儒生说话，始皇大为冒火，便把他派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蒙恬三世都有大功于秦，故得始皇信任，蒙恬监军于外，威震匈奴，其弟蒙毅则在中央政府，参与决策（见《史记·蒙恬列传》）。蒙氏支持扶苏。扶苏如继位，胡亥、赵高将靠边站，李斯也不会得到重用。胡亥、赵高等与扶苏等不论从利害关系，或从政治思想上论，都处于对立的地位，所以，胡亥、赵高等先后将扶苏、蒙恬兄弟杀害则是必然的了。

王子、公主大遭殃

但是，内讧并没有到此停止，赵高随即策划更大的屠杀。趁二世问怎样才能纵情欢乐、为所欲为、延年益寿、长有天下，赵高便挑拨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其中有假，而诸公子都是陛下的兄长，诸大臣又都是先帝所委任的，今陛下刚继位，诸公子和大臣心里都不服，恐怕将会发生政变。”胡亥说：“那该怎么办？”赵高献计说：“用严刑峻法，罪相连的都杀，以至杀其全族，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都杀掉。同时，要培养自己的亲信，贫者富之，贱者贵之，使他们死心拥护陛下，这样，陛下就可高枕无忧，任意为所欲为，随意寻欢作乐了。”胡亥认为这是个好计。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大屠杀开始，仅是皇族，就有十二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十位公主在杜邮被车裂。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将被处决前，申诉自己无罪，使臣说：“我不管你有罪没罪，我只管执行命令。”嬴将闾痛哭欲绝，仰天大叫“苍天”三声，说“我没有罪”。弟兄三人抱头痛哭，拔剑自杀。这使全皇族陷于震恐，王子嬴高想逃亡，怕连累家族，于是上奏章说因先王爱他，愿陪伴先王，要求埋葬在先王墓地——骊山山麓。胡亥看了奏章，龙心大悦，赵高乐极忘形地说，“好极了，他们整天陷于死亡的恐怖之中，那有时间来考虑谋反！”在胡亥、赵高的恐怖政策之下，皇族以至群臣个个自危，想背叛的日益增多。老百姓也更活不下去了，陈胜揭竿起义，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秦王朝末日到了。

内讧不断目取灭亡

可是，胡亥、赵高并不就此罢手，还在闹内江。赵高先是对胡亥说：“陛下年纪轻，未必事事尽懂，坐朝理政必有差错，就在大臣面前暴露自己的短处，不能显示天子的神明。不如深处宫中，跟我及熟习法律的宦官，阅文批示，这样，大臣们就不敢上奏疑难问题，天下都称陛下圣主了。”胡亥照办，从此，事皆取决于赵高。因此，李斯不能亲向胡亥奏事，很不满这种规定。赵高深忌李斯，乃向胡亥进谗说：“丞相李斯参与沙丘之谋，今陛下已立为帝，丞相却不加官，他的愿望很明显，是想封土称王。他的大儿子李由为三川守，不仅让盗匪横行，且与之私通，而现在丞相主管政府，权势比陛下大，这有可能出现大问题。”胡亥也认为是这样，便派人先去调查李由“跟盗匪勾结”的情况。这时李斯才知自己处于危境，便向胡亥揭露赵高阴谋，指出赵高权已与陛下一样，而其为人邪恶又阴险，且贪得无厌，如陛下对他不加

以控制，将会发生政变。胡亥不听，却将李斯所说转告赵高。赵高说：“丞相最忌的是赵高，如高死，他就夺权了。”于是，胡亥便将李斯交赵高审判。赵高对李斯用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其刑乃诬服，被腰斩于咸阳市。

李斯是个很有智谋之士，他分析了七国的形势，认为预见秦将兴起，乃西入秦，说秦王灭六国，成帝业，一统天下。并献计：以金玉游说贿赂诸侯名士，不纳则以利剑刺之，随后派良将东征。迄秦下逐客令，乃上《谏逐客令》，制止了秦王的错误决策，使天下人才仍为秦所用，这是有关秦王朝兴亡的大事。秦统一天下后，为秦制订了许多长治久安的决策。李斯是秦朝开国重臣。如果他能粉碎沙丘之谋，扶立得人心的扶苏，秦朝将改观，李斯将建立更大的功勋，成为千古名臣，永垂后世。而李斯堕入赵高圈套，是其私欲在作怪。他为私欲，入秦求富贵，为秦建了盖世功勋；也为私欲而参与沙丘之谋，最后身败名裂。这便是李斯的悲剧！

李斯死了，赵高任中丞相。从此，权全归赵高，他在胡亥面前敢“指鹿为马”，可见其权已超胡亥。后赵高逼胡亥自杀，想代称帝，因知群臣不服，乃立子婴为帝。子婴素恨赵高，待赵高来谒时，便与宦者韩谈及其子杀赵高（见《史记·李斯列传》）。这样，沙丘之谋的三位主谋人物都先后完蛋了。而在不断内讧之下，这有如釜底抽薪，秦王朝仅传二世便灭亡了。

二、帝后树党西汉改朝

自从吕雉以太后身份开创临朝称制的先例,以后成为太后的多以她为“楷模”,一批批太后的亲人陆续登上政治舞台,操纵朝政,于是后党与帝党为了争权夺利,闹得几无宁日。

帝党后党争权反复拼搏

在西汉时,这种争夺此起彼伏,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也是当时专制统治的必然现象,按照封建制度的规定,老子当皇帝,儿子最笨也得由他继位;而一旦当上皇后的,她家的父母兄弟姐妹就全变成皇亲国戚,可以参预政权,得以分配权力。当皇帝归天,继位的太子是小孩的话,就由他的母亲即太后临朝称制,权力全归后党,如果儿皇帝长大了或帝党中有人不甘受制,双方矛盾就日益突出,必然发展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翻开《汉书》,西汉王朝共有十五代皇帝,几乎无朝无后党掌权,其差别只不过是其权力的大小罢了。除了刘邦、刘恒、刘启、刘彻这四个皇帝能操纵朝政,以及第十代皇帝刘询在后期能控制政权外,其他十代皇帝的权力都完全掌握在后党手里。如果从掌权时间着,帝党掌权时间长些,计帝党控制朝政的时间有一百二十多年,完全由后党掌权的时间只有六十多年,所以西汉王朝能延传近二百年之久。接受后党掌权危及皇室的教训,西汉第七代皇帝刘彻即汉武帝为防范这种情形再次发生,采取杀其母立其子极其残忍的手段。他死前一年,想立最心爱的八岁儿子刘弗陵当太子,便先把孩子的母亲、年轻貌美的妃子钩戈夫人杀掉。为什么要把她杀掉呢?他解释说,“我死之后,她当了皇太后,一定为非作歹,重用她的家人。为了避免吕雉故事重演,不得不如此。”但汉武帝是白费心机,他能艾除了太后党的出现,防止不了皇后党的产生。他死前遗诏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去病母弟)与大将军上官桀等辅政,而后立为昭帝(刘弗陵)的皇后上官氏,是上官桀的孙女,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桀因与霍光争权被族诛,政权完全落入上官皇后外祖父霍光的手里。以后以霍光为代表的后党虽丧失了权力魔杖,即在霍光死后前年被族诛,迄第十二代皇帝刘骜至最后一个象征性的儿皇帝刘婴(共四代),权力还不是全落入以王凤、王莽为代表的后党的手里。

后党,这个西汉封建制度产生的怪胎,它虽曾显赫于一时,而到头来多不得善终。自从西汉王朝兴起,直到灭亡,皇后家族二十家,能够保全身家性命,不过四家而已,其他十七家大多是被杀或遭到灭族之祸。但是,即使是每次斩草又除根,它被“春风吹又生”,到一定时机,这样的怪胎还是“呱呱堕地”,大多不以前人覆亡为鉴戒,照样争权夺利,照样走上灭亡之路,这是什么原因呢?概言之有三:一、有皇帝必有皇后,皇后地位仅次于皇帝,皇帝一死,儿子继位,皇后就成为皇太后,其地位又在儿皇帝之上了。皇太后如稍有点“能耐”,扶植后党揽权并非难事。二、“七国之乱”留下的教训。汉承秦制,虽仍实行郡县制,也认为秦没有分封诸侯致削弱皇室力量,所以也实行分封制,芟除异姓王后,大封刘姓王,以为屏障,可是这些同姓王一有机会便结党谋乱。想当皇帝,于是发生了“七国之乱”。既然这些刘姓王即皇帝的兄弟叔伯们都不可靠,皇帝该依靠谁呢?显然最亲近的还是皇后的家人,如岳父、舅父、内兄弟之辈,所以这些皇亲国戚得到了信任和宠

幸。三、西汉皇帝，大多不是儿皇帝，就是糊涂皇帝，到后期更是昏君辈出，而当皇帝的皇后大都比皇帝年轻得多，其寿命也就比皇帝长得多，她伴君或亲政久了，见世面多，经验也丰富，比那些儿皇帝、糊涂皇帝高明得多，其控制权力或临朝称制就是必然之事了。

但是，不论是帝党或后党，这些人都是因“以子继父”或因“裙带关系”而显贵，除了极少数人物外，大多是碌碌庸人，甚至有的是双料草包或十足白痴。古往今来，凡凭先人余荫或裙带关系而居高位的，大都是这样的货色，岂独西汉的后党、帝党为然。后党与帝党有时也难于划清其界线，有的帝党即后党，有的后党即帝党，两者往往合二为一，蛇鼠一窝。他们夺权有方治国却无术，往往把国家弄得一团糟，使人民遭殃。可是，专制权力魔杖紧紧握在他们的手里，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罪恶现象是极其困难的。手中无权的人民和还没有觉醒过来的人民是不可能奈其何的。这大概是在专制封建制度统治下造成种种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帝党与后党争权夺利，一直贯穿西汉王朝的始终，从吕姓后党夺权开始，以王姓后党篡位结束，而这两次后党与帝党的斗争，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第一次后党夺权被帝党打败了，吕姓后党遭灭族之祸；最后一次后党的篡位却顺利成功了，这次夺权斗争没有流血，帝党中人还算幸运得以苟延残喘，不过，西汉王朝终于宣告灭亡。下面，为了深入探讨后党与帝党斗争的真相，我们将着重评价这两次夺权斗争的始末及其成败的原因。

吕氏后党专权终遭灭族

现在先述评西汉后党第一次夺权的成败。

刘邦当上皇帝后，就封他的妻子当皇后，封长子刘盈当太子。为巩固儿子的皇位继承权，吕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采取了极其残忍的手段。而巩固儿子的皇位继承权，实质上也是为保卫后党的权力，如果儿子失去皇位继承权，她的皇太后的地位也就没了。据《汉书·高祖吕皇后传》记载：刘邦纳定陶一女子为戚姬（地位次于皇后），十分宠爱，生一个儿子，名叫如意。刘邦认为太子刘盈为人仁慈而软弱，不象自己，说“如意象他”。想废刘盈另立刘如意为太子。戚姬经常伴着刘邦出发到关东地区，她趁着刘邦的宠爱，日夜向刘邦哭着请求立她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皇后吕雉年老色衰，让她留在后方，刘邦跟她的感情日益疏远。刘邦虽想立如意为太子，由于诸大臣力争始终下不了决心。吕雉对戚姬恨之入骨。刘邦病逝，刘盈继位，吕雉当皇太后，她立即下令逮捕戚姬，剃去头发让她穿上用赤土染红的囚服，跟罪犯一起捣米。并派人去赵国召如意来，将之毒杀。吕雉又下令砍断戚夫人的手足，挖掉双眼，凿聋双耳，灌下破坏声带的哑药，把她扔到厕所，命名“人彘”。过了数月，特地召刘盈来看“人彘”，刘盈询问知是戚夫人，痛心大哭，回去便病了，一年多不能起床。他派人告诉太后吕雉说：“这不是人做的事，我是太后的儿子，怎么能再治理天下事！”从此日夜饮酒、玩妇人；不理政事，过了七年便死了。刘盈死后虽先后立了两个儿皇帝，吕雉仍掌实权，她背刘邦“非刘氏王，天下共击之”的约定，分封侄儿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侄孙吕通为燕王，封吕姓亲属六人为列侯。吕雉前后执政达十六年。吕雉临终，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御北军，梁王吕产为相国统御南军，并告诫他俩说：“高祖曾与大臣立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

之，今吕姓封王，大臣们都不服气。我死之后，恐怕他们发动政变，你们要率兵保卫宫廷，千万不要给我送葬，以免被人所控制。”吕雉死后，太尉（全国军政首脑）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章等共谋杀了吕产、吕禄，搜捕吕姓家族，不论男女老幼，全体屠杀。迎立刘邦次子代王刘恒，即孝文皇帝，于是，政权又归帝党。

由上可见，政权归谁，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帝党或后党是否出现强人。吕雉不仅懂得一些统治术，而且她是个心毒手狠的女强人。西汉王朝第一个皇位继承人却与他的母亲吕雉恰恰相反，是一个仁慈而软弱的君主，他事前既不能制止吕雉的暴行，事后却吓得卧病在床上，从此自暴自弃，把朝政丢开不理，使吕雉能继续为所欲为，于是，以吕雉为首的后党形成了。后来，后党权力被夺，吕姓族人被杀，是因吕姓请王都是草包，他们像小孩一样被帝党所玩弄：吕雉死后，据说朱虚侯刘章听其妻（吕禄的女儿）透露吕姓家族要谋反，便秘密派人告诉兄长刘襄，请他发兵向长安进攻，自己则与大尉周勃、丞相陈平密谋作为内应。但是他们手中没有兵权，于是派人向北军假传圣旨要周勃接管北军。事先指使酈寄等警告吕禄：“皇帝已派周勃接管北军，要你回去封国，你要马上交出将印，辞职离去否则大祸就要临头。”吕禄因酈寄是他的好朋友，相信他不会欺骗自己，就把上将军印信交出，将兵权交给周勃。吕产不知吕禄已离开北军，据说他带上卫队和从官直入未央宫，准备作乱。周勃已派军守住殿门，阻他入宫，并派刘章率兵将之困住，吕产终被刘章所杀。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吕姓后党便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

以吕雉为首的后党是否有“取汉而代之”的野心？吕姓诸王是否要谋反？根据现有史料，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吕雉这人确是非常狠毒残忍，但既不是乖巧人，也不是政治家。从杀人手段看，她毒杀如意、把戚姬毁成“人彘”，跟凤姐害尤二姐，毒设相思局杀贾瑞一样狠毒，但凤姐杀人不见血，而她杀人却赤裸裸，其心机、手法都远远逊于凤姐。她虽跟武则天一样临朝称制，但武则天能玩弄群臣于掌握之中，最后当上了真皇帝；而她虽也能以威慑服从臣，但大臣是口服心不服，如陈平等当面顺着她大封吕姓王，暗地里却在准备拆吕家班底，使吕姓家族终遭灭族之祸。她的野心和政治水平跟武则天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从现有史料中还未发现她有“取汉而代之”的野心。如果说她有野心，只不过是让吕姓家族掌掌权，威风威风而已。她执掌政权期间，天下还太平。她继续推行重农抑商、与民生息政策，废除秦所定的“挟书者族”之律和夷灭三族及“妖言令”，对促进经济、文化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至于说在她死后吕姓诸王阴谋作乱，那只是刘章所说，口说无凭，而事实呢？也是口传，泄露于吕禄女儿之口，都无实据，既然要谋反，就要紧握兵权，不会再听什么“圣旨”。要谋反没有兵权怎能谋反，谋反一交出兵权就会被杀头，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普通常识。一听“圣旨”说要交兵权就交，这就不是谋反人做的事，除非他是个十足的白痴，但世上会有谋反的白痴么？如果说有的话，也不过是胡言乱语说反话之类罢了，不会真的行动。吕姓诸王“谋反”这个公案，刘章这样说了，《汉书》这样写了，人们也就这样信了，二千多年来一直成为定案。我们否定诸吕“谋反”，只不过是就事论事，澄清历史真相，并不是说不要撤消诸吕权力。如果让这些草包继续掌权，国家将会被搞得乱七八糟。正因把这些绊脚石搬掉了，才能出现“文景之治”。

汉末多昏君权全归外戚

继汉高后吕雉之后的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三个皇帝，虽然能控制政权，但后党还是参预朝政，在汉文帝统治时他的生母窦太后的侄儿窦婴，汉武帝统治时他的生母太后的同母异弟，即他的舅父卫青，他的妻子皇后姐姐的儿子霍去病等在朝都当大官。可是，从汉元帝（刘弗陵）这位糊涂皇帝继位后，权力便开始向后党那边倾斜了，当时的皇亲国戚许姓家族（元帝母族）和史姓家族（元帝曾祖母族）都据高位，但只是滥竽充数，他们骄傲奢侈放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虽不至于倾覆汉室，但使内部分裂，矛盾重重，国势日衰。迄汉成帝登基以后，多届政府逐步以至完全掌握在汉成帝生母皇太后王政君的弟弟王音、王根、王凤的手里，最后由王政君的侄儿王莽篡夺了政权。王莽能篡位，以后党与帝党彼此情况看，这是顺理成章的必然之事：

王姓后党能掌权，当然是因他们家有个王政君。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她虽没有什么本领，但心向外家，懂得掌握政权的重要性。在她一听到刘欣即汉成帝病逝消息，却不像一般妇女那样因儿子死而哭哭啼啼，而是把处理政权交替视为命根子事，以迅雷之速度驾临未央宫，收取皇帝印信，将一切权力交给王莽，撤销董贤大司马官职，任王莽当大司马。这是争夺权力的最关键时刻，她紧紧抓注了，而且处理得多么干净利落！又将孝成皇后赵飞燕（汉成帝妻子）、孝哀皇后傅氏（汉哀帝妻子）贬守陵墓，逼之自杀，于是只有王姓后党独尊。这都表明王政君在夺权方面具有特殊的天才。由于王政君寿命长，活到八十四岁，王姓家族靠山也就靠得久。她是汉成帝的母亲，故汉成帝登上宝座时，她升为太后，迄汉哀帝继位，她又顺开太皇太后了，以后的两个皇帝，她的地位更至高至尊，这样汉家最后的四个皇帝都在她控制之下，一直到王莽篡位。在汉家朝廷，她家有十人封侯，五人任大司马，不过王姓后党中人大都并非草包，有不少人都有点能耐，因而能巩固王姓后党的势力，为王莽篡位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是因西汉后期的四个皇帝，不是糊涂、昏庸，即是二流子或小孩子，他由王姓后党任意摆布也就不足为奇了。如那位汉成帝刘骜。他经常微服驾车外出，不是访贤问苦，了解下情，而是寻花问柳，花天酒地。许美人与女史曹宫各为他生一男孩，他为了遵守对赵飞燕妹妹赵合德的盟誓，表示对她的独宠，即不与别人生孩子，竟丧尽天良下令或亲手把这两个小孩杀死。他荒淫无度，是历史上第一个服春药死的帝王。汉成帝死，继位的侄子刘欣，即汉哀帝，也是个花花公子，他宠爱宦童董贤，封为大司马，甚至欲以帝位让给董贤。他在位时，政治衰败，社会危机严重，谏大夫鲍宣上书说民有“七亡”、“六死”，极言人民贫困、父子夫妇不能相保，他却无动于衷。哀帝死，元帝庶孙刘衍即位，即汉平帝，年仅九岁，因王莽不许往在中山的母亲来与之相见，心怨不悦，王莽将之毒死，另立宣帝玄孙刘婴，时才二岁，只当了三年儿皇帝便被王莽所废。王莽篡位时假惺惺地握着年仅五岁的刘婴小手，歉疚地哭泣，说：“从前，周公代理君主，终于把宝座归还原主，而今我迫于皇天威命，却不能如愿以偿。”说了哀叹良久。随即叫人将刘婴牵下殿，向王莽跪拜称臣。

王莽能顺利篡位，也因他不是个简单人物。这人城府甚深，他对王家伯

叔很孝敬，甚得他们的欢心和支 持，故步步高升。官爵越高，他越恭敬谦虚，凡所赏赐都反复坚辞，或分给下属和别人，博得下下赞扬。他广揽人才，重视士人，大建学舍。他关心人民疾苦，一有灾害，带头和发动捐款救济，广建房舍收客流离失所贫民。自己子侄犯法也“与庶人同罪”，次子王获杀死家奴，他严予斥责，命其自杀偿命。王莽所作所为，得到上下的称赞。有一次上书歌颂其功德的竟达四十八万七千人之多。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代汉制造舆论。王莽是个学者，年轻时勤奋学习，精通儒家六经，即《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春秋》；向往三代，企图效法古制以改革当时的弊病，以挽救深重的社会危机。由于其所行不够切合实际，和在经济和对外政策方面失误较多，反而使社会危机加深，终于在全国农民起义中灭亡。后人对其篡位多讥议，究竟其中是非，已在前章论述，在这不多赘述了。但不管如何，王莽总比西汉后期的糊涂、昏庸、二流子皇帝强和有所作为得多，其代汉也无可非议。但人们被正统或“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观点所局限，王莽改革失败便成了千古罪人，这是不公平的！

三、外戚宦官东汉蛀虫

继后党（外戚集团）这个怪胎崛起于西汉之后，另一怪胎宦官开始结党成帮，而其垄断朝政是在东汉和帝时，从此，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反复展开夺权的拼死搏斗。在搏斗中，宦官集团往往取胜。

宦官外戚轮流专政

早在商代，宦官已经出现，西周时已初步形成宦官制度。迄秦，宦官赵高竟能“指鹿为马”以愚弄秦二世，因秦朝传世短促，宦官势力得不到发展，宦官势力崛起是在汉武帝时。由于汉武帝削弱外朝，重用内朝，宦官得任“中书令”（负责传宣皇帝诏命），其权力进一步扩张，为后来宦官擅权奠定了基础。昭帝年幼登基，权归外戚霍光，宦官势力的发展受到阻碍。霍氏被诛杀后，在宣、元帝期间，宦官势力迅速恢复。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也只能依靠勾结外戚史高的势力，才能与之一起控制朝政。这也说明，在西汉时宦官还不能独自专政，在政治舞台上还下是主角。尔后权归王姓外戚，一直至王莽篡位，西汉灭亡。

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后，内官都用宦者，如中常侍（皇帝的侍从）、大长秋（皇后近侍，宣达皇后意志，管理宫中事宜）等重要职务都由宦者担任，这样皇帝和皇后的诏令宣达和外朝官员上奏的文书等事务都由宦官担任，宦官势力不断扩大，为东汉后期宦官垄断朝政打开了缺口。但在东汉前期，皇室势力较强，宦官还不敢放纵行事。和帝继位时年仅十岁，大权落于临朝称制的窦太后和其兄窦宪的手里，后依靠宦官郑众等夺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令其自杀，逼窦太后归政。于是宦官集团始得势，但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夺权斗争并没有从此结束，其斗争来往反复，有如“走马灯”：和帝死，少子隆即殇帝出生百余日就继位，由邓太后临朝；殇帝死又立刘祜，即安帝，仍由邓太后临朝，其兄邓骘居要职、掌握大权。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合谋，诛杀邓氏。安帝死，阎太后临朝，立年幼的刘懿继位，刘懿旋即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立年仅十一岁的刘保即顺帝继位，诛杀反对刘保即位的外戚阎显等，并幽禁阎太后。顺帝选乘氏侯梁商女为皇后，梁商任大将军，总管朝政。梁商死，又由其子梁冀继位。顺帝死，梁太后与其兄梁冀先后迎立冲、质、桓三帝，都临朝执政。梁太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合谋诛杀梁氏。桓帝死，窦太后与其父窦武立年仅十二岁的刘宏，即汉顺帝。太尉窦武与太傅陈蕃合谋诛杀宦官，事泄反被宦官所手，窦太后被幽禁，宦官复得势。汉灵帝立何皇后，其兄何进为大将军，他与袁绍谋杀尽宦官，因延误失密，也为宦官所杀。袁绍率兵入宫杀尽宦官。外戚与宦官两败俱亡。被何进召入京的董卓独擅朝政，废少帝另立九岁的刘协为皇帝，汉室名存实亡。

宦官和外戚——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母体生出来的两个怪胎，他们的权力都是凭着皇帝的信任和宠幸而取得的。当昏庸的、或儿皇帝继位时，其权力更为膨胀，为所欲为。翻开《后汉书》的宦官和外戚史，在东汉期间几乎是轮流执政：皇帝死后，皇后升太后，由她临朝，外戚专政。之后，皇帝依靠宦官之力除掉外戚，由宦官专政。皇帝就这样由外戚、宦官先后玩弄于掌握之中，任由他们摆布。也就是这样，宦官与外戚为争夺最高权力展开了旷日

持久的斗争，不仅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害，也使东汉王朝寿终正寝。当然，我们不能说外戚、宦官都是坏人，彼此拼搏的是与非、善与恶，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外戚多以族灭告终

先谈外戚集团。安帝时的邓氏外戚和灵帝时窦氏外戚是东汉外戚中的佼佼者。据《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传》记载：邓绥自幼喜读史书和儒家经典，选入宫后，仍勤奋学习，曲意奉上，厚待下人，深得和帝宠爱，立为皇后。殇帝、安帝时，她都临朝。她明辨是非，亲断冤狱，释放宫女，关心人民疾苦，赈济饥民，先用杨震、虞诩等贤才治国治军，天下得以稍安。其兄邓骘虽居高位，但小心谨慎，不敢为非。邓太后死那年，安帝因她久不归政心怀怨恨，又信乳母王圣诬告邓氏兄弟密谋废帝，乃与宦官李闰合谋，诛杀邓氏。邓氏是无辜的，这是一桩冤案。至于桓思窦皇后妙是个妒忌成性的妇人，无善可称，但她的父亲窦武却是个正人君子。《后汉书·窦武传》云：窦武因长女窦妙立为皇后，得升任太尉。在职期间，多交名士，他为人嫉恶如仇，廉洁节俭，拒绝收礼、贿赂，妻子生活也俭朴。当时边境多患，人民饥荒，他得到两宫赏赐，都散给太学生，或施舍救济贫民。因宦官当权，正直官员如李膺等被驱逐。窦武上书进谏，李膺等得再任用。窦武与太傅陈蕃合谋杀宦官，因窦太后犹豫，窦武也不够当机立断，致使事机泄露，反为宦官曹节等所杀，连累“党人”遭殃，李膺蕃等一百余人被杀。窦武谋杀宦官，本意为肃清腐败现象，以申张正气，挽救汉室危机，其动机是可嘉的。这次外戚与宦官斗争有一个特点，有大批士人支持外戚。由于斗争失败，宦官权势更炽。

和帝时，外戚窦宪是个既有大过也有大功的人。窦宪因其妹贵为章德皇后得任大将军，他持势杀人，作威作福。但他率兵灭北匈奴，勒石燕然，使北部边寇平息，其功远超卫青、霍去病等人。这次战役，战果空前，是中国对外战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考之《后汉书·窦宪传》，和帝与宦官杀他，其罪名是“密谋不轨”，但其事说不清。

在外戚集团中，最坏的莫过于梁冀。其妹是和帝皇后。其父大将军梁商恰恰与之相反、梁商严于律己、谦虚谨慎、虚己待贤，因此，梁商在时梁氏族不敢放纵为非。梁商死，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他是个二流子恶棍，一旦大权在手，穷奢极侈，无恶不为。他与其妹梁太后操纵朝政，先后迎立冲、质、桓三帝。冲帝立时年仅二岁，在位仅五个月便夭逝。质帝八岁继位，有一次在朝会时，他看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即将之毒死。梁氏以前所立的都是儿皇帝，这样好控制。这是东汉外戚立帝的惯例。而后立年已十五岁的桓帝是因梁太后想以妹嫁他。由于桓帝年长较懂事，对于梁氏的“跋扈”早恨在心，梁太后一死，桓帝就与宦官谋杀梁氏。梁冀其死活该。但除了一祸患，另一祸患又起，宦官单超等五人因杀梁氏有功，都被封侯，这“五侯”横行霸道不减梁氏，人民仍处于灾祸之中。

汉灵帝时的外戚何进，虽无大恶，但却是个双料草包，是促进东汉王朝灭亡者之一。他本是屠户出身，因其妹贵为皇后得任大将军。他跟袁绍等谋杀尽宦官，因何太后不同意，他也犹豫不决。当时军权在他的手里，要杀宦官只不过挥手之劳，竟宣召外兵，却迟而不密，使宦官得知并能从容准备先

下手杀之。外戚、宦官互相屠杀，两败俱亡后，这时应召而驻兵干外的董卓才率兵入京城，不费吹灰之力成为当时的实际统治者。

纵观东汉后期外戚史，尽管有恶棍如梁冀等，但大多心存汉室，他们既没有西汉末期外戚王莽的智谋，也没有王莽篡位的野心。有的如窦武为挽救危机，竭尽其力；有的如邓鹭、梁商自我约束，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不论是恶棍或忠臣，以至谨小慎微的人，他们既处在权力的巅峰上，冰山一倒，便不可避免地遭灭族之祸，能善终的只不过个别人而已。

宦官作恶甚于外戚

现在让我们再评论宦官集团。

宦者原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自幼便被强买并阉割进宫当宦者，其所受残酷的迫害，是人间所罕见的。他们都是皇室的权才，大多当下等役使，只有少数人才当上宦官。有了专制皇帝才有宦者，他靠着皇帝过活，仗着皇帝富贵。东汉从刘秀起，接受西汉王朝皇帝不可靠、大臣不可信的教训，便任用宦官作为心腹以控制天下。以后的皇帝为改变大权旁落于外戚的状况，往往通过宦官之手以发难。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由于宦官是主要的助手，每次取胜，其权势便膨胀，有的甚至反奴为主，任意废立皇帝。这些宦官一得志，其凶恶甚于外戚。其中也可能是一种逆反心理在起作用，专制皇帝给他们的灾害，他们便将之洒向人间散布开来，进行报复。不过宦官终究是宦者，不管其势多大位多高，也不可能“取而代之”，必须紧紧依靠皇室，才能存在，才能保持其权势。因为这些人一离开皇室，便什么都没有了。

当然，宦官中也有较正派的人，如郑众和孙程等宦官。郑众协助和帝诛杀窦氏后升为大长秋，但每次论功封赏，他是辞多受少，故得到和帝的信任，经常与他议论国家大事。迎立顺帝刘保并协助其诛杀外戚阎显的孙程，因有功被封浮阳侯，但他没有仗势作恶，与其他宦官朋比为奸，而且还能坚持正气。司隶校尉虞诩弹劾为非作恶的宦官张仿等，因而被诬陷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据《后汉书·孙程传》记载：孙程上书进谏，并上殿吆喝张仿，后又陈述虞诩对国家的贡献，终使顺帝释放虞诩。

不过，像郑众、孙程这样的宦官毕竟是少数，势大权重的宦官大多作恶多端，宦官单超等五人因协助桓帝诛杀外戚梁冀有功，都被封为侯，他们操纵朝政，贪污残暴。据《后汉书·单超传》记载：单超后任为车骑将军（位在皇帝之下，三公之上，这是宦官担任最高职位之始）危害更大。单超死后，剩下的“四侯”，越发蛮横凶暴，民间有四句形容他们凶恶形象的歌谣：“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意思是：左官有扭转天（皇帝）的意志之力；具爱坐地称霸，骄横无比；徐璜凶残有如卧虎；唐璜的毒手像大雨遍及天下。这“四侯”的兄弟亲戚，都在地方当大官，像强盗般抢夺人民财产。人民活不下去，纷纷造反。《后汉书·曹节传》记载：宦官曹节、王甫等因诛杀外戚窦武、诬杀桓帝弟渤海王悺有“功”，先后被封为侯。他们利用手中权力，互相封爵赏赐。朝廷内外部有他们的亲人当官，他们残杀无辜，贪污掠夺，接受贿赂，无恶不作。

陈蕃、李膺等和太学生郭泰等支持外戚窦武与宦官曹节等作殊死斗争，这是历史上士大夫阶层参加政治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因宦官胡作非为，朝政日非，世家大族李膺等人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制造舆论，进行挟击。

由于宦官势力强大，又得到桓帝的支持，李膺等人被诬为“共为部党，诽讪朝廷”，桓帝诏令逮捕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窦武上书进谏，李膺等才得再用。窦氏被灭族，宦官又得势。灵帝在宦官侯览、曹节等人挟持下，收捕“钩党”（指相牵连的同党）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妻子徙边，附从者连及五服内亲。并制诏州郡大举“钩党”，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均被指为党人，陆续杀死，流徙的又有六六百人。迨灵帝举行冠礼，虽大赦天下，却唯独不赦“党人”。后灵帝又在宦官挟持下，下诏州郡凡是党人学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两次“党锢之祸”，士大夫阶层受到最严重的打击，使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正直之士害怕又罗“党锢之祸”，三缄其口，宦官气焰更盛，朝政日非，导致天下大乱，始时，这些世家大族子弟和太学生认为制造声势浩大的舆论便可纠正时弊，但是权在宦官手上，所谓“舆论”又能起多大作用，结果不仅无济于事，反纷纷下狱。他们后来加入的外戚集团，其声势也不弱，当时的军权和政权都分别掌握在太尉窦武和太傅陈蕃的手里，如果能当机立断，讲究策略，诛杀宦官首凶，并非难事。可是，窦武听从窦太后女人之见而犹豫不敢下手，而当其开始行动时，又不从首凶开刀，却从其次，并连及一般宦官，且事机不密，泄露于外，于是引起全体宦官公愤，团结一起协帝进行反击，终于失败被杀。“党人”又再遭殃。这次斗争虽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东汉以后，士大夫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担任了主要角色。

外戚与宦官搏斗失败的原因

窦姓外戚与宦官斗争，其声势不能说不大，为何却失败了？而且不仅这一次，在整个东汉后期，外戚为何也都败于宦官，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外戚集团的起家及其能爬上权力中心，都是凭着皇室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外戚就不能成为外戚。东汉后期皇权虽已削弱，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便是在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时，尽管是汉室已名存实亡，除了袁术外其他人都不敢公开声称要背叛汉帝，从曹操以至各地割据者在表面上还是打着拥汉的旗帜，因为背叛皇室是罪大恶极，那时人们的心理上是很难摆脱这种压力的。何况在汉灵帝时皇室还有权力，依靠与汉室的关系获得权力的窦氏集团不能不郑重考虑，不然就会担着“背叛”的罪名，这样不仅失去荣华富贵，还会遭灭族之祸，正因此，使他顾虑重重，不敢轻举妄动。这就不能像还是当无赖时的刘邦那样毫无顾忌，看见秦始皇当皇帝那样威风凛凛，无限羡慕，便脱口而出：“大丈夫当如此也！”于是，放手大干。由于窦武犹疑不决，密谋而迟迟不实施，其谋则不密，必然外泄，这就使宦官能先发制人。也正因皇帝是“神圣”不可背叛的，手中又握有权力魔杖，而东汉后期的皇帝不是庸主便是娃娃，实际上代理皇帝行事和使用权力魔杖的是其身边的亲信宦官。这根权力魔杖掌握在哪个宦官手里，哪个宦官就法力无边。每次为了制服外戚集团、宦官集团便掣起这个法宝，确是万应万灵，几乎没有哪一个外戚集团能逃这一劫数，即以族灭告终。

四、八王之乱 中国离碎

西晋和秦朝一样，当创业主逝世不久便出现内江，骨肉相残的惨烈程度不相上下，但秦朝诸王无权无兵，任由二世宰割，而西晋诸王都有封国，手中有权有兵，且先后参加夺权的八位王爷，既有野心又凶残，祸乱一起，有如群兽狂斗，杀人盈野，血流成河，皇族罹难，人民遭殃。于是，流民为乱，异族纷纷崛起，使中国支离破碎，陷入“大分裂时代”，引起了近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

引起大乱的始末

《晋书·惠帝传》记载：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司马衷继位，称惠帝，外戚杨骏专权。贾皇后杀杨骏，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不久，贾皇后又矫诏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随即以玮“擅杀”亮罪杀玮。300年，赵王司马伦杀贾皇后，次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皇帝。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起兵反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杀。晋惠帝复位，司马冏辅政，302年，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乂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执政，303年，司马颖与司马颙联兵讨司马乂。304年，东海王司马越杀司马乂，司马颖据邺城，被封皇太弟，任丞相。305年，司马越起兵攻司马颙、司马颖，先后将之打败，次年迎惠帝还洛阳，处死司马颖、司马颙。306年，惠帝死（有说是被司马越毒死），立怀帝，司马越独掌大权。311年，司马越死。八王之乱至此结束，前后长达16年。

从以上的简况说明，为了夺权而发动变乱的八王中，除了司马伦篡位，其他七王都不敢窥窃“神器”，都奉晋惠帝，故失位而复位，这是否因他德高望重？不！因他是最理想的傀儡，奉他为帝，可掌皇权的实权，而不用担篡位的罪名。

晋惠帝性痴呆，懵懵懂懂，不懂世事。他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声，问左右侍者：“这叫声是为官事，还是为私事？”有的侍者对这糊涂问话只好糊涂答之：“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他在位期间，皇族内乱，战祸连年，天下荒饥，饿殍遍地。司马衷对此大惑不解，说：“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粥？”其痴呆大都类此。他虽在位16年，只不过是个象征性的皇帝，谁控制他，谁便可下诏书，为所欲为，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晋书·惠帝纪》）。

第一个控制司马衷的是他的皇后贾南风。贾南风貌不扬，矮而黑，因其父贾充是晋元勋得宠被纳为太子妃，她为人阴险凶悍，曾因妒火中烧手杀数人，甚至以戟掷孕妾，胎儿随刃堕地，其酷虐如此！惠帝即位，她为皇后，诏书都由她下，她挥舞这支权力魔杖，如前面所述，翻手之间，轻而易举地先后杀掉皇太后父亲杨骏和司马亮、司马玮两王，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南风淫虐，滥杀无辜，在她擅政十年期间，后族专横，贿赂公行。299年，矫诏废杀太子及其生母谢氏。贾南风以为杀了太子，其统治地位便可巩固无虞，殊不知有人在暗里策划夺权，这人就是右将军赵王司马伦。在其谋士孙秀的教唆下，他先是极力巴结贾南风，得她信任，成为心腹；太子被废后，孙秀献计：促使贾南风杀太子，再借为太子报仇杀贾南风，这样便一箭双雕，就可夺权。于是，散布谣言：金殿禁卫军将废皇后迎太子复位。贾南风听了十分恐惧，立即使人杀太子。司马伦便趁太子被杀、人心愤恨之机，联合梁王

司马彤发动政变，矫诏使齐王司马冏入殿“逮捕皇后”。当齐王司马冏向贾南风说有诏要逮捕她时，她说：“只有我可以下诏书，你哪里来的诏书？”并问起事的是谁？司马冏说：“梁王司马彤、赵王司马伦。”贾南风说：“拴狗当拴脖子，却去拴尾巴，那能不失败？”她后悔只知对付太子，不知背后还有大敌人。司马伦又矫诏赐金屑酒将她毒死（《晋书·惠贾皇后传》）。正是：螳螂捕虫，黄雀在后，那时晋皇朝便是这样一个盯着一个，一个阴谋胜过一个，杀人手段之酷虐也一个超过一个。

乱源来自分封和所立非人

皇族内乱，其引火线虽来自司马衷和贾南风，其源却出自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立司马衷为太子，贾南风为太子妃，是犯了最大的错误。他也知道司马衷是个蠢才，不能料理政事，早想废之，因其母后杨氏用立嗣以长不以贤为理由固谏，乃止。司马炎另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大封皇室诸王，计封皇族二十六人为国王（《晋书·晋武帝纪》）。司马炎为什么大封宗室诸王呢？因他看到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于是一反秦汉以来虚封皇侯的惯例，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为国王，希望这些国王屏藩帝室。在封 27 个国王中，其中有五个大国，六个次国，十六个小国。不论大小国都有一定数量的户和兵，可自选文武官员。大国有民户二万，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次国有户一万，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小国有民户五千或不满五千，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由于这些国王有权有兵，又大都是野心家，结果事实和司马炎的希望恰恰相反，不仅不能屏藩帝室，而是播下了皇族内乱的种子，导致西晋灭亡。

晋武帝所以犯以上的错误，跟他是个纯儒者有关。儒家学说有精华有糟粕，而他不分好坏一概照办，遵循长幼有序之说，明知司马衷痴呆也纳皇后的立嗣立长之谏；由于对周朝制度的崇拜，便将之恢复。历史事实说明：分封制害多利少。秦鉴于周朝后期的分裂，为加强中央集权，宁使“子弟为匹夫”而实行郡县制。汉部分实行分封，致有吴楚七国之乱。曹魏时则因禁锢诸王，皇族内乱没有发生。西晋诸王野心家如此之多，跟实行分封制有关。权越大兵越多，野心就膨胀，即使原来没有野心的也因此滋生；如果无权无兵，纵有野心也无法实现。晋武帝不吸取历史教训，结果造成后祸无穷。

从司马懿至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都是杰出人物，他们为司马炎建筑了登上代魏的台阶。司马炎也是有作为的人，他为人宽容、敦厚，比较能纳谏，平和待人，也有一定谋略，故能平吴统一天下。司马氏集团的其他人就大多是碌碌庸人，不仅司马衷痴呆，参加变乱的八王也大多智商不足。如司马亮和司马玮，兵权都操在他俩的手里，却被贾南风愚弄致死，司马伦野心虽很大，却是个昏庸愚劣的花花公子，他废杀贾后篡权自立的阴谋，都是孙秀所教，篡位后，政权实归任中书令的孙秀，他下的诏书，孙秀认为不对的就更改，或者作废另写。司马伦战败被擒，他被迫饮下金屑毒汤时，他后悔已迟，连连悲叹：“孙秀害我，孙秀害我！”又如司马颖，也是个智慧不足，神志不清的庸人，不过他为人较敦厚，把封国大事全交给卢志管理，故博得美誉，也因此受到全国的推崇，曾一度辅政。但他志得意满后，骄傲奢侈，不再听卢志规劝，结果一败涂地，最后还不是脑袋搬家。正因此，这些发动变乱的诸王，尽管他们的野心都很大，个个都想拿大极或当皇帝，由于他们大都智

商不足，都是低能儿，即使政权到了手，没有一个能把它撑起来。

其后果无比严重

“八王之乱”引起的后果在历史上是无比严重的。皇族骨肉相残之惨厉是空前的，每一王战败，都连累到他的家族及其党羽的家族，司马冏与司马乂是兄弟，司马乂生擒司马冏后，不只将他斩首示众，传递各军，其党羽也全屠三族，被杀的有二千人。司马冏、司马颖、司马颙起兵攻打司马伦时，双方混战 60 余日，死亡将近十万人。司马颙起兵反司马乂，司马颙的都督张方攻入首都洛阳，奸淫烧杀，大肆抢掠，杀人以万计。幽州都督王浚攻入司马颙根据地邺城，仅妇女就有八千人被强奸后推入河里淹死。而由于战乱频繁，造成连年饥馑，瘟疫流行，死的无法计算，在 306 年，仅晋帝国宁州一地死亡就以十万计。而“八王之乱”引起“大分裂时代”长达 286 年，在当时的中国国土上，最少时有两个国家并立，最多时出现十一个国家，互相讨伐，各族混战，战祸连绵不断，居住在黄河流域各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罄竹难书的！

五、弑父屠兄 杨广登基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次子，他何以能夺取其兄杨勇的太子位，从而登上皇位？称帝后的杨广即隋杨帝为什么不依靠北人，即使杨氏起家的关陇集团，而依靠南人，致使南北朝臣矛盾激化，内部分裂，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只有从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去探讨。

善矫饰媚双亲夺帝位

杨广工心计善矫饰，他针对其兄杨勇的弱点反其道而行之，以投双亲之所好，博取欢心；同时，暗里广结朋党，策划夺位阴谋。

杨勇是杨坚长子，杨坚称帝后立他为太子，军国政事及死刑以下的刑罚，都让他参加裁决。凡政事有不妥处，他都提出不同意见和纠正办法，文帝多赞同。杨勇颇好学，会词赋，性宽仁、厚道、坦直，但为人率性任情，喜排场。文帝尚节俭、反对奢华，对他这种作风很不满意，曾戒之说：“统治天下，未见有奢华而能长久的。”有一次，百官来朝，杨勇设乐受贺，文帝很反感，认为是“违礼”，于是，恩宠渐衰。杨勇多内宠，尤爱姬妾昭云，不喜欢独孤皇后为他要的嫡妻元妃，而元妃因患心脏病，二天便死了，独孤皇后疑元妃之死是被勇所害，严斥之。杨广知道父皇母后不喜太子之故，姬妾但备员数，只跟肖后住在一起；每次来朝，车马侍从，都很俭素；接待朝臣，礼极卑屈。这样，不只得到父皇母后的宠爱，也得到群臣的赞扬，他的声誉超过诸王。杨广乃指使党羽杨素等在其父皇母后面前盛赞扬广之德，多言太子之过，隋文帝、独孤皇后便都有废太子之意，暗中派人观察太子的行为。有一次，文帝派杨素去探太子，素到东宫，故意久停门外，使太子久待，以激怒之。太子果恨之，形言于色。素还，对文帝说勇有怨，恐有他变，要深加防察。文帝听了素的谗言，更加疑太子。杨广的其他党羽也纷纷交相潜毁太子有非分之谋，文帝便相信太子要加害于他，对之“如防大敌”。这时杨广的心腹太史令袁充认为时机成熟了，便假借天象对文帝说：“臣观天文，皇太子当废。”文帝信以为真，便下诏废太子，囚于东宫，交新立的太子杨广管束。文帝患病，叫太子杨广到仁寿宫照料医药，而广却“奸乱宫闱”，文帝知道，用力撑着起来，说：“在废我儿！”因派人去叫杨勇。未及派使，文帝暴死。杨广继位，立即伪写诏书，赐杨勇死。后追封房陵王（以上事见《隋书·房陵王杨勇传》）。

所谓“奸乱宫闱”事，在《晋书·宣华夫人陈氏传》有具体揭露：夫人陈氏与皇太子杨广在夜间同侍候文帝，天亮夫人出外换衣，杨广见夫人色美顿起奸心，跟在后边强逼夫人遂其兽欲，夫人拒绝，逃到文帝卧所，文帝见她神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泣说：“太子无礼。”文帝大怒说：“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皇后误我！”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严说：“叫我儿！”述等将要去叫太子，文帝说：“是杨勇。”述、严出外写好诏书，让左仆射杨素看。素将这事告知太子，太子立即叫张衡入寝殿，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的人到别室。不久，文帝便死了。这时，夫人与诸后宫相注视说：“事变！”大家脸色苍白，惊得发抖。张衡何许人也，他在夺宫事件中担任什么角色？《晋书·张衡传》有明白的交代：杨广夺位的计谋，多由张衡所策划，杨广继位后，对他特别恩宠，他因此颇自骄傲，后得罪杨广被赐死。他临死大叫

说：“我为人做那种事，还能希望活得久么！”意指为杨广害其父文帝事，这就揭开了“文帝暴死”的真相。

杨广为人手狠心毒、荒淫无比。但他在未继位前，却矫饰得“天衣无缝”：多么节俭！多么孝顺！多么谦恭！不仅瞒过满朝文武，窃取了崇高的声誉，连他的双亲也认为他是最理想的继承人。谚云：“知子莫若父”。隋文帝是历史上比较有远见有作为的贤明君主，不仅不知其长子杨勇，也更不知其次子杨广，致为其所骗，把好人当坏人，将坏人认为是好人，可见识人用人不易！隋文帝之所以不知子，是由于他看人不是从大节着眼，而是从生活小节着手。他崇尚节俭，作为一个古代帝王来说，这是一种罕见的美德，但专以此衡量人而不考虑其他，就会走向极端，看人必然是片面的。杨勇只不过“率性任情”点，多几个内宠，喜甜宴，讲究排场些，这即使是历史上的明君也大多不例外。但杨勇优点不少，特别是参预朝政时表现不错，便是对于文帝的错误主张，也敢于提出纠正意见，如文帝要移民实边，他上书谏止，避免了劳民伤财。对杨勇的大节，文帝却看不到。对于杨广，只看到他的表面，而看不透他的本质，致上了杨广矫饰之当，当他觉悟看破其人时已迟了，因杨广怕自己的骗局被揭穿，当上太子后便对其父文帝严密监视控制，一知自己真面目被文帝所识破，便先下手为强了。

暴虐屠杀引起众叛亲离

杨广杀父屠兄登上帝位后，便采取排除异己培养心腹的人事政策，想以此巩固其血腥统治。对于先帝旧臣和拥护原太子杨勇的诸臣则予以排斥、屠杀，大量重用灭陈时投于其麾下的南臣，于是，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南北朝臣的对立和斗争。

先是向先帝旧臣及拥护杨勇的诸臣开刀。高颖是隋朝的开国头号功臣，他是反对废太子杨勇的中坚人物，炀帝则以“谤讪朝政”罪名杀之。贺若弼是平陈功臣，炀帝竟以他私议其奢侈为借口杀之。薛若衡才华横溢，为时人推崇，炀帝继位，他上《高祖文皇帝颂》，溢美文帝，炀帝“览之不悦”，不久即被缢杀。礼部尚书宇文弼以才干著称，因对高颖说：“从前周天元因好声色而亡国，以今比之，不是更甚了么！”竟被炀帝所杀。即使是为他夺太子位立大功的杨素，炀帝因杨素是先帝重臣，军功卓著，他表面尊重他，内心却很猜忌。杨素有病，炀帝派名医诊治，赐以上药，实是欲探其病情，恐他不死。杨素也自知名位已极，恐遭不测，不肯服药，不久便死。素死，炀帝对近臣说：“使素不死，终当灭族。”可见，他已准备杀素。在先帝旧臣中得到杨广始终信任的，只有善于明哲保身的牛弘、宇文述二人而已。

由于炀帝排斥、屠杀北方的旧臣，北方旧臣主要是文帝原依靠的关陇集团的势力终于分裂出来，形成了反隋的主要力量。首先是杨素的儿子、关陇集团头目杨玄感起兵反隋炀帝。参加造反的多是魏周以来的权贵。杨玄感的叛乱虽被镇压，但关陇集团势力并没有被消灭。曾为杨玄感谋主的李密，投瓦岗起义军取得领导权后便传檄天下，历数隋炀帝十罪，给隋炀帝严重打击，之后，关陇集团成员李渊起兵占据关中，也与他身受隋炀帝猜忌排挤有关。炀帝已知北臣大都叛变，北方已无其立足之地，只能向其根据地江都逃跑想在那苟延残喘，但北方将兵思归，不肯为其卖命，宇文文化及等将官便趁机发动江都政变，将炀帝缢杀了。唐太宗曾指出：“炀帝的灭亡并不是因甲仗不

足，而是由于不仁不义、群下叛变的缘故。”内部叛变，外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正是这种内因外因结合在一起，导致隋传二世而亡。

谀者助纣为恶加速隋亡

隋炀帝之所以重用南人排斥北人，这是因他不信任先帝旧臣及拥护太子杨勇的人，故当他即帝位后，五年间就连续下诏四次招揽和拔擢新人，这反映了他急于培养效忠于他的势力集团的心情。既然不信任北方旧臣，他只能是依靠南臣。而这与他过去的一段历史有关。588年，他被任为行军元帅统领八路大军共五十一万八千人向陈进攻，次年攻陷陈都城建康，陈兵溃败，陈后主投降。及陈平，杀罪大恶极的害民官湘州刺史施文庆等，人心大快；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后任扬州总管，镇江都，原陈将官大都投其麾下，不少人得到重用，成为心腹。但这些心腹将官，大多唯唯诺诺，曲意讨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是由于隋炀帝是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君，在他面前敢坚持是非的极少，大多是阿谀奉承，看着他的脸色说话，照着他的意志行事。他的心腹大臣虞世基、裴蕴、袁充等都是这种人。虞世基，会稽余姚人，他原是陈国官员，陈灭归隋，因他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炀帝重其才，让他参掌朝政。当时天下大乱，隋朝开国元勋相继被杀，世基惊祸及己，虽居近侍，却唯炀帝之命是从。尽管叛乱日多，州县多被占据，因知炀帝厌听这些消息，有关战败事都不以实告，因此外边有变，炀帝多不知情。正因世基善揣摩炀帝的爱憎，故言多合意，炀帝对他特别亲爱，朝臣没有哪一个比得上他（《晋书·虞世基传》）。裴蕴是河东闻喜人，但他祖孙三代仕陈，陈灭归晋，晋统治者亦将他视为南人。蕴性明辩，有吏干才。他完后任汉、直、棣三州刺史，都以治绩著称。隋炀帝赏识其才，甚为重用，擢授御史大夫，与虞世基等参掌机密。他善伺炀帝旨意，炀帝欲加罪谁，则曲法顺情，促成其罪；欲宽容谁，便从轻处理，将之释放。杨玄感反叛被镇压，炀帝派他惩处其党羽，对他说：“玄感一呼，附从的有十万之多，可见天下人不要太多，多便相聚为盗。不将之杀尽，则不能惩戒后人。”蕴便峻法治之，杀戮的达数万人，并抄没其家（《晋书·裴蕴传》）。袁充本陈郡阳夏人，后寓居丹阳。原任陈宫，陈灭归隋。他好道术，颇晓星象，因取媚炀帝，得任秘书令。炀帝每次征讨，他知道了便假借星象，以顺其意。因此，炀帝对他赏赐有加。亲昵异常（《晋书·袁充传》）。虞世基、裴蕴、袁充等人献媚讨宠，实是助纣为恶，促使炀帝暴行累增。炀帝为人如此，其所依靠大臣又如此，焉得不败。

炀帝杀父屠兄，这是其私欲膨胀极度的必然结果。他又是个猜忌多疑的专制暴君，不可能有唐太宗化敌为己用的胸怀和智谋，只能对先帝旧臣和拥护太子杨勇派一概排斥，加上他对人民又这么残暴，因而不断扩大和加强敌对势力，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反叛洪流。当他逃到江都后已感到末日将至，有一次，他取镜照面，对肖后说，“好头颈，不知谁来斩它！”肖后惊问缘故，他强笑道：“贵贱苦乐，没有一定，斩头也不算什么！”但到叛变的将官要斩他头的时候，这个暴君原来是个懦夫，他发抖了。因害怕刀杀，要求让他饮毒酒了结，叛将不同意，他便自解衣带给叛将们，哀求缢杀，于是这个罪大恶极的民贼就这样被缢死了。

六、内争不断唐朝换代

唐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朝代，政治、经济、文化都有重大成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即使如此，它和其他封建朝代一样，内讧起伏，争斗不已，仅就皇族方面来说，其斗争之复杂和次数之多超过任何朝代，如玄武门之变、武周革命、中宗复位、节愍太子举兵、韦后乱政、太平公主谋乱、玄宗内禅、张后之乱，等等，但大多变乱时间较短，不致造成大害，且有些变乱平定之后，向好的方面发展，如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这个一代英明之主得以继位，对唐朝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出现了“贞观之治”；武后临朝称制并改唐为周，当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她能纳谏，善选拔人才，亦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先后平定韦后、太平公主的变乱后，唐玄宗励精图治，创建了“开元盛世”。而给李唐王朝致命伤的，却是藩镇叛乱割据、宦官专政跋扈，且是互相连结、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愈演愈烈，直到唐亡。

祸害由谁引起

唐玄宗是使唐朝鼎盛又将之推向下坡的关键人物。从713年~734年的21年期间，他任用贤臣，虚心纳谏，颇多善政，故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交通发达，边疆安定，国威远扬，为有唐一代鼎盛时期，被史学家誉为“开元之治”，或称“盛唐”。但在734年之后，他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日益骄奢，纵情声色，怠于政事，任用佞臣，亲信宦官，造成官吏贪渎，政治逐渐腐败，自持富强，傲待边族，轻信边将，轻启边衅，加剧了民族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藩镇叛乱、割据，宦官权势倾主，以至废立皇帝。这应该说罪在玄宗，咎由自取。

“偏听则暗”。历史证明，偏听必偏信，这是犯错误之由。唐玄宗后期正由于偏听偏信而犯了一连串的错误。他为何从明君变成昏君？这是因他后期妒贤害功，总担心大权旁落，故通过宦官将军政大权紧紧抓在手里。他大量任用宦官，为之加官封爵总数多达三千人，其中任三、四、五品官有千余人，有的如杨思勳竟官到一品，给车骑大将军称号，封号国公。唐玄宗尤其宠信高力士。据《旧唐书·高力士传》说：唐玄宗最宠信宦官，监军和宣达圣旨都由宦官任之。任监军的宦官，其权力超过节度使；出使的宦官，地方长官待之如上司，曲意奉承。在诸宦官中，权力最大的是高力士，凡四方进奏文表，要先呈高力士，然后进上，小事则由高力士自己处理。玄宗常说：“有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甜。”玄宗宠信高力士如此，必然是言听计从。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都因他的引荐而取得将相高位，其他走他的门下而获得官职的则数不清了。高力士资产殷富，连王侯也比不上他。该传还说，“力士为人谨慎无大过”。从以上史实看，说力士“无大过”是不对的。既然说他富超王侯，那么钱财何来？显然是纳贿所得。正因有贿可纳，他不管好丑都一概引荐，特别是推荐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等人，就是最大的罪过。唐廷任用奸相李林甫，朝政从此开始腐败；任用安禄山启了藩镇叛乱、割据之端，唐王朝从盛世趋向衰落以至灭亡，高力士不能辞其咎。但是，高力士只不过是唐玄宗的化身，当然，祸首还是唐玄宗。

藩镇叛乱割据

“安史之乱”严重削弱了唐王朝的国力，促进了藩镇的割据。但“安史之乱”并非由于设立藩镇，唐王朝设立藩镇是为对地方的控制，维持庞大国家机器的运转。唐廷先后设置了大小藩镇 89 个，割据叛乱的只有 11 个，可见藩镇大多听从唐廷指挥，执行命令，对保障唐王朝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尽管有些藩镇割据，唐王朝从“安史之乱”，即 1755 年（天宝十四年）算起，还延传了 150 年。“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问题不在于设立藩镇，而是由于唐玄宗疑忌功臣，害怕功臣功大倾主，取而代之；对胡将则偏听偏信，认为他可为保边疆，而不可能统治汉族。他对安禄山宠信有加，正是因此。

据《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安禄山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得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但其人乖巧而狡猾，为取得玄宗信任，凡朝廷派来使者都给厚赂，乞为好言；奸相李林甫知玄宗喜爱安禄山，便顺其意，加以赞美，玄宗对他更坚信不疑。在玄宗面前，安禄山却装作憨厚样子，扮呆卖傻，他知道玄宗十分宠爱杨贵妃，便请为她的干儿子，入奏时皆先拜杨贵妃，玄宗怪而问之，他说：“臣是蕃人，蕃人先母后父。”玄宗听了，高兴得很，从此恩宠无比。安禄山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大量储存兵器、粮食和战马及牛羊等备战物资，表面上是说为防御边寇，实是阴谋叛乱。人言安禄山将反，因玄宗心腹宦官等受其厚赂，都言其忠，故玄宗深信不疑。迄安禄山率诸蕃马步兵十五万叛乱，玄宗悔之已晚了。

玄宗在后期妒贤害功，培养死党，宦官则信高力士等，朝官则听从奸相李林甫、杨国忠。边将则恩宠安禄山，以为有了这些心腹将相，便可保住唐朝江山，结果适得其反。在安禄山叛变以后，他还是只信任宦官和杨国忠之流，对他拼命沙场讨伐叛军的将帅则诸多猜忌。他派大将封常青、高仙芝率军迎战，因故尚锐，唐军皆新募之兵，一战便溃，封、高两将乃决计坚守潼关。这措施是正确的。他因听监军边令诚（宦官）的谗言，竟冤杀这两名大将。之后，令名将哥舒翰代领兵迎战，哥舒翰奏称叛军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名将郭子仪、李光弼也奏称拟直捣敌巢范阳，潼关大军必须坚守，以保住西京。如果玄宗采纳，端敌人老巢后，敌军必溃乱，潼关始出击，胜利可在望。但唐玄宗听信杨国忠说哥舒翰按兵不动是别有企图，便屡次派宦官催其出战。哥舒翰预料出战必败，拍胸痛哭，因不敢违旨，只好引兵出击，结果全军覆灭。叛军占潼关，西京无险可守，玄宗只能是仓皇出逃，奔蜀避难。后经郭子仪、李光弼等将帅和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才被扑灭。但唐玄宗对扑灭“安史之乱”的有功之臣仍猜疑如故，如对挽救唐王朝的元勋郭子仪，表面上恩宠无比，加官封爵，却削弱其兵权，让其赋闲无事，由宦官来控制军权，这些人指挥军队，其后果可知。

由于唐玄宗后期犯一系列错误，唐朝力量已非昔比，对依然保持很大实力的投降的安史余部，已无力将之平定，只好承认他们割据的势力范围，就地封为节度使。其中成德、卢龙、魏博三个藩镇，即史称“河北三镇”，势力最为强大，与唐廷长期分庭抗礼，在平乱中涌现出一批唐朝战将，也效法安史降将，各自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于是，形成了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头领死后，或则子继父职，或则由部众另行拥立，虽也申报朝廷，中央想干预也无力，只能予以承认。藩镇之间虽为利害冲突经常互相讨伐，但朝廷如果干预则连兵相抗，借以互保。唐宪宗时，讨伐一些藩镇虽取得一定胜利，

并迫使部分藩镇归顺，但不久又死灰复燃，照旧拥兵自重，分裂局面一直延到唐亡。唐代藩镇割据，其实质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赋税成倍增加，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祸害。

宦官专权跋扈

唐代后期宦官之祸，比之东汉有过之无不及，这在史学界认识是一致的，但对于宦官与皇帝的关系看法仍不一样。有的认为唐代宦官自活跃于政治舞台之后，权力倾主，任意废立皇帝，家奴变成了主人。有的就持相反意见，认为唐代宦官与皇帝同属一个利益相关的“家庭”，二者之间是一种主仆关系，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两种意见都有所据，也都有其偏颇之处。唐代宦官与皇帝关系是复杂的，既是主仆关系，也有反奴为主的关系；利益既一致也不一样。这些都反映在不同时期上：玄宗时宦官尚忠心耿耿；肃、代宗时，宦官权力虽扩大，皇帝大权仍不旁落，对跋扈宦官还能予以惩处，这时，宦官还没有从家奴变成了主人。之后，除了德宗是继位外，其他十世的皇帝无不为宦官所废立，其中宪宗、敬宗被宦官所杀，昭宗被宦官幽禁，文宗在“甘露之变”后被宦官软禁。文宗曾对人无限悲愤地说：“受制于家奴，尚不如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可见宦官权力多大，以及皇帝无可亲何的处境。以上事实也说明，唐朝后期宦官地位已发生了变化，其权已可震主、倾主以至杀主了。

总的说，宦官与皇帝关系有如影和形，无形则无影，宦官是依靠皇帝才能存在的。唐代后期宦官虽有废立皇帝之权，但不可能“取而代之”，只能是废一帝立一帝，所立的皇帝也必须是李家皇族子孙，不然他们就无所依存了。但宦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在废立皇帝问题上，宦官各从自己本身利益出发，往往分成不同的派别，这一派要拥立那个皇帝，那一派要拥立另一人为皇帝，于是双方斗争白热化，彼此矛盾不可调和，只能是你死我活。这就不能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了。如在宪宗时，围绕皇帝继承，宦官分成两派，宦官吐突承璀等主张废太子宥，以沔王恽为继承人；宦官王守澄等则力保太子宥，二派斗争十分激烈。宪宗后来倾向沔王恽，于是太子宥派便先发制人，弑杀宪宗，抢夺皇位，诛灭吐突承璀等，沔王恽亦于同日被杀。为夺皇位残杀父兄，足见斗争之无情和惨烈。宪宗是唐代后期有为之主，曾使唐朝一度中兴，他被杀时年仅四十三岁，若假之以年，可能有大作为；而杀父抢位的穆宗，为人昏懦，荒于政事，终日游宴，甘受宦官摆布，曾一度中兴的唐朝又趋向衰落。

唐代后期宦官为何能有废立皇帝大权？宦官具有如此大权，是有一个过程的：玄宗时，开始让宦官参预政务，任方镇监军；肃、代宗时，宦官主管禁军；到德、宪宗时，确立了监军制（各方镇设临军机构，可干预地方军政事务）、神策军中尉制（掌管禁军及中央精锐部队）和枢密使制（掌机密，参预国家大事）。这样，宦官参预政治、军事便逐步制度化了。由于监军制的确立，担任监军的宦官，俨然是方镇节度的上司；由于神策军中尉制的确立，担任神策军中尉的宦官掌握了中央精锐部队的帅权；由于枢密使制的确立，担任枢密使的宦官，得以执掌机密，议决国家大事。皇帝还利用宦官来钳制大臣和监察皇族子孙以及刺探军情。此外，还派宦官处理外交、经济以

及采购等事。宦官干预国事已像水银泻地般，渗透了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显然，宦官之所以有权废立皇帝，在于他们控制了军国大权，尤其关键的是掌握了禁军和神策军。这些部队是当时唐朝中央最精锐的部队，骑兵是其主力。唐朝十分重视骑兵，皇帝的卫队都用骑兵，且日益加强，太宗时仅：“百骑”，至武则天时“改百骑为千骑”，中宗时又“改千骑为万骑”，而参加这些骑兵部队的都是精选善于骑射的健儿。神策军也以骑兵为主力。在当时来说，骑兵是各种兵种中最精猛的作战部队。它速度快，冲击力强，李世民在与群雄角逐中，每战多胜，创建唐朝，主要就靠发挥骑兵这种独特的作战力量。宦官不只掌握禁军、神策军的骑兵，也掌握了马政，即皇家和国家的主要养马牧场，这就可以从中选精良的马匹以供骑兵使用，保持骑兵的战斗力。由于宦官掌握这些皇牌军，谁敢对抗，迅即调动精锐的骑兵镇压。《新唐书》作者评论“甘露之变”时说：“李德裕尝说过，天下冲击力最强的是北军”，李训等人却以“政府的弱卒以抗击宦官的精兵，他们的死是必然的。”正因宦官掌握精锐的骑兵部队，大臣甚至皇帝都要俯首听命，如文宗、宣宗都曾先后向宦官托孤，宦官置之不理，最后立谁为皇帝还是由宦官来决定。而朝廷大臣对此只能唯唯喏喏，不敢哼一声，不管宦官立哪一个为皇帝，他们都北面事之。

军权是权中之权，谁掌握军权，就能掌握政权，以至掌握一切。唐朝南司受制于北司，首相听命于宦官，皇帝的废立唯宦官之命是从，是因宦官手中有军权。枪杆子里出政权，古今如此。

宦官是“刑余”的小人，他们不学无术，眼光短浅，唯利是图，通过这些人来处理国家大事，必然是搞得一团糟，唐后期衰亡并非意料外之事。宦官掌权是成事无望、败事有余；在政治上，他们结党营私，陷害异己，不顾国家利益，只顾小集团利益。如“永新革新”，触及宦官利益，俱文珍等宦官便发动政变，逼顺宗退位，王叔文，王伾和柳宗元等八人遭到贬斥，或因致死，或流放边疆；“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大杀朝官，朝廷几乎一空。经济上，他们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到处敲榨，掠夺民财。军事上，让宦官监军，因他们毫无军事经验，瞎指挥的结果是，唐军屡打败仗。而将官如不听其瞎指挥或不纳贿，便编造谎言上奏，陷害忠良，许多将官因之冤死，使唐军事日益衰弱。

信任心腹宦官，疑忌贤臣良将，导致大权旁落，受制于家权，以至国事日非，最后国破家亡，这是唐统治者的自作自受，自食其恶果！

内争参差交错

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错，争斗不息。皇帝与宦官、宰相与宦官、大臣之间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连结一起，南北司争权，都连结藩帅为助，斗争极其错综复杂，发展到势不两立。

由于宦官专权跋扈，一些不甘受制于家奴的皇帝便通过宰相与之斗争。李诵即顺宗，为太子时即与王伾、王叔文等策划改革政治，继位后尽管患风疾，口不能言，仍以病弱之躯力挽狂澜，任用王叔文执政，志除宦官，筹划从宦官手中夺回兵权。在他当位六个月，宦官专政局面曾一度肃清。后宦官俱文珍等勾结大官僚及藩镇势力进行反扑，由于彼此力量悬殊，宦官又控制朝政。李昂即文宗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锐意改革，并谋杀宦官。李

昂谋杀宦官主要是依靠翰林学士李训、郑注，他们利用宦官仇士良与宦官王守澄之间的矛盾，任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毒死王守澄，诛杀巨阉韦元素、陈弘志等。接着使人诈报左金吾院内石榴树上降甘露，文宗命宦官仇士良等前往察看，恰巧风吹掀起大幕，伏兵暴露，仇士良等慌忙劫持文宗回宫，调来神策军反扑，李训等被杀，郑注也被诱杀。李训的同伙河东节度使王播和宰相舒元舆、王涯相继戮死，南衙朝官被杀达千人。史称“甘露之变”。此后，宦官势益大，上助天子，下压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但是，南衙与北司之争并没有停止，昭宗时又趋激化，宰相崔胤借助藩镇之力与宦官反复进行殊死的拼搏。据《旧唐书·崔胤传》记载：900年，崔胤被罢官，他致书藩帅朱全忠求援，借朱全忠之助，杀专权宦官景务修、宋道弼。同年十一月，宦官对季述、王仲先、王彦范幽禁昭宗，扶太子镇即位，罢掉崔胤相位，崔胤又勾结朱全忠兵起兵威胁京师，并使人策动神策军大将孙德绍诛掉刘季述等“四贵”。901年10月，宦官韩全海、张彦宏逼昭宗罢掉崔胤相位，劫昭宗幸凤翔，崔胤又勾引朱全忠围凤翔，逼杀韩全海、张彦弘，崔胤又得复相位。崔胤正是借藩帅朱全忠之力三次战胜宦官。903年，昭宗返京，成为朱全忠的傀儡。崔胤与朱全忠合谋，杀尽宦官，彻底消灭了操纵唐中央政权过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宦官势力，取得南衙对北司的最后胜利。但崔胤诛杀宦官并非为唐廷，而是从自己利益出发，他早就为朱全忠谋图王之策，朱全忠控制唐中央政权后不久，便杀死昭宗和哀帝，创建五代梁王朝，唐朝亡了。崔胤也不得善终，朱全忠疑其不忠便将之杀了。

牛、李党争是唐朝内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有其特点。唐朝大开科取士，寒士得以通过进士及第做朝官，于是，庶族士人突破了士族士人垄断朝政的局面。808年，宪宗时，牛僧孺、李宗闵同年登进士第，又同年登制科。他俩在制科考试时，率直地批评时政失误，猛烈抨击时相李吉甫。穆宗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并抨击座主、门生、同年间往往朋比呼应，以及进士科试只重文采、华而不实等不良风气，于是，彼此结成私怨。在政见上，牛僧孺等较保守，对藩镇主张妥协，承认割据局面；对边族纠纷则委曲求全，恐生事端。李德裕等则较激进，力主抑制藩镇，收复吐蕃侵占的维州。他和另一故相之子郑覃主张，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郑覃还几次奏罢进士科。牛僧孺等则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由于私怨和政见不同，逐渐形成牛李两党，以后发展到意气相攻：你支持的我反对，你反对的我支持；彼此势不两立，互相排挤，不能同朝相处：你上台我下台，你入相我外任，两党交替执政，轮流外任。唐文宗为此慨叹：“去河北贼（指河北三藩镇）易，去此朋党实难。”过去史学家把牛、李党争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列为唐朝三大祸患，是否能将之并列，值得商榷。考查《旧唐书》的《牛僧孺传》和《李德裕传》以及与之结党的主要人物传记，事实说明：牛、李两党并非奸党，牛僧孺任御史中丞时，为民解纷伸冤，执法如山，连皇帝讲情也不答应。宿州刺史李直臣贪污枉法合当处死，直臣向宦官行贿为之说情，僧孺坚决顶住。穆宗亲自向他求情说：“直臣虽有罪，但此人有才，可委边任，朕欲对他宽大处理。”僧孺说：“帝王立法，是为了束缚奸雄，针对才多的，禄山、朱泚此正因才过人，才扰乱天下，何况直臣只是小才，那能枉法？”由于僧孺理直气壮，穆宗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他的。他为官奉公廉洁，拒不纳贿。不论在内任外任，都尽力所职。牛党的主要人物李宗闵、杨嗣复虽朋党积习比较深，查其传记，未见有大过。他们虽靠宦官支持，但未见与

宦官勾结做坏事。李德裕少时勤奋读书，很有文采，气节超群：他为人敢作敢为。敢言敢谏。敬宗时，任浙西观察使，因敬宗狎比群小，数出游幸，上丹宸六箴进行讽谏。武宗时任相，力主削弱藩镇，曾佐武宗讨平擅自袭任泽潞节度使的刘稹。当国六年，藩镇之乱渐清。他对巩固中央政权是有功的。任地方官时，政绩斐然。他在蜀时，西拒吐蕃，南平蛮、蜃，数年之内，夜犬不惊，人民安居乐业。李党主要人物之一郑覃为人敢言敢谏，疾恶如仇，生活朴素，家无媵妾，其忠直和朴素的作风，为时人敬仰。可见，不论李德裕也好，牛僧孺也好，这牛、李两党的头头，对唐朝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以李德裕来说，他是功大于过的，是唐朝的忠臣。两党其他主要人物也并非为非作恶之徒。两派之争，有的是是非之争，有的是意气之争，但都未对唐朝造成大害。当然，由于彼此互相排挤、攻击，对唐朝政治无疑投下一层阴影，对唐廷力量是有所削弱的。但其危害决不能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造成的祸患相提并论。

史学家把唐之亡只归咎于藩镇、宦官和牛、李党人，这未能揭开其本质，其实，促使唐朝从其颠峰跌落下来，始作俑者是唐玄宗。其后继的皇帝也大多跟他一样，忌贤害功，把权力交给心腹宦官，结果是尾大不掉，奴才变成了主人，皇帝成了他们的傀儡，让这些无知无能的阉人掌握中央大权，天下安得不乱，唐朝哪能不亡？！

高峰和低谷是连在一起的，这也是说低谷是高峰的隔邻，如果你在高峰上迷失方向，跨错了一步便会跌下深谷里。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不断重复出现：创造伟大业绩的人，由于他胜利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不再是谦虚谨慎，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而是骄傲自满，偏听偏信，独行其是，结果是：错误连串，乱子四起，于是便把其创造的伟大业绩推向毁灭之途，唐玄宗便是这样的人。开头我们已经指出：他是把唐王朝推上富强的顶峰的人，也是把盛庸推向下坡路的人。可以说是：成也玄宗，败也玄宗！

七、邪盛正衰两宋沦亡

北宋理学家程颐曾夸宗代“百年无内乱”，元人编的《宋史·后妃传序》也说：“宋朝三百余年，外无汉朝外戚王氏之患，内无唐代武周、韦后之祸，这是值得称道的。”说内乱没有威胁到宋王朝的生存则可，说没有内乱那就有点夸大其词了。为争权夺利而内讧，在封建社会无朝无之，宋朝当然不能例外。

斧声烛影千古疑案

北宋神宗年间的吴僧文莹著的《续湘山野录》有这样的记载：公元 976 年 10 月 20 日夜晚，天刚下了大雪，太祖邀其弟光义酌酒对饮，令宦官宫妾都退出。这时，远远站在外面的宦官宫妾遥见烛影下，仿佛见光义离座避席，既而太祖引斧斲雪，顾光义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是夕，光义留宿禁内。将五鼓，太祖已死了。这便是史学家所称的“斧声烛影”之谜。事过千年，仍为疑案。论者多疑太祖之死是太宗所谋杀，否定的也不乏其人，《宋史》就力持此说，但很难解释发生以下种种事件：

金匱誓书何以太祖死后六年才揭开？《宋史·昭宪杜太后传》说：鉴于柴氏使幼子继位而失天下的教训，杜太后病重时要太祖“百岁”后传位于二弟光义，并诏赵普于榻前写誓书，藏之金匱。这誓书是否真有其事，值得研究。如有誓书，太祖“暴死”时应该拿出，何以在太祖死后六年才由赵普揭开？之所以如此，很有可能是太宗继位引起朝臣议论，或谋杀案有所泄露，为了平息众疑，六年后，才由赵普伪造金匱誓书，反正据说知此事的只有三人，杜太后、宋太祖都死了，只有赵普一人，编造了也无人可证其非。

太祖之子德昭何以自刎？对此，《宋史·燕懿王德昭传》说得很清楚：979 年，德昭跟太宗出征幽州。有一天晚上军中突然发生骚乱，太宗失踪了，有人谋立德昭继位，后来太宗知道此事很不高兴，太宗因这次远征失败，归后不实行赏赐将士的诺言，德昭便乘间入言，太宗大怒说：“待你当了皇帝，赏赐还不迟！”德昭回家便自杀了。按照常规继皇位应是德昭而不是光义、太宗失踪德昭继位是符合人心之事，故“有人谋立德昭”。德昭当然也知道此事，而德昭提议“赏赐”事，太宗不听便算了，何以咆哮如雷，脱口说出“待你当了皇帝”之语，可见太宗害怕德昭取而代之，德昭听了也知道事不妙，与其被杀不如自杀。如果德昭不死，太宗是睡不安的。

廷美又何以被逼而死？《宋史·魏悼王廷美传》说，太宗继位时，亲弟只有廷美，后封秦王。之后，屡有人密告廷美骄傲放纵，阴谋不轨，太宗便将他一贬再贬，太宗的心腹大臣赵普还不放过他，使人密告，“廷美没有悔过，经常有怨言，要把他贬到远地，以防发生变故。”太宗便下诏书再将廷美贬为涪陵县公，流放于房州，廷美至房州，因忧悸成疾而卒。其实，所罗列廷美的“罪行”，都是“言辞不逊”，或一些生活细节，说是谋反，难以落实。该传又说：有人说昭宪杜太后和太祖的本意是：“太宗之后传位于廷美，廷美之后复传位于太祖子德昭。”据说这就是“兄传弟”的原则。这暗示了廷美之所以屡有人密告和其致死的原因，如果宋太宗能坚持“兄传弟”的原则，廷美继位已定，何必搞“阴谋”？而告密的人哪敢一告再告，廷美又何以一贬再贬，最后流放远地致死？廷美受逼害时，“兄传弟”之誓书早

已传开，这本可使光义继位名正言顺，但事物总有它的反面，它又成为太宗的隐患，如不除掉德昭、廷美，他的宝位难坐得稳，也难为其子继位得到保证。因之，德昭、廷美之死是势所必然的了。

上述说明，太宗为篡位保位而采取的手段虽不像“玄武门之变”那样公开、惨烈，但也是够阴险恶毒的。在此之后，宋代虽不再发生相类事件，但在皇室内部父子、母子、兄弟、叔侄之间的互相猜忌极其厉害，明争暗斗也是很激烈的。

贼党横行朝野遭殃

宋朝创建不久，内忧外患交迫，迄神宗时更甚，科举出身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都想有所革新，以改变“积弱积贫”的局面。但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意见却不一样，于是分成两党，即史称新党、旧党。新党以王安石为首，旧党以司马光为代表，两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两党政见的动机都是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迄宋徽宗时蔡京执政，他虽标榜继王安石之志实行变法，但其所称的变法已经变质，只是借变法之名以刮民脂民膏，满足以宋徽宗为首的一群民贼不断膨胀的私欲。凡是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不管是新党、旧党都进行排挤打击，把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轼、苏辙等 120 人定为元祐奸党，徽宗还亲笔书写其名，刻在石碑上，称为党人碑，置于文德殿门，在碑上有名的，死者削其原职，还活着的则流放外地。后来又将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共 309 人，也刻石朝堂。变法派黄履、吕嘉等十余人，也都被指为“党人”，斥他们“为臣不忠”。“党人”的子孙也被禁锢，不准他们在京或附近做官。

徽宗在位期间，君子遭殃，小人得志。作恶最多的，除蔡京外，还有王猷、朱勔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人们称之为“六贼”。蔡京是个投机取巧的两面派，他曾参加变法派，司马光上台后复差役法，时任开封知府的蔡京按期完成，得到司马光的器重。不久，有人告他“挟邪坏法”，被下放到地方去了。蔡京在杭州时，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地区（指苏、常、湖三州）为徽宗搜集“书画奇巧”，蔡京便抓住这个机会“不舍昼夜”地跟他游览，并把自己做的屏障、扇带给童贯带给徽宗，并上论奏，这引起徽宗的注意。蔡京又结纳徽宗所宠信的道人徐知常以及宫妾、宦官等，这些人交相称赞蔡京，蔡京于是逐步爬上相位。蔡京在仕途上四起四落，每一次宋徽宗还是要他回来，这是因为蔡京善于搜刮钱财，满足他的无穷享受。由于蔡京善于搜刮，加上历朝的积蓄，府库中的钱粮堆满，他便向徽宗提出“丰、享、豫、大”之说。他们视钱财如粪土，尽情挥霍，奢侈成风。因攀附蔡京得当官的富家子弟朱勔，奉蔡京命采集江浙的珍异物给皇帝欣赏，初只献三棵黄杨，便获得徽宗赏识，1105 年主管苏杭应奉局。他所贡之物，都掠夺自民间，不给分毫。只要老百姓家有一石一木让他看中，就带兵进入其家，一时拿不出，就用黄封表识，令其护看，如有差错，就加上对皇帝“大不恭”罪。大的物件取不出，就拆墙拆屋。发现深山怪石，江湖异物，即使处于悬崖峭壁或不测深渊，也严格限期逼迫民工去开采。尝得一太湖石，高四丈，以巨船运载，使用役夫达数千人，所经州县，拆水门，炸桥梁，凿城垣而过。掠夺的花石树木，用大批船只和人力运送到首都开封，以装饰皇家园林——琼林苑和万寿山艮岳，供皇帝和皇族以及官僚们观赏，这种运输称做“花石

纲”，不知有多少人家因此而卖儿卖女，朱勔搜刮于东南，宦官李彦则掠劫于西北。李彦性凶狠，他暗中与朝相王辅内外串连作恶，恣意掠夺，凡民间的美田，指使人投文说是荒田，加以没收，谁敢申诉便施加重刑，死者千万。所掠财物，都由民间运输，累月经年，没有休止。被掠夺田地的农民无地可耕，供使役的农民不能耕田，无以为生，因而或饿死，或自缢。这六贼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贼党，彼此之间互相提牵互相包庇，宦官童贯推荐蔡京为相，蔡京便极力推荐童贯将兵。童贯大权在手，掠夺财产，镇压人民。宦官李彦大肆搜刮民田，因有宦官梁师成做靠山，大臣反对也无奈其何。梁师成甚得徽宗宠信，王辅以父事之，蔡京父子也极力谄附，都人称蔡京是“公相”，称梁师成为“隐相”，“公相”还要奉承“隐相”，可见“隐相”权力之大。而“隐相”的权力还不是徽宗给的，徽宗实是“六贼”的总后台。“六贼”为徽宗大力搜刮的同时，趁机贪污勒索，如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万亩。朱勔被抄家时，发现仅田产就有三十万亩。王辅执政时，置应奉局，并自任主管，四方进奉的珍奇异物，都索取于民，而王辅献给皇帝的不及十分之一，其余都入其家。在“六贼”倒行逆施、大肆压榨下，人民怨恨已极，喊出了“打倒筒（童贯）拔掉菜（蔡京），便是人民好世界”的口号，各地纷纷爆发起义，金人趁机入侵，北宋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君王屈膝英雄遗恨

徽、钦二帝被俘，高宗继位。在他统治期间，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主和派以最恶毒而可耻的手段杀了主战派的代表岳飞，屈膝向金国称臣，从此，南宋一蹶不振，注定了它必然趋向衰亡。

“贼党”的残酷掠夺，农民活不下去，纷纷起义，但当女真人南下，掳去了二帝，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国耻家恨使人民喷发了抗金的怒火。宗泽老英雄团结广大人民与金兵作殊死战，屡创金兵。以高宗为首的主和派议割地求和，任东京留守兼开封知府的宗泽上书坚决反对。当时大河南北、大行东西约有民兵和起义军一百多万，他们对金兵极其痛恨，宗泽知心可用，便着手将之组成浩浩荡荡的威震敌胆的抗金队伍。《宋史·宗泽传》记载，河东“巨寇”王善拥众七十万，车万乘，欲据京城。宗泽单骑到他营中，流着泪对他说：“朝廷正在危难的时候，如果有一两个像你这样的人，还怕敌人不灭吗？今日是你立功的时候了，千万不可失掉啊！”宗泽这番说使王善感动得热泪盈眶地表示：“敢不效力。”遂率众归附。号称“没角牛”的杨进，有兵三十万，还有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宗泽派人晓以大义，全招纳之。于是，宗泽军日益强大，金人屡次来犯东京，都被打败。而高宗畏金如虎，继续南逃，宗泽上书请其返京，说：“臣为陛下保护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今春已有三个月了。陛下不早日回京城，天下之民依戴谁呢？”宗泽前后共计上书二十余次促高宗还京，都没有反应，因而发愤成疾，疽发于背。宗泽精神奋发地对众将说：“我因二帝被俘，积愤致病，你们能歼灭敌人，那么我虽死也无恨了。”众将流泪说，“敢不尽力！”众将出，泽叹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次日，狂风骤雨，天昏地黑，七十岁的抗金英雄在他弥留之际，没有一语乃家，还高喊：“渡河！渡河！渡河！”

宗泽的抗金精神激励着其后继者，继之崛起的是岳家军。岳飞，相州汤

阴人，出身农家，有志气，沉默寡言，家贫力学，尤喜《孙子兵法》，学“技击”、骑射，能挽三百斤硕弓左右射。十九岁时，金人陷其家乡，乃参军。因屡立战功，被招讨使张所赏识，以为统领。后隶属宗泽，战开德、曹州有功，泽大奇之，说：“你的勇敢和才智，古良将不能过，但好野战，不是万全之策。”飞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宗泽听了，表示赞同，转战南北，屡败金兵，爱国之士多归之，组成了一支威震敌胆的岳家军。1140年6月，岳飞出兵北伐，在颖府与金兵统帅兀术展开了大决战。兀术有精锐骑兵，身穿重铠，三骑用索联在一起，称“拐子马”，每出战，宋军不能当。这次决战，兀术投入了一万五千骑，岳飞命步卒带麻札刀参战，坚卧地上，不仰视，“拐子马”一到，只砍马脚。拐子马相连，一马仆地，二马不能行，岳家军奋击，大败金兵。兀术大哭说：“自从海上起兵以来，皆用拐子马取胜，今都完蛋了！”兀术增加金兵反扑，都被打败。岳家军进驻朱仙镇，沦陷区军民纷纷响应，举起“岳”字旗；沿途父老百姓送粮，顶盆焚香迎候。自金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术欲调兵抵抗，无兵听调，叹说：“自我兴兵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惨败。”金帅乌陵思谋素桀黠，亦不能控其所部，只好告之，“不要轻动，岳家军一到即降。”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庄、将官李凯、崔虎、华旺华率领所部来投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所属千户高勇，皆密受飞旗榜，自北方来投降。金将军补常欲以五万内附。岳飞大喜，对部下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讵料高宗心里有鬼，害怕岳家军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帝，他的帝位难保，便与金人议和，要北伐军班师。岳飞上书反对，说：“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轻輜重，疾走渡河，豪杰风向，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坚决主和，一日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促飞撤军。飞悲愤流泪，东向再拜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高宗压力下只好班师。兀术知如飞健在，金人难得志，便致书秦桧说：如议和心先杀飞，而秦桧也知如飞不死，和议难成，将祸及己，便遵兀术旨意力谋杀飞。在高宗的全力支持下，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岳飞。时年才三十九岁的一个旷世文武全才的抗金英雄便这样被冤杀了！

岳飞被冤杀了，人心军心冷了散了。主战的抗金名将不是被贬便被撤职，名垂史册的开封保卫战的主帅李纲和与岳飞齐名、威震黄天荡的韩世忠等人，英雄无用武之地，李纲晚年抑郁而死，韩世忠为了避祸只好隐居于西子湖畔，头戴角巾，经常怀酒瓶，骑着驴子游山玩水。从此，南宋再不能组成一支象样的抗敌队伍。

绍兴议和成了，宋高宗向金国割地赔款称臣，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他和秦桧等无耻之徒，“直把杭州做汴州”，沉醉西湖，歌舞不休，南宋前途可想而知。高宗、秦桧等这些历史罪人的名字也就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八、明多昏君良臣遭殃

有明一代，共有十六个皇帝，除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外，其余多是昏君或庸主。其中尤以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熹宗朱由校、神宗朱翊钧为最，思宗朱由检虽自称“非亡国之君”，他想有所作为而无所作为，也属于庸主之例。明朝皇帝权力最大，军政大权直接操纵在皇帝手里，而当它操在昏庸之主手里时，必然乱政，祸国害民。明中期以后，即从英宗开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宦官干政，二是良臣遭殃，这一直至明亡。

极端专制制度是宦官乱政之源

朱元璋登上皇帝位后，实行空前绝对的专制制度，军政大事，生杀予夺，全由皇帝裁决，大臣不得参预。大臣只能提提意见，提得不对的，就遭受廷杖或杀头，在那时大臣贱如奴隶。为了皇权至尊，巩固皇帝独裁权，以传之万世，他立了许多祖训，不准后代皇帝干这干那，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宦官干政”，并把这六字写在牌上，竖立在内宫，他以为有了这块皇帝御制牌，便可以避免发生汉、唐的宦官之祸了。但事与愿违，他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实行的极端专制制度恰恰是培育宦官干政的土壤。极端专制的特性之一是不信任大臣，怕出现权臣，危及皇权，正因这种特性发作，朱元璋才下令取消自秦汉以来设立的丞相官制，中央各部门的奏事都由自己来独裁，他担心自己死后，后代皇子皇孙恢复此官制，又立了一个祖训：以后子孙不准设丞相，臣下有奏请设丞相的处以极刑。但皇帝日理万机，总得有辅佐的人，于是设几个大学士，称阁臣，但只当顾问，承旨办事，不得参预决定，更不准干预中央各机关的事。这么一来，皇帝的事就空前繁忙，朱元璋就平均每日要亲自批阅一百五十件奏章，裁决四百种案件。对如此繁忙的政务，朱元璋、朱棣等还可拼命应付，轮到他那些生长在深宫之中和在女人、宦官之手长大的花花大少皇帝们，不仅不能也懒得应付了。至于那些皇帝娃娃就更谈不上批阅了，只好假托阁臣之手代拟出意见，时称“票旨”，再由这些花花大少皇帝或娃娃皇帝来照抄批写。而这些阁臣又不能将其意见直接交给皇帝，只能由宦官转呈，阁臣恐自己写不清楚，还要请宦官作补充说明；皇帝的决定，有时用批示，有时用口头，也由宦官传递，这样宦官就可插手军政事务，权力日益膨胀以至由宦官代拟，甚至不用转奏皇帝，由自己矫旨办事。宦官的权力不仅可处理全国军政事务，而且无所不监，监军、监矿、监税，掌握锦衣卫和东厂、西厂、内厂等各种特务机关，监视全国宦僚和军民了。这是因皇帝最信任的是宦官，特别是皇帝的贴身宦官，故放手委托他们管理一切，监视一切，他们实际上是皇帝的化身，行使着皇帝的权力。

对于朱元璋竖立那块“不准宦官干政”的御制牌来说，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搬掉那块牌的不是别人，而是英宗朱祁镇最崇拜、最信任的宦官王振，宦官王振搬掉那块牌标志着宦官干政开始。王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明史·王振传》记载：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少年时当教官，后自愿净身入宫在内书堂教小太监读书。朱祁镇在东宫时，他侍左右。朱祁镇即帝位，称英宗，因“振狡黠得帝欢”，任他为司礼太监。这样，中央各机关奏事都要经过他上呈下达。那时英宗才九岁，因喜欢他敬佩他，事事听他的，称他

为“王先生”。他教导英宗用严刑峻法统御群臣，说这样做可防止群臣欺蔽，于是大臣不断被捕入狱，王振的权力越来越大，公侯贵戚称他“翁父”，不少大臣见他都要跪拜，不跪拜他或认为讥讽和反对他的，不是借故削职就加罪杀害。因之畏祸而向他阿附送贿的日多。他与投靠他的大臣结成私党，操纵朝政，俨然太上皇。他与其私党肆行无忌，贪污勒索，贿赂公行。自王振专政以来，明朝政治腐化，边防松弛，因而瓦剌得以入侵，边报传至京师，王振不作充分准备，即挟英宗领兵五十万北上亲征。大军抵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军屡败，惧不敢战，又立即折回，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到，明军溃败，英宗被俘，王振为乱兵所杀。史称“土木之变”，英宗弟朱祁钰继位，称景泰帝，任用了于谦为帅，击败来犯京师的瓦剌军，瓦剌统帅也先被逼放回英宗。英宗乘景泰帝病危，武清侯石亨等率兵入南宫，拥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正派官员相继被害。英宗死，儿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政权又落入另一宦官汪直的手里。《明史·汪直传》记载：英宗为刺探外事，除了锦衣卫和东厂外，又设西厂，任命汪直主持，从此大的冤狱不断出现，即使是民间斗骂鸡狗琐事，也用重刑，使官民惊恐不安。汪直权势日炽，他每次出行，随从甚众，公卿皆避道走，兵部尚书项忠不避，便进行污辱，后借故削为平民。凡大臣不屈者，汪直皆加以陷害，被削职的有尚书董方、薛远，大学士商辂、左都御史李宾等数十人。朝臣无耻者多附和汪直，乃至跪拜，回而得据要津。汪直奉命出巡，御史、主事等官跪拜马前，各地边防部御史也谒见于路，守令不如意即加以鞭鞑。为立边功自固，屡出任监军，诈称寇边，讨伐邀功，致引起边患。后来他的罪行虽暴露，但宪宗对官民则严加镇压，对汪直则手下留情，只降官发往南京。

至武宗朱厚照在位时，十分宠信宦官，政治更腐败。当时得宠的宦官有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人号“八虎”，而刘瑾尤其狡狠。《明史·刘瑾传》记载：刘瑾很仰慕王振，便学他的样，向武宗日夜进鹰犬、歌舞、杂戏，并引导武宗出处微行。刘瑾还劝武宗令内臣镇守者各贡万金，还奏请置了三百余年皇庄，以压榨农民血汗，以满足武宗游乐，因而博得武宗的欢心，被任为司礼太监。并由其党乌永成掌东厂，各大用掌西厂，刘瑾则复立内厂，三厂作威作福，特务四出罗织人罪，严刑酷法，被捕下狱，少得存者，由于武宗怠于政事，奏章及内阁的“票拟”（由阁臣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称票拟）最后都由刘瑾批决，实际是行使皇帝权力。当是时；刘瑾权倾天下，凡入朝或出使官员皆送贿，只要送贿，有天大罪也可化无罪；而对反对或违己意的，陷害、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少人因此被害死或破家荡产。他把忠直的臣录入“奸党”，把奸臣称为“忠臣”。刘瑾乱政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仅刘瑾搜刮的有金一千二百余万两，银二亿五千余万两，仅银子一项相当于明朝六十年的国税收入。后刘瑾罪行败露，被凌迟处死。

到熹宗时，宠信宦官魏忠贤，其乱政达到高峰。《明史·魏忠贤传》记载：魏忠贤跟抚养朱由校的奶妈客氏相爱（即所谓“对食者也”），互相勾结。光宗死，十六岁的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因客氏在熹宗面前说好话，魏忠贤得任秉笔太监。魏忠贤引熹宗声色犬马，熹宗深信之，故他势日盛。熹宗即位初，东林党人掌握朝政，反东林党人见魏忠贤得势，便依附之以攻击东林党人，东林党称这新组成的党是“阉党”。由于熹宗厌政，忠贤

得操纵朝政，矫旨胡作非为，副都御史杨涟愤甚，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因客氏从旁帮助，熹宗竟下旨罢免杨涟。朝内外东林党的人纷纷上章揭露魏忠贤罪行。魏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魏忠贤罗织罪名，进行屠杀。先是将东林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逮捕入狱，拷打逼供，折磨而死。不久，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东林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纓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都被拷打惨死于狱中。在朝的其他东林党也都被贬逐。于是，内外大权一归魏忠贤，朝廷内外上是阉党，其党骨干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其党中善于吹牛拍马之徒，为魏忠贤歌功颂德，把魏忠贤捧得高到无以复加。有的论魏忠贤应配孔子，有的则请为魏忠贤建生祠，甚至大学士拟的“票旨”，却说“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熹宗并列。熹宗死，其弟朱由检即思宗继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剥削人民，十通关节。思宗遂下令将魏忠贤贬滴凤阳，接着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知，畏罪自杀。

宦官乱政，其靠山是皇帝。宦官没有皇帝无以存在，皇帝没有宦官就难以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明朝中期以后，宦官权如此之大，除了利用其监视群臣和军民外，还要利用宦官进行掠夺，如扩大皇庄、监矿、监税，以及为皇宫服务的经济活动，加上明代昏庸之主又如此之多，甚至批准奏事的大权也下放给宦官，于是，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就成为事实上的皇帝。这些宦官大多既无知识或知识不多，也无从政经验，他们办事往往靠一些贪佞之徒为之出主意，其本性又贪婪，其不乱政才怪呢！

良臣名将多被廷杖贬斥杀戮

有明一代，从朱元璋至其后代子孙，都视群臣如奴隶，动不动就要用廷杖，不知有多少人死于廷杖之下，杀戮的更无数。朱元璋仅兴起的胡惟庸和兰玉两案就杀了四万五千多人，至于被贬逐的算是幸运的了。明朝如此虐待群臣，不少良臣名将却甘心情愿，为之竭力尽智，且这个集权专制政府竟传世长达近三百年之久，这是什么原因呢？其中原因有种种，在这里非探讨主题，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其危亡的关键时刻，往往有良臣名将为其流砥柱，使之转危为安。可是，当明朝统治者感到自己安全的时候，或因猜忌其功大恐震主，或被进谗言，往往向这些良臣名将开刀，不只朱元璋统治时如此，其后代子孙也遵祖训照样办理。尽管统治者，廷杖的廷杖，杀的杀，每代都有良臣出现，或冒着杀头的危险，为之进忠言，或为其效命边疆战死沙场，这与朱元璋提倡程朱理学不无关系，这些忠臣们认为这样尽人臣之节，是最大的光荣。这也许是明朝能成为长寿王朝的原因之一吧。虽然忠臣们如此尽节，并没得到统治者的怜爱，还是我行我素，毫不手软，要想你死，用“莫须有”的罪名，便叫你脑袋搬家。英宗复辟后杀于谦便是典型的一例。《明史·于谦传》记载：于谦，钱塘人，1421年（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五年）中进士。宣宗时，巡抚各省时，因能雪冤囚，揭发害民之事，提出兴革事宜，深得宣宗信任。英宗继位后王振专权，挟英宗征瓦剌时于谦任兵部左侍郎，他进谏不听。英宗被俘，京师震惊，群臣束手无策。英宗的弟弟郕王监国，他命群臣讨论战守。有人说星象有变，当南迁才可保存。于谦厉声说：“说

南迁的，应斩！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国家就糟了，宋朝不是因南渡而衰亡吗！”郾王表示赞同，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筹划北京的防务。当时精锐的部队已被瓦剌消灭，留在京师的弱兵不及十万，上下惊惶，缺乏战胜敌人的信心。于谦乃请郾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运粮军，即赴京师，并经过于谦筹划部署战守事宜，人心才稍安。因当时英宗被俘国无主，皇太后乃立郾王，是为景帝。这时，瓦剌军已逼近京师，有人提议全军撤入城内坚壁据守以老敌兵，于谦不同意说：“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他分遣诸将，率师二十二万，列阵九门外，然后关闭诸城门，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不顾兵先退的，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的，后队斩前队。将士知必死，都拼死战斗。来犯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之敌都受到重创，瓦剌军知勤工军将陆续到，怕断归路便急忙撤退。瓦剌军派使求和归还英宗，景帝犹豫，于谦劝说：“你皇位已定，照理应当迎接。”乃派使迎英宗。英宗得归，于谦是有功的。但是，英宗趁景帝病重拥兵复辟，却诬于谦与大学士谋迎襄王子当皇帝，判以极刑。王文极力辩其冤，于谦笑说：“辩冤有什么用呢？”英宗终于杀于谦，一代良臣名将就这样被冤杀了。没有于谦率师打退瓦剌军，北京将被攻陷，明室当时有可能灭亡；于谦如不劝景帝迎英宗，英宗将老死漠北，而英宗为了表明其复辟有名，竟以根本没有“谋立襄王子事”诬陷于谦。统治者为了其需要，连他们的救命恩人也置之于死地，这是多么狠毒！

张居正是明代的杰出改革家，神宗初，他使腐败的明朝一度振兴，对明王朝是立下大功的。《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江陵人，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因他政绩显著，不断晋升，官至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当时神宗年幼，得太后支持，张居正乃得进行一系列改革。他考核吏治、整饬边防、改革经济，使腐败的明王朝出现了振兴景象。张居正能取得如此政绩，是因神宗年幼还不能亲政，这对于张居正本人来说是幸运的，他平安地一直到1582年病逝。张居正生前，神宗曾对他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而张居正死后，尸骨未寒，有人弹劾张居正蓄宝多过国库，这时已亲政的神宗思财心切，便派人查封其家，子女惊惶多躲避在空室中。及开门时已饿死了十多人，神宗就是这样照顾张居正的子孙！搜索结果，未发现什么巨宝，搜得其诸子及兄弟所藏也不及先朝大贪官严嵩的二十分之一。搜查者认为“十年宰相，所蓄私囊岂止此数！”便拷打张居正长子、礼部主事敬修，敬修不胜刑被迫诬服，胡乱说存宝三十万金于谁家后，便投环自杀。如果张居正不早死，他是免不了被杀的。1630年（崇祯三年），因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为张居正鸣不平，这一冤案才得平反。

此外，立功却诬为有罪被斩首的也不少。如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俺答盘踞河套，经常南下犯边，曾铣发兵收复河套时，恰好宫中失火、皇后去世，神宗认为是“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下令逮捕曾铣，处以死刑。兵部尚书张经，被任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军务，许以便宜行事。当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有二万多人占据拓林川沙洼，张经抽调各路兵马准备捣其巢穴一网打尽，明世宗却以“畏贼夫机，欲俟倭饱扬，剿余寇报功”的罪名，下令逮捕张经。是日，张经在石湾大捷，斩贼首一千九百余级，焚溺死的甚多，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逮捕张经到，张经向世宗申述进兵讨倭寇始末，说：“任总督半载，前后俘斩倭寇五千，乞原宥。”世宗竟说张经冒功，竟将之斩首，天下人都为他喊冤。

明代皇帝就是这样随意屠杀有功之臣，这是祖训，已习以为常了。令人惊异的是其杀的理由千奇百怪，朱元璋以星变杀开国元勋李善长，英宗因复辟无由而杀于谦，神宗因听说张居正蓄宝多而抄其家，世宗竟诬立大功的张经为冒功而将之斩首，归结到一点都是冤哉枉也！

昏君庸主当国其衰亡必然不可避免

朱元璋在位时，日夜操劳政务，寝不安席，后代子孙就不那么起劲了，越到后来越懒，干脆“卧而治之”，朝也不上了。如宪宗在位二十四年，孝宗在位十九年，武宗在位十七年，穆宗在位七年，神宗在位十九年，都不出见政府官员，一切都由宦官上呈下达，有的连对大学士的“票旨”看也不看，转述大臣的意见听也不听，概由宦官代理。宦官刘瑾向神宗奏事，神宗正在玩，摆手赶他出去说，“我用你们干什么，却用这些肮脏事来烦扰我！”以后刘瑾每次奏事都趁这位皇帝玩的时候，这样他就可代行使皇帝的权力了。自英宗以后，昏君辈出，朱明王朝每况愈下，政治日益腐败。

1627年，朱由检即位，是为思宗，年号崇祯。初，清除魏忠贤、客氏集团，不准宦官干政，使人感到腐败的政治似有转机，但思宗其人刚愎自用，喜怒无常，又无治国之术，办事朝令夕改，掌权后未见有何作为，却反怨群臣无能。他独裁又猜忌，总怀疑臣下，总觉得群臣办事不顺意，还是宦官百依百顺可靠，于是便大用宦官来监政监军，充分发挥东厂、锦衣卫的特务作用，进行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因此，宦官人数急增，他统治时不下十万人，创造了最高纪录，不知多少人死于特务的密告之下。他猜忌多疑，喜怒无常，对谁也不满意，朝中大臣更换频繁。他在位十七年，先后出任阁臣五十余人，吏部尚书十三人，兵部尚书十六人，刑部尚书十七人。他文过饰非，自己出的主意，臣下办好了，便夸自己英明；出了事，就诿过臣下，将之治罪。正是这样，总督巡抚被杀的多至二十人。他杀抗清名将袁崇焕便暴露了他的残酷和愚蠢。他曾因认为群臣无用而恨当代无岳飞，其实袁崇焕就是明代的岳飞。他奉命守山海关宁远时曾重创来犯后金军，后金统帅努尔哈赤受伤，不久病死。之后，皇太极来犯也大败而归。袁崇焕虽立大功，但被魏忠贤阉党所诬，只好告病乞休归田。思宗即位，任袁崇焕督师辽东。1629年，皇太极统大军伐明，因畏崇焕，绕道直向北京，崇焕急引军回护京师，受到思宗奖赏，因皇太极用离间计，诬崇焕与敌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思宗竟上当，于1630年冤杀袁崇焕，思宗一面杀戮大臣，一面任用宦官掌握一切重要部门，当有人反对时，他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由于思宗独裁独行，宦官胡作非为，政治日益腐败，加上天灾人祸，农民起义军日益强大，且边患时起，内忧外患交迫，朱明王朝岌岌可危。而思宗欲以暴力镇压，便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这时，李自成起义军针锋相对地提出“均田免粮”、“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无以为活的广大农民纷纷投入其麾下，与明军作殊死战。加上监军宦官对将官的掣肘和陷害，将兵无斗志，兵败如山倒，李自成1644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率领大顺军迅速向北京推进。当大顺军逼近京城时，他要文武大臣献策，个个哭泣无言以对。守城明军，因长期缺饷，饭吃不饱，怨声载道，明王朝的内帑虽有三千七百万两白银、一百五十万两黄金，他却说“帑藏如洗”，死也不肯拿出一点来赈饥发饷，因此，守军不愿卖命，躲在城堞里睡大觉，当大顺军直抵城下时，已众叛亲

离，百官都跑光了，他最信任的宦官已另投新主，彰义门、德胜门的宦官监军打开了城门，守军争先恐后的举手投降，大顺军不战而入北京城。前一天晚上，思宗想逃，但守城的监军不开城，他只好返宫。这时，他用的十万太监跟随他的只有一个宦官。1644年3月19日，天快明时，他上吊在万寿山一棵树上，与他对面自缢的是宦官王承恩。尔后吴三桂勾结满清入侵，打败了李自成，接着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当清军进入云南时，永历帝从云南逃到缅甸，后被缅甸人送回，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明王朝灭亡了。

九、慈禧夺权光绪饮恨

由于封建专制帝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不仅野心家想取而代之，在皇室内部为夺继承权而采取的手段也极其惨烈。这几乎无代无之，清朝也不例外。如清王朝的开创者皇太极死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争皇位剑拔弩张，几乎刀枪相见，后因孝庄文皇后说服多尔衮立她的六岁的儿子福临为帝（即顺治），让多尔衮为掌实权的摄政王，一场即将出现的内讧才避免。多尔衮率大军占据北京后，其夺帝位的野心更炽，孝庄皇后恐顺治皇位不保，便按满族兄死弟娶嫂的风俗，主动下嫁多尔衮，顺治皇帝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让多尔衮成为事实上的皇帝。至康熙晚年，诸子之间争夺继位更复杂尖锐。康熙一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二十个。原立二儿子胤禔为太子，因康熙在位太长，胤禔急于接班，康熙病要他入侍，他以为康熙快死便面有喜色，康熙乃废之。后又复立为太子，他担心皇位被兄弟所夺，经常派人刺探康熙活动，康熙一怒之下又将之废掉了。康熙诸子认为机会来了，纷纷结党以争继位。据传说：康熙病危，写好遗诏“传位十四子胤禛”，不料这遗诏落入带兵守卫皇宫内外的隆科多手里，他是四子胤禛的舅父，经二人商量将诏书改写，“十”字添上一划一勾，就成了“于”字，把“禛”字右边顶上小划向左稍延些，在下面再加一横划，就成了“禛”字，这就成“传位于四子胤禛”。于是胤禛登上皇位，是为雍正。由于清室皇位的争夺，解决之法都很巧妙，不致影响大局。清王朝延传长达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其中有八个很有才干，其他四人也属中等的才智，象明朝那样一连串的昏君庸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但是，清王朝不亡于内讧，也不亡于昏君庸主，却亡于一个很有心术又阴险残忍的女人手里，这就是遗臭万年的慈禧太后。

据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征服并残酷地屠杀同属于女真民族的那拉部落，那拉老酋长死前悲愤地说：“我们纵使只剩下一个女子，也要复仇。”三百年后这位老酋长的后裔中有名叫那拉兰儿的，即后来的慈禧太后，正是在她手埋葬了努尔哈赤的子孙，不自觉地为其祖辈报了血海深仇。姑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但历史事实是：慈禧太后确是清王朝的掘墓人。

慈禧挟两幼主荼毒天下

慈禧姓那拉氏，乳名叫兰儿，慈禧是她称皇太后的徽号。她十七岁时被选入宫，因咸丰帝奕訢的宠爱，后又生子载淳，被封为懿贵妃。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进逼北京，咸丰帝怕得要命慌忙带上懿贵妃和儿子载淳，从圆明园逃到热河承德的避暑山庄。北京任由英法联军抢掠焚烧，包括闻名于世的绝代园林——圆明园被焚毁了。1860年11月，清政府被迫先后签订了屈辱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次年，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临死前，立六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任命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大臣。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合称两宫皇太后。权欲极强又野心勃勃的那拉氏，他不甘心权力落入肃顺等人的手里，便策划发动夺权的政变。他先是拉拢钮祜禄氏，诬称肃顺等人图谋不轨，要与钮祜禄氏一起垂帘听政，以扶小皇帝载淳。钮祜禄氏是个

头脑简单的女人，便上了她的圈套。那拉氏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懂得要发动夺权的政变，要有得力的帮手，并要有军队和外国的支持，于是她想到北逃时留在北京与英法议和的咸丰帝六弟奕訢，这人不仅在掌握北京的政权，且因议和跟外国人关系较好，便以两宫懿旨派心腹太监召奕訢到承德避暑山庄，与之议定了发动政变的计划。那拉氏最怕外国人不支持，奕訢拍着胸膛说：“外国不会有异议，如有什么困难，唯奴才是问。”奕訢回北京后便按照所议行事，向肃顺等的反对派游说，要他们上表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同时请求外国侵略者的支持。那拉氏还暗里收买掌握京城附近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和控制北京周围军队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又以肃顺等政务繁忙为借口，解除了他们的兵权。一切部署妥当后，就派肃顺等人从大路护送咸丰帝灵柩回北京，那拉氏就带小皇帝载淳等人从小路提前四天到北京，她已收买的党羽们立即上书要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英法使节也扬言支持。这时护送灵柩的肃顺等八大臣还蒙在鼓里，走到半途，咸丰帝的七弟、那拉氏的妹夫奕訢照原定计划，从承德带兵追上他们将之逮捕。肃顺被斩，其他人有的被革职或赐令自杀。于是，那拉氏的儿子载淳正式继位，上母后皇太后徽号为慈安太后，圣母皇太后徽号为慈禧皇太后，宣布两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一切权力归慈禧太后。慈禧掌权后，继续玩弄权术进行统治，奕訢因议和支持政变提任议政王，她怕奕訢权大，先是削弱其权，后又以贪污罪名，革去一切职务。慈禧只知沉醉于权欲，对儿子很少教育，载淳十八岁亲政时，还微服到民间去寻花问柳，染上梅毒，因误是“天花”错下了药，不久便死了。载淳死后，慈禧以其妹夫奕訢的四岁儿子载恬继承皇位，是为光绪。她又可以皇帝年幼为名，再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了。但是慈禧对这个头脑简单的慈安太后也放不过，1881年的一天，使人送一盒点心给她，吃了一块，便暴死了。这样就只剩下慈禧皇太后一人专政了。

慈禧就是用这样阴险狠毒的手段夺取了清王朝的全部权力。在这两次垂帘听政期间，其所作所为，说明她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奴才。

在慈禧的统治下，外国侵略者可以随心所欲了。1874年，日本人发动侵略台湾战争，慈禧派人与日本人签订《北京条约》，不仅赔款，还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于是，日本人气焰更盛，1879年侵占琉球，为以后日本人侵占台湾提供了跳板。慈禧对沙俄侵略者一味妥协退让，正是在慈禧的怂恿之下，沙俄又侵占了中国数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3年，爱国将领冯子才在镇南关大败前来侵略的法军，击毙敌人一千多名。中国在镇南关大捷引起法国举国震动，巴黎人民上街示威游行，促使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这时慈禧却下令停战、撤兵，派李鸿章与战败的法国人订立了屈辱的条约，因之，法国并吞越南和打开中国西南大门的野心，得以完全实现。法国败而胜，中国胜而败，这真是天下之大怪事！但它也彻底暴露了慈禧卖国的丑恶面目。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海军大败，都是慈禧投降卖国路线导致的。1894年，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慈禧指示李鸿章“避战自保”，力保“和局”，故当日本海军在黄海袭击北洋舰队，舰队进行反击，而李鸿章竟下令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卫基地，使日本得以占领朝鲜全境，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从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北洋舰队腹背受敌，虽经英勇奋战，全军终于覆灭。清朝海军本来经费就不足，慈禧竟提用海军经费多达白银三千万两大修颐和园，以供个人享乐，这也是清朝海军弱于日本海军的原因。甲午战争

大败，清朝举国震惊，光绪帝及亲近的朝臣等纷纷主战，而慈禧却大施淫威压迫光绪等屈服，派李鸿章与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仅赔款一项就达白银二万万两，这笔巨额赔款当然是转嫁由人民来负担，这使中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从此台湾也就成为日本人的殖民地了。

百日维新及光绪悲剧

1894年，甲午战争大败后，清王朝的弱点全部暴露，贪婪的西方侵略者争先恐后来分割中国这块肥肉，1896年，俄国、法国在汉口划定租界，日本在杭州划定租界，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驻军，各国跟着援例，纷纷派军驻扎各地保护各国的利益。1897年，法国要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他国，日本在苏州划定租界。1898年，德国租借胶州湾（青岛），并要清政府保证山东省不割让他国，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旅顺、大连）；日本要清政府保证福建省不割让他国；英国租借威海卫和九龙（1842年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已全部割让香港全部主权于英国）；法国要清政府保证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不割让他国；日本在天津、汉口、沙市划定租界。1899年，英俄两国约定长城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为俄国势力范围；日本在厦门、福州划定租界。1899年，法国租借广州湾（湛江），俄国占领东北。各国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像一群恶兽，在咆哮着，急于将中国吞噬，已私自协调好要将中国瓜分。

光绪于1875年继位，迄1887年，即他十六岁时才亲政。但慈禧绝不会放弃权力，仍由她“训政”，保持着最后决定权。光绪天资聪颖，刻苦学习，他读的书很多，经史子集诸书无不涉及。他怀有远大抱负，常以《孔子家语》中的“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作为座右铭，认为皇帝只有爱民，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人君只有兢兢求治，国家才会出现太平之世，提出了“治世莫如爱民”的主张。在他亲政期间，中国正面临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对国家和人民前途至为忧虑，总想有所作为以救国救民。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时，他坚决主战，当他听说李鸿章要借英国之力以促日本退兵时，他气愤地说：“中国自应大张挾伐，不应该借助他邦的力量，以致日后别生枝节。”这次日本的侵略，因慈禧的卖国投降路线的掣肘，中国失败了，并在慈禧压力之下签订了《马关条约》；但恰恰是这个耻辱的条约唤醒了广大的知识分子。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1895年），来自全国十八省的数千名举人，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的科举考试，他们悲愤交集，由康有为带头联名“公车上书”，提出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海内外为之震动。由于顽固大臣的封锁，光绪没有看到“公车上书”。次年，已考中进士的康有为，又写了一篇一万三千余字的上皇帝书，备陈变法下手之方和先后缓急之序，光绪看到后毅然动容，颁布了道“上谕”，列举应兴应革事项，实行新政。但因顽固大臣的阻挠，他的“上谕”只不过是一张废纸。1897年康有为又上书光绪，指出：国外，各国在议论瓜分中国；国内，反抗政府的危机四伏，现在已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如果不赶快变法挽救，要想偏安或当老百姓也不可能了。这封书虽被顽固大臣扣压，因天津、上海各报已刊出，光绪看到了，深为感动。稍后他读到康有为所著的《波兰亡国记》、《突厥亡国记》，不禁痛哭流涕，他对清王朝和中国的前途，怀着极大的忧虑。康有为还组织保国会，宣传保国、

保种、保教（孔孟之道），顽固大臣说他“保中国不保满清”，请求光绪下令禁止保国会活动，光绪反驳他们说：“会能保国，岂不是大大的好事”。这时光绪已认识到“不变法不能立国”，但有慈禧在背后掣肘，变法没有权哪行，有一次，他愤愤地对庆亲王奕訢说：“太后若不给我权力，我宁愿退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訢将之告慈禧，因迫于变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慈禧只好表示同意光绪的变法要求，但提出的条件是“不能剪掉头发，改换服装，不能改变祖宗的规矩。”并对奕訢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什么名堂，下不了台时，才出来收拾他。”当奕訢向光绪传达慈禧同意变法的“懿旨”，光绪高兴极了。于是用其师傅翁同龢辅政，康有为等人开始汇集到光绪周围，充当光绪变法的“智囊团”。于是，光绪正式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他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小臣的旧例，曾召见康有为于仁寿殿。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又选集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讨论制度，通盘筹划。整个百日维新中，一共下了谕旨、诏令达一百一十多道，内容有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广办邮政，裁撤驿站；改订规章条例，精简机构，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加强海陆军，改用新法操练；准许旗人自谋生计，等等。

这些新政牵涉面极广，变法是革新当然会触及“祖宗规矩”，触犯顽固守旧派的既得利益，必然遭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极力反对。躲在颐和园窥测方向的慈禧，在“定国事诏”颁布的第四天就开始行动了，她借用光绪之名，一连下了三道“上谕”，一是剪除光绪的股肱，罢黜翁同龢，二是控制人事大权，命凡是二品以上官员授职者必须到皇太后前谢恩，三是派自己的亲信，控制战斗力最强的北洋之三军的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在这同时，慈禧已派心腹控制着紫禁城和颐和园的警卫大权，北京已在其武装力量控制之下。这显示慈禧要有动作了，而康有为等维新派还蒙在鼓里，只忙于拟计划写诏书，光绪头脑就较清醒，他与慈禧太后接触中察言观色，已觉察到顽固派的罪恶用心，便给康有为“密诏”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但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只知空谈改革，对光绪的“企望”毫无回音，更谈不到“相救”。光绪感到事情危急，为挽救康有为等又急下“上谕”，令康有为速到上海“督办官报”，“毋得迁延观望”，意思已说得很明白，这群书生气十足的“书呆子”还不明白，直到光绪又写密诏说令其督办官报是“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这才如梦方醒。才仓惶出走。过不了几天，慈禧果发动政变，把光绪幽禁于瀛台。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还对光绪的“密诏”实是报警无动于衷，仍然呆在北京，致被逮捕，殉难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从光绪颁“定国事书”到慈禧重新训政，历时一百零三天，故史称“百日维新”，也称“戊戌变法”。

论者都认为光绪是一个软弱的革新变法者，但从其推行“百日维新”的言行看，光绪不愧称为坚强的革新变法者。他是不顾生死下定变法的决心的，有一次接见群臣时，他悲痛地说：“朕不自惜，死生由天，你们如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而无憾啊！”当他实行变法因受慈禧掣肘感到无权。他毅然要求慈禧给权，不然“宁愿退位，不当亡国君”。为实行

新政，他敢于排除阻力，对于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沂、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沆、石侍郎溥颢、右侍郎曾广汉等予以革职。这就是“百日维新”中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当他知道慈禧在磨刀霍霍的时候，便横下心来与之作最后一搏，他召见了驻扎在天津的北洋三军主将之一的袁世凯，给予升官，使其感恩支持变法，并由谭嗣同劝袁世凯倒戈站在光绪一边，除掉荣禄，包围颐和园。幽禁慈禧，把军权掌握在手里，以推行新政。光绪之所以相信袁世凯，是因他伪装倾向维新派，康有为以他可托，便写密奏向光绪推荐袁世凯，因此，咎在康有为不明于知人，而并非光绪。袁世凯被光绪召见后，即向荣禄报告，荣禄慌忙向慈禧告发，光绪终于被迫退位，被幽禁于中南海瀛台，成为一个不带枷锁的囚犯。由于各国对光绪的支持，慈禧不敢对光绪下毒手。变法失败，旧制度恢复，以光绪为首的维新派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是，一、双方力量悬殊，从中央到地方，大多是顽固派占优势，且掌握军政要害部门；而维新派，只有康有为等少数“智囊团”及光绪一些近臣，且慈禧是个很有斗争经验的老狐狸，光绪则还缺乏斗争经验。二、维新派虽争取到各国的支持，但没有发动各界群众起来支持，仅靠几个高级知识分子是很难成事的。而康有为等人虽能提出新思想，拟定一系列新政，但对如何才能实现没有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和有步骤地稳步进行，却在“百日”之内将新政一揽子推出，并想毕其功于一役，这必然是欲速则不达。

腐化和愚昧埋葬了清王朝

从1861年咸丰帝病逝到1909年慈禧死长达四十八年内，实际上是由慈禧专政。这四十八年是清王朝最黑暗时期，在慈禧的腐化和愚昧的统治下，不仅埋葬了清王朝，也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慈禧的一生，是罪恶的一生，她对外屈膝投降，先后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使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而清政府又承担禁止国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保证，这就表明清政府和慈禧完全变动了帝国主义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而赔款数额之大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仅《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就多达白银六亿五千万两，因是分期付款，再加上利息就达白银十多亿两，如此天文般的数字的巨款都是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偿还的，使中国人民更加贫困，经济陷于崩溃。慈禧对内则横征暴敛，穷奢极侈，她开始垂帘听政时，仅税收每年约白银八千万两，到她临死前后，每年已增加到白银二万万两。而供慈禧一人花费的数量就极其惊人。她为住得舒服而修的颐和园就用去达白银至少有七八千万两，每顿饭有一百种左右的山珍海味，餐具都用金玉器制。仅金餐具就重五千八百多两，银餐具重一万多两；有一年，她就做了一百三十五套衣服，用去白银三万八千多两。她过生日豪华得很，五十岁生日时仅演戏购买的灯盏就用去白银十一万两；六十岁生日，虽值甲午战争紧张阶段，仍然用去白银二千万两。

慈禧奢侈腐化惊人，其愚蠢无知也首屈一指！她的愚蠢无知同样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慈禧一系列丧权辱国行为，使帝国主义站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受欺负够了，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于是自发地掀起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烈火。这时，慈禧听说山东省的义和团，有一种神奇的法力，只

要口中念念有词，身上就变成“铁布衫”、“金钟罩”，洋人的枪炮就不能击伤。慈禧虽当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但侵略者得寸进尺，尽管她对洋人百依百顺，还是老挨洋人揍，她又恨洋人同情光绪，但敢怒而不敢言；跟她一样愚蠢的大臣如载漪等提醒她，义和团专杀洋人，他们刀枪不入，何不使义和团向烈强挑战，这一下使慈禧心花怒放，过去她害怕洋人是因他们枪炮厉害，现在既然有枪炮打不入的义和团，洋人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下决心要对列强宣战。但是她怕担当责任，想利用囚禁仍是名义上的皇帝光绪宣布此事，于是便把光绪叫来，请他发表“意见”。光绪虽被幽禁，仍一直关心国事，对外边情况也有所了解，他虽知道自己无权，还是坚决不同意利用义和团来向外国宣战，他说：“他们的血肉身躯怎能挡住外国人的枪炮啊！不能用百姓的生命作儿戏！”何况“寡不可敌众，弱不可以敌强，断没有一国能敌七八国的。”但是慈禧主意已决，她对光绪的明智意见置之不理，严厉斥责光绪误事。光绪无可奈何地回返瀛台，叹息说：“可惜十八省数万万之生灵，将遭涂炭了！”“祖宗基业不可保了！”身为囚犯的光绪，头脑是如此清醒，不仅担心人民遭涂炭，更为其清王朝将灭亡而悲叹。

1900年5月25日，慈禧终于下诏向世界所有跟中国有邦交的国家宣战，这荒唐的行动使人人为之瞠目，在慈禧愚昧无知的推动下，义和团运动的烈火在北京、河北、山西、山东等省愈烧愈炽。帝国主义者对慈禧的宣战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他们可以联合起来侵略中国了。于是，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共八个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六月十八日攻陷天津，七月二十日攻陷北京，义和团被大屠杀，中国人民被大屠杀。慈禧太后像丧家之狗，慌忙挟持光绪逃走，在逃走前还发泄其兽性，不管光绪怎样哀求，他还是把光绪最宠爱的珍妃投入井中。她逃到西安后，急派李鸿章到北京向八国乞和，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

参加义和团的广大群众，其原来的动机是单纯的，是激于民族感情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他们没有文化易受迷信思想的欺骗，说念什么词便可刀枪不入，不怕洋鬼子，慈禧就想利用义和团杀洋人来泄恨，把轰轰烈烈的民族自觉运动引上歧途，从而引狼入室，正如光绪所料，人民“遭涂炭了！”义和团无数爱国群众遭到屠杀，据统计，至少有三千万以上不幸的中国人家破人亡，而这次事件的罪魁慈禧却在西安每天照样快快乐乐地看戏。

1908年10月，慈禧结束了她罪恶的一生。据说在她死前的一天，她自知病将不行，恐怕自己死后光绪将复位又得行新政，便毒死了光绪，这虽是传说，但慈禧为人狠毒，这是有可能的，且光绪当时只患感冒，并非不治之症。光绪在囚禁后一直念念不忘“新政”，他原以为自己将活得比慈禧久，待慈禧死后，他又可推行新政以挽救国家，哪料他却比慈禧早一天死了，这不能不使他饮恨终身！

第三章廉洁奉公流芳百世

这里所评价的名传千古的九个杰出人物，不只是重复他们的过去业绩，而是着重探求其一生活动的可贵之处，使能对人们有所启发和激励。他们的共同点是一生廉洁奉公、爱国爱民，但也各有其特点，如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魏征谏净，纠正君王过失；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包拯铁面无私，执法如山；苏轼当官或贬滴，始终爱民；文天祥以身报国，“留得丹心照汗青”；海瑞为民请命，敢骂皇帝；林则徐为救中国，毅然焚毒抗英。他们公而忘私、为国为民的动人事迹，迄今读之仍使人感动不已，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这便是人的价值最可贵之所在。凡是对祖国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后人对他们同样景仰和怀念，他们也就永垂不朽。

一、诸葛为国 鞠躬尽瘁

诸葛亮辅佐的蜀汉，只不过是三国时的一个割据小国，其“兴复汉室”的宏伟愿望也未实现，但“诸葛大名垂宇宙”，被称为千古名相第一人。诸葛何以获得如此崇高的声誉，人们为何如此景仰他？

“隆中对”料形势发展如神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诸葛亮早丧父母，依靠叔父诸葛玄生活。玄任豫章太守（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后往荆州投刘表，诸葛亮也就跟叔父到荆州，玄死，诸葛住在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他在隆中住了十年，一边耕田，一边读书，喜欢诵其所作的《梁父吟》诗（见《诸葛亮集》），其中有“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足见其抱负。他虽隐居隆中，却经常与好友探讨治世之术，密切注视着当时的政治形势。207年，诸葛亮已二十七岁，身高八尺，仪表英俊，常常自比为管仲（春秋时齐国名相）、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但没有得到时人的承认，只有诸葛亮的好友徐庶等人赞许，认为“诸葛亮确是这样非凡的人”。当时投靠刘表的刘备屯兵于新野，徐庶往见刘备说：“诸葛孔明，大名士庞德公誉为‘卧龙’，将军想见吗？”刘备说：“你可带他来。”徐庶说：“此人可往见，不可招来，将军应该在驾前往拜访他。”刘备便前往向诸葛亮请教，“凡三往，乃见”，正是在这次会见中，诸葛亮向刘备提出了决定其前程的“隆中对”。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纵论天下形势及取天下的战略、策略和步骤。诸葛亮首先提出胜败主要决定于“人谋”的重要思想。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割据称雄，北方只剩下两个强者，即袁绍和曹操，而曹操能打败袁绍主要是靠什么呢？他指出：“曹操比之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图天下要认清其对手，所以诸葛亮对当时存在的四个主要割据者逐个进行分析，认为谁“不可争锋”、谁“不可图”、谁可取，说：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以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可取的只有荆州和益州，荆州是“用武之国”，而刘表无图天下之志终将失守；“益州险阻，沃野千里”，是一个图天下的理想根据地，但“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争天下不能四面皆敌，要分清敌我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主要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据此，诸葛亮提出团结孙权和边疆少数民族，从荆益两州挟击曹魏的战略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刘备听了连声称“善！”由于刘备三顾草庐，诸葛亮感激其待贤之真诚，就离开隆中辅佐刘备。从此，刘备与诸葛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刘备）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诸葛亮当时仅是个才二十七岁的青年书生，还未有突出表现，而刘备敬重如此，具有万人敌与刘备出生入死的关羽、张飞有意见是不奇怪的。

刘备之敬重诸葛，诸葛之择刘备，可说是彼此都明于知人。诸葛择刘备而事之，并非偶然。他曾长期住在荆州，而其叔父诸葛玄又与刘表有旧，且诸葛当时才华为大名士庞德公所赞赏，称之为“卧龙”。诸葛若肯在投往刘表有可能得到重用，但诸葛住荆州久深知其人，已料其不能守荆州，不可能为其所用。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为孙权所敬重，如他往投孙权必被接纳，他何以不往依之？据说诸葛亮奉命往东吴说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操时，“张子布（张昭）荐亮于孙权，亮不肯留。人问其故，曰：‘孙将军可说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至于曹操，他的好友石广元、徐庶、孟公威都先后投之，他为之惋惜，因他认为曹操是“汉贼”。可见诸葛的择主是极其慎重的，他是“非其主不依”，宁可“躬耕垅亩”。刘备当时还寄人篱下无立锥之地，诸葛愿为他效力，除了感其待己之真诚外，也由于他认为刘备是“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将能成大事，“兴复汉室”。而刘备对诸葛亮之所以日见重用，不仅是深服其“隆中对”之精辟，而是在以后能取荆、益两州以至在西蜀称帝，都是因采纳和执行“隆中对”之故，特别是在“隆中对”具体实践中，诸葛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曹操大军下江南，刘琮投降，拟消灭刘备后再沿江取东吴，刘备和孙权处境都很危急，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他赴东吴向孙权陈说利害，并用激将之法使其下抗操的决心，最后指出孙、刘联合抗操必胜及形势的发展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听了很高兴，即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率水军三万，与刘备协力抗拒曹操。后来形势发展果如诸葛所料，曹操在赤壁战败后便引军北回，刘备先得荆州后又取益州，称帝于西蜀，于是三国鼎立。

形势的发展与“隆中对”的预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故被称“千古奇策”。

以“人谋”迎逆境而上

形势在不断变化，而形势之变化决定于客观和主观情况。从赤壁之战到刘备据有荆益两州、称帝西蜀，是按照“隆中对”的预料顺利发展着，因为它所分析的形势与当时的客观形势是一致的，刘备在这个时期是贯彻执行了“隆中对”的战略的，其中包括联吴抗操的对外方针。219年，关羽北伐，围樊城，降于禁，斩庞德，梁、郊、浑反魏民间武装准备响应，关羽威振华夏。曹操拟迁都避之，后采纳司马懿计，许割江南给孙权，使孙权袭荆州，关羽两面受敌，在回军以夺回荆州的途中被东吴擒杀。221年，刘备称帝后于是年七月率师伐吴，在猇亭（今湖北宜昌）惨败，逃归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223年病死，由刘禅继位，托孤于丞相诸葛亮。荆州失陷、关羽被杀和猇亭惨败，使蜀汉国力削弱，已从其黄金顶峰跌落下来。蜀汉从顺境转向逆境。但是，诸葛亮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兴复汉室”的壮志，他知其难为而为之，以“人谋”迎着逆境而上。

诸葛亮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他认识到以当时蜀汉的处境和国力是不可能进行北伐的，要北伐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解决存在阻碍北伐的种种矛盾，由于形势比人还强，蜀国不幸从联吴抗魏转向吴蜀相争，使魏坐得其利，如果吴蜀交恶继续发展，彼此互相削弱，不仅不能北伐，将更快地被魏所灭。有鉴于此，他派邓艾赴吴向孙权陈说利害，于是两国重申旧盟。对

内，诸葛宣布“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分兵屯田以减轻农民负担，实行盐铁官营政策，使“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派人负责兵器、农器的制造，使蜀国出现了“田畴开辟，仓廩实，器械坚利，蓄积丰饶”的景象。同时，积极练兵，充实军备，以备北伐。为了安定南方，使边疆少数民族不为曹魏所利用，扰乱后方，便率军到南中，“七擒七纵孟获”，终使孟获心服，宣誓“南人不复返”。做了充分准备后，225年，诸葛亮率军北伐，出发时上疏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表明其北伐以“兴复汉室”的决心。

曹魏原以为蜀国只有刘备，刘备既死，蜀国数年间毫无动静，所以不做预防，忽闻诸葛亮率军北伐，朝野恐惧。诸葛亮扬声由斜谷取郿城（今陕西眉县），使赵云、邓艾为疑军，占据箕谷，他却亲率诸军攻祁山，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今甘肃陇西）、天水（今甘肃甘谷）、安定（今甘肃镇原）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曹魏派张郃领军抵抗，诸葛亮命马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军战于街亭（今甘肃秦安县），因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举动失宜，为张郃打败。街亭是汉中咽喉，诸葛亮进无所据，只好迅速退军还汉中，为了“明罚思过”，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上疏自责用人不当，失败之责应由己负，“请自贬三等”。有人建议增兵再战，诸葛亮认为：这次蜀兵比魏兵多，而蜀兵不能破敌而为敌所破，可见失败的原因不在兵之多少，而在于自己指挥不宜。因此，他要求部属“勤攻吾之阙（过错）”总结失败的教训。于是“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练兵备战，以为后图，可见，诸葛亮遭受失败并不气馁，也不文过饰非，而是引咎自责，要求人们多提意见，找出失败的原因，使以后不重复错误，以利再战。

226年十一月间，诸葛亮知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又决定北伐，便上言指出，“汉贼不两立”，王业不能偏安，虽然敌强我弱，“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而胜败“难可逆见”，最后表明其“伐贼”的决心：“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是有散关（今陕西宝鸡市）之役。诸葛复出散关，率大军围陈仓，魏将曹真拒之，蜀军粮尽而退。魏将王双率骑来追，诸葛亮返军与战，破之，斩王双。次年，诸葛亮派陈式率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两郡，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欲击陈式，诸葛随后自率军到建威（今甘肃成县），郭淮惊而退军，遂平武都、阴平两郡。再经过两年备战，231年，诸葛复出祁山。这次魏军主帅是司马懿，他坚壁固守，以老蜀兵。部下请战，说：“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司马懿置之不理。两军相待一个多月，蜀军粮尽退兵，魏名将张郃来追，诸葛伏兵斩之。又过三年，即234年，诸葛亮率大军由斜谷出，据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与司马懿对峙于渭南。诸葛亮因每次北伐粮尽退军，便分兵屯田，与居民杂处，兵不扰民，百姓安堵。诸葛亮数次向司马懿挑战，司马懿坚守不出。两军相持百余日。是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时年五十四。蜀军退。后司马懿率军往追，蜀军反旗鸣鼓，若向魏军，司马懿恐中诸葛亮计乃退军。蜀军入谷后才发表。司马懿退军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后司马懿巡视诸葛亮驻军营地，赞说：“天下奇才也！”

在三国中，蜀是小国，魏是大国，蜀国占地不及魏国的十分之一，人力、物力，兵力相差也极其悬殊，而诸葛亮以五万兵力敢与司马懿驻秦川的十多万大军对峙，孙子兵法云：“倍则攻之”，谙熟兵法的司马懿不敢攻而是“畏

蜀如虎”，屯田采取守势，诸葛亮如果没有非凡的军事天才何以臻此？

有人说，诸葛亮北伐是不自量力，如闭关守险，或可相安无事。当时魏蜀之间，毫无妥协余地，蜀不灭魏，必被魏所吞，所以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说得很明白：“汉赋不两立”，“然不伐赋，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在战争中，胜败往往以“人谋”而定，使强者败，弱者胜，因此，诸葛亮不因蜀弱而退却，为了“复兴汉室”，敢于五出祁山进行北伐，这充分显示了他的“人可胜天”的大无畏精神。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二十七岁离开隆中到五十四岁在五丈原逝世，在整整二十七年中，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其崇高品德突出表现在：一、为公忘身。刘备病重时，将刘禅托孤于诸葛亮，嘱以后事，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哭泣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为安定南方，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五出祁山，竭智尽力，因劳成疾，终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魏氏春秋》载：司马懿见亮使至，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马，所食不至数升，”司马懿曰：“亮将死矣。”一个统帅，事事亲劳，以至废寝忘食，并非所宜，但也反映了诸葛亮勤于公务而忘身的精神。

二、大公无私。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父子，都一心为公而不谋私利。刘备统治西蜀时，东州人与益州人矛盾尖锐，刘备入蜀，其骨于是荆州之士，如三州人士团结不好，益州则难于稳定。诸葛虽是荆州士人的领袖，他依靠而不偏袒荆州宿士，毫无“朋党”之私，而是尽力团结东州、益州人，有才的都加以提拔和信任，如益州的杨洪、何祗两人都是从小吏提升为太守。由于他待人以诚，甚得三州人士敬佩，使之团结在蜀汉政权下为之竭智尽力，他特法心平，赏罚公道，正如陈寿所说，“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他自恃清廉，律己甚严，对家属也严格要求。诸葛亮病逝前上表给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蜀书·诸葛亮传》）这八百株桑树和十五顷田是政府所赐，除此而外，别无余物。他生活朴素，不喜声色犬马。入蜀后命其妻在乡间封邑管理田产和桑园。因无子乃纳一妾，他自称“妾无副服”，说明妾也跟他过着粗淡生活。《诸葛亮集》载有诸葛亮给其兄诸葛瑾书说：“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维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乔原是诸葛瑾次子，因亮初无子以为嗣，当时随在军中，本来他服役已到期可以轮换回成都了，为不让他比诸将子弟有任何特殊，还是叫他带兵运粮。四十七岁时得子诸葛瞻，对其严加管教，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也致书教诲。现存的《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载有诸葛亮的《诫子书》，不仅是对其子的希望，也反映了诸葛亮高尚的品质情操，《诫子书》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

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后两语正是诸葛亮身体力行的总结，也是他伟大之处。澹泊是指对名利权欲的恬淡，明志是指具有高尚的志气，有了澹泊的情操，才可能有高尚的志气。宁静是指清静，含有清心寡欲，以静制动之意，远是指远大的理想，只有不为物欲所牵，才可能有远大的理想。相反，就会陷于名利缰锁和物欲的深渊之中，就不会有高尚的志气和远大的理想。诸葛亮正是澹泊才能明志，宁静才能致远，协助刘备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成为世人的楷模。以此教子，使诸葛瞻不为邓艾以封王诱降所动，不改父志，壮烈地为国战死。而在诸葛亮“澹泊、宁静”的高尚品质情操的影响下，蜀国官员廉洁奉公成风。

诸葛亮逝世数十年后，蜀人仍歌思，怀念其德。迄宋，苏轼有诗曰：“武侯来西国，千年爱未衰”。就在一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其怀念也丝毫未减，尤其对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爱国的精神景仰不已！

二、魏征敢谏被誉“人镜”

魏征为人耿直廉俭，处境虽屡变，始终以国事为重。他事唐太宗后，能坚持谏净，纠正了太宗许多错误，使其正确使用权利，魏征对“贞观之治”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一生为国事竭力尽智

魏征一生，因形势变迁曾屡易其主，但不管在哪里，他不为图位而屈从，他的言行都显示了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字玄成，钜鹿曲城（今河北晋县）人。他少孤贫，但有大志，不事生业，曾出家当道士。他勤读博学，因见当时天下大乱，便着重研究有关政治外交活动的谋略。617年，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响应李密（瓦岗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请魏征负责掌管军中的文书。李密每次看到宝藏的来信，很赞赏，后知是魏征代写的，当即派人召见他。魏征向李密献十策，其策虽奇却没有被李密采纳。及王世充攻李密于洛口，魏征便找军中长史（相当秘书长的官）郑廷说，“魏公（指李密）虽屡胜，但骁将锐卒死伤很多，军中又无钱赏有功的将士，这很难跟敌人打硬仗。不如深沟高垒以坚守，敌人粮尽必然撤退，那时追而击之，必然会取得胜利。且世充的老巢东都已无粮，他现在计穷，意欲死战，正是穷寇难与争锋，请勿与战。”郑廷却讥为“老生之谈”，魏征气愤地说：“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由于魏征的“十策”和其“奇谋深策”都不被采用，两军一交锋，李密军大败，乃投降唐朝。魏征奉命去黎阳招降李密旧部。这时夏王窦建德（河北农民起义军首领）率军南下，攻陷黎阳，魏征被俘掳，任命他为起居舍人（记录夏王言行的官）。及窦建德被唐军打败，魏征逃回关中。太子李建成久慕其大名，召为洗马（太子东宫属官，主管经籍图书），对他很为敬重。魏征见秦王李世民勋业日隆，劝太子建成早谋对策。“玄武门之变”，太子建成被杀，秦王李世民便使人召他来，质问他：“你离间我兄弟，居心何在？”魏征毫不畏惧，坦直地说：“皇太子如听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素器重魏征为人，便不究既往，任命他为詹事主簿（掌管太子文书的官）。李世民即皇帝位，升魏征为谏议大夫。

身为谏议大夫，就要对皇帝进谏，指出皇帝错误言行，弄不好就要杀头，何况魏征又是来自唐太宗的敌对势力方面的人，唯唯诺诺还恐保不了命，何况要触犯“龙的逆鳞”呢，而魏征却全不顾这些，他不仅敢于谏，还敢净谏，即使唐太宗勃然大怒，他也神色不变，继续坚持。他敢于谏净，是因其人性格忠直，无所屈挠；另是他来自敌营，唐太宗不记前嫌，破格重用，他感知遇之恩，故竭智效力。他与唐太宗讨论治国之术，记录在档案的就有数十万言。唐太宗曾慰劳他说。“你进谏的前后共有二百余事，如果你不是至诚奉国，哪能这样？”魏征是非分明，正确的则坚持。有人告魏征包庇其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无据，可是，彦博却认为，“魏征不拘形迹，不避嫌疑，所以招致毁谤，虽无私情，也应斥责。”太宗令彦博批评魏征，魏征不服，对太宗说：“君臣协契，义同一体。为避嫌疑，而不以诚相见，如果上下都这样，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太宗自我检讨说：“我已后悔，我是错了。”魏征拜谢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太

宗说：“忠臣和良臣不相同吗？”魏征说：“良臣使自己获得美名，君主也得好名声，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杀戮，君主得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空有其名。”魏征就是这样的良臣，他进谏的事大都是太宗的错误还起于苗头的时候，因而能使太宗的错误未形成事实，这样，他得了名臣的称号，太宗也得明君的美名。

魏征做事，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敢做敢为。太宗即位之初，派他去安抚河北，许他便宜行事。途中遇见被抓送京师的前东宫的千牛李志安、齐王府护军李思行。本来，魏征曾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这两人跟他有旧，他不避嫌疑地对副使李桐客说，“奉命出使时，太宗已赦免东宫和齐王府的部属，如果让思行等抓送京师，其他的人将怀疑太宗的赦令是假的，这对安抚残余的敌对势力是不利的。对国家有利之事，知了就要做，宁可对己不利，也不可废国家大计。”于是便释放了志安、思行两人，并将之报告太宗，太宗认为这样做很对。从此事足见魏征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害。

628年，太宗晋升魏征为秘书监（官名，掌图书著作等事），参预朝政。从此，他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以谏净为己任，做到知无不言。

向太宗谏诤使内安外服

《旧唐书·魏征传》“史臣”赞曰：“智者不谏，谏者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这是说，在古代专制帝王统治下，谏者下场大都是悲惨的，所以智明人士都不敢谏，而谏者对个人来说因没有好结果，故明哲保身之士都不谏。如果能让智者尽其言，这对国家是有利的。魏征是智者，言无不尽，太宗用之，故内安外服。

魏征谏诤的功勋，首先是太宗制订了对内对外的总方针。太宗即位之初，有人上书建议，君主必须独掌大权，不得委权于臣下，有人则主张耀兵振武，以慑服边疆民族。如果按照这些人的意见去做，太宗将是个暴君，决不会是英明之主。魏征坚决反对这些人的意见，劝太宗“偃武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太宗虽采纳这个总方针，但在具体行动上往往与之有抵触，由于魏征进谏得到了及时的纠正，使这个总方针得以正确贯彻执行，这使天下安宁，边疆民族纷纷来朝贡，尊太宗为“天可汗”。

对待边疆民族，魏征主张不要靠武力立威，要以德服人，和平共处。627年，有人报告岭南少数民族首长冯盎谋反，太宗立即下令派兵讨伐，魏征认为国家初定不宜用兵，且冯盎谋反证据不足，应先派使前去调停。太宗按照魏征意见办，结果免了一场兵燹，太宗赞扬魏征说：“魏征主张我发一介之使，而岭南遂安，胜十万之师。”有一次，太宗派使到西域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没有回来，又派使多带金银和丝织品到西域诸国去买马。魏征谏说：“今以立可汗为名，可汗还没有立，即到西域诸国买马，他们必以为意在买马，而不是专意立可汗。可汗得立，也不会感恩，西域诸国知道了，必以为中国薄义重利，这样得马而失义了。”太宗纳其言，不派人去买马。

凡认为是劳民伤财及对国家不利的东西，魏征都进谏。629年，高昌（西域国名，今吐鲁蕃一带）王文泰将来朝见唐太宗，西域诸国也想派使者同来进贡，太宗令高昌在京的使者前往迎接。魏征谏说：“中国始平，疮痍未复，如增加劳役，人民则不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还不能供应，今又增加这么多国家的使者，人民负担就更重了。如果任其商贾往来，边疆人民可获

其利，如迎接其宾客，中国就受其弊了。”太宗善其议，急派人追回使者。632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只有魏征认为不可。太宗问魏征：“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中国未安吗？远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魏征答道：“陛下的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廩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譬如一个病了十年已治好的人，身体还很衰弱，却要他挑一担米，且走一百里路，这能行吗？隋末之乱不止十年，陛下虽将平定了，但国家元气还未恢复，就认为功成业就，要去封禅，我对此是怀疑的。何况隋末大乱之后，不少地方还是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陛下封禅，万国咸集，这就将自己虚弱向外暴露，且竭财赏赐也不能满足远人的愿望。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遇水旱之灾，百姓就更难以生活，如有人煽动就要出现动乱，那时悔之晚了。”太宗听了不能反驳，于是停止了封禅。

魏征还认为治国要取信于民，并要上下守法。唐朝规定十八岁的男子才开始服兵役。626年，太宗因征兵较难，为扩大兵源，决定征十六岁以上的健壮男子。魏征屡谏以为不可，认为这是“失信于民”，几次抗旨拒绝签署命令。太宗质问魏征为何说他“失信于民”？魏征对说：“您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蠲免征以前拖欠国家的财赋，但是有关部门还在催交；您出敕命令：已经服役、已经交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又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唐太宗终于同意不征不到年龄的兵，说：“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是治理不好的。”贞观初，汉州刺史庞相寿贪污被告发，受到追赃撤职处分。他是唐太宗的老部下，向太宗求情，请原谅他。太宗认为他贪污是因穷，便赐他一百匹绢，叫他以后不要再贪污，仍让他继续当刺史。魏征知道了上书反对，指出太宗枉法徇私的错误，并说“你过去为秦王时部下很多，他们贪污都得到原谅，那影响就坏了。”太宗不得不改变对庞相寿的处理。

与君主协契故成一代良臣

魏征之所以敢谏，首先是因唐太宗善于纳谏，而唐太宗能始终纳谏，也与魏征善于启发和引导有关，这才能形成贞观的新风，即君臣以诚相见，知无不言。正因魏征敢谏，太宗纳谏，君臣协契，同心竭力治好国家，太宗得了明君的美名，魏征也因此成了一代良臣。

如果魏征奉事的君主不是唐太宗，而是别的昏庸的暴君的话，他也不敢谏，他如敢谏，纵使他有百个脑袋也被砍掉，他只能成为忠臣，决不会成为良臣。有一次，唐太宗在丹霄楼欢宴群臣，太宗说：“魏征、王桂以前在东宫时，尽力为东宫策划，当时诚是可恶！我能不念前怨提拔用之，可说无愧于古人。而魏征每次进谏，即使我不同意，他还是顽固地坚持，他为何这样呢？”魏征对曰：“臣认为错误的事才进谏，如果认为错的事也同意，恐怕会错办了。”太宗说：“你当时答应，以后再说不行吗？”魏征说：“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如果臣当面许陛下，之后又进谏，这就是‘退有后言’，这能说是以忠诚对待陛下吗？”太宗大笑说：“别人说魏征举动傲慢，我因其为人忠诚，觉得他很妩媚。”魏征拜谢说：“陛下鼓励

臣下知无不言，臣才敢进谏，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进谏，那敢多次触犯龙鳞？”魏征说的是心里话，太宗善于纳谏，他才敢谏诤。

魏征不仅敢谏，还不断对太宗启发和加深其认识纳谏的重要意义。首先是从理论上划清了明君和昏君的界线，使太宗从思想上认识到纳谏对治好国家的重要性。有一天，唐太宗问魏征：“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指出：任何个人所知有限，皇帝也不能例外，他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还举了许多史实说明这个观点。唐太宗连连点头称“善”。另是，魏征对唐太宗做有妨碍进谏的事他也及时进谏。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又鼓励提意见，因之上书言事的很多，其中有些与事实有出入，太宗对此很气愤，欲加以责罚，魏征担心这样做会堵塞人口，从此没有人再敢提意见了，便对太宗进谏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不对，无损于国家。”太宗赞同说：“此言是也。”

魏征不只是敢谏，他还善谏，故其所谏多为太宗接纳。他的善谏表现在善于抓住要害，且陈述得有理有据，使太宗认识到按照魏征的意见办会有利无害。

魏征向唐太宗上的《四疏》，古代史学者认为是“可为万代王者法”。这《四疏》说明了魏征善谏的本领。唐太宗生长于隋末大乱之世，他是揭起义旗推翻隋王朝的关键人物，在他取得天下后以隋亡为戒，魏征特总结隋亡的教训，以免使唐太宗重蹈其覆辙。“其一”指出了隋亡的原因：隋炀帝不是不想隋朝长治久安，而故意施暴政使之灭亡，而是因他自恃国家富强，可以任意而为，不顾后患所致。他搜刮天下的人力、财力、物力，以满足其无穷的私欲。他大建华丽宫殿，徭役无时停息；他穷兵黩武，向外示威；他重用奸佞之徒，杀戮忠正之士。正因此上下离心，人民穷苦不堪，国家四分五裂，终于被其部下所杀，子孙灭亡，为天下笑。“其二”认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要“居安思危”，“戒贪以俭”，“知足以自戒”。“其三”则强调“明德慎罚”，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赏罚要划一，不要因亲疏贵贱而决定刑赏的轻重。他还阐明“静之则安，动之则乱”的道理，认为隋末之乱是因“动”，即“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治就要“静”，即不烦扰百姓，要反隋之道而行之，“如果能想到隋之所以危，则可以安；想到隋之所以乱，就可以治；想到隋之所以亡，就可以存。”“其四”就指出“诚信”对治国的重要性，言而不行，是因言不信；令而不从，是因令无诚，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国败，为下则身危。为劝太宗慎终如始，他指出了太宗对纳谏态度的变化：“贞观初，闻善若惊，之后五六年间，还能愉快纳谏，从此，就渐厌恶直言，有时虽能纳谏，但是很勉强。”后来，魏征还上《十渐疏》，从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的变化，他指出：贞观初年，亲近君子，远小人，现在是表面上恭敬君子，实际是亲近小人，随便怀疑和斥退君子；贞观初年，虚心纳谏，现在是自负功大，骄傲自满，不愿再听下边奏事。如果知错不改，后果不堪设想。《十渐疏》对太宗敲了警钟，对太宗震动很大。太宗将之贴在屏风上，使随时看到，用以警惕自己。太宗能“慎终如始”，保持“贞观之风”，魏征的敢谏和善谏起了重要的作用。太宗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我平定天下，历尽艰险的，要算房玄龄的功劳第一。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忠言，安国利民，犯颜直谏，纠正我的过失，对我帮助最大的要算是魏征了。”

魏征一生廉洁奉公，他的住室连一个像样的客厅也没有。魏征病重，太宗到其家探望，抚之流涕，问他还有什么话说，魏征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意思是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担心国家的兴亡。次日早上，魏征死，时年六十四。太宗亲临痛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并下令按一品官安葬。魏征妻子说：“徵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羽仪甚盛，非亡者之志。”向太宗辞谢，只以布车载棺，不用文彩装饰。魏征出葬时，太宗登苑西楼，望着丧车痛哭。太宗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常保这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逝我失一镜了。”

三、刘晏理财“爱民为先”

在封建社会历史上，理财者大多只知搜刮于民，国库虽富裕，民则贫困。唐理财家刘晏理财却做到利国利民，其理财主导思想即“爱民为先”，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

《新唐书·刘晏传》记载：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玄宗到泰山封禅，那时刘晏才八岁，他到玄宗所住的行宫献《东封书》，玄宗看其文感到惊奇，不相信是八岁小孩所写，便命宰相张说考他，张说面试他后对玄宗说：“国瑞也。”玄宗即封他为太子正字，带他回长安，让他在国家图书馆里工作。人们称为神童，名震一时。后任夏县令。参加科举考试，“举贤良方正科”，后升京兆尹。760年，任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763年，升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不久罢相，仍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766年，任户部尚书，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盐铁、铸钱使，与第五琦分理天下财赋。779年，总领天下财赋。德宗即位后，其宿怨杨炎任宰相，刘晏被诬陷而死，时年六十五岁，天下冤之。他的家属被充军岭南，部下受株连者数十人。杨炎派人抄他家时，没收到的家财，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石而已”。刘晏理财二十年，且财权如此之大，管的范围又如此之广，而毫无积蓄，可以说是没有私产。刘晏以善于理公财著称，却从不治私财，他私人生活很俭约，所居简陋，饮食粗淡，家无腾婢，但对天下名士却慷慨好施，因此，人服其廉，又颂其德。

刘晏能改变安史之乱后唐朝财政紊乱状况，做到利国利民，其理财主要从下列几方面着手：

寓赋税增加于发展生产之中

封建统治者为填其无底欲壑，横征暴敛，使人民财力俱困，人民的血汗被榨尽时，不仅无赋税可增，统治者也将寿终正寝。刘晏理财则不然，他不增加赋税而却自然增加，其妙诀在于先做好利民之事，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发展农业生产，农民富裕了，户口随之增加了，不用催迫赋税，农民主动上交，赋税也就必然多了。概言之，即寓赋税增加于发展生产之中。

刘晏任夏县县令时就是这样做的。他到任后到农村调查了解，帮助农民解决困难，以发展农业生产，生产增加了，不用他派人催赋迫税，农民都自动按期上交，没有人漏税逃赋。刘晏任京兆尹时也很重视农桑生产，他认为：“王者爱人，不在赐予，而是应当劝导农民做好耕耘和纺织。”当时因安史之乱，百户无一存，田无人耕，田主也多逃亡未归，荒地很多，他奏请朝廷批准后，便组织开荒生产，凡户主回来耕种的免三年差科，原业主弃田耕的让别人耕租，随例交纳官税，因而使亨都地区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农业增产，人丁兴旺，赋税也就增加了。

刘晏征收税，首先是从便民、利民着眼。当地应交的赋税，如其所出产的土产卖不了，就以其所余的土产代赋税，运粮船有空时就将其运到需要的地方出售，这样可使官船不停航，促进商品交流，增加生产者的收入。有一年，关中粮食丰收，需外运粮食减少，便将运粮食的官船转运销不了的东南各州的手工业产品，运到长安和关中销售，这既刺激东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

国家也可增加税收。边远地区的手工业产品，因交通不便难于销售，也将之顶赋税，并运到附近产铜的地方出售，换回铜在当地铸钱，减少了铸钱成本，也使边远地区人民增加收入。刘晏征收赋税就这样利民利国，一举两得。其次，刘晏征收赋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丰、歉、荒年情况来决定其数额，平常年岁则照原规定征收，荒年则减少或全免，大丰年则有所增加，但只有十分之一。这样，就不会增加农民的负担，使赋税趋于“平敛”。

刘晏救灾是在其初萌时，而不是在成灾之后。在其初萌时百姓受害浅，国家赈灾款支出少：如在灾成之后，不仅百姓受害深，国家赈灾款支出多，而要恢复生产需要的时间更长，这就必然相应地减少赋税的收入。刘晏要求各州县报告风雪丰歉情况，及时采取消灭灾害措施，预先给予贷款或减免赋税。同时，组织农民以副救灾，帮助农民发展当地特产和副业生产，将之运到丰收的地方去换粮，或由国家用谷交换以供官用。依靠农民的力量来生产自救，不仅可渡过灾荒，且不增加国家的开支。“议者或饥晏不直接救”，河中少尹陈谏赞称刘晏这种赈救于灾前的办法很好，他说：“善治病的，不要使病人到危急时才治；善救灾的也不要等到灾祸遍地才赈救。这时，赈给少不足以活人，赈多国家开支多，以后又不得不增加赋税；如赈救有偏差，官吏从中作弊，必然是强的得多，弱的得少，真正受灾的得不到多大的好处，因为贪官污吏即使刀锯在前也是禁不了的。”

改革旧体制以利国利民

唐朝到中期后，因循守旧，弊政不少，至肃宗时财政极其紊乱，刘晏从参加管理中央财政至总领天下财政，其着重点是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其取得显著成绩的有三：

一是改革漕运。唐朝首都长安因人口日增，每年需从东南地区调粮百万余石供应。运输有水运和陆运，水运因三门峡险阻，运粮船覆者过半，由于损失极大，至三门峡时改为陆运，不仅费时费工，影响供应，且造成粮价暴涨，官吏则加重关中地区人民的赋税。刘晏经亲自调查研究，总结水陆运之教训，决定全从水路运输，即从淮水、泗水、汴水入河，西指长安到渭桥。由于长年战乱，河道无人整修，泥沙堆积，阻塞不通，刘晏便组织民力，全线疏浚，他不仅到前线领导，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还身先士卒，参加劳动。在刘晏和广大民工日夜奋战下，全线终于疏浚。过去漕运由各州县派“富户”督办，称为“船头”，他们征派民力，从中剥削，受害的还是百姓。刘晏便决定改为官运，从食盐价税中拨款解决漕运费用，雇用民力，而“不发丁男，不劳郡县”，大大减轻百姓的负担。以往经三门峡时出现覆船、是由于船不坚、牵索不牢、航路不熟，刘晏便建造专渡三门峡的坚固的大船，用竹子和麻制作坚实的牵索，船队过三门峡时，十船一纲，每纲三百五十人，三十人背纤，五人掌篙，稳妥地通过险峡，结束了过去船工经三门峡时船翻人溺、死无葬身之地的血泪史。粮运到达京城，代宗高兴得很，派卫士以鼓吹迎接刘晏于东渭桥，遣使慰劳刘晏说：“卿，朕肖何也。”从此，每岁运粮四十万石，保证了官民的粮食供应。由于水路畅通，物资交流也很方便。有一年，长安食盐不足，刘晏从扬州运三万斗，四十天便运到了，解决了长安官民食盐的困难。

二是改革盐政。肃宗即位之初，为补国用不足，实行食盐由官专营专卖，

由于官运官销，垄断盐市，弊病甚多，供应不及时，加上贪官污吏从中作弊，盐价由每斗十钱提高到每斗一百一十钱。由于盐价贵人民买不起，或因供点不普遍买不到，人民常常淡食。刘晏代第五琦主持盐政后，对盐政进行了改革。先是把由官专营专卖改为民产——官统——商销，即民可生产私盐，但要由国家统购，再由国家卖给商人去销售，国家卖盐给商人时，食盐的流通税则加在盐价上，并通令不准再对盐商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由于让民生产盐，盐产量迅速增加，国家就收到更多的流通税。而让商人销盐提高了商人销售的积极性。销售点遍布城市乡村，百姓买盐方便了。这对国家、产盐者和买卖者都有好处，国家实行食盐专营、专卖时，每年收入只有六十万贯，刘晏改革盐政后，收入增加了十倍，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三是改革“常平”工作。所谓“常平”工作就是稳定物价工作。物价的稳定与否对国计民生有很大的影响，物价的稳定标志着经济的稳定发展或繁荣，物价的暴涨将导致经济的衰退或崩溃。而粮盐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商品，稳定了这两种物价，人民生活就有了保证，刘晏任常平使后就对粮、盐仓库进行新的改革，其任务不仅是储存，主要还在于稳定物价，市场粮价下跌，常平仓就以较高些价格收购储存，以防谷贱伤农；粮价上涨，常平仓则以较低价格出售，以保证消费者的利益。盐货源是由国家控制的，为防止盐商抬价加重百姓负担，刘晏令在交通要道及偏僻地区设常平盐仓，盐价上涨时便将盐平价出售。

理财关键在于人事和情报

刘晏理财能取得如此显著成就，决策正确当然是重要的，但他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关键还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廉洁奉公的理财能手，并能及时掌握全国经济动态。

唐中期以后财政紊乱，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吏治腐败，用不得其人。刘晏掌财权后，他认为“官多则民扰”，裁减了大批冗官和贪官，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新理财人才，其数多达数百人，都年轻有为，办事敏捷。当时理财人才如此济济，跟刘晏知人善用和清廉方正有关。刘晏本人从不理私财，勤劳奉公，一早上班一直工作到傍晚才休息；他办事雷厉风行，事无滞留，当天事当天决，待人宽，对己严，又精通业务，办事有条有理，在他以身作则下，形成了一种廉洁奉公的风气。刘晏之后，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徵、李若初管理财政，都有名于时，而这些人都是刘晏的部属，是他培养和选拔的。刘晏用人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他认为“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这是说，士是科举出身，一般把名视得比利大；吏是幕僚出身，一般利重过名。因此，刘晏让“名重于利”的科举出身的士人掌管钱财的出纳工作，吏则管文书和其他杂事。不管士或吏都给予较高俸禄以养廉，所以，他们工作干劲都很高，对刘晏的指令坚决贯彻执行，虽在数千里外，一接到命令就立刻照办。

掌握情况则明，否则必暗。明始能作出正确的决定，把事情办好；暗则糊里糊涂，把事情办糟。刘晏做任何事情，都先把情况弄清楚，重大事情还亲自到第一线去了解，才作出决定。如他为解决漕运存在的困难及问题，亲自观察各地河道，“尽得其病利”后，才采取各种措施，改水陆两运为全由水运，终使转运及时又安全。又如他能使物价长期稳定，主要是他及时掌握

了全国各地经济动态。他令各地设巡院，利用原有的“驿传”，募人专职传递信息，这样四方物价的涨跌及存在问题，虽在远的地方数日间便可了解，故能及时采取措施调节市场，使物件得以长期稳定。

四、仲淹为政 先忧后乐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朝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心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1046年，跟他同科中进士、被贬于巴陵郡（即岳州，未时称岳阳）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拟将唐宋名人的诗、赋用石碑刻于楼上，也请范仲淹作文以记之，范仲淹便写这篇传诵古今的名篇《岳阳楼记》。这篇只有三百六十字的短文，文情并茂，气势磅礴，变化万千，他把自己的崇高思想融化于岳阳楼胜景之中，令人击节赞赏，对作者景仰不已。上面摘录的是《岳阳楼记》的最后部分，可以说是范仲淹的自画像：他不因得志而高兴，也不由于被贬谪而悲伤。当他在朝廷当政时，为民解忧；被贬谪地方时还想着怎样为君分忧。升官也忧，贬职也忧，那么到何时才快乐呢？他的回答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这两句话不是在写《岳阳楼》时才提出，而是范仲淹少年时的抱负，曾以此勉励自己，他是这样说了，在他从政一生中也是这样做了，这两句话就更发出了熠熠的光辉。“先忧后乐”的精神，是其遗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激励着人们为国为民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朝廷匡君直道改革弊政

《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祖先世居邠州（今陕西彬县），后迁苏州吴县。淹二岁时父亲死了，母亲远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及长，知自己的家世，便哭泣辞别母亲，前去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应天府书院，投在当时名师戚文同门下学习。他读书日夜不息，疲劳时就用冷水擦面以激奋精神，粮食不够便吃粥，一般人都受不了，仲淹却不以为苦。在名师教导下，他品学兼优，1015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便迎母亲来奉养。后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这时他才改原姓范，名仲淹。之后，曾任监泰州西溪盐税、大理寺丞、监苏州粮料院，主持应天府学等职。1028年，副相晏殊推荐仲淹为秘书阁校理。秘书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实际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使他有机会得以经常见到皇帝，“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每遇到对皇帝、国家、人民不利之事，都敢于进言。直言即使遭到贬职，但他没有退却，三次直言三次被贬谪，他仍奋不顾身，不改其“先忧”的初志。

1029年冬至那天，章献太后将受群臣朝见，仁宗皇帝率领百官向他叩头。仲淹早就对章献太后在仁宗已二十岁时还垄断朝政有意见，现在又要在朝廷上让仁宗朝拜，认为这有失君主尊严，便极力反对，说：“奉亲于内有家人礼，让皇帝服百官同列南面朝拜太后，这是不能为后世宗法的。”于是，便上疏请太后还政。这时，太后和讨好太后得任宰相的吕夷简当然对此不高兴，对仲淹的意见置之不理，但不久便下诏令，贬谪任何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通判。

仲淹虽被贬，见朝政有失仍敢直言。朝廷要建太乙宫及洪福院，远到陕西去购买木材，仲淹上书反对说：“大兴土木，又将劳民，不知有多少百姓

将破产，这是不顺人心、合天意的，应罢建寺院。”虽然朝廷不接纳，仁宗认为仲淹不同意建寺院是出于忠心的。太后死后，仁宗召回仲淹任言官——右司谏。以前非言官，仲淹还敢言事，现言事成为自己的本职，他言事更多了。太后临死时遗诏要立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范仲淹不同意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保育皇帝而代立为太后的，今一太后死了，又立一太后来参决军国事，天下人将怀疑陛下没有母后帮助就不行了。”1033年蝗灾、旱灾严重，尤以长江流域、淮河、山东半岛为甚，仲淹上书请派使主持赈灾事宜，却没有回音，便亲自向仁宗报告，并说，“如果宫中半日不食，那么怎样呢？”仁宗听了对灾民也表示同情，便派范仲淹前去主持灾区工作，他到处开仓赈济灾民。他完成救灾任务回京时，特带回饥民吃的“乌味草”呈献仁宗，请他传示六官贵戚，使他们知道人民的困苦，对皇室的奢侈之风有所收敛。仲淹敢言敢谏，威望日隆，宰相吕夷简政见与之相左，早想借故排挤，恰好这时仲淹带头反对仁宗废郭皇后，便贬他任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后又改任苏州知州。

1035年，因仲淹在苏州治水有功，被仁宗召回京，给天章阁待制荣衔，实任开封知府。仲淹对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提出了批评，他向仁宗献“百官图”，就图中所列百官调升情况，指出哪些人是按规定升迁的，哪些人是宰相以私人关系提拔的，并说：“对于近臣的进退，不宜全委之宰相。”他又上“四论”批评时政，并说：“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吕夷简大怒，反唇攻击仲淹说：“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明党。”仁宗无子，仲淹曾建议立皇太弟，对此仁宗不高兴，吕夷简就借此贬仲淹到饶州任知州。殿中侍御史韩渎迎合吕夷简的意旨，请将仲淹的朋党写在榜上，张挂于朝堂。于是，秘书丞余靖向仁宗说：“仲淹以一言触怒宰相，就被贬谪，而所言只不过陛下母子夫妇之事，陛下已经优容不追究了，臣请取消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动承认与仲淹是师友，且尝荐己，愿一起受贬。馆阁校勘欧阳修因谏官对仲淹被贬，坐视不言，致书责之。余靖、尹洙、欧阳修三人为仲淹鸣不平，也都被贬。

仲淹三次直言三次被贬，人们认为他一次比一次光荣，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在饶州一年多，先后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西夏侵扰，攻延州（今陕西延安），1040年，仲淹被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他进京辞仁宗之后，便挂帅赴陕北与西夏作战。他筑兵寨，联诸羌，任用狄青、种世衡等名将，打退西夏军，从此西夏不敢正视延州。由于仲淹立功于边陲，尽忠于疆域，得到了仁宗的器重，召拜枢密副使。这时欧阳修、余靖等人也被任为谏官。在欧阳修等谏官极力推荐下，仲淹被拜为参政知事，即副相。于是，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项整顿政事的主张，为仁宗采纳，立即按范仲淹的建议以诏令颁布全国，史称“庆历新政”。仲淹为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行，首先从整顿吏治入手，不称职的降黜，有德才的提拔，一时吏风大变。对于调查属实的赃官，他毫不留情地在班簿上用笔勾掉，有人对他说：“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仲淹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有人哭好些！”庆历新政实行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开始一新。因新政触犯贵族的利益，他们群起攻之，蜚语四起，范仲淹、欧阳修被斥为朋党，支持仲淹的石介被诬陷有废立皇帝的阴谋，宋仁宗退缩了，至1045年初，新政被废殆尽。支持新政的相继

被贬出京，仲淹被免去参政知事，贬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

在地方居职清正为民解忧

范仲淹从任地方小官到当大官后的每次贬谪，在本职范围内尽力为民做好事，即使是在职范围之外，他发现不利于民的事和人民困苦的处境，都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为民解忧，确是“进亦忧，退亦忧”。

范仲淹对人受冤，敢于昭雪；对权贵鱼肉人民，敢于按法处理。从他入仕途开始，即中进士后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广德军太守以情代法，冤狱甚多，他将连年积案复核审查，发现冤案就向太守辨清是非，因他按法据理力争，使案情得到澄清。他任开封府知府时，对皇亲国戚、官僚豪强横行不法的，坚决按法处理。如有内侍仗势作恶，怨声载道，历任知府不敢动其毫毛，仲淹到任后，核查事实，决定将之严惩，但他知道内侍是皇帝的内宠，触犯“君侧小人，必得罪以死”，在向儿子嘱以后事后，上疏请朝廷将之惩办。由于范仲淹按法严治，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

范仲淹在本职是尽忠职守，但非本职之事只要能为民解忧的，他也主动争去做。他任监泰州西溪盐仓时，因见海堤多年失修，已坍塌不堪，大海汐一起，不仅盐场亭灶被毁灭，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尽管修堤非其职责范围，他为修堤救民，便上书江淮漕运使张纶建议修复海堤，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向朝廷上奏，并推荐仲淹作兴化县令，负责治堰工作。1024年秋，仲淹率领民工四万余人，亲临筑堰前线，参加运土、夯上。当筑堤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时，忽起大风雨，跟着又来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这时，有人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复”。但在仲淹等人的坚持下，继续修堤，在1028年春，终于完成了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堤工程。从此，盐场和农田的生产有了保障。去年受灾流亡的数千民户返回家园。当地人民感激范县令的功绩，把海堰叫做“范公堤”。范仲淹贬苏州时，也为自己故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由于苏州水利长年失修，河道淤塞，水流不出，每至雨季，经常出现“湖溢江壅”，“田多水患”。仲淹到任后立即奏请朝廷复修苏州水利工程。仲淹亲临工地，与广大民工一起露宿山野，参加修复劳动，过家门也不入。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复修了苏州水利工程。因旧有河道疏通，水患遂息，使苏州成为宋代旱涝保收的大粮仓。

前面曾提到仲淹奏请皇帝救济灾民事，正是由于仲淹为民请命，使成千上万的灾民得到赈济而免于饿死。仲淹一到灾区，每到一处，就令打开仓廩赈济灾民，调拨江南大小麦豌豆五十万石北运京东的重灾区，还减免赋税，发放官钱，率领灾区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大灾之后，瘟疫流行，仲淹派医施药治疗，制止了瘟疫的扩大。

“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范仲淹高风亮节，为后人所敬佩。司马光称赞他是“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这并非溢美之词。

一个人高风亮节的形成，跟他自己的处境、努力和所受教育都有关系。仲淹幼时生活孤苦，勤奋读书，以及后来在名师戚同文的言传身教下，对他节俭奉公、居职清廉的政风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而八载寒窗，使他精通六经

博古通今，吸收古人的崇高思想，故年轻时便立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志。

他曾在长白山麓的鳧泉寺寄宿读书，虽吃粟米粥而不以为苦，在应天府求学时也如此。有的富家的同学见他终年吃粥送给他佳肴，他不愿吃人的施舍，推辞不得，让它发霉，后人家怪罪，他长揖谢说：“已安于喝粥，一旦享受美餐，恐日后吃不得苦。”贫困的生活，养成他节俭作风，也使他深刻体会到贫穷之苦。及其显贵，妻子亲自做饭，没有宾客不吃两份肉，衣服也很俭朴。

仲淹自己节俭，但慷慨好施。他任杭州知州时，已经六十一岁了。子孙劝他在洛阳建别墅以乐天年。这时，因他节俭和边功得到赏赐有一笔钱，他不同意为自己建“安乐窝”，却用这笔钱来置义庄、义田、义宅，以瞻济贫苦族人。有一次，他被贬出京，将所存的三千匹绢，分送亲戚、闾里、知旧。任越州知州时，属下一小官病死，子幼无以生活，他将自己薪俸之余送去。另一小官病死无钱安葬，他也给钱安葬。

热心劝学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风气，范仲淹尤其热心。他在苏州买了一块地，有位风水先生说：“这是块宝地，在这里建房室将相辈出。”他笑着说：“只有我家贵，那如天下士都贵，士人辈辈在这里受教育，将会不断出现贵人不是更好么。”于是，他在这块“宝地”上建了学校。他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关心兴学，后来做到宰相时，下令州县一律办学。他负责应天府学教务时，对学生谆谆教导，使学风一新，对于来学困难的学生也加以接济和帮助，有位名叫孙复的就是得到他的支持而学有所成。还有许多著名学者，如胡瑗、张载、石介等，都得到他的帮助。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始终“忧君、忧民”，不计较个人私怨。他与宰相吕夷简政见不同，对他所为多作抨击，曾数受贬斥，吕夷简罢相后再入相时，仁宗帝要他与夷简释前嫌，他叩头谢说：“臣所论都是国家事，对于夷简没有个人嫌怨。”他曾上奏要太后还政被贬官，太后死，言事者多揭露太后时的错误，独仲淹向仁宗上奏：“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陛下十余年，她也有功劳，宜掩盖她的小过，以全后德”。

1052年，仲淹调任颍州知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五月二十日到余州时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仲淹由于乐善好施，死时积蓄已尽，家人贫困无钱安葬。因其当政时为民解忧，邠、庆二州人民与所属羌族，都画像立生祠奉祀。他死时，羌族酋长数百人，哭之如父，斋戒三日才回去。

五、包拯无私 执法如山

包拯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律家，他以刚正不阿、为民伸冤而扬名后世。

包拯所捍卫的当然是封建法制。封建法制制订的主旨在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并使百姓服服贴贴受其统治，以达到其统治的长治久安的目的。但法制终究是解决矛盾的产物，所以明智的封建法学家在制订法律时，也不能不考虑到百姓的一定利益，不然必将引起新的动乱，其统治就难于巩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百姓的利益是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长治久安的主旨的。但法律的实施如何，还是决定于掌握法制大权的人，落入贪官的手里，其所标榜的“明镜高悬”，实是暗无天日，冤情遍地；在清官手里，百姓则不至于伸冤无门，是非澄清无望。包拯就是这样的清官，由于他为人峭直，又有较浓厚的“民本”思想，故不畏权势，为民伸冤，这在无官不贪，有冤无处诉的封建社会里，当然使百姓感恩戴德，有口皆碑，把他看成救世主。

尔后当人们受到贪官污吏的勒索，或蒙受冤屈时，总希望再有一位“包公”出现，于是他的事迹越传越奇，人们并按照自己的愿望编成小说、戏剧，使这位包公的声誉越来越大，他虽已逝世了九百三十年之久，他执法如山的高大形象还活在人们的心中。

为人峭直从不徇情谋私

《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中进士后，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小官，他为人至孝，因父母亲年老，为侍奉双亲不肯就职。后数年，父母亲相继去世，他办好丧事还是守候在双亲墓地，乡里中父老多次劝勉，他还是不愿离开，过了较长的时间，朝廷派他任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他才赴任。后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县，1043年，调首都开封任监察御史，得以参预朝政。之后在中央财政机关任职，过了几年又调任谏官，两年后，调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任地方官。1056年，调回首都任开封府尹，也任过天章阁侍制和龙图阁直学士。1060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使（相当于副宰相），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病死于开封。

包拯为官清明，他最恨贪官污吏。他说：“清廉的官吏，是人民的榜样；贪污的官吏，是人民的强盗。”他曾留下一条祖训：“后世子孙当官的，犯贪污受贿罪，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于本家坟地。不从我志的，就不是我的子孙。”他要求将之刻在石上“公昭后世”。包拯一生确是廉洁奉公，他任端州知县时便充分表露他廉洁爱民的风格。端州产砚石，制作的砚石质好刻工精，唐时已负盛名，宋代规定每年要进贡一定数量的砚石，历届县官都趁机大捞一把，征取砚石竟数十倍于进贡之数。包拯到任，按照规定进贡之数征收。过去砚工因贪官征收数量过大，终年劳动除去贡砚外所制的卖钱不够裹腹，怨声载道；现在包拯一下减少了数十倍的贡砚，百姓奔走相告，欢声载道，盛赞包拯为官清明，包拯也就深受百姓爱戴。当他离任时，百姓精制一砚，赠送他作为纪念，包拯也婉言坚决谢绝，“不持一砚而归”，其清廉如此。

包拯从不徇情谋私，其所论都是国事，不谈私人关系，对亲友也如此。

他主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庐州是他的故乡，亲戚、朋友甚多，他到庐州全部谢绝私人来访。其堂舅因现任知府包拯是他的外甥，以为有了靠山，便仗势欺人。受害人向包拯告状，包拯查明实情，立即将其传来，当堂对证，其堂舅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包拯便命衙役打其堂舅七十大板。包拯依法惩治其堂舅，人们称赞包拯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从此，包拯的亲友不敢再仗势横行、为非作歹。

刚正不阿弹劾权臣国戚

无私才无畏。包拯性峭直，既不搞阴谋，也不懂得耍两面派那一套。他嫉恶如仇，喜怒形于色；他是非分明，正确的竭力支持，错误的坚决反对。正因此，他对权臣、国戚毫无畏惧，敢于弹劾。

弹劾国戚张尧佐便是他无私无畏精神的具体表现。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仁宗因宠爱张贵妃，一下子授予张尧佐四个要职：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官使、群牧置制使。张尧佐无才无学，因是贵戚而得任高官，引起满朝不满，群臣极谏，仁宗不理。包拯却不罢休，连续上本对此事进行尖锐的批评，指出这不仅违背“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的用人准则，且将导致外戚窃权。包拯的谏净和迫于舆论的压力，仁宗才免去了张尧佐的景灵台官使和群牧置制使两项要职。由于包拯所谏的是为国而不是为私，因此他言事都毫无顾虑。仁宗无子，有些大臣由于建议立继承人而被贬斥，可是他上奏说：“陛下久没有立太子，天下都以为忧，不知是什么缘故？”仁宗问他：“你想立谁呢？”包拯说：“臣建议立太子，是为宋宗庙万世计，陛下问臣想立谁，是怀疑臣有什么企图。臣今年已七十岁了，又没有孩子，不是想为立太子邀功而为后代造福。”仁宗说：“容后商议”，对于包拯所奏他事，都一一批准施行。

在封建社会里，是非多由有权势的决定，贪官可美化为清官，清官可丑化为贪官。因此，贪官往往晋升，清官竟被冤杀，是非竟颠倒如此！包拯任监察御史时，转运使王逵弹劾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任中师素以廉洁著称，王逵是贪鄙小人，为何王逵竟告起任中师来了，人们畏惊王逵权势，都不敢过问此事，替任中师鸣不平。包拯便亲到陈州去调查此事，经过多方了解和掌握证据说明，原来是王逵恶人先告状，苛剥农民，多收钱粮的正是王逵，而不是任中师。真相大白后，包拯回京向皇帝上奏，要求惩办王逵，逼其将贪赃退还农民。

由于包拯为人刚毅，不畏权贵，依法办事，他在开封府和中央任职时，贵戚、宦官惊其弹劾，其跋扈行为有所收敛。史称：“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意思是说包拯为人铁面无私，为人很严厉，很少有笑容，连京城的儿童和妇女都知包拯其人。京城人都说：“关节不到，有阎包老。”阎罗是梵文（Yama-rajā）的简译，传说是主管地狱的神，亦称“阎罗王”、“阎王”，据说其办案公正无私，旧时比喻刚直、不怕权势的官吏，所以京城人把包拯比作“阎罗”

为民伸冤留下“包青天”美名

包拯之可贵之处在于为民伸冤，他惩办侵吞人民的权贵与罪犯，维护平

民的利益，因而留下了“包青天”的美名。

宋朝旧的法律规定，告状的人不准径直到法庭上，申诉必须先将状纸文给“门牌司”，由其移交，这样“门牌司”便从中勒索，并暗中作鬼使案情复杂，有冤的不能详诉其冤屈。包拯任开封府府尹后，认为这种告状程序易使官吏作弊，要为民伸冤，必须让民直接来法庭告状，于是他取消旧告状程序，大开正门，凡告状的都可直接到法庭上陈述曲直，申诉冤情，官吏不得阻拦。这在法律上，是项重要的改革，减少了“门牌司”的转递手续，不仅可使告状者不被勒索，更重要的是可使审判官直接了解案情，有助于进行正确的判决。

包拯办案办事一个特点是：凡是侵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他都坚决处理或奏请纠正。在开封府的惠民河两岸，有不少宦官和权贵用土填河建筑花园亭榭，致使河道阻塞，适遇京城有大水，水排不出，造成洪水灾，使无数平民无家可归。这时包拯任开封府府尹，他了解到河道阻塞造成洪水泛滥的原因后，决定将之摧毁，有的宦官和权贵便拿出地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经包拯审验发现有不少是伪造的，便将情况向上奏报，将这些宦官和权贵侵占河面用来建的花园、亭榭全都毁掉。包拯任中央三司户部副使时，秦陇斜谷造船用的木材都索取于民，七个州建造河桥的木材也都向民征取，而且数量达数十万之多，这就大大加重百姓的负担，包拯上奏请取消这种剥削百姓的做法。契丹聚兵将南侵，边郡告警，朝廷向包拯前往河北负责调运军粮时，他发现漳河两岸土地很肥沃，可是不让农民耕种，却征用邢、洛、赵三州民田多至一万五千顷来牧马，他便上奏请将田还给农民耕种，朝廷准其所奏，这样可解民困，增加粮食，也可供应部分军粮，实是利民利军，一举两得。解州产的盐，生产和销售原都由官方垄断，包拯认为这不利于流通，对民不利，便奏请允许商人买卖。稍后于包拯的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说：“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包拯办案言事取得最佳效果，也由于其人机智，他初任天长县知县便显示办案之明智。有某人的牛舌被人割了，某人来向包拯控诉，包拯说，“你回去把牛杀来吃了”。某人回去照办，不久有人来控告某人私杀耕牛，包拯说：“你为什么割了某人的牛舌又来告他？”这人以为事情已暴露，只好承认。这人没有偷牛而只是把某人的牛舌割了，显然是在陷害某人，包拯为什么叫某人把牛杀吃了，因为宋朝法律规定杀牛是犯法的，既然这人想陷害某人，知道某人杀了牛必来控告，这样，这人就自投罗网了。

包拯一生刚正不阿，为国为民，其生时已得到朝野的敬重，朝廷士大夫以至远方学者都不称呼其官名，而是称为包公；及其去世，忠贞之士痛哭夫声，京城吏民莫不悲伤，叹息之声，闻于街道。远到边疆民族也慕其名。据《甲申杂记》记载：西羌于龙阿归顺宋朝后，对押运使说：“平生闻包中拯，朝廷忠臣。某既归汉，乞赐姓包。”神宗同意其要求，赐姓名包顺。

六、苏轼升贬 始终爱民

苏轼诗词文章，雄健豪放，有如行云流水，当世惊服，后世传诵，被称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苏轼诗词文之美，人都知之；其道德之美，言者则少。他历知数州，为官清正，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是个好“父母”官；贬滴荒漠，躬耕自养，与民共甘苦。由于他诗词文美，道德也美，两美互相交映，故苏轼大名永垂后世。

为官清正爱护百姓

《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在外游学，由母亲程氏教他读书。程氏读东汉《范滂传》，不胜感叹。苏轼说：“轼学滂的为人，母亲同意吗？”程氏说，“儿能为滂，我能不为滂母？”范滂为人刚直，疾恶如仇，他敢于抑豪强，结交太学生反对宦官，因党锢之祸被杀。被捕时向母亲告别，其母以滂能与李膺、杜密等一起就义感到光荣。从苏轼与母亲的问答，可见苏轼少年时的志向，而母亲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及长，博通经吏，下笔数千言，好读贾谊、陆贽的书，后读了《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二十一岁时进京应考，中进士。欧阳修读其文大为赏识，说：“吾当避此人一头地。”神宗时曾任开封府推官、礼部员外郎，知密州、徐州、湖州。因对王安石新法有不同意见，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登州、杭州、颍州、定州，官至礼部尚书。后贬谪惠州、儋州。最后北还，病死于常州，追谥文忠。

苏轼任地方官时，关心民瘼，为民伸冤，每遇灾害奋不顾身。他任开封府推官，按法公断，决断精敏，诉讼无滞留，公事未完，直到深夜才休息。1076年，苏轼知徐州。翌年八月，黄河决口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淹没了四十五县，三十万顷良田一片汪洋，洪水汇到徐州城下，城将淹没。城中富民争相外逃以避洪水，苏轼说：“富民走了，民心动摇，谁与我守城？只要我苏轼在，决不能让洪水淹没城。”便下令将富人全部赶回城中。苏轼还冒着暴风雨亲到徐州军营，动员官兵们共同守城，说：“城将被洪水淹没，现在危急得很，驻军要尽力护城，我跟大家一起与城共存亡。”驻军将官见苏轼泥浆满身，不辞劳苦组织防洪，军官大为感动说：“太守还不避洪水救灾，我们驻军岂能袖手旁观，誓当效命！”便率领驻军持备铺到防洪前线，筑东南长堤以阻洪水涌入城中。可是，暴雨不止，眼看城将被淹，苏轼日夜在城上指挥抗洪，过家也不入，布置官吏分头堵水，经过英勇奋战，终于保住徐州城。苏轼还向朝廷奏请，调来民夫建筑堤防，以免徐州城再遭洪水之祸。

苏轼曾两次在杭州当官，第一次是任杭州通判，时新政日下，轼每因法便民，民赖以安。第二次是在十二年之后，他再到杭州任知府，为民做了不少好事，1090年春，苏轼再到杭州时，恰逢杭州大旱，瘟疫流行，他立即向朝廷上奏，要求免本地区上贡米三分之一，并调粮救灾。又将公粮减价出售，设饭舍施粥以赈饥饿百姓，又建医站和药局、行坊治病，被救活的病民很多，终于制止了瘟疫的流行。

杭州近海的地方，地下泉水咸苦，故居民缺水。唐刺史李泌引西湖水，

凿井六口，人民才能吃淡水。白居易知杭州，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引水入田，灌溉田达千顷，农民得以丰收。自唐至钱氏，每岁都浚治。及宋，湖水横封淤塞，六井也废湮。漕河淤塞，水取给于江潮，而江潮每至，泥沙淤积。舟行困难，不得不三年淘一次，劳民伤财。苏轼知杭州后，经亲自观察，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潮水，便疏浚二河以通漕。又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从此江潮不复入市，河道不淤，舟楫通行。苏轼还浚治六井，他还采纳了老僧子珪的以瓦筒引水，筒外盛以石槽的建议，以瓦筒把六井水引到千家万户，使百姓取水很方便。不久杭州大旱，杭州人赖六井以生。宋初以来，西湖不浚多游淤，苏轼认为如不再采取措施，不仅无西湖，不能再发挥西湖蓄洪灌溉之用，其后患不堪设想，便制订了以西湖淤泥筑长堤的计划。他筹措钱粮、募人力，建筑长堤，南北径三十里。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州人称为“苏公堤”。苏轼还设计了更大的开发运河系统以利民的计划，因其离任不能实行。苏轼在杭州，因有德于民，家家有其画像，饮食必祝，感其为民谋利之恩，又建生祠以纪念他，苏轼得人心如此！

几经贬谪而不改其志

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政不是全部反对，对其扰民的则反对，对利民的则支持，正因此，他成为新旧党争的受害者。当王安石推行新政时，苏轼上书论其不便，因而被新法附和者御史李定等所构陷，从其所写讽刺新法的诗中罗织罪名，说其“讪谤朝廷”，兴起“乌台诗案”（我国历史上著名文字狱之一），险些遭到杀头，后谪贬黄州。神宗死后，哲宗继位，起用旧党司马光，全面废除了新法。这时苏轼也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等官，但他对旧党尽废新法持有异见，他任地方官时亲眼看到某些新法的实施确对人民有好处，主张利于民的新法应该继续施行，从而受到旧党程颐一派的攻击，被贬出京。

苏轼与王安石政见虽不同，但两人私交甚深，在王安石下台后，两人仍有会面或书信往来，不因政见不同而影响彼此关系。在反对王安石新法上，他与司马光是站在一起的，但当发现司马光的错误做法又对他进行批评。可见苏轼所反对的是从公事出发，而不存在个人的私见，其为人是多么光明磊落，他认为对国对民不利的便应该批评，不管他是谁，他是对事不对人。他被贬居常州时，有一次经过金陵，这时王安石已解职在这里闲居，他往拜访王安石，两人讨论当时局势，苏轼说：“兵祸连起，屡兴大狱，这是汉、唐灭亡之兆。宋太祖以仁厚治天下，正是为革除这些祸患。今在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地区又数兴大狱，公为什么独无一言？”安石说：“安石在外，安敢言。”轼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本是事君的常礼。但皇上待公的是非常之礼，公对待皇上，岂能以常礼对之？”安石认为苏轼说得对，说：“安石一定说。”王安石改差役为免役，差役害大利少，免役则利多害少，司马光当政后凡是新法部废，他对免役只看到其害而看不到其利，便废免役，恢复差役，苏轼便与之力争。司马光还是坚持己见。苏轼便将此事提到政事堂来讨论，司马光很恼火，苏轼理直气壮他说：“以前韩魏公杀陕西义勇，当时你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高兴，你也不顾。你曾将那次争论详细告诉我，今日你当了宰相，为什么不许我把话说尽呢？”说得司马光也笑了，

承认自己不应该发火。

苏轼反对新政的是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从总的方面说，王安石实行变法是当时必需，方向是对的，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时看出了其中的弊病，故写了《上神宗皇帝书》，此书的内容，正如苏轼在书内所说，“臣之所以欲言者三：‘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书中引古证今，说明国家成败是看人心的向背，风俗的厚薄，和纪纲的张弛，尽管其中的论述反映了苏轼的某些保守观点，但确是指出了新政存在的问题。他曾当面批评神宗的错误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虽悚然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结果却依然故我。这“三言”不仅是神宗所犯的错误，也是王安石的错误，是新法失败的主要原因。神宗执政时，宋朝“积弱积贫”已久，要改变这种局面，当然需要改革过去的弊政，但任何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太急了就会翻筋斗。任何善政的实现，关键在于用得其人，改革也如此。由于当时皇帝支持改革，一些投机之徒纷纷以改革派自居，钻入改革派混水摸鱼，如蔡京等人；而实行改革，旧官僚多反对，就需要进新人，这些人虽有魄力思想敏捷，却缺乏经验，如任用吕惠卿等有才缺德的“小人”。何况新用的人也有不当的，加上新政推行过急，故往往出偏差。要实行改革，必须广泛听取意见，问题是听言太广而思虑不周，不经试验，便草率作出决定，广泛推行，也会出问题。苏轼的“三言”也可以说是总结了王安石改革失败的教训，可作为后世改革的借鉴。苏轼并不反对改革，而是反对错误的改革。他早对豪强兼并是不满的，曾提出了“变政易令”的主张，并针对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积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后来他不同意司马光废除有利于民的新政，也说明了苏轼并不反对改革。

综观苏轼一生的言行，可以说是一个忠君忧国爱民型的士大夫。他从小便受母亲的教育，勉励其以范滂为榜样，后他喜读贾谊、陆贽的书，也因这些书敢于抨击弊政，主张行仁政，母亲和范滂其人以及贾谊、陆贽的书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如他中进士的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援引古代帝王施行刑罚的范例，论述刑赏必须以忠厚为本，阐述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对于违背仁政，于国于民不利的事，在他初出仕途时就敢于抨击：1071年正月，苏轼任开封府推官，当时宫廷下令于元宵节前低价收购浙灯四千余盏，禁止民间私相买卖，乃上《谏买浙灯状》，要求取消这种对民间的无理剥削，神宗终于取消成命。对神宗的纳谏，苏轼“惊喜过望，以至感位”。为向神宗效忠，便“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写了给神宗皇帝的万言书。苏轼当官时敢言敢谏，贬官时不便于言，也要请能言者言之。如因见“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地区又屡兴大狱”。认为这是亡国之兆，便请王安石出面进谏。这说明，苏轼几经贬谪，而其忠君忧国爱民之志不改。《宋史·苏轼传》的作者在“论曰”最后指出：“苏轼不得为相，难道不是他的幸运吗？有人说：‘苏轼如能稍自隐藏，收敛些，即使不得掌大权，也可避免祸患’。假使苏轼改变其敢于抨击弊政的风格而是这样做了，还会得力苏轼吗？”

逆境躬耕自乐与民共甘苦

苏轼在其一生中，在朝当官时间不长，大多被排挤到地方当官，而且屡

次迁调，或贬滴荒蛮之地，而他最有贡献的是在哪些地方？苏轼用诗回答是：“问你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并非自嘲，事实确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时期，处于逆境的他躬耕自乐与民共甘苦，有人说这时期他是“人民之友”。不，他事实上已还原为一个普通的平民，已成为人民中的一员，而且他以此为荣，这是一种最崇高的品格。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创作许多优秀的诗词散文，成为千载传诵的杰作。“诗穷而后工”，如果苏轼不屡遭贬谪，也就没有这些辉煌的词章，苏轼也不可能成为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总的说，苏轼在这个时期，他的道德更崇高了，诗文更妙绝了，他才能不朽。

苏轼为人是非分明，无所畏惧，即使受排挤或贬滴，也绝不附和权贵，宁愿处于穷乡僻壤躬耕自养。他因“乌台诗案”下狱，一出监狱就写诗二首。其一有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终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这是说他以诗文得罪，这次被贬黄州，而“塞翁失马”未知是祸是福，但是决不学像贾昌一样以斗鸡得宠的那些人的所为。他写了这些诗句后自嘲他说：“我真是不可救药”。苏轼为官清廉，又慷慨好施，积蓄不多，贬黄州挂的团练副使是个空衔，实是削职为民，长此以往实难生活，经友人的帮助才请得城东的营防废地数十亩，自己开垦耕种。因这里地名“东坡”，苏轼便自称“东坡居士”。苏轼在“茨坡”的耕种生活，在他写的《东坡八首》及其“并叙”里说得很清楚。“并叙”说：“……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慰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在这“茨棘瓦砾之场”开荒，又逢大旱，使苏轼筋疲力尽，但他还是勤于耕耘，希望来岁有收获以维持生活。这时，苏轼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农夫，他所想的也是一般农夫所想的。《东坡八首》里还写苏轼如何虚心向农民学习耕种技术，及其自耕自食之美：“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甑。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当时苏轼才刚开垦，而他过去吃的是因储久而发霉的官仓米，他想像到新春便可吃到收获的一筐筐雪白如玉般的新米，它比官仓米的味道多美呀！苏轼在日间耕耘，晚间就欣赏自然风景之美，自得其乐，如他写的《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新，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锵然曳杖声。”意思是说：雨洗后的东坡，月色分外清新，这时四面寂静无人，只有诗人拄着拐杖漫步在石头路上，饱赏着这美好的夜景。

苏轼当官时敢于抨击害民的弊政，几经贬谪为民后，经过自己的躬耕及在民间的亲身体会，更感到当时统治的横征暴敛、穷奢极侈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因此，这时，他写的一些政治诗不只是站在人民旁边为民请命，而是站在人民中间，代表人民向统治者控诉了，他在惠州时写的《荔枝叹》便是明显的一例。1095年，他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市）时得赏荔枝美味，忆起汉唐统治者为了吃到新鲜荔枝而给人民带来无穷的骚扰和灾难，并联系当今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便以此为题借古非今进行猛烈的评击。这首诗开头写道：“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堆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鹊梅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意思是说：为了使杨贵妃吃到新鲜荔枝博其一笑，十里一驿站，接力运送；五里一土堡，官兵急催。送荔枝的马跑如飞，跨山越海，一路尘灰滚滚，因马跑过急，无数人跌落坑谷，死尸纵横相叠。接着作者愤怒地写道：“至今欲食林甫肉”。之后，作者直接联系到当朝的丁谓、蔡襄贡茶和钱惟演贡牡丹事，认为跟李林甫一样，都是为了谄媚皇上，同样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既然人民

“欲食林甫肉”，对于当时跟李林甫一样干那些劳民伤财之事的人，人民对他们的态度也是不会例外的。那时苏轼才遭“文字狱”之祸而被贬谪，他还是这样敢于引古刺今，且指名道姓公开谴责，这显示了苏轼的大无畏的精神。

苏轼于1097年7月2日至儋州，这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过的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六无”生活。开始还得住在官舍，后被逐出，儋州人对他深表同情，帮他建了茅屋五椽，未取丝毫报酬。苏轼在《与程孺书》谈及此事：“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这时，苏轼穷甚，食用困难，幸又得儋州人慷慨支援，据苏过《斜川集》记载：“物器或不给，邻里咸致所有。”“藟芋人人送，困庖日日丰”。在苏过的《夜猎行》小序中，还谈及黎族同胞捕鹿豨后，赠他父子鹿豨肉的事，苏轼在《和拟古》之九里描写他跟一位卖柴的黎族相遇的情况，以及黎胞赠他古贝布说：“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这位“家在孤云端”而“形槁神独完”的黎胞虽“笑我儒衣冠”，因“海风今岁寒”，赠他“古贝布”以御寒，可见这位黎胞对远贬儋州的苏轼是多么同情和关怀。儋州人民对苏轼的百般爱护，苏轼对儋州人民感情日深，在《和与殷晋安别》诗中说：“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绣面，指黎族）亲。”苏轼与儋州人友好相处，已成为其中一员了，后来他在一些诗中也说：“我本儋耳人，寄生在西蜀”、“馀生欲老海南村”、“他年谁作地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我们从苏轼写的一些诗中，也可见他与儋州人是相处无间的。例如《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总角黎家三两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午零风。”你看，连孩子们对苏轼是多么亲热，而苏轼这时心情又是多么舒畅，把这里看成是自己的理想境界了。

苏轼一生，不论升官或贬谪，都始终爱民，故处处得到人民的爱戴。苏轼热爱人民，人民给他以无限的力量，使他即使在最困苦的处境中，也得以愉快地生活下去，从而与人民打成一片，成为人民中的一员，这便是苏轼最可贵之处。

七、文相丹心永照汗青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
身世飘摇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文天祥写的《过零丁洋》。当时文天祥被俘在元军中，元军与南宋流亡政府在崖山海战前，元军统帅要文天祥写信给南宋流亡政府招降，文天祥便写这诗回答。这诗前六句是回忆过去苦读中状元和遭逢国家多难起兵救国以及被俘的经过，后两句是表明将以死报国的决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指爱国的赤心）照汗青（指历史）”。文天祥大义凛然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世爱国志士以他为榜样而为国献身。文天祥爱国的赤心永垂史册！

人如其文为民伸冤解困

《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吉州吉水人。“体貌丰伟，美哲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幼时就仰慕欧阳修、胡铨等忠于国事。二十岁，中进士，对策集英殿。时理宗在位久，厌理政事，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其言万余，不拟草稿，一挥而就，理宗深服其理又爱其文采，便亲拔为第一名状元。之后，曾做过几次京官，因触犯权贵而自请免职或被罢官：一次是元军南侵，宦官董宋臣劝理宗迁都，当时没人敢说其非，天祥上书请斩董宋臣，未被采纳，便自请免职；一次是因得罪当朝宰相贾似道，被劾去职。在天祥中状元后十多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任地方官，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文天祥一生，言行如一，这就是说其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历史有不少人文美而行丑，人们鄙其行而不称其文；而文天祥文和行都达到了美的高峰，两美合一，故成最美，为人赞美不已。文天祥的殿上对策是这样说，他任地方官时也是这样做了。他中状元那份以“法天不息”为对的卷子，先从天地、阴阳、四时运行不息，说到“道”也运行不息；又从道的不息，说到为人君也应不息；然后指出国家的贫弱，要求朝廷自强不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朝民困兵弱，是因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掠夺人民。他要求起用公道、正直之臣，实行公道、直道之政，才能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文天祥就是公道、正直之臣，他任地方官时就是实行公道、直道之政，以其个人有限的权力当然不可能改变宋朝“积弱积贫”的局面，但在其所管辖范围内，人民生活过得较好些，因而颂声载道。

1262年，文天祥任瑞州（今江西高安）知州。三年前，瑞州曾被元兵攻陷，掠夺杀戮，城郭萧然，满目疮痍，而以前官吏只知敲诈勒索，驻军也横行非法，故人民困苦不堪。文天祥到任后，“抚以宽慰，镇以宁静”，让人民休养生息。并设“便民库”，贷款和施粮救济生活困难的百姓。对于驻军

目无法纪的，即抓一些罪大恶极的处以重刑，使百姓不再受干扰，安居乐业。

1264年，文天祥任江西提刑，负责全州司法工作。历任官吏，大多贪污勒索，故冤案不少，而百姓伸冤无门，无可奈何，文天祥在任职期间，作到根据事实，按法判刑。还检查过去的案件，发现可疑的重新调查，如属于冤案则为民伸冤。如临江（今江西清江县）城内的金地坊，有个贫穷的姓陈的银匠，某天在市上看见一个人牵着一匹牲口，牲口背驮着一捆“关子”、“会子”（宋代的钞票），不由叹道：“我们这样苦，不过是缺少这一驮罢了！”第二天早晨，有人在慧力寺后山中，发现了那牵牲口的人的尸体。有人曾听见银匠说的话，便去报案，县官未经调查，便派人捉来银匠严刑拷打，银匠经不起酷刑被逼招认，终于含冤被杀。文天祥在翻阅旧案时发现这案大有问题，他认为哪能凭一人的口头揭发而毫无证据地定罪杀人，于是文天祥便亲到临江去多方调查，发现了两条线索：一是银匠被杀之日，李某用会子买祭品；二是那人尸体被发现的那大晚上，有人听到李某家暗阁上有响声。文天祥分析认为，李某买祭品可能是怕银匠死后变“鬼”来索命，故用祭品来求饶；李某家暗阁的响声可能是在埋藏关子、会子。他便派人去李家搜查，果然证实，终于为死者伸冤，杀人者偿命，陈银匠的母亲无人赡养，由官府赡养终身。1269年，文天祥任宁国府（今安徽宣城）知府。由于战乱和官吏压榨，宁国府社会经济凋敝，百姓困苦至极，文天祥到任后发现这种情况，立即向朝廷要求减免宁国府的赋税，并实行一些惠民政策，才使百姓得免于饥荒。文天祥在此任职仅一个月便调回京，百姓对如此好官突然离任很为惋惜，为感他的德政，自动捐钱为他立生祠。

御强敌奋不顾身无所畏惧

文天祥初入仕途之时，正是国家危急，南宋王朝最腐败之日。自宋高宗冤杀岳飞、与金议和以后，南宋王朝，以偏安江左为满足，君臣享乐腐化，西湖歌舞不休，“直把杭州作汴州”。尔后有一些皇帝虽想振作，但“积弱”势已成，每战多败，只好割地输金币议和，迄理宗、度宗朝政更糟，他俩都是昏君。理宗宠信奸佞，国事日非，尤其是联蒙古军灭金后，实是帮蒙古撤去自己屏障，为蒙古打开了直接侵宋的大门。度宗就更其荒唐，军政大事委任奸相贾似道，这个放荡子弟因靠姐姐受到理宗宠爱爬上高位，他骗上有术，理政治军无能，当元军大举入侵，贾似道率十三万大军抗元，在鲁港（今安徽芜湖南）大败，元军主力顺长江东下，逼近临安。这时度宗已经病死，由四岁幼子赵显继位，太皇太后全氏主持朝政，下诏号召各路军民起兵勤王，保卫京师临安。各地文武将官因见元军强大，南宋王朝摇摇欲坠，大部观望不动。那时文天祥在赣州（今江西赣县）做知州，他接到诏书，痛哭失声，立即集结州兵，发动郡中豪杰和少数民族响应，共得一万人，准备起兵入京保卫。他的朋友劝他说：“现在元兵三路进攻，京城外围已被突破，即将逼近京师，你以一万乌合之众前往，‘这无异于驱羊群以搏猛虎。’”文天祥说：“我也知道是这样。国家养育臣民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勤王，却没有一人一骑入关，我深以为恨。所以不自量力，决心以身殉之，使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果能这样，社稷或可保。”他将当官十多年薪俸所余全部用作军费。每与僚属语及时事，抚几痛哭，说：“乐人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初，文天祥要求拱卫京城，

知枢密院（主管军事）兼参政事（右丞相）陈宜中不同意，原来勤王的寥寥无几，临安空虚，朝廷才催促文天祥率兵入京，一到临安，文天祥就上疏，提出了抗敌的建议：“宋鉴于五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一时虽能矫尾大不掉之弊，但是抵抗外敌的力量也就逐渐衰弱。所以，敌兵攻一州则破一州，攻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以统御。以广西并于湖南建府于长沙，以广东并于江西建府于隆兴，以福建并于江东建府于番阳，以淮西并于淮东建府于扬州。专长沙取鄂，隆兴取荆、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广力足，这就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这样敌人就必须到处防御，其力量就分散，疲于奔命，又组织民间的豪杰起兵出没其中以干扰敌人，如能这样打退敌兵是不难的。”文天祥所说，确可增强抗元力量，是御敌的良策，但时议却认为其说“阔远”，朝廷也置之不理。

当文天祥率部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时，畏敌如虎的丞相陈宜中、留梦炎却在积极策划议和。三路元军包围临安时，文天祥主张与元决一死战，陈宜中主张议和，留梦炎却溜走了（后来投降了元军）。而太皇太后因陈宜中的活动已向元称臣，元军统帅伯颜则坚持非丞相亲来请降不可，陈宜中害怕被扣却跑了。太皇太后诏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部督诸路兵马，并派他和吴坚、贾余庆、谢堂等几位执政大臣到伯颜军营谈判，天祥据理与伯颜抗争，遂被扣留。吴坚等人被放回去办理宋朝投降事宜。1276年，元军入临安，太皇太后和幼帝宋恭帝投降。文天祥也一起被押解北上，经镇江时逃脱，历尽艰险始至福建。时益王在福州即位，任他为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旋又至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都督府，招兵筹响，坚持抗元。1277年，率部反攻江西，收复州县多处。不久在兴国战败，退入广东，屯兵南岭（今广东紫金南）。次年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遭元军突袭被俘。天祥吞刀子自杀，不死。文天祥被押到潮阳，见元军统帅张弘范，其左右命之拜，文天祥昂然挺立，弘范佩其为人，便以客礼相见，使作书招张世杰，天祥说：“我不能保卫父母，你却教我叛变父母，行吗？”弘范一再要求，天祥就书所写的《过零丁洋》与之，表示自己以死保国的决心。

状元名相烈士千古一人而已

文天祥原以抗元救国为己志，不幸在战斗中被俘不能再振宏图，其心中悲愤可知，更令其悲痛的是他目击匡山海战宋军溃败，以及耳闻陆秀夫抱幼帝赵昰跳海殉国的悲剧，正如他在《集杜诗·南海》序中说，“匡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时日夕谋蹈海，而防范不可出矣！”想跳海自杀不能，只能“坐北舟中，向南恸哭”。大破宋海军后，元军置酒庆祝，弘范强拉文天祥与会，并又一次劝他说：“宋朝已亡了，丞相忠孝已尽够了，如果能将你事宋的忠心改事元朝皇帝，你一定得任宰相。”文天祥流着泪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岂有为了逃其死罪而有二心呢。”一再表示其忠臣不事二主的决心。弘范义其为人，便派使护送文天祥到燕京。

文天祥在被押途中，曾在建康逗留两个多月，他为同押的宋官邓光荐编了诗集，取名《东海集》，意为应像鲁仲连那样，宁蹈东海而死。义不事秦。邓光荐病不能北上，赠文天祥《念奴娇·驿中言别》，赞扬文天祥百折不回的爱国精神，也为其壮志未成而惋惜。文天祥步原韵奉和了一阕，有云：“镜

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未灭。”文天祥曾自杀，因防范严不遂。及到燕京，被安置在会同馆，以上宾招待。供以美酬佳肴。文天祥却无动于衷，以被俘为耻，为国亡悲愤不已，晚间不能入睡，坐以达旦。元统治者怕其逃，押到兵马司，派兵严加防卫。时元世祖初统一中国，想招募南人以才治国，他问投降过来的原宋官员王积翁：“南人谁最贤能？”积翁答道：“南人无如文天祥。”便派积翁去劝说文天祥。文天祥说：“国亡了，我只有一死。如能宽容，让我回乡去当道士，他日或许以方外人备顾问。不行直道的亡国之十大夫不可以与之谋事，我变节事元，用我这样的人有什么用？”积翁便去跟留梦炎等人商量，想联合十人上书请释放文天祥，留梦炎不同意说，“文天祥不会当道士，他一回去一定号召南人起来反元，这置我们投降元朝的十人于何地？”这事就罢了。元统治者还是不断派人去劝说文天祥，其中就有降元的宋德佑皇帝，现被元封为瀛国公的赵显。文天祥见到赵显，跪下痛哭流涕，连声说：“圣驾请回！”元朝大臣阿合马、孛罗等都亲自劝降，文天祥还是那一句活：“我文天祥忠于宋朝，宋亡只求速死。”文天祥在燕京三年，元世祖知其志不能屈，曾与宰相商量将他释放，因有人言其在江西起兵事，说其挥臂一呼从者万人，怕他回去又发动南人反元，结果不敢释放他。

文天祥虽处狱中，尽管元统治者威胁利诱其志不移。文天祥在狱中编自己的诗集《指南后录》，又集杜诗二百首，并作题记。也正在这时，他写了气壮山河、千古不朽的《正气歌》，他历举了历史上许多忠烈慷慨的杰出人物，以说明“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文天祥便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浩然之气”，使元统治者无可奈何。

1359年，有闽僧说：“土星犯帝坐，疑有变。”不久，中山有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劫文丞相，元世祖乃召文天祥，问他：“你有什么愿望？”文天祥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那能奉二姓？赐之一死，便是我最大的愿望。”当时元世祖还不忍立即杀文天祥，便挥手令他回去，言者极力主张从文天祥之请，以免有后患，元世祖从之。元世祖也许觉得杀文天祥不好，又下诏止之，但文天祥已被杀了。文天祥临刑时很从容，他对吏卒说，“我的事完了。”向南拜后就刑。数日后，其妻欧阳氏收其尸，面颜如生，死时四十七岁。其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终于实践了他的豪言，实现了他的壮志！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状元任丞相的不乏其人，跟文天祥同朝的留梦炎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国家危急时逃亡保命，后来投降了元朝当了汉奸；像文天祥那样状元、名相、烈士兼于一身，千古一人而已！正因此，文天祥永垂不朽！

八、海瑞刚正 为民请命

有人说，海瑞为人可贵在于一个“忠”字，“忠”也可以说是海瑞精神。其实海瑞一生的言行，不能仅以“忠”字概括，而是体现在：忠君忧国爱民，其着重点却是“爱民”。《明史·海瑞传》则指出这一点：“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具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写传者强调：海瑞从政一生，“意主于利民”，这就点出了海瑞的最可贵之处。如果说海瑞精神，却是一个“刚”字，凡于国于民不利的，他都敢说敢顶，不只敢惩治贪官、抨击豪强，还敢骂昏君，这就是被后人赞颂的海瑞精神。

愤朝政腐败上书骂皇帝

《明史·海瑞传》记载：海瑞，字汝贤，琼山人（今海南省琼山县）。1549年考中举人，任南平县教谕（属福建省延平府），后被提升淳安县（属浙江省）知县。1564年，被调到京城任户部主事。海瑞因见朝政腐败，便上疏揭露，严厉地批评了皇帝。这疏被名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也称《治安疏》。这一疏几乎使海瑞掉脑袋，也使海瑞名闻天下。后代史家称为“海瑞骂皇帝”。

如果弄清当时的政治背景，更见海瑞的胆识超人。海瑞所骂的是明世宗，即嘉靖皇帝。他初即位的时候，在内阁首辅杨廷和辅导下，对弊政实行改革，取得了一定政绩；后来他迷于求道成仙，深居西苑，不管国事，专意斋醮（道教设坛祈祷叫醮），海瑞上疏时，他不上朝与群臣相见已二十余年了。当时到处建道院，摆道场。他在京师建的就有乾清宫、坤宁宫、西天厂、西番厂、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等，天天祈祷，甚至日夜不息。不仅祈祷成仙，而且事事求鬼神保佑。边军打胜仗，得不到赏赐，却归于道士祭祀之功，给道士加官封赏。在世宗的带头下，宫廷内外，香烟缭绕，京师俨然成了大道场。为了证实斋醮使天下太平以讨好世宗，地方督抚大吏纷纷上报符瑞，朝廷大臣交相上表祝贺，最善于愚弄世宗的要算方士邵元节和陶仲文两人。邵元节自称能求雨求雪，被封致一真人，为他建真人府。陶仲文以画符除妖进行欺骗，被封为少师、少傅、少保，在明朝一人兼有这三官职的只有陶仲文一人而已。对支持世宗斋醮的都得到升官封爵。而反对世宗斋醮，不是遭受廷杖，便是被杀头。文士段朝用对世宗说，深居不与外人接触，则可化物成金，不死药可得，世宗听了很高兴，专心修炼。太仆寺卿杨最加以劝阻，立即下诏逮捕，当即廷杖，活活打死。御史杨爵见旱灾严重，世宗却日夕建斋醮，修雷坛，劳民伤财，便上书直谏，也被拷死于狱中。自从杨最和杨爵二人直谏被打死，以后没有人敢再言时政。而海瑞是个户部主事小官，竟敢上书揭露朝政之腐败，且其抨击之严厉远远超过杨最、杨爵两大臣。

海瑞首先揭露朝政腐败民不聊生说：

陛下以为修道可成仙，专心致志修炼，竭民脂民膏，以兴修道院、场，深居不出，二十余年不上朝，造成法纪松弛，……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如今百姓在说：“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就是说，民穷财尽，没有子遗。陛下试思今日之天下，是个怎么样的天下？

天下人对陛下不满意已很久了。古代的君王有过，还有直臣进谏纠正，现在陛下修斋建坛，群臣也跟着一起进香，一听说得到仙桃仙药，也一同上表祝贺；建宫筑室，则都竭力经营，要购买香宝则四出搜刮。陛下做了错事，群臣也顺着做，没有一个敢于指出陛下的错误，阿谀奉承之风太盛了。

接着海瑞一针见血指出世宗的最大错误说：

陛下的错误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错误在于斋醮。上自尧、舜、禹、汤、文、武等圣君，未能久于人世；下至自汉、唐、宋以来的方士没有一个活到今天。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陶仲文已经死了，他不能长生，陛下怎能求得不死。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山，孙奭说：“天能说话吗？那有天书”。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此二物，是有脚行来吗？说是“天赐”，天有手交来吗？这是左右奸佞之徒，以妄诞欺骗陛下，而陛下却上当了还不知。

海瑞还批评了世宗用人之非说：

陛下又说悬刑赏以督责臣下，这就要用有治国的人才，这样天下无不可治，而陛下想斋醮，来保佑是有害无益的。用人而用唯唯诺诺的人，这便是陛下的错误。前重用的严嵩，有那一件事不顺着陛下呢？他以前与陛下一心，现在已被斩首了。梁材忠心为国，陛下却反以为逆，他历任都有政绩，至今户部的官员还称赞他。但诸臣宁为嵩之顺，不愿为材之逆，这是否因他们看到了陛下所喜欢的而避逆趋顺呢？这样对陛下有何好处？

最后，海瑞提出了对世宗的希望说：

陛下如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每日上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的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等圣君之列，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身于古代的忠臣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之间而已。

世宗一读海瑞疏，大为发火，掷于地说：“快把他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这时在旁的一位宦官说：“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自知触忤皇帝必死，已买一棺材，跟妻子诀别，准备待罪于朝，僮仆也遣散了，他是不会逃的。”世宗默然不语。一会儿又取来读之再三，有所触动，为之叹气，连留中宫数月。他尝说：“此人可说是比干，但朕并非纣王。”及世宗病，召阁臣徐阶商议内禅，因说：“海瑞说的都是。但朕病久，安能上廷视事。”又说：“朕不爱惜自己，致被疾病困扰。如朕能上朝，那会受此人诟骂呢？”他既知海瑞说的都对，却以疾病不能理政为自己解脱，因而越想越气，便下诏逮捕海瑞下狱，并追究主使者。继而将之交刑部，海瑞被判死罪。也许由于海瑞所言大义凛然，世宗不得不比之比于，他自己说“并非纣王”，实是怕被称为暴君，故不敢立即斩海瑞。海瑞上的疏比之杨最、杨爵的进谏，其言词激烈得多，为什么杨最、杨爵一进谏即廷杖或逮捕入狱致死，而海瑞上疏后，世宗看之再三，连声叹气，从斋醮场回到中宫，时间长达数月，而他逮捕海瑞并论死罪却迟迟不批斩，且说“海瑞说的都是”呢？再联系他说的“朕不爱惜自己，致被疾病困扰”，说明他服金石药后，致使身体日坏，可能是知上方士当有所醒悟，不然他绝不会说“海瑞说的都是”，判了死罪却迟迟不批准斩海瑞。

其实海瑞骂皇帝，除出于“民不卿生”而为民请命外，其骂皇帝实是爱皇帝，也是忠君思想的体现，希望世宗能成为尧舜之类的圣君。但世宗这个昏君绝不会成为圣君，他最切望的是长生不死，他因服金石药，药火发作，

于 1566 年 12 月死了，这距海瑞上疏只有十个月。世宗死，外庭群臣多不知道。狱官知道了，认为海瑞将出狱见用，便设酒菜款待之。海瑞却以为即将斩首，便恣意饮食。狱官附耳低声告诉他说：“皇帝已死了，先生今可出狱当大官了。”海瑞惊呼说：“确实吗？”大哭，所饮食的都呕出了，昏绝于地，终夜号哭不止，可见，海瑞对皇帝是多么忠心耿耿。

从县官至巡抚其政在于利民

海瑞出狱后，受到朝野重视，不断升官，三年间升任右金都御史，以钦差大臣巡抚应天十府。从 1558 年至 1569 年，即从他任县官至任巡抚的期间，其施政都是为了利民。便是他入京应举人考试前，已关心人民的疾苦。

1549 年，海瑞赴乡试，一到京城就向皇帝上《平黎策》。当时黎族因不堪压迫，屡起反抗，在海瑞赴乡试这一年，明王朝派兵镇压，杀死黎族五千余人。海瑞是海南人，对残杀黎族，坚决反对，他主张应在海南开辟纵横大道，使汉黎人民交往方便，消除民族隔阂；在黎族住地设县治理，和汉族同等对待。他任淳安县知县时也很关怀百姓，采取的不少措施都是为百姓着想。淳安县地主土地多，却瞒报不纳税，税役都转嫁到少地无地的农民身上，这种不合理的税赋，海瑞愤愤不平，于是毅然重新清丈土地，按土地实际数额征收税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海瑞任巡抚应天十府时，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是他政绩最辉煌时期。应天十府为应天、苏州、常州、松江、镇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他州、广德，本来是当时最富庶之地，因连年受灾，贪官盘剥，乡官掠夺，百姓日益困苦。海瑞到任后锐意兴革。海瑞做的第一件好事是整修吴淞江、白茆河，变水害为水利。吴淞江是引太湖水经黄浦江入海的，因水利多年不修，河床泥沙日积，水道被阻塞，太湖水流不出，奔涌回溢，造成水灾，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海瑞乃先后向朝廷上《平吴淞江疏》和《平白茆河流》，并主张以工代赈，结果不仅疏通了水道，当时处于青黄不接的成千上万的饥民因参加兴修水利而得免饿死，确是一举两得。1570 年，吴淞江地区有大水，因吴淞江开通了，百姓没有遭到水害。与海瑞作对的某按院不禁惊叹说：“万世功被他成了。”三吴地区农民都受其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海瑞一贯反对大户兼并，他到任后就力摧豪强，抚穷弱。由于海瑞连皇帝也敢骂，声名很大，只要听到这位“刚峰先生”一到，十府有问题的官员心惊胆颤，许多人要求解绶辞职；有一个权贵的家门原漆红色，一听海瑞要来了，便慌忙漆成黑色；任监江南织造的宦官，素来作威作福，不把地方官看在眼里，但知道海瑞来了，出外不敢乘八人肩舆。海瑞力摧豪强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乡官强占民田的都逼其退回于民，连罢相回乡的徐阶也不容宽，要其退回一半。海瑞实行退田铁脸无私，雷厉风行，所属惊恐不敢不贯彻执行，有不少豪强逃到他乡避风。因海瑞力摧豪强，豪强多怨恨，便群起而攻之。首先上告的是给事中舒化，认为海瑞“迂滞不达政体”，应让他到南京任闲职。跟着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乡绅，沽名乱政”。对凤翔的诬告海瑞上《被论自陈不职疏》，理直气壮进行反驳道：“凤翔不考其初，据今日论，谓民为虎，乡官为肉，不知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今日乡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夺之，今还之，原非乡官之肉，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臣窃恐凤翔居乡，亦是此景乡官

也”。但是当时的皇帝朱翊钧也是个昏君，他不仅不支持海瑞，却将他解职，海瑞便回到海南岛的琼山老家。百姓知道海瑞去职，号泣满道，家家绘像祀之。

1585年，海瑞被召复用，初任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后又改南京吏部右侍郎，这都是闲职，这时海瑞已七十二岁了。海瑞因见贪污腐化日甚，乃上书要求严惩贪官污吏，他说：“陛下不能制止贪污，是因治贪官污吏的刑罚太轻了。诸臣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为贪官文过饰非，待士有礼，百姓则无辜了。”因举明太祖朱元璋的剥皮囊草及贪污八十贯则绞杀之法，主张当用此法惩治贪官污吏。主张再用如此虐刑，虽有所偏激，但可见他对贪官污吏痛恨之深。

一生刚正不阿廉洁奉公

海瑞在初入仕途时便显示他“刚”的性格，他不屈于人，敢顶权贵。他任延平教谕时，有一位御史到学宫视察，所属官吏都下跪迎接，只有海瑞像山笔架般挺立着，只作个长揖，说：“此学堂是师长教士人读书的地方，不当在这里屈身下跪。”他任淳安知县时，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驿站招待不周，竟仗着父势吊打驿吏。海瑞说：“胡公曾指示，所过勿铺张，今这人行装极盛，必非胡公子。”便没收其敲诈来的数千金，并修书一封，说这人冒充胡公子，将之送给胡宗宪，胡宗宪看了信和被送来的儿子，哭笑不得，不敢加罪海瑞。大贪官严嵩的党羽都御史鄢懋卿经过淳安，海瑞招待甚薄，并说县小不足容车马。懋卿甚恨，但知海瑞为人刚直，只好敛威而去。

海瑞很廉洁俭朴。他在淳安任知县时，身上穿的是旧布袍，食的菜都是老仆种的。他很少吃肉，只是在母亲生日那天，买了两斤肉在家里为母亲祝寿。总督胡宗宪知道了还讥笑他寒酸，因为县官公开为母亲祝寿，可以收到不少礼物，而这实是变相受贿，海瑞是决不会这样做的。他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时，一到任就严禁送礼，送来的一一送回。1587年11月，海瑞死在南京任上。临死前三日，兵部送来柴菜多算了七钱银子，海瑞派人退了回去，海瑞没有儿子，死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见海瑞的帐子、箱子都很破旧，连一般寒士都不如，使他感动得哭了，跟朋友一起凑钱才安葬了海瑞。海瑞丧日，南京人民自动为之罢市，穿着白衣来送葬的夹满两岸，把酒洒在地上祭奠的延长达百里。这便是人民对于海瑞的评价。

九、则徐救国 焚毒抗英

林则徐，中国近代史的民族英雄。他揭开了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第一页，其在广州地区领导的禁烟抗英斗争，可歌可泣！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道光皇帝的反复无常和王爷们的破坏和出卖，林则徐的斗争最终失败了，但林则徐的英名永留人间！

为救国救民坚决禁烟

《清史稿·林则徐传》记载：林则徐，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少警敏，有异才”。1811年，中进士。曾任江苏按察使、江宁市政使等。任东河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时，兴修水利，改革弊政，卓有政绩。尤其在湖广任内极力主张和严厉禁烟，取得了显著成效。

鸦片烟对中国人的毒害有其深远的历史。鸦片，又名大烟，是从一种叫罂粟的植物果实提炼出来的毒品。罂粟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入印度及东南亚一带。原为药用，初吸可振作精神，但吸了极易上瘾，不吸则哈欠连天，眼泪鼻涕齐流；吸久了，骨瘦如柴，有气无力，半死不活，人死财空。远在辽金，鸦片就传入中国，只是数量很少；到了明朝，逐渐增多。1840年，即鸦片战争以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为图暴利便大批将鸦片运销中国。他们毒害中国人，还讥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其可恶如此！1773年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每年有一千箱鸦片输入中国，到十九世纪初期，每年输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到四万箱左右（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每一箱在中国港口出售价格按质量高下为四百元到八百银元）。那时，美国人也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销售以获暴利，其数量仅次于英国。如1817年，在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四千五百箱中，美国占一千九百箱。从嘉庆到道光初年，多次下令禁烟，只不过是官样文章，因清廷上下大多是烟鬼，或受贿赂，或参与走私，成为鸦片贸易的保护人和走私者。后因白银运出日增，造成财政危机，才引起清廷有识之士的注意。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禁烟议疏指出：“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二千余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土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年复一年，不知伊于胡底。”他认为漏银之多，是“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洋之烟自不来矣。”故主张“宜先重治吸食”，并提出了禁烟的具体办法（《清史稿·黄爵滋传》）。道光将之交大臣讨论。

林则徐极力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要求对犯禁者用重刑，说：“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利用之兵。”他在其掌管的湖北、湖南内雷厉风行实行禁烟。对于官员和将兵吸毒者限期戒绝，如不戒绝，则予重刑；对于民间吸毒者，则配制多种戒烟药方，立足于劝戒，许多吸毒者服了戒除了烟瘾。林则徐在禁烟实践中，认识到禁烟其重点要放在断绝鸦片烟来源上，因此严惩贩毒者，破获贩毒案件多起，仅汉阳县就在两个月内缴获烟膏一万二千余两，并将之全部焚毁，这为林则徐后在广州禁烟提供了经验。林则徐禁烟取得的卓越成绩，引起了当时倾向于禁烟的道光皇帝的重视，

召他入朝，接见他达十九次之多，跟他商量禁烟事宜。1838年，授他钦差大臣，派他到广州去查禁鸦片走私活动。

虎门销烟威名震中外

林则徐对到广州禁烟的任务之艰巨及其复杂性，在京时已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可从其给好友龚自珍的《复札》中看出。他被授命钦差大臣后，龚自珍写《送钦差大臣候官林公序》，提醒他：在广州禁烟，外国人可能动武，应该有所准备，还要警惕在广东的官员绅士中阻挠禁烟的人。他在《复札》中同意“外国人可能动武”的说法，但他所担心的不是在广东那边有人阻挠，言外之意阻挠可能来自北京。所以他说：“如履如临，易能已已！”尽管如此，林则徐为了救国救民，决心冒着风险去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

林则徐为人精明，办事周密，为了彻底禁烟，他认真考虑，充分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禁烟工作：

首先详细调查鸦片走私和了解来华通商的各国情况。他未到广州前，已了解到一批勾结外商从事走私的“汉奸”的情况，故到广州后，立即将之拘捕。同时将十三行的老板集中，随时传讯。当时清政府在广州设立十三家对外贸易公行，垄断供销代购业务，处理与外商的关系。他们也是从事鸦片走私的外商的买办，代销洋烟，走漏白银，勾通幕僚，从中得赃暴富。这些人既是鸦片走私的同伙人或庇护者，也是鸦片走私的知情人。故林则徐将之集中传讯，交代罪行，供出走私情况，使能掌握鸦片走私全面情况，以便采取对策。林则徐认为鸦片走私其来源于国外，要彻底禁烟必须杜绝其源，这就不可避免与从事贩烟的国家作斗争，故他急切要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为此，他在行辕里设立“译书馆”，翻译国外有关书报，认真阅读，反复研究，“借以探访夷情”，使能更好地与之斗争。

林则徐深知禁烟任务的艰巨，要团结广大官民才能做好这一工作。林则徐到广州后，团结两广总督邓廷桢同心协力开展禁烟工作。邓廷桢原倾向弛禁，后因形势推动转向严禁，在这之前，他在广州进行禁烟工作已有三年，因英商与奸商勾结走私，鸦片走私难于断绝，林则徐到广州，他极力支持，表示一定要“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林则徐见沿海人民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认为“民心可用”，便召募渔民、蛋户进行训练，对协助禁烟起了相当作用。

对于来华经商的区别对待，正常贸易准予照常进行，对于鸦片走私者则严厉打击。林则徐到广州半个月后，严令英国领事义律查缴烟土，二百多英国商人终于在当年三四月间被迫交出了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英、美商人共交出鸦片二万多箱，约二百三十多万斤。林则徐亲临虎门验收，焚于海滨，四十余日始尽。林则徐还要求外国商人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对正当贸易则准其照常进口交易。

林则徐和龚自珍一样早已预见“外国人可能动武”，故他一到广州，知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可用，就令他整兵严备。他巡阅了沿海炮台，加强布防：以虎门为第一防线，横档山、武山为第二防线，大小虎山为第三防线，每道

防线都增设炮台，安置大炮。海道到横档山分为二支，右多暗沙，左经武山前，水深，洋船从此出入。关天培建议于此设木排铁链二重，又增筑虎门的河角炮台，英国商船后到的不敢入。会有英国水手杀死一个中国人，义律拒不交凶手，林则徐则断其食物，撤买办、工人以困之。义律以索食为名率两艘军舰炮击九龙山炮台，参将赖恩爵发炮还击，英舰惶惶逃走。林则徐准许具结的外国商船进口贸易，义律率军舰闯入珠江口拦阻进口的英国商船，并开炮攻击中国水师船，关天培命开炮还击。英军舰又犯虎门官涌，清军分五路进攻，“六战皆捷”。

由于林则徐禁烟雷厉风行，措施正确有力，在广州禁烟取得大胜利，尤其虎门销烟震惊中外。销烟时，“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许多外国人也前往参观，他们对销烟工作的彻底，表示钦佩，并向林则徐脱帽致敬。

可是，英国侵略者不会甘心失败，1840年6月，英国派舰只40艘和士兵4000到中国海面，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因广州防守严密，英军不敢犯，转攻厦门。当时邓廷桢已调任闽浙总督，他已作好抗战准备，派提督程恩高等迎敌于海林澳，英军不得逞便北上攻陷定海，8日抵天津。道光吓坏了，竟责林则徐、邓廷桢在粤办理不善，转滋事端，将他俩撤职，林则徐后又遣戍伊犁。先后派琦善、奕山到广州向敌人摇尾求和。8月，英国增派舰、兵扩大战争，军舰直抵南京海面。至是，清政府完全屈服，被迫与英国订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战争才结束。1843年中英又签订《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1844年，美国和法国也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以《南京条约》为代表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开端。

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反对外国侵略运动，竟以如此结局告终，是什么原因，谁是罪魁？

民族英雄与清廷罪臣

一个人的功罪，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评价和处置。对于林则徐，清廷则认为是罪魁，我们则认为是功臣。是功臣或罪魁，也许在当时还不太清楚，但历史巨人是最明智的人，最公正的判官，是功臣或罪魁逃不过他的巨眼。

林则徐的焚毒抗英，远远超过其所认为禁烟是为“足饷足兵”的意义，这是个伟大的行动。它揭开了中国民族历史的新篇章，使林则徐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个千古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英雄业绩，振奋了民族精神，唤醒了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生存而奋斗。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侵略战争，其所经之处抢掠奸淫，东南沿海人民义愤填膺，自动组织起来进行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尤以三元里人民的斗争声势最大，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使其狼狈不堪。在福建厦门近郊的乡民曾以抬枪等为武器与英军开展激烈的战斗，歼敌多人。在浙江宁波、镇海、定海等地出现反抗侵略者的“黑水党”，多次神出鬼没狙击英军。在台湾的台南、台北、基隆等地人民也多次击溃英军的进犯。

反看清廷大臣琦善是多么卑鄙、无耻，他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汉奸。当英国侵略军到天津白河口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竟设宴招待英领事义律及英军官兵，义律转交英外相给中国“宰相”的照会，诬蔑林则徐、邓廷桢焚烟挑衅，琦善满口答应代为转奏。琦善上疏把责任全归林则徐，道光皇帝则命重

治其罪，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并令沿海要隘遇英船勿开炮，义律才率英舰回广州。琦善到广州后向英军求和，按照义律要求擅自订立《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赔偿烟款白银六百万等，但没有上报。英军随即占领了香港（《清史稿·琦善传》）。道光皇帝知道后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前往广州“进剿”。但这位皇侄是个大草包，他在夜间向英军进攻，据说“乘风毁敌舰七艘”，天晓才知是误烧民船。这时英军舰抵城下，摧毁清军船六十余，城外东西炮台也已陷落，炮火已打到奕山居住的贡院，奕山慌忙答应义律所索的烟款六百万，并割香港全岛，英军才退。奕山上奏时却讳败为胜，说：“义律穷蹙乞抚，照旧通商，改偿费为追交商欠，由粤海关及藩两库给之。”道光皇帝览奏，“以夷情恭，诏允所请。”（《清史稿·奕山传》）清朝君臣为了遮丑，就这样自欺欺人。

英军侵略得逞，主要责任当然要由道光皇帝负责。他为人反复无常，左右摇摆不定，在禁烟抗英的斗争中，稍胜利就冲昏头脑，趋向极端，如林则徐在“六战皆捷”后上的奏报说：“英国商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而对于“愿意具结的英国船，许其进口。”林则徐对英商区别对待是正确的，可是道光却认为错误，竟下令：“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许取具甘结。”当一有挫折，便手足发冷，慌忙请和。英军要求太高，又转为主战，但不用禁烟抗英取得辉煌成就的林则徐、邓廷桢等，却用奕山等草包，结果是一败再败，又不自反省，反把一切罪责推给林则徐，要“重治其罪”。

英国人虽在这次鸦片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侵占了香港，索到赔款，等等，但极不光采。当时英国议院辩论对中国出兵是否合理时，议院中不少人坚决反对为支持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而发动的战争。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罪行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林则徐和他焚毒抗英的大无畏精神是不朽的！

第四章 寡廉无耻遗臭万年

我们在第三章“廉洁奉公流芳百世”里，评述了九位对国家、人民、民族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之后，在这一章里也评述了在历史上九个寡廉无耻的卑鄙人物，使两者互相对比，善与恶，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鄙，是如此分明，有如天壤之别。前者受人景仰歌颂，流芳百世；后者被后人唾骂鄙视，遗臭万年。梁冀、蔡京、严嵩、贾似道、魏忠贤、和珅等人，大权在手，就横行霸道，剥民敛财，擅权误国；秦桧则是个民族败类，他与宋高宗杀害岳飞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罪恶，使他成为一个不齿于人类的大汉奸；张全义、冯道则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卑鄙人物。这些人生时已受到人民切齿痛恨或鄙视，有的已得到应有的报应，有的虽侥幸于一时，但都逃不了历史的惩罚，人民法庭的判决。这些历史的罪人和卑鄙人物，他们徒刑是无限的，永远被人鄙视，永远被人唾骂。

一、梁冀专政 擅权作恶

在封建王朝里，当官不一定凭本事，只要你生长在权势之家，或与皇帝有裙带关系，即使是二流子也可青云直上。东汉末年的外戚梁冀就是这样当上了大将军，此人虽无本事，但有奸计，且阴险，他专政二十多年，使东汉外戚专权达到了最高峰，也是东汉王朝最黑暗的时期。

独揽朝政专权自恣

《后汉书·梁冀传》记载：梁冀父梁商女因其被顺帝立为皇后得任大将军，梁冀也因此拜河南尹，后梁商死还未下葬，因梁冀是皇后的哥哥，得以继任其父职。顺帝三十岁突然病死（什么原因没有说明）。太后与梁冀为便于操纵政权，立一个二岁的娃娃继位，称冲帝，不久便病死了，又立八岁的孩童刘缵为质帝。质帝少而聪慧，尝目视冀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到了，就密令爪牙放毒于煮饼中，质帝吃后当日就死了。梁冀和太后立蠡吾侯刘志为帝，称桓帝。从此，权归梁冀，他专擅威柄，凶恣日甚，朝廷大小事由他裁决；宫廷近侍，由其党羽所任，连皇帝起居，也要过问，百官升迁，都必先向其谢恩。梁冀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桓帝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

梁冀专政后，排除异己，凡与己见不同或不附己的，多被其杀害。李固尝上书指出，东汉外戚少幸存者，这是因其专权作恶，自取灭亡，因此，反对外戚掌权，使政归国家。为此，他曾建议梁商辞退高位，为梁商所不满。李固在地方当官时曾上奏揭发南阳太守高赐等贪赃枉法，赐等惊罪，就重贿大将军梁冀，梁冀派人持书去说情，李固不买账，因此，为梁冀所恨。冲帝死，议立嗣，是时任太尉的李固鉴于东汉外戚在立帝问题上，皆“贪孩童以久其政”造成的祸害，主张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为帝，但梁冀和太后主张立将为他们的妹夫蠡吾侯刘志为帝，双方争论不下，一时未决。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将军累世与皇室有联婚之亲，秉摄万机，宾客满天下，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如得立，将军大祸临头。不如立蠡吾侯，才可长保富贵。”梁冀赞其言，明天重会公卿，梁冀意气凶凶，言辞激烈，断然要立刘志。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原主张立刘蒜，现在害怕了，都说：“惟大将军令。”李固仍坚持原议，梁冀厉声说：“散会。”梁冀乃说太后免去李固的太尉职务。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鲔谋立刘蒜为天子，李固实不参与，梁冀竟诬固与文、鲔共为妖言，将之逮捕下狱。李固的学生勃海王刘调戴着木枷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到宫门为固伸冤，太后怕事闹大，被迫放李固出狱。李固得释，京师人欣喜若狂，皆高呼万岁。冀闻之大惊，怕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将固杀了。

下邳人吴树被任为宛县令，向梁冀辞行，梁冀在宛县的宾客不少，冀要他多关照。吴树说，“干坏事的人，应该杀绝。将军是皇室外戚，处大将军重任，宜崇贤善，以补益朝廷。宛是大县，士人很多，而将军未见推荐一长者，而所托的多是坏人，我不敢从命。”梁冀很不高兴。树到宛后，杀了害民的梁冀宾客数十人，梁冀深恨之。吴树后被任为荆州刺史，临行时到梁冀处辞行，冀设酒招待，放毒酒中，树出死车上。又候猛新任辽东太守，不向他辞行，梁冀竟借他故斩之。其凶横狠毒如此！

流氓恶棍无耻之徒

梁冀外貌丑陋，双肩耸起，目射凶光，口吃说话不清，少时便过着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的生活。但其人阴险，手段狠毒，凡反对他的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梁冀任河南尹时，横行霸道，他父亲梁商的亲信洛阳令吕放，从爱护梁冀着想，向其父梁商谈及梁冀的短处，希望其父促其改过，其父责备他，梁冀就派人于途中把吕放杀了。梁冀怕其父知道此事，便嫁祸于人，诬陷是吕放的怨仇所杀，请任吕放的弟弟吕禹为洛阳令，使其搜捕凶手，尽灭被诬的人的宗亲、宾客百余人。

梁冀任大将军后，侈暴更甚。他贪污受贿，卖官鬻职，四方勒索，还派人交通外国，广求珍物。这还不足，还要谋财害命：扶风人士孙奋富闻京师，他向其借钱五千万，士孙奋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竟向县郡控告士孙奋，说士孙奋的母亲是他家的守藏婢，盗其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潜逃，于是逮捕士孙奋兄弟，拷打死于狱中。全部没收其家财产，计有一亿七千余万。梁冀作官实是作强盗。

梁冀和其妻孙寿是一对恶狼，其荒淫凶恶不相上下。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梁冀也改穿奇装异服以相衬。孙寿性妒忌，能制御梁冀，梁冀对她既宠爱又害怕。梁冀与美人友通期私通，孙寿使其子胤杀之。但孙寿却与一监奴秦宫私淫。梁冀富甲天下，拥有封户三万，他大造官邸，极尽其华丽之能事；孙寿据说因梁冀“有周公之功”，被封为邑君，租邑岁入五千万，她也在对街大造宅第，与之比侈，梁冀夫妇就是这样互相夸耀富有。

梁冀又建别第于河南城西，强夺良民为奴婢，名曰“自卖人”。还在城西建一兔苑，用地数十里之多，发所属县卒徒，建筑楼观，数年乃成。梁冀通告：凡有侵犯，要处死刑。有一西域商人，不知禁忌，误杀一兔，竟辗转牵连杀了三十余人。梁冀这个流氓恶棍无耻之徒，其残暴如此！

恶贯满盈身死族灭

权力滥用或使用不宜，就害国害民害己，这在东汉外戚专权而造成恶果的历史中又得到充分的说明。东汉光武帝刘秀原想通过皇室与功臣宿将的家族联婚，将功臣宿将世代纳入皇室势力系统，拱卫东汉王朝，以巩固其统治，谁知适得其反。因外戚取得权力后，操纵朝政，甚至皇帝的废立也由其决定。所立的大多娃娃皇帝，如果皇帝长大，或立年长的，不甘当傀儡皇帝，就通过宦官杀外戚，权又归宦官。在东汉王朝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其表现是外戚与宦官的不断拼搏，其实也是西汉帝党与后党斗争的继续。因此，东汉外戚大多以族灭告终，外戚梁冀也逃不了其灭亡的命运。

梁冀之所以能当大将军，只不过是凭其与皇室有裙带关系，即他的妹妹是顺帝的皇后。梁冀这个纨绔子弟，虽别无所长，却是个权欲狂：他大权小权独揽，在位二十余年独擅朝政，威震内外，百宦惧其淫威莫敢违命，桓帝也恭敬从命，无奈其何；他无所不贪，无恶不作，谁敢持不同意见就施加暴力以镇压。他就是靠权力来满足其荒淫奢侈的生活。维持其穷凶恶极的统治。有识之士如崔琦、袁著早就预见，梁冀其如此横行终将步以前外戚灭亡的后

尘，建议劝其及早退位，以免遭杀身之祸，冀不听反而恨之入骨，将他俩先后杀害。梁冀这种人是离不开权的，他是与权共命运的，即以权而兴，因权而亡。物极必反，梁冀恶贯满盈之日，也就是其灭亡之时桓帝这个傀儡皇帝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他外受梁冀的操纵，有意见也不敢哼一声；内受梁太后和梁皇后的挟制，那位梁皇后尤其狠毒，他稍不如意，就毒死皇帝左右的人，桓帝也经常提心吊胆。桓帝嘴里不敢说，但恨在心里，伺机向梁冀开刀。梁氏集团安置在桓帝身边的临视人梁皇后死后，桓帝便密谋消灭梁氏。有一天，他喊宦官唐衡到厕所问道：“左右人中有谁不是梁冀的人？”唐衡说：“单超、左悺、徐璜、具瑗都不满梁冀专横。”于是，桓帝使唐衡传单超、左悺入密室，说：“梁将军兄弟擅权朝政，迫胁内外，公卿以下都只听其指使，今欲杀之，你俩意见怎样？”超等说：“梁冀确实是国家的奸贼，早应该除掉。臣等智低力弱，未知圣上意见怎样？”桓帝说：“我早就审慎思考过了，你们要密图之。”超等说：“图之不难，但恐陛下狐疑不决。”桓帝说：“奸臣胁国，当治其罪，何疑之有！”于是召集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五人密议，遂定其议。桓帝咬单超臂出血为盟，表示同大家同心协力消灭梁氏。乃派单超等五人带兵包围梁冀宅，逮捕梁冀及其宗亲，族灭之。因单超等五人除掉梁氏有功，同日被封为侯，世称“五侯”，于是东汉外戚专政又转入宦官专政时期。

二、全义为官 甘受耻辱

张全义名传后世，并非由于他建立了辉煌的功业，而是因其人品格低下，毫无气节，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谁势力大就投靠谁

《旧五代史·张全义传》记载：张全义，字国维，汉州（今河南范县）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曾在县衙门服役，为县令所辱。唐末黄巢发动农民造反，张全义参加农民军。黄巢攻入长安，任张全义为吏部尚书（管理官吏的任命和考核）兼水运使（主要负责解决长安的粮食供应）。黄巢失败，张全义投降唐朝，屡有战功，以后，张全义在五代乱世中，谁势力大就投靠谁，历经三代奉侍过八个皇帝。

据上所记是说黄巢失败后张全义才投降唐朝，但《洛阳搢绅旧闻记》说，“张全义在黄巢军中，知其必败，就翻身投唐，唐授泽州刺史。”这一记载虽与《旧五代史》有异，却是有可能的。因张全义这人善于看风驶舵，他也许不可能等到黄巢失败后才投降，一见义军形势不妙，就向唐投降了。这跟张全义因势弱而屡叛其主的经历是吻合的。

张全义投唐时是在河阳节度使诸葛爽的麾下，诸葛爽死，其部下分裂，互相攻伐。部将刘经与李罕之争夺洛阳，李罕之打败刘经于圣关寺，乘胜将攻河阳。就派素认为是心腹部将的张全义去抵抗李罕之，但张全义看到刘经弱李罕之势大，认为刘经必败，就背弃刘经，跟李罕之同盟结义，反戈攻打刘经于河阳。刘经得到诸葛爽儿子诸葛仲方的支援，打败了李罕之、张全义的盟军，张全义便收拾余众，与李罕之守怀州，求救于镇压农民军起家的军阀李克用。李克用派兵助之，进攻河阳，刘经和诸葛仲方战败弃城奔汴州（今河南开封市），李罕之就占据河阳，推举张全义为河南尹。初，二人相得甚欢，后来发生矛盾，张全义趁李罕之率兵在外作战，后方空虚，率兵袭取河阳，自己当了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求援于李克用，李克用复派兵助李罕之攻河阳。这时镇压黄巢军起家的朱温应张全义的求援已派兵前来，李罕之与李克用授兵被迫撤退。全义感朱温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竭力为朱温卖命。

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东迁，命张全义负责建造洛阳宫城，张全义拆毁长安宫室及民房，取其材营建新宫，长安从此沦为废墟。不久朱温杀唐昭宗，改立唐昭宣帝，旋杀昭宣帝称帝，国号梁。因张全义在朱温篡位活动中立功，被任为河阳节度使，封魏王。朱友珪杀其父朱温篡位，以张全义为守太尉、河南尹。朱友珪被禁军所杀，朱友贞继位，史称梁末帝，他任张全义为洛京留守，兼镇河阳，后又授天下兵马副元帅。梁末帝在与军阀李克用儿子李存勖混战中大败自杀，李存勖建立后唐。张全义使人向李存勖的皇后行贿，从洛阳前往开封朝见李存勖，泥首待罪，他一再上表叙述投靠朱温和跟他结儿女亲家是被迫，并非所愿，并说：“伏念臣曾栖恶木，曾饮盗泉，实在瑕疵，未蒙昭雪。”“栖恶木”是指依靠后梁朱氏，“曾饮盗泉”是指曾参加农民军，承认自己有罪，以求得李存勖的谅解，以服事新主（李存勖灭后梁，说自己是唐的继承人，称唐庄宗）。李存勖召见，以其年老，使人扶他上殿，赐宴尽欢。张全义终被新主接纳。张全义曾代梁末帝在洛阳准备法物把天，但未去成，因法物具在，便请李存勖到洛阳行郊祀之礼，于是博得存勖的欢心，任他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封他为齐王。这时，张全

义见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的势力大，就竭力巴结，以准备后路。他推荐李嗣源去镇压魏州兵变，詎料李嗣源竟与叛兵勾结反对李存勖。当时张全义在病中听到这消息，优惊不食而死。那料这次投机又成功了，李存勖被部下所杀，李嗣源入洛阳称帝，这就是后唐明宗。明宗感其推荐之功，追赠太师，谥曰“忠肃”。

受耻辱不以为耻

张全义品格卑下，毫无气节，只要能使脑袋不掉，保住官位，什么事也干得了。他能历经三代侍奉八个皇帝，都得到信任，且不断升官，以至封王，跟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以及他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忍受的耻辱有关。张全义奉侍后梁朱氏时间最久，长达三十年，而朱温父子都很残暴，几次想杀之，因他卑身以待，倾财力人力贡奉，得以免祸。而朱温能得天下与张全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朱温原参加黄巢农民军，有谋略，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后降唐，与李克用等联兵镇压了黄巢农民军。他灭唐后建后梁，因与李克用及其子李存勖连年混战，兵连祸结。朱温兵数败亡，幸得张全义的全力支持，朱温才能屡败屡战。朱温荒淫，不仅在战争掠夺妇女奸淫，还竟令自己的儿媳每夜服侍，朝臣将领之女亦不能幸免。有一次朱温兵回洛阳，到张全义的会节园避暑，仅住数天，强使张全义的妻子、女儿、儿媳陪他睡觉，张全义的儿子继祚愤耻极了，拿起刀来要去杀朱温，张全义急忙制止其儿子说：“我过去被李罕之军围困于河阳，时间长达一年，无东西可吃，只好吃木屑，存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顷刻，幸得朱温派兵来救，才能得到今日，此恩不可忘啊！”继祚才作罢。也因其妻子储氏曾陪朱温睡觉，张全义每有危难，往往派妻子入宫为他求情。因人进谗，朱温疑忌张全义，要杀之，储氏入宫当面质问朱温说：“张全义是一个种田的老头，三十年来，他在洛阳四周，开荒种地，为你征收军赋，帮助你打天下。现在他已衰老了，活不了多久，你还要疑忌他，这是什么原因？”朱温笑着说：“我对他没有坏心肠，老太婆不要多说了。”在老婆的帮助下，张全义才不被朱温杀死。这也许是张全义因能忍耻才能偷生吧。

张全义屈膝待上，也要其下属奉承他，不然便施以淫威。河南令罗贯，是个正直的官吏，待张全义稍慢，张全义就罗织罪名陷他，使他冤死杖下，朝野冤之。

张全义处理案件，以先诉者理直，因而，一些狡诈的恶徒往往恶人先告状而得胜，致造成冤案不少，民以为苦。洛阳监军使尝收得李德裕太尉平泉庄醒酒石，全义向他要，监军不给，全义立杀之，其作恶如此。

剥下以奉上得保官位

张全义不管谁当皇帝他都能保住官位，他历任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以至封王，内外官历二十九任，始终任河南尹时间长达四十余年。他之所以得到每个皇帝的信任，除其卑躬屈膝外，主要是“剥下以奉上”。因张全义善于招抚百姓增加生产，使河南洛阳一带的地区成为粮仓和兵源，对任何一个皇帝，张全义都竭尽财力物力人力奉献，供这些皇帝穷奢极侈和战争之用。所以每一个皇帝都喜欢他这个“种田老”，任他为河南尹，这就是四

十余来年他始终得任河南尹之故。

张全义初任河南尹时，所属洛阳一带的十八个县，因长年战乱之故，洛阳都城变成灰烬，到处一片荒凉，满目疮痍。这时，他只有部下百人，便选可使的十八人，任为屯将。每人给旗一面，榜文一张，分别到所属十八县招集农户，令自开荒耕种，于是流民渐归。又选可使的十八人，任为屯副，流民回来的安抚之，除杀人的处死外，余皆加杖而已，无重刑，流民归来的日众。行之一二年，每县增户，大的六七千，次的四千，下的三二千，并在农闲组织他们陈兵习武，共有民兵二万余人。五年之内，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张全义招集和组织农民发展生产，虽使农民不致流离失所，但正如宋代薛居正等所修《旧五代史》所指出，张全义“惟勤课劝，其实敛民附贼，以固恩宠。”对其“剥下奉上”如此，认为“盖乱世贼臣耳。”此论是正确的。后梁是个残暴虐民的政权，张全义对后梁王朝则竭民力财力以奉。后梁王朝与克用父子长期混战，张全义每月都以销马兵卒奉献给后梁王朝，李存勖灭朱氏后，张全义本应族诛，张全义知李存勖的妻子刘皇后贪财，就向她献上马千匹，得到了刘皇后庇护。李存勖以刘皇后故，待之甚厚，数幸其家，皇后也拜他为父，封为齐王。从此，张全义凭刘皇后势，作威作福。张全义就是这样的卑鄙人物。

三、冯道保位 卑事五朝

在五代时期，国家兴亡，帝位取代，有如走马灯，而冯道安然不动，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官“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时间长达二十多年，是五代史上的“名臣”。而如此“名臣”在我国历史上，一人而已。

五代官场不倒翁

《旧五代史·冯道传》记载：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省交河县东北）人。他的祖先或务农或学儒。冯道少时好学能文。李存勖袭父职任晋王，冯道任晋王府掌书记。由于他能吃苦耐劳，勤于职事，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政权，他先后被任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洛阳兵变，李存勖中流矢死，李克用养子李嗣源率兵入洛阳称帝，是为明宗。明宗对冯道素有好感，初任端明殿学士，不久升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冯道这人是个变色龙，君明他能用着干好事，君暗也就随着鬼混。在明宗统治时，他当了七年宰相，重视选拔人才，劝明宗居安思危、关心民间疾苦，因而暂时出现了小康局面。在这以后，这个变色龙的卑鄙本色便充分显露出来了。

欧阳修撰写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史书记载了冯道屡事新主的一些卑劣行径。明宗死，儿子李重原继位，是为愍帝，冯道仍任宰相。李重原只当了四个月的皇帝，明宗的义子潞王李从珂就在凤翔起兵叛变，愍帝慌忙逃到卫州的明宗的女婿石敬瑭军中。冯道曾在明宗统治时任宰相十余年，明宗对他十分宠信，可是他这时对后唐的存亡、愍帝的下落完全不放在心上，他所考虑的是：潞王李从珂兵力强，政变一定成功，认为是他重新选择新主人的时候了。这就必须为新主立功以取得信任，于是召集百官商议迎立李从珂当皇帝，冯道主张立即写“劝进表”，中书舍人户部导说：“哪有天子在外，大臣们就劝别人当皇帝的呢？”另一宰相李愚说：“舍人说的是对的”。冯道说：“别管那一套了，还是面对现实吧！”当李从珂率军到后唐京城近郊蒋桥时，冯道已率百官在此列队欢迎，并奉上“劝进表”，请李从珂当皇帝。从珂即位，是为废帝。这时愍帝还在卫州，过几天，愍帝被杀。冯道因迎立有功，得任同州节度使，后拜司空。李从珂称帝一年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变，勾结契丹兵围洛阳，后唐军大败，李从珂率全家老幼登楼自焚死。君王的死活对于冯道毫无影响，他又奉迎新主了。石敬瑭灭后唐后建立后晋，是为高祖，他任冯道为守司空、同中书六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冯道不仅又得任宰相，封爵也比前高而多，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大军三十万南下灭晋，冯道立即前去拜见德光，石敬瑭统治时冯道曾奉命出使契丹，因他卑躬屈膝博得德光的好感，任他为太师。因不堪契丹掠夺压榨，中原各族纷纷起义反抗，收复了从洛阳到开封之间的广大地方，直指汴京，德光被迫撤兵北归，冯道追随德光到常山。适德光病死，时汉军收复常山，冯道又四出安抚以冒功。石敬瑭的大将刘知远乘虚夺取帝位，建立后汉，称周太祖。冯道立即从常山前去朝见，被拜守太师。郭威灭汉，建后周，冯道又转事周，被拜太师，兼任中书令。周太祖死，养子柴荣继位，称周世宗。刘彧趁周国丧世宗初立，勾结契丹军南下攻上党，世宗召集百官商议抗敌。世宗说：“刘彧欺我年轻，认为我新立而国有大丧，必不能出兵以战。但善用兵者要出敌

不意，我当自率兵击之。”冯道在事明宗之后，奉侍九位君主，都唯唯诺诺，未见谏诤，而这次却异常，坚决进谏，反对世宗出兵。世宗说：“唐太宗平定天下，敌无大小皆亲征。”冯道说：“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说：“刘旻乌合之众，若遇我师，如山压卵。”冯道说：“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大怒说：“冯道也太瞧不起我了！”于是亲自起兵迎击刘旻和契丹联军，在高平取得大捷。冯道这次为什么如此谏诤，他本意并非担心出师不利，因周朝的兴亡对他是无关系的，而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他确是认为柴宗敌不过有契丹帮助的刘旻，他反对出兵，柴宗打败了，他就有预见之明，而且可向刘旻和契丹表明：我冯道是反对出兵的。契丹来了，或刘旻称王，他不是照样又可当大官。冯道这种投机取巧，客观上实是阻挠当时五代趋于统一的形势。柴宗是个英明之主，他在高平大捷后，威武大振，取淮南，定三关，正当其就将统一中国时，不幸逝世。后“黄袍加身”取周政权于寡妇孤儿之手的赵匡胤正是在这基础上，继承柴宗的事业，统一了中国。所以，冯道的谏诤是逆历史统一潮流的。柴宗出兵时因鄙冯道不让他随军，任他为太祖山陵使，负责办理周太祖丧事，周太祖下葬后，冯道也病死了，是年七十三。

向契丹卑躬屈膝

冯道一生，最卑鄙的莫过于卑躬屈膝奉事契丹。他任晋太祖石敬瑭的宰相时就充当不光采的角色，及其当契丹的太傅，其卑鄙嘴脸暴露无遗。

石敬瑭是靠契丹的力量建立后晋的。他是以割地、称臣、称子为条件得到契丹出兵帮助的。在打败后唐后，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对德光就自称“儿皇帝”，尊称德光为“父皇帝”，四十七岁的“儿皇帝”认三十七岁的“父皇帝”，实是世界政治史上的怪事。石敬瑭当儿皇帝后就履行自己答应的条件，每年输帛三十万匹，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世称“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从此，千余年来中国人修筑的万里长城都在契丹所管辖的范围。从新边界到当时中国的首都汴京，八百公里间一望平原，没有一个险要的关隘可以阻挡敌骑，门户完全洞开，使中原地区失去了北方的重要屏障。契丹兵马可以长驱直入，为所欲为，抢掠屠杀，中国百姓从此灾难无穷无尽。石敬瑭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换取个人权势的可耻行径，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唾骂。冯道担任石敬瑭的宰相后，是积极支持石敬瑭的投降国策的。及皇帝石敬瑭为上徽号尊称德光为父皇帝，想派冯道为册礼使，对冯道说：“此行非卿不可”，冯道无难色慨然答应。石敬瑭又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冯道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冯道到达后，对契丹主德光极尽其卑躬屈膝之能事，得到德光的喜爱，想要留他在契丹，冯道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冯道在契丹居留了两个多月，德光看到他确对契丹忠实，才让他回去。这次出差虽苦，但他以其对契丹的忠实博得德光的信任，使他在后来德光夺取中原时又得任大官。德光率契丹大军灭晋，冯道立即前往汴京朝见德光，德光责冯道事晋无状，冯道恐惧说不出语。德光又问他：“为何来朝见？”冯道战战兢兢地说：“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讥讽他说：“你是那一种老头子？”冯道卑下地说：“是个无才无德又痴又呆的老头子。”德光听了，开心大笑，封他为太傅。冯道就是这样自卑自贱取得契丹主的喜欢和信任。

“长乐老”保位秘诀

当时天下大乱，外族入侵，君主兴废接踵，人民困苦至极。冯道则官位不变，自得其乐，自号“长乐老”。他著书数百言，历述其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的官职和封爵，不以为耻，而是自以为荣。自说：“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百乐，何乐如之？”在“生民之命，急于倒悬”的时候，冯道就这样自乐其乐，这就是冯道。所以，有人骂他“可谓无廉耻者矣！”但是，在如此乱糟糟的时代，冯道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帝，朝朝官运亨通，常常享荣华富贵，究其有何秘诀？

冯道为人表面忠诚，实是虚诈，用其虚诈来装饰其忠诚，使人更觉得其忠诚；其虚诈在忠厚的掩盖下，其虚诈更深沉莫测，使人不易发觉。从大节看，冯道是个“无廉耻者”，不过在五代时，改朝换代频繁，为臣者迎新送旧大有人在，朝朝出现投降派是一种社会现象，而取得新政权的新主，也需旧朝臣民的支持以巩固其政权，故对这种大节不甚重视。但从小节看，其个人道德无可厚非，加上其善于为文，故为时人所感佩，而其每事新主都竭其忠诚，故为新主所喜爱和信任。

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当李存勖军与后梁军对峙，冯道在李存勖军中，他住在茅房，没有床席，晚间只睡在一束于禾草上。所得薪金，都跟仆人一起用，同器饮食。诸将有掠得美女的将之送给冯道，冯道不能推辞，便安置在别室，访到其主人便让她回家。他任学士时因父死回家居丧，恰遇灾荒，便出所有以救济同乡，自己亲自“耕于野，躬自负薪”。有荒田不耕的，冯道便在晚上为之耕种，其人后来致谢，他“殊不以为德”。这时李嗣源同在军中甚赞赏其为人，认为是“真士大夫也”。李嗣源即位后，对其极为宠信。他在常山时，见在中国士女为契丹所俘的，便尽其所有以赎之，“皆寄于高尼精舍，后相次访其家以归之”。冯道个人道德如此，便是其得到人们敬佩的原因。

他特奉新主也极尽力，以表其忠诚。如前所说，儿皇帝石敬瑭要他前往上徽号于父皇帝契丹主德光，这本是项苦差事，他二话没说，立即答应前往。石敬瑭为他送行时，对他如此“忠诚，自酌酒赐之，为之感泣”。他到契丹后，也对契丹主表其“忠诚”，契丹赐其臣牙笏及猎日赐牛头是一种特殊的赏赐，冯道皆得之，冯道写诗表示其感激契丹主之恩云：“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并自以为荣，博得了契丹的信任。但是冯道从来不打算专事一主，他的“忠诚”是虚诈的。如他在契丹时所得的赏赐，都用来买柴炭，人问其意，他说：“北地苦寒，老年所不堪，当为之备。”暗示他将久留契丹。契丹感其意，便命他回去，可是冯道却再三上表乞留，以表示他对契丹的“忠诚”，固遣乃去，犹更住馆中月余。既行，所至留驻，凡两月方出境。意在使契丹主知其恋恋不舍。左右问他：“当北土得生还，恨无羽翼，公独宿留，何也？”这时冯道才说出心里话：“纵急还，彼以筋脚马，一夕即追及，亦何可脱，但迟缓即不能侧矣。”众乃服其老谋深算。这就是冯道以虚诈粉饰其忠诚，以忠诚掩盖其虚诈，使人不测其用心，而信其忠诚，“长乐老”之能常保官位，其秘诀在此。

四、蔡京以法剥民敛财

古代吏说明，总理天下朝政的人，如果无才难于治好天下，但有才而缺德，同样会把天下搅乱。蔡京就是后一种人。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蔡京居相位达十七年之久，他理财倒有一套本事，向人民盘剥和勒索了不少财物，以供徽宗和以他为道的“六贼”挥霍享受，人民不堪其苦，铤而走险，于是江南河北，遍燃起义烽火，北宋的丧钟敲响了，蔡京的末日也到了。

假新政济其私欲

《宋史·蔡京传》记载：蔡京，字无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1070年，中进士。在中央任起居郎时，奉命出使辽国，回来后任中书舍人，后改龙图阁侍制，知开封府。之后任相四起四落，最后一次罢相时贬海南岛儋州（今海南省琼县），未到贬所，途经潭州时病死，年八十。

蔡京是个心术不正、善于钻营投机的人。王安石实行变法时，他见神宗皇帝支持变法，就削尖脑袋投入变法派，支持新政，想从中向上爬。及王安石失势，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上台，他见风转舵，向其靠拢。司马光由于对新法有偏见，不管是好是坏都一律罢免，恢复原状。宋朝原实行差役法，弊多利少，王安石乃改为免役法，执行得好，利多弊少，王安石罢相后仍实行。司马光执政后罢去免役法，恢复原来的差役法，并限定五天完成。朝廷大臣们认为时间太紧迫了，而蔡京接到命令后，认为是讨好新执政的大好机会，雷厉风行地在五天的限期内把这事办了。蔡京便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功，因这时只有蔡京如期完成任务，司马光高兴地夸奖他说：“要是个个像你这样执行命令，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不久有人揭发他“挟邪坏法”，被贬到地方去做官。曾参加变法的章惇要罢差役法恢复免役法，让有关部门讨论，但很久还拟不出具体方案。蔡京对章惇说：“按照熙宁年间的成法施行便可，何必还要议论？”蔡京就是这样投机于新旧两派之间，唯上级意志是从，司马光要罢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蔡京第一个完成任务；十年后，章惇罢差役法恢复免役法，又是蔡京第一个附和，积极想办法使之实施。

宋徽宗即位后，因有人弹劾蔡京被贬杭州，快快不乐。这时，宦官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到三吴地区（即苏州、常州、湖州）为宋徽宗搜集“书画奇巧”，善于钻营投机的蔡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便极力巴结童贯，不舍昼夜地与之伴游了几个月。蔡京擅长书画，便精心作屏障、扇带画拜托童贯呈给宋徽宗，并附上论奏，宋徽宗也工于书画，对蔡京书画甚为赞赏，自是想提拔蔡京。蔡京还结纳宋徽宗的左右，如左道徐知常和宫妾、宦官等，他（她）们乃众口一词赞誉蔡京，徐知常还对宋徽宗大力推荐蔡京，说要想有所作为就非任用蔡京为相不可。1072年，宋徽宗任用蔡京为宰相，宋徽宗对他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事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爬在地上磕头感谢，表示愿效力至死。于是他便标榜要继承发扬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精神，公开冒充变法派、以行新法为幌子，上以挟制宋徽宗，下以威慑臣民，干其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为富国强兵裕民，其之所以出毛病，主要是用人不当、操之过急、措施不善，而新法到了蔡京手里已完全变了质，为了敛聚财物以取悦宋徽宗和满足其私欲，想方设法以盘剥和勒索人民。

诱君王腐化享乐

宋徽宗初即位时，为政还算清明。宋朝“积弱积贫”已久，到宋徽宗时更为严重，财政出现了危机，如不变革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想继“父兄之志”恢复新政，想任用曾经参加变法派的蔡京来推行，希冀国事有所振作，结果所托非人，适得其反。宋徽宗后来享乐腐化，虽咎由其负，跟蔡京等人的诱导也大有关系。有一次，宋徽宗举行大宴会，他叫宫人拿出玉盘子和玉酒杯给大臣们看，说：“我想用此，恐人说太奢侈了。”蔡京说：“臣昔日出使辽国，餐具都用玉器，还以此向臣自夸，说南朝没有此物。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宋徽宗说：“先帝用玉制一小台才数尺高，上奏进谏的甚多，朕甚畏其言。这些玉器存之久了，因怕人说奢侈，有口难辩。”蔡京说：“做事情只要合理，多言有什么可畏。陛下应该受天下的供奉，用一些玉器，算了什么！”

蔡京要宋徽宗“应该受天下的供奉”，除了取悦于宋徽宗外，还有其深算：宋徽宗为享乐向天下要的多，他就可以盘剥勒索于民更多，就可从中大捞一把。事实确是如此，他想方设法肆无忌惮地去敛财：实行“方田均税”，“免役法”，豪强地主行贿可以瞒田，使税少役少，赋税和役钱都转嫁农民身上；政府垄断盐的专营，并更改盐钞法，要盐商交钱给中央，换取“盐钞”到地方买盐，这样，盐利便归中央。并屡发新盐钞，旧钞变成废纸，持有旧钞的大受其害，有的官商原存旧钞几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还铸当十的大钞，提高茶税，人民大受其害。又借无主田为名强占农民的肥田沃土。要全国各地贡“羨余”，把地方财政全部集中到京师，并将全国金银矿冶所产之利，都纳入皇帝主管的内藏府。

在蔡京的“新政”的搜括下，皇家的钱库是盈溢了，蔡京也掠夺到大量财富。蔡京还提倡“丰、享、豫、大”之说，说什么“处于太平盛世，君主要尽情享乐”。开始宋徽宗用玉器于宴会还怕人言，在蔡京的鼓励下，这个原来就“轻佻”的皇帝，他的二流子本性得到了充分发挥，酒色财气都齐全了。先是铸九鼎、建明堂以夸富表功，接着扩大修建皇宫，建筑一座规模巨大的人造风景山——艮岳，派人四出搜集奇花异草、珍鸟灵兽安置其中，以供君臣游玩取乐。君臣几乎天天饮宴取乐，甚至粉墨登场和优伶一起演戏嬉闹，或者微服外出寻花问柳。由于君臣穷极奢侈，盈溢的钱库花了个精光，财政又陷于空前危机之中。

陷穷途悔之已晚

蔡京标榜是继承新党反对旧党，事实上新旧两党他都反对，以蔡京为首的六贼（即蔡京、王己、童贯、梁成师、李彦、朱勔）是名副其实的“刮民党”。他们为宋徽宗搜掠奇花异草、珍鸟灵兽，永无已时，并派役运往京城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即《水浒传》描写的“花石纲”，使人民负担深重不堪。而派往搜掠这些东西的官吏，只要谁家有奇花异草，便登堂入室夺取，或借“违反皇帝意旨”等大帽压人，从事敲诈勒索。受害最惨重的尤以东南地区人民为最，因而激起方腊发动群众起义。虽然被童贯率十五万禁军镇压了，人民起义还没有停止。人民愤怒地说：“打破筒（指童贯），拔了菜（指

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

蔡京为宋徽宗敛财的同时，自己也大捞一把，仅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万亩。蔡京还公开卖官鬻爵，官位还有定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他占地周围几十里以建东园，毁民房几百间以建西园，供其享乐。对这东西两园，有人讥说，“东园如云，西园如雨”。“如云”是说嘉木繁茂，望之如云；“如雨”是说被毁房的百姓，无家可归，泪下如雨。

由于蔡京剥民敛财，君臣纵情享乐，朝纲紊乱，人民厌弃，国势日弱，金人南下，宋徽宗为保命传位于其子钦宗便惶惶南逃。钦宗即位，人们认为国事至此罪由蔡京，侍御史孙覿等上疏揭露其奸恶，蔡京被贬儋州。蔡京在赴贬所途中，要买食物，人们知是蔡京都不愿卖，并指其唾骂。蔡京见人恨己如此，也不禁叹息说：“我失人心，竟一至于此！”他经潭州（今长沙）病死前写一诗说：“八十一年往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只因贪恋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蔡京看到人民对他极其厌恨，虽有所悔，但还认识不到其犯罪的原因，竟说“只因贪此荣华”。如果能像范仲淹所说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建设好了，人民富裕了，享一下“荣华”又何妨。但蔡京却恰与此相反，他是剥民敛财，“先天下之乐而乐”，结果从“荣华”至“如今流落向天涯”，死于潭州。万贯家财成泡影，臭名昭彰传万世，这是罪有应得！

五、秦桧卖国千载唾骂

在杭州岳飞墓地前，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的铸像袒臂反剪跪着，这是历史对杀害岳飞的汉奸秦桧及其帮凶的判决。奸恶已成为秦桧的代名词，尽管时间已过了八百多年，人们对这个刽子手仍唾骂不已。

被俘变节南回力主和议

《宋史·秦桧传》记载：秦桧，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1115年中进士，补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后任太学学正。1126年，金兵进攻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派使要求北宋割三镇。秦桧上疏论兵机四事，一言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只割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狡诈，守御不可松懈；三言要召集百官详细议论，采取正确的意见写进盟书，四是要把金使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朝廷置之不理。朝廷派他跟张邦昌与金谈判割地事，秦桧三次上书请辞，说：“是行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金坚持非割地不可，否则将进攻汴京。宋徽宗召集百官在廷和殿讨论，范宗尹等七十人请与之，秦桧等三十六人坚持不同意。金兵攻陷汴京，徽宗、钦宗被俘。金要立异姓为帝。留守王时雍召百官军民共议立张邦昌为帝，与会的人都大惊失色不敢答，监察御史马伸对众人说，“我们是谏官，那能不言？当共上书，乞立赵氏。”时秦桧任御史台台长，赞成马伸的“立赵氏”的意见，乃上书反对说：“张邦昌过去附会权势，实行害国之政。今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张邦昌是有责任的。天下人恨之如仇敌，如给他地盘，使其主宰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是不能为金作屏障的。金一定要立张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杀头的危险，陈说两朝的利害，请立宋的嗣君以安定四方，这不只使大宋蒙福，大金亦有万世利。”金因秦桧反对立张邦昌，乃派人抓他到军营，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

从秦桧上书论“兵机四事”及反对立张邦昌而坚持立赵氏，说明这时他还是忠于国事，忠于宋朝的。但是，不坚定的人经不起严峻的考验是会变节的。自从他跟徽、钦二帝被俘北去，据说他“杀金人监视得逃回”后就变了。原来秦桧在金营时，服事金主吴乞买之弟挾懒，在挾懒威胁利诱下，成了挾懒的爪牙。金人要其为金做事，他在公开场合拒绝，暗里则“委曲顺从”。金人南侵时，他就代金人写讨伐南宋的檄文。那时秦桧已倡和议，主张“北人归北，南人归南”，两朝分而治之，得到金人的赞赏。金人因自度靠武力难消灭南宋，便以和议来瓦解南宋军民反金之心，从和议取得割地输币之利。因秦桧首倡和议，挾懒认为他是可用而且是可靠的人，便纵之使南归。秦桧放回时，朝士提出一连串疑问：被拘北去的还有一些大臣，为何只有秦桧能归来？自燕京至楚州二千八百里，难道没有人查问，那能杀监视者南回？就算是金人有意放他，要以他妻子为质，王氏那能与之回来？由于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秦桧是好朋友，为之辩护，力荐其忠。秦桧一回来便倡议“北人回北，南人回南”的和议。这是一项恶毒的阴谋，因南宋的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人组成，如果都北回，南宋王朝抗金力量将大为削弱，金人的力量则将增强。秦桧还代写给挾懒的求和书。过去南宋对金是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秦桧始。而宋高宗赵构却很赏识

秦桧说，“秦桧忠朴过人，朕得之欢喜得睡不着觉。既得知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秦桧这个“佳士”为何竟使赵构高兴得“睡不着觉”，其中自有其奥妙：

蛇鼠一窝君臣同屈膝

秦桧知道要完成挾懒交给他的“和议”任务，手中要有大权，所以回来就千方百计设法钻入中央枢纽。当时还无宰相，秦桧便扬言：“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有人问他为何不说，秦桧说：“现在没有宰相，那能执行。”后吕颐浩再任宰相，秦桧同秉政，为夺吕权，便指使其党建议：“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赵构同意说：“颐浩专治军旅，桧理政务。”于是，秦桧得独专政事。但赵构经细加考虑，觉得“北人归北，南人归南”有不妥之处，乃召直学士院綦密礼来商议。赵构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桧又说‘为相数月，可耸动天下’，今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密礼便将赵构说的话通告朝廷内外，人们始知秦桧的奸。秦桧的主张引起强烈的反对，赵构便将秦桧罢相。后金使来，求尽全部送还北人，与秦桧所议一致，有识之士更证实秦桧与金人共谋。

秦桧罢相，但在伺机而动。金主死，挾懒继位，主张和议。这时形势有利于主和派，赵构也主和，乃再起用秦桧为相。这时，派金使来议和，入见赵构。赵构对秦桧说：“先帝的灵棺，迟二三年运回尚可，惟太后年纪已老，朕日夜思念，欲早相见，所以情愿屈己，希望和议尽快达成。”秦桧说：“屈己议和，这是陛下的孝心。见主卑屈，我们怀愤不平，这是人臣的忠心。”君臣一唱一和，煞有介事，赵构只说到徽宗的灵棺和提及想见其母，那时他的哥哥钦宗还在却毫不点及，这里大有文章。原来金人已放出风声，如不议和将放钦宗回来当皇帝，这吓坏了赵构，说为母而“屈己”是表面话，实是怕钦宗回来帝位不保，所以要秦桧与金人尽快议和。秦桧所说“见主卑屈”，“怀愤不平”，是欺人之语，他是效忠于金，故使尽阴谋，促使南宋讲和。秦桧和赵构虽各有打算，却是蛇鼠一窝，故君臣同屈膝。

赵构虽主张尽快讲和，秦桧却一再考验他是否下了最大的决心，赵构讲和之心坚决了，秦桧就可达到其讲和的卑鄙目的。有一次，宰相们与赵构议事后，秦桧故意独自留下，说：“臣僚畏首畏尾，多持两端，这不足与之断大事，如果陛下决心讲和，只专与臣商议，不让群臣干预。”赵构说：“讲和之事只委你主办好了。”秦桧说：“臣亦恐有不便，望陛下再考虑三天，容臣别奏。”又三日，秦桧复独留奏事，赵构讲和之意已很坚决了，秦桧认为还不行，说：“臣恐另有不便，想请陛下再考虑三天，容臣别奏。”赵构说：“可以。”又三日，秦桧复独留奏事如初，知赵构讲和之意坚定不移，便拿出已拟的和议请赵构批准，仍声称不许群臣干预。

朝中贤士都言和议之非，或相继辞职，或被秦桧罢职。秦桧派市井无赖王伦与金议和，金使与王伦回，金竟“诏谕江南”，把南宋视为臣属，引起朝野上下愤激，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斩秦桧与王伦以谢天下。针对主和者说“我一屈膝称臣徽宗的灵棺可还，太后可返，中原可行”，指出：“自徽、钦二帝被俘北去以来，主和议者那个不以这说以引诱陛下，但是有那一次实现。可见金人之虚伪，而陛下还不觉悟，竭民脂民膏以奉敌人，忘国家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欲将天下称臣于金才甘心。就使如主和者所议，而

陛下屈膝称臣，天下后世将说陛下是什么样的君主？何况金人变诈百出，所议决不可实现，而此膝一屈就不可复伸，国势陵夷就不可复振。”他说，“臣与秦桧等不共戴天，请斩秦桧等三人头，然后扣留金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勇气百倍。”最后表示：“不然的话，臣只有像鲁仲连那样投东海而死，决不能在小朝廷里苟且求活！”胡铨大义凛然，秦桧恨之入骨，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为罪名，派兵押送胡铨到昭州，由当地政府管制。而反对“屈己求和”的仍大有人在，司勋员外郎朱松、馆职胡珙、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说：“金人以和之一字诱骗我已有十二年了，其阴险的目的在于：覆我王室，弛我边备，竭我国力，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绝望我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行叩头称臣之礼。自公卿大夫至六军万性，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往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还有不少臣下纷纷上疏极言屈己之礼的错误。京淮宜抚处置使韩世忠四次上疏极力谏诤，指出诏谕江南是金人以“刘豫相待”，表示：“金兵势重处，愿以身当之。”金使所过之处，州县都以臣礼相迎，抵临安时，赵构欲待以客礼，韩世忠更为气愤，再上疏说，“金以诏谕为名，暗致陛下归顺之义，此主辱臣死之时，愿效死战以决胜败，如其不克，委曲从之未晚。”群情愤激如此，赵构和秦桧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出发，还是不顾一切决议议和。赵构为了遮丑，装病躲进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订和议。

为卖国冤杀岳飞臭名昭彰

1140年，金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兀术杀其叔父挞懒，夺取政权，于是撕毁和约，南侵。南宋抗金将领岳飞、刘锜、韩世忠、张浚等屡败金兵，金兵势日衰。当时岳家军战果最辉煌，所至金兵披靡，抱头鼠窜，迅速挺进到朱仙镇、即将渡河。这时金兵士气低落，纷纷准备投降，岳飞见恢复旧山河的宏愿将实现，非常高兴，对部将们说：“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金人老巢），与诸公痛饮耳！”捷报传开，前线后方军民欢欣鼓舞，谁知秦桧却令岳飞迟兵，岳飞上疏说：“金人锐气丧失，气急败坏，把装备粮草全部丢弃，疾走渡河。而我军将士听命效劳，所向披靡。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要求乘胜进军。秦桧令张浚、杨沂中撤军后，一天连下十二道金牌急促岳飞班师，岳飞极其悲愤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家军撤退时，人民拦马痛哭。为何胜利在望，赵构和秦桧急令班师？这是因金人有“钦宗”这张牌以威胁赵构，打胜了钦宗将被迎回来，他的皇位就难保了；秦会则担心主战派的代表岳飞打胜了，他的地位就难保了。所以君臣合拍，非迫岳飞退军不可，这真是千古怪事！千古憾事！

眼见抗金将领军力日益强大，秦桧恐威胁到主和派，便想法削其车权；赵构也遵其祖训“虚外防内”，便听从秦桧意见，来个“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于是，召三大将回京“论功行赏”，韩世忠、张浚任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枢密使、枢密副使都是负责军国要政的）。三大将被解兵权，金人再次以军事威胁，通知赵构，如议和要以淮水以北归金，并致书秦桧必杀岳飞和议始可成。秦桧便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岳飞父子入狱。赵构和秦桧同意金人提的和议条件：“划淮为界，岁币银绢各二十五万，割唐、邓二州”。这就是宋与金签订的第二个屈辱和约，史称“绍兴和议”。和约签订后，秦桧按照金

人意图罗织罪名杀了岳飞父子。天下冤之，闻者流涕。杀岳飞是赵构批准的，他是主犯，秦桧是策划者，他派其死党罗织罪名，秦桧实是直接杀岳飞的最可恶的刽子手。杀了民族英雄岳飞，秦桧的恶名更昭著，他的汉奸罪名也就永远抹不掉。

秦桧两任宰相，时间长达十九年。他以金人自重，挟制赵构，甘心为金人当走狗，一心倡议和向金人屈辱称臣。为了达到其议和的罪恶目的，凡反对议和的忠臣良将，都被他杀戮或贬谪，而附和议和的无耻之徒，则被提拔以为己用。这些人为他罗织罪名以排除异己。秦桧诬陷人找不到罪证，则以谤讪、指斥、怨望、立党沽名以至无君心等空洞的文字作为罪名。秦桧要害某人，都亲向其同党作指示，识之者看了其罗织的罪名，说：“此老秦笔也。”他派暗探，布满京城，即使稍有讥讽的议论，都被逮捕处治。为了掌握赵构的心理动态，他暗中结纳内侍及医师王继光，伺察赵构动静。对朝政及君国事，他向赵构上报的都是报喜不报忧，并指使其同党为其歌功颂德，如台州曾悖献诗，称秦桧为“圣相”。秦桧为人阴险，两面三刀，如张浚辞右相职，赵构问他：“谁可代卿？”张浚不答。赵构说：“秦桧怎样？”张浚说：“跟他一起共事，才知其人阴险。”赵构说：“那就不用赵鼎”。初，张浚和赵鼎两人意气相投，私交甚笃。张浚先发达，极力推荐赵鼎。俩人尝共论人才，张浚赞许秦桧，赵鼎说：“此人得志，我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张浚不以为然。故引进秦桧，共政才知其为人阴险，所以赵构要秦桧为相，张浚不同意。秦桧因此恨张浚，便挑拨赵鼎说：“上召公，而张相迟迟不召。”以激怒使之排挤张浚。秦桧在相府表面装作很听赵鼎的话，赵鼎原很不喜欢秦桧，由是反信任之，后来终被秦桧排挤。赵鼎与张浚后来相遇于福建时，谈及这事，始知他俩都为秦桧所卖。

秦桧为人阴险如此，其可恶也如此！

六、似道当权丧师误国

正当蒙古兵不断进攻南宋的时候，贾似道却不断升官，权力不断膨胀，连皇帝也俯首听命。其震主是否因他功高？抑或他有什么大本领？回答都是否定的。探讨贾似道升官和擅权秘诀，也就明白了南宋日益趋向灭亡的原因。

升官的秘诀：欺骗和要挟

《宋史·贾似道传》记载：贾似道，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是制置使贾涉之子。少年时落魄，酗酒赌博，流氓成性。以父荫当了嘉兴司仓小官。后其姐贾氏被选入官，得到理宗的宠受，贾似道因之被召到中央，升任太常丞、军器监。从此，贾似道有恃无恐，行为更不检点。白天纵游诸妓家，晚上就泛舟西湖饮酒作乐。有一天晚上，理宗登高眺望西湖夜景，见湖上灯火异常，对左右说：“此必似道作乐。”明日使人去询问，果然不错。因理宗宠爱其姐，也就不了了之。贾似道正是凭着他和皇室这种裙带关系，故能施展其各种奸计，也是他得以升官和操纵朝政的原因。

贾似道能够如此，当然有其秘诀，但揭开来，只不过是四个字，即欺骗要挟。

正是凭着姐姐的恩宠，1241年至1250年的十年间，贾似道由泮州知州升到两淮制置大使兼淮东安抚使知扬州，1257年，当了知枢密院事，任两淮安抚大使。1258年加参政知事。但贾似道为朝廷所倚重，是由于他采取欺骗手段，假报“援鄂之功”。1258年，蒙古兵向南宋发动全面进攻，蒙古大汗的弟弟忽必烈围鄂州（今湖北武昌）。贾似道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自汉阳入督师。蒙古兵攻城急，城中死伤达一万三千人，赖守将高达率援兵力战，鄂州城才保住，但贾似道吓得要死，密派使求和，条件是：向蒙古称臣，割江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忽必烈拒绝议和。后贾似道获知蒙古大汗在钓鱼山病死的消息，认为这是求和良机，又派使向忽必烈重提前次议和条件，忽必烈因急于回蒙古争夺汗位，遂许之。蒙古兵撤军，贾似道出动大军拦杀了一百七十名殿后的蒙古兵，隐瞒其向蒙古人求和的条件，谎报蒙古兵已被打退。理宗被欺骗，认为他有再造宋室之功，以少傅、右丞相身份召其入见。令文武百官到郊迎接慰劳。

贾似道也就趁机指使其党羽大肆制造舆论，鼓吹其“援鄂之功”，以宋室“再造者”自居，人们也以为如无贾似道，宋室就岌岌可危了。从此，他独擅朝政，权倾内外，为所欲为。理宗死，他扶立度宗即位，度宗昏庸，军国大事听从似道处理，称他为“师臣”，朝臣则称他为“周公”。贾似道知朝廷离不开他，便采取流氓要挟的手段，以争取更大的权。安葬理宗后，他即辞官回家，同时指使其党羽谎报蒙古兵急攻下沔（今湖北宜都东南），朝中惊骇，度宗和谢太后手诏请贾似道治事，拜他为太师，封魏国公。这么一要挟，贾似道升了官，权更大了。但贾似道还是不满足，嫌官和权还不够大，于是又大耍其流氓要挟手段。度宗以为他这位“师臣”不管事了，他的南宋王朝将不保了，惊慌得很，每日派大臣、侍从传旨挽留有四五次，派宦官送赏赐的有十多次之多，还每夜派人卧在贾似道门外把守，恐贾似道走了。度宗为挽留贾似道，授他太师、平章军国重事，许他三日一期；还在葛岭赐别墅一所，迎养其中，一切公文都送到那里签署。不久，他又称病辞职，度宗

哭着挽留不听，许他六日一朝，让他入朝不拜，而每次退朝，度宗必离座目送他离殿才敢坐下。后又许他十日一朝。经过几次耍流氓手段进行要挟，朝廷内外大小权都归于贾似道，俨然是“太上皇”了。

国难当头仍恣意淫乐

贾似道独擅朝政后，南宋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忽必烈取得汗位后，改号元，并立即派兵大举进攻南宋。贾似道国事不顾，只管贪财淫乐，时人说：“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贾似道虽深居葛岭，但其党羽遍布朝中，大小事不向他报告，谁也不敢处理。谁敢冒犯他，轻则斥责，重则撤职，正直之臣被他贬斥殆尽。他想方设法贪污，剥夺人民，一时贪风大肆。官吏都争向他行贿以求美职，送给他财货之多数也数不清。

1268年，蒙古兵围襄阳，次年围樊城，贾似道却悠哉游哉躲在葛岭别墅里享乐。他大建其楼阁亭榭，纳了许多美丽的宫女和妓女、尼姑为妾，日夜淫乐。他还邀请旧日的赌友来到葛岭，关起门来赌博，不许人窥视。他的一个侍妾的哥哥来看妹妹，站在门外还未入门，贾似道看见了，命人将他捆起来，投入火中活活烧死。有一名侍妾在西湖上看见两个游客，赞了一声：“多美的少年”，贾似道立即叫人砍了她的头。其残忍如此！贾似道尝与诸侍妾蹲在地下斗蟋蟀，他的狎客戏之说，“此军国重事吗？”贾似道酷嗜宝玩，特建多宝阁以收藏，每日都到楼上玩赏。他听说余阶有条玉带，使人求之。因知余阶死时已将之殉葬了，便派人去掘其墓取来。别人有宝物，求而不给，便加罪害之。

蒙古围襄阳、樊城以来，贾似道不组织甚至反对派兵支援，却整日躲在葛岭自乐其乐。但他却屡次上书请求亲临前线指挥，又屡次使谏官向皇帝上奏，说什么“师臣”不能离开中枢，要求挽留他在朝中。这样，这位“师臣”可不冒到前线的风险，又可在其别墅里继续淫乐了。襄阳城破，守将降，贾似道却大言不惭地对度宗说：“我屡次要求到前线指挥，先帝皆不同意，如果让我前去，不会有这种事。”这是说襄阳失陷责任与己无关，而他对国事是忠心耿耿的，他不是屡次要求到前线去指挥吗，而先帝却不允许是咎在先帝了。贾似道如此耍两面派，其奸可说是奸到了家。

害国奸臣人人喊杀

度宗病死，元军攻陷鄂州，太学生上书要求非“师臣”出师不可，贾似道不得已，只好在临安设立都督府，但他害怕元将刘整，不敢出兵。刘整死，贾似道高兴地说：“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师，集中各路精兵从水路出发，带了大批金帛辎重，船只首尾相接达百余里。至安吉，贾似道乘的巨船搁浅，千人下水拉不动，便换他船前进。但贾似道这个胆小鬼，虽率大军三十万，但不是抗元，而是想与元军求和以保命，所以一至芜湖，就送还元军的俘虏，派使送荔枝、黄柑给元朝丞相伯颜，重提以前他所提的议和条件。伯颜因他前次失信，拒绝议和。贾似道不得已命孙虎臣率七万兵驻于丁家洲，他与夏贵率军驻守鲁港。因宋军上下毫无斗志，元军来攻，不战而溃，贾似道如丧家之犬，乘小船逃到扬州，宋军三十万全部溃散。元军顺长江下，逼近临安。

贾似道鲁港兵败，其“援鄂之功”的骗局也被揭开，而其一贯向敌称臣求和，不组织抗元，使群情更加激愤。太学生及台谏纷纷上疏请杀贾似道，太后却误以“贾似道勤劳三朝”，只罢其官，谪居婺州。婺州人听说贾似道将至，贴出通告拒绝其入城。朝廷又命将贾似道改徙建宁府，有人入奏说：“建宁乃名儒朱熹故里，虽三尺孩童也粗知忠孝道理，闻贾似道这奸臣来都呕吐恶心，何况见其人！”时朝臣都主张将贾似道远谪，太后被迫才将贾似道贬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并抄了他的家。

福王芮素恨贾似道，便召募能杀贾似道者送贬所，有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贾似道行时，尚有侍妾数十人，虎臣全部赶走，并没收了他的珍宝，掀开了轿盖，让他暴晒于秋日之中，一路上还令轿夫不断唱杭州歌辱骂之。贾似道被押至漳州木绵巷，虎臣屡暗示他自杀，不听，说：“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虎臣说：“吾为天下杀贾似道，虽死何憾！”便拉杀之。

七、严嵩作恶奸险无双

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宦官。但在明世宗时，宦官敛迹，严嵩得宠，他排除异己，其子跟其作恶，害国害民。严嵩之奸，有其特点，且其人之阴险，可以说是当世无双。

媚上取宠以遂其奸

严嵩发迹，主要是靠其媚上取宠，《明史·严嵩传》记载：严嵩，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分宜）人。瘦高个子，粗眉目，大声音。1050年中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后因病辞职归家，在钤山读书十年，诗文有所长进，“颇有声誉”。严嵩正是利用其善于为文为世宗写青词和作文歌功颂德，以及善度上意而得宠。

严嵩任礼部侍郎时，世宗派他到显陵去祭其父。回来向世宗说：“当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时，皆应时而止。在枣阳刻石碑，群鹤集绕；碑运入汉江，河流忽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念上天眷爱之意。”严嵩这一捧，世宗大喜升他为吏部左侍郎，任南京礼部尚书，继改为吏部。后到京师以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参加修改宋史。这时，世宗欲将其父兴献帝庙号追尊为睿宗入太庙，位在武宗之上。世宗是继其兄武宗之位的，当时朝臣（严嵩在内）都不同意，世宗很不高兴写《明堂或问》责备群臣，严嵩一看不对头，立即改口，顺着世宗的意把兴献帝入太庙的礼仪办得很周到且隆重。严嵩这次投机，又得到了世宗给予金币的赏赐。经这两次献媚得到了甜头，严嵩从此留意钻研媚术，手段越来越巧妙了。世宗上朱元璋的“皇天上帝”尊号，严嵩上奏看见了五色彩云，请世宗受群臣朝贺，还精心撰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为世宗歌功颂德。严嵩这次阿谀奉承又大得世宗的欢心，被升为太子太保，赏赐与辅臣一样。

严嵩为争取世宗的更大信任，在世宗面前竭力表现其忠勤和不计较名位。1542年，他因媚上得宠，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时严嵩已六十余岁了，仍拼着老命，积极异常，朝夕都在内阁值班，也没有回家洗澡，世宗大为赞赏，赐其一良记，文曰“忠勤敏达”。世宗要给他加上上柱国的官衔，他辞说，“尊无二上，上非人臣所宜称。国初虽设此官，左相国徐达，功臣第一，亦止为左柱国。乞陛下免臣此官，著为令典，以昭臣节。”于是，又博得世宗的称赞。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1521—1566），1529年起就不视朝，尤其是1541年发生宫女要勒死他的事件后，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严嵩独承顾问，所下御札都经严嵩之手，同僚都不得与闻，因此，严嵩得遂其奸。严嵩之得以独掌朝政，除了媚上以取得宠信外，有其操纵世宗的诀窍，如他欲解救某人，严嵩则顺着世宗意痛诋之，婉曲为之解释，以使世宗有所不忍而从宽处理；欲陷害某人，必先赞美其优点，再揭其要害，或触及世宗所耻和忌讳之事，使世宗恨而杀之。他用这两手，使世宗或喜或怒，往往百发百中。

陷害同僚未见痕迹

严嵩陷害同僚其手段同样奸险，往往出乎被害者意料之外，还来不及申冤已脑袋搬家，或被贬斥。之所以能如此，其手段有二：一是抓住世宗的弱点，借刀杀人。世宗一心修道，政事委严嵩，是个典型的昏君，但其人自信自负，认为自己英明，如触动其短处，就要杀人，严嵩就以此激怒世宗以害人。二是两面三刀，使被害的不易发觉。严嵩野心很大，位在其上的必伺机陷害谋取其位，但对要害的对象毕恭毕敬，被害的误以为他为人诚实而不疑。他害人往往抓其要害，但自己不露面，通过其因公失误以论罪，故都没有痕迹。严嵩就用这些手段陷害的同僚就有二十多人。严嵩确是杀人不见血。

严嵩陷害夏言是足见其奸险的一个典型例子。夏言是内阁首辅，严嵩中进士比夏言早，而职位在夏言之下。开始，他对夏言很恭敬，他尝亲身到夏言家邀请其赴家宴，夏言辞不见。他向夏言请示时，长跪读其所写公文，因此，夏言以为“嵩实下己，不疑也”。其实，他是在伺机陷害夏言。世宗因修道戴道家的香叶巾冠，并将五顶香叶巾冠赐给夏言、严嵩等阁臣，夏言不戴，世宗怒甚。而严嵩在世宗召见时特意戴上香叶巾冠，并笼上轻纱保护以示郑重。世宗看见了，益内亲严嵩，他就趁机进谗言，说夏言不戴香叶巾冠是慢上，世宗果勃然大怒，将夏言撤职。严嵩乃得以补其职，掌握了内阁大权。世宗后发觉严嵩为人贪横，乃复用夏言。夏言复职后，盛气凌严嵩，其党羽被免职。其子世善横行霸道，夏言要揭发其罪，严嵩父子大惊，到夏言榻下长跪，哭着求饶，夏言为人较软，便宽容不计较，但严嵩并不因此而感激夏言，而是在伺机构罪陷害之。夏言支持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提出的收复被蒙古占领的河套地区计划，严嵩却上奏说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恰巧这时内宫失火，皇后去世，严嵩又进谗言说是因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地区，混淆国事造成的”，世宗是最迷信的，便信以为真，先后将曾铣、夏言杀了。于是，朝政大权就由严嵩独揽了。

结党营私下场可耻

严嵩掌握了大权，大肆结党营私，其党羽都任要职，士大夫争附之，文选郎中万霖、职方郎中方祥两人，时称“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等辈是其心腹党羽。严嵩父子贪甚，想得美职或犯罪求免的向其行贿，因此，每天到严府行贿的络绎不绝。

严嵩只管陷害同僚、结党营私，对边防置之不管，造成了北方蒙古鞑靼贵族军和东南倭寇对明朝的严重威胁。但是严嵩却包庇纵容通倭官僚，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如福建巡抚阮鄂通倭案发后，阮鄂以重金贿赂严嵩，得以免罪；相反，抗倭将领张经于1555年于浙江大败倭寇，俘斩倭寇二千人，是抗倭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因没有向严嵩父子等贿赂，竟被诬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严嵩贪横，引起正直朝臣愤怒，纷纷上疏揭发其罪恶，认为最大贪污的首推严嵩，由于世宗的宠信，未被治罪。过去代世宗写票拟由其子世蕃代笔，然世宗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及严嵩妻死世蕃守丧，不能代写票拟，而严嵩年过八十，人也就糊涂，受诏多不能答，往往失旨。代世宗所写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因此，渐失世宗的欢心。方士兰道行以扶乱得到世宗宠信，兰道行指出严嵩是最大的奸臣，世宗乃有意罢免严嵩。御史邹应龙有一次避雨于内侍家，知道此事后，上疏揭露严嵩

父子不法事，说：“臣言不实，乞斩臣首以谢严嵩、世蕃。”世宗便将严嵩免职，世善谪戍边地。世嵩却逃回原籍，继续鱼肉乡民，甚至私通倭寇，潜谋叛逆，御史林润将其罪行上奏，世宗大怒，将世蕃斩首。抄严嵩父子家时，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有数百万两。另强占的良田、美宅无数，仅袁州一府四县之田，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严嵩因世宗“念其赞玄修道之功”没有处刑，但过了二年，严嵩也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死去。

八、忠贤横行害人害己

明代阉宦乱政，其祸甚大，而其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一些无耻的士大夫阿附之以张其势，不然其虐焰不会这样酷烈。魏忠贤和其阉党的乱政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与客氏勾搭操纵政权

《明史·魏忠贤传》记载：魏忠贤，肃宁（今属河北）人。少无赖，与群恶少赌博，赌输了，没钱给，为债主所迫，便自阉割，托人帮助入宫当太监，改名为李进忠。熹宗年幼时，由奶妈客氏抚养，客氏原私侍宦官魏朝，所谓“对食者也”。及忠贤入宫，客氏与之私通，薄魏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勾搭。光宗死，长孙嗣立，是为熹宗。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忠贤因客氏故得任司礼秉笔太监，复原姓魏，赐名忠贤。客氏淫而狠。忠贤不知字，但能强记，为人残忍阴险，好谀。熹宗深信此两人，两人势益张，揽权内外，胡作非为。

为取得熹宗的欢心，魏忠贤极尽其阿谀奉承之能事，日夜引导熹宗为声色犬马之乐。他劝熹宗选年轻太监鍊火器为内操，后增内操万人，出入裹甲，恣为威虐。他还勾结外廷官员以为己助。魏忠贤能把持朝政，是由于熹宗昏庸，军国大事委之忠贤，专心致志做木工。他“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魏忠贤每趁熹宗引绳削墨时，便向他奏事，他听了，很不耐烦地说：“朕知道了，汝辈好为之。”熹宗这么一说，忠贤正中下怀，这样圣旨就由忠贤的意志来拟就了。实际上熹宗是把皇帝的权力交给魏忠贤，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要客人杀人矫诏便行了。每年出外巡察数次，俨然是皇帝派头，所带的随从多至万数，威风得很。所经过的地方，当地官员遮道跪拜，高呼：“九千岁！”而忠贤傲然高坐连看也不看。无耻之士大夫，上疏提及魏忠贤时，因其管东厂特务组织，都写“厂臣”，不敢称其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为皇帝拟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不称其名，把他与皇帝相提并论了。据说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象上报，黄立极等拟票旨说：“厂臣修德，故仁兽至。”这不仅是谄谀胡说，而是把皇帝置于其下了。

忠贤手握皇权，反对或不附己的，则矫诏贬杀；同时利用东厂特务组织，缉访内外，不论是否事实或有否证据，要你死即死。戚臣李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家藏有皇上赐公主之物，忠贤竟诬以盗乘舆服御物之罪，论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其奴上告，忠贤杀之，抄其家。民间有议忠贤，就被擒杀，甚至剥皮、割舌，被杀的不计其数。

忠贤横行于朝廷内外，客氏作恶于内宫，她胁持皇后，残虐宫嫔，裕妃张氏怀孕，客氏潜杀之；皇后张氏怀孕，客氏设什使其堕胎，熹宗因之无嗣。宫妃和太监被她害的还很多。她还家里藏宫女八人，想效吕不韦所为，其狼子野心可见。

正因忠贤和客氏内外勾搭作恶，朝政日非，政治黑暗，坏人当权，正人遭殃。

组织阉党屠杀东林党人

魏忠贤如此嚣张，是因有一批无耻的士大夫依附，组成了一个有很大势力的阉党。魏忠贤斗大的字都不识，毫无知识，其理事都是其党为之参谋。而阉党能形成也与朋党之争有关。神宗时，各成朋党，互相排斥。无锡人顾宪成政见与当权者不合，辞官回乡，讲学于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弊，海内士大夫多附和之，时称“东林党”。熹宗即位，是由给事中杨涟等东林党人拥立的，故熹宗继位之初，都由东林党人当政。魏忠贤得势，“邪党”便依附之以倾倒东林党人。初，魏忠贤干预朝政，受到东林党人反对，乃谋结外廷官僚为援，顾秉谦、魏广微率先依附。副都御史杨涟揭发忠贤十四条大罪，东林党官员七十余人也纷纷上书揭露忠贤不法行为，因有客氏从中支持忠贤，熹宗不但不罪忠贤，竟下旨严斥杨涟。忠贤益无忌，在内阁逼走东林党人，由顾秉谦任内阁首辅。从此，内外大权归忠贤。中央各机构都由阉党把持，外廷文臣有“五虎”主谋议；武臣有“五彪”主杀戮。此外还有被称为“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一大帮爪牙。四方总督、巡抚，也都偏置死党。

魏忠贤因遭到东林党人弹劾，恨之入骨，欲尽杀之。顾秉谦便将其所忌的东林党人的名单送给忠贤，于是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名东林党人先后被罢斥，并兴两次大狱：1625年，辽东经略熊廷弼因被后金战败被押在狱，忠贤指使其党羽诬陷东林党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接受熊廷弼的贿赂，将之逮捕下狱，进行惨无人道的逼供拷打，除顾大章被迫自杀外，其余五人全被折磨而死。1626年，又逮捕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遵素、李应升等士人，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惨死于狱中。这两次大狱被害的，史称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

恶棍立生祠欲盖弥彰

当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已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其徒子徒孙莫不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凡有好事，不管大小都归功于魏忠贤。如辽阳一男子武长春宿娼时，因发狂言被东厂逮捕，其党羽竟说是“赖厂臣（指魏忠贤）忠智立奇勋”，不然将为祸乱；仓场失火，也说是忠贤所救“得无害”。又如筑山海关城、捕获大盗王之锦、修峻孝陵工，都说是由于魏忠贤的规划和指挥得宜。魏忠贤还经常冒边功，如袁崇焕宁远捷，竟冒为己功，崇焕功却不录。在其徒子徒孙的吹捧下，这个恶棍一下子变成了大贤大圣人，有的奏请应为魏忠贤建生祠，有的请以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公。这么一来，海内争望风献媚，上至四方督抚大吏争颂德立祠，下至武夫、商贾、诸无赖子亦各建祠，汹汹然唯恐不及。所建生祠极其工巧、华丽，为建祠大肆强占民田，拆毁民房，甚至斩伐墓木，被害者敢怒不敢言。魏忠贤生祠遍布各地，强令人们顶礼膜拜，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蓟州道胡上不写建祠文，皆下狱论死。但“恶有恶报”，魏忠贤这个恶棍想用生祠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是徒劳的。

熹宗死，其弟朱由检继位，称思宗。思宗索知忠贤恶，深自警备，阉党自危。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阉党。嘉兴贡生钱嘉征揭发魏忠贤十大罪行，思宗召忠贤，使内侍读之，忠贤吓得发抖。初，贬谪凤阳。不久，又派人将之逮捕治罪。忠贤闻讯畏罪自缢死。思宗下诏分裂其肢体，悬首于河间。答

杀客氏于浣衣局。其大小党徒二百零四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九、和珅恃宠贪赃枉法

和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在世界上也堪称第一。明朝大贪污犯严嵩与之相比，奸险过之，明目张胆则不如，贪污数目远远不及。这个超级贪污犯，到头来除了自取灭亡、遗臭万年之外，对他又留下些什么呢？

攀上皇亲胡作非为

《清史稿·和珅传》记载：和珅，字致斋，钮祜禄氏，满州正红旗人。年轻时，是个穷生员，承袭其先人三等轻骑都尉职，后授三等侍卫。因其相貌俊秀，又有文化，善投乾隆之所喜，获得乾隆宠爱，不断升官，掌握了政、军、财、文、人事、内务、民族等大权。是乾隆在位时最显赫的人物。

和珅权力大膨胀是在攀上皇亲国戚之后。1780年，和珅以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身份被乾隆派往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贪污案。侍尧被称才臣，为乾隆所倚重。和珅到云南，通过审问侍尧的心腹仆人，查清了李侍尧婪索贪污的事实，处以重刑。他在云南办案过程中，还发现云南吏治败坏、各州县财政亏空严重，向乾隆报告，建议急于清理。由于他办案有成绩，得到乾隆赞赏，还未回京，即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及至京，向乾隆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乾隆深表赞同，并按此办理。又授其御前大臣兼都统，招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的附马。随即授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理藩院尚书事。从此，和珅被宠信在群臣之上。

最有讽刺意义的是：以审处贪污发迹的和珅，当他掌握大权后，其贪赃枉法更甚。由于他经常在御前行走，对乾隆的所喜所怒摸得一清二楚，故能迎合他所爱所憎，窃弄权力以作威作福。不附己者，伺机进谗激怒乾隆，以陷害之；犯罪而向他行贿的人，就千方百计为之周旋，或将其事拖延，等到乾隆怒火平息之后，乘机说情为之开脱。

乾隆在清代也算是一个有为之主，他对贪赃枉法之徒多严惩治，唯独对和珅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理。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乾隆晚年，连年兴兵，大兴土木，大搞巡游，所需之经费非正常赋税收入所能供给，其超过的都委和珅代为筹办。于是，和珅便向四方勒索，和珅之权足以决定人们的祸福，谁敢不听命，不贡献。和珅从中乘机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地方督抚所进献给皇帝的贡物，乾隆仅收到十分之一、二，其余全被和珅贪污了。正是由于乾隆的信任和为和珅开方便之门，和珅才敢明目张胆为非作恶。因此，可以说乾隆是他贪赃枉法的靠山。

营私自肥手段恶劣

如果说乾隆是和珅贪赃枉法的靠山，那么，和珅却是当时贪污分子的总后台。由于是乾隆要其筹款，和珅就可放手伸向四面八方要求贡献，地方大员那个敢不供给？于是，他就趁机大肆向下勒索，其下也向所属照此办理。于是，层层勒索，层层中饱私囊，形成了一个从上至下的全国贪污系统。而“羊毛出自羊身上”，大小官员共同剥削的对象必然是老百姓，这就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造成老百姓穷苦不堪，被迫铤而走险，清廷就派兵镇压，

将帅要求拨军费，必须向和珅行贿，否则借故拖延，故将帅都克扣军饷贿赂和珅，并从中贪污。清朝盐政最赚钱，因和珅征取无厌而日益凋敝，仅两淮盐政征瑞一人送给和珅的贿赂就有四十万两银子之多。

于是，全国军政大贪污分子无不投在和珅这个总后台的麾下，以求其保护。当他们出了问题时，和珅就大力包庇。御史钱沅上奏揭发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赃营私，乾隆派和珅和都御史刘墉前往查办。和珅受过国泰贿赂，派人急报国泰准备对付，国泰就预先设法弥补国库中他们盗去银两的亏空。和珅为包庇国泰过关，清盘银库时，令抽视银数十封无缺，就草草收场，便要起还行馆，企图蒙混过关。可是，刘墉要求封库，坚持明日全部清盘，结果发现是借商人的银子来充数，国泰等的贪污罪行才审查落实。但和珅对贪污犯国泰等的包庇，乾隆却未见过问，在“加恩”中外大臣时，和珅得加赐太子太保，充经筵讲官，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户部如故。乾隆八十大寿，命和珅和尚书金简专负责庆典事。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说各省库存已空，乾隆知道了很不高兴。省库空虚，和珅是心里有数的，是因地方官贪污和向他行贿之故，他不得不请派尹壮图往查省库的同时，使其心腹、侍郎庆成同去，暗中监视并串通各省大员设法应付。每至一省，庆成都设法拖延，待该省官员将银库挪移足了，然后查库，结果都未见亏空，尹壮图因之以妄言被撤职。御史曹锡宝上疏揭发和珅家奴刘全奢侈潜妄，建屋超过制度，乾隆知其欲弹劾和珅，因怕和珅不敢明言，故先揭发其家奴，乃派人去调查。和珅知这事后预先使刘全毁屋更造，因而查无实据，审问刘全时使其谈和珅的私弊，刘全也守口如瓶，结果查无所得，锡宝受到了谴责。

罪行被揭身败名裂

“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的靠山乾隆死了，这个中国以至世界历史上的最大的贪污犯的末口也就来到了。1795年，即乾隆八十六岁时传位于皇太子颙琰，称嘉庆。但乾隆在死前，仍紧抓军政大权不放，嘉庆只能“朝夕敬聆训谕”而已。和珅为讨好颙琰，他被封为皇太子前，和珅将乾隆的意图告他，说明颙琰得为皇太子是他拥立的。但颙琰早知其奸，及继位，因乾隆还在，不敢处理。乾隆死，给事中王念孙首先弹劾其种种不法罪行，嘉庆于宣读乾隆遗诏的那天就下旨逮捕和珅，命王公大臣会审，俱得实情。嘉庆便下旨宣布和珅二十条大罪，抄其家时，嘉庆宣布其家产清单共计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计，已估者二十六号，即合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抄出的东西计有除金、银、玉等器物几百件外，还有金银元宝各一千个，生沙金二百余万两，赤金四百八十万两，白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五万八千元。银号四十二座，当铺七十五座，古玩铺十五座，地亩八千余亩。全部估算，台白银八亿——十亿两之巨！最后，嘉庆令其自尽。

直隶布政使吴熊光来朝见，嘉庆问他：“人言和珅有异志，有否事实？”熊光说：“凡怀有不轨之心的人，必收人心，和珅则满、汉几无归附者，即使怀有不轨之心，谁肯从之？”嘉庆说：“那么，处理他是否太急了？”熊光说：“不速治其罪，怕其党羽日久攀附联络，别滋事端。发之速，是义之尽，收之速，是仁之至。”这个超级贪污犯杀之是百分之百应该，是大得人心的。但对嘉庆来说，他对和珅这笔天文数字的财产垂涎已久，据说，所没收的财产大部归入皇家银库，当时有民谣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跋

由于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拙著《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三国智谋精粹》，该社杨岗副编审经常与我有信往来，我们神交已久。杨岗副编审曾约我有空到京商谈长期合作问题，我趁今年五月间到浙江富阳县参加中国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之便，顺道到京拜访，我们一见如故。我将我撰写的“廿五史类评”的四本书稿（现改为“智慧四书”）的提纲交给杨岗副编审，他看了当即答应“四书”一起出版。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已向韩天雨总编辑汇报，并征得其同意，嘱我将书稿尽快整理寄来。我对中国经济出版社处理书稿的果断、快捷和魄力，深为敬佩和感谢。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深深地体会到“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酸甜苦辣，编辑编改的好作品，人们赞美的是作者，编辑自甘默默无名。如这“智慧四书”，该社编辑同志费了很多时间审改，并对有关史科、典故逐一稽考核实。仅是书名，杨岗副编审与韩天雨总编辑就商量过多次才最后改定。这套丛书如为读者喜欢，有益于社会，作者不敢专美，因该社编辑也花了不少宝贵的心血。在此，特向中国经济出版社深表谢忱。

霍雨佳

1993年8月13日写于海口胤园

